

日本军国主义

(日) 井上清 著

第 **3** 册

商务印书馆



日本军国主义

第三册

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

〔日〕井上清 著

马黎明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目 次

对新版《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的说明	1
第一章 军部的形成	5
第一节 “军部”的概念	5
第二节 天皇制军队与人民	14
第三节 军队从政府独立出来	28
第四节 军阀的形成	44
第五节 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部”的形成	57
第二章 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军部	74
第一节 军部同政党和人民的对抗	74
第二节 军部对中国的干涉	92
第三节 军部的后退和准备反击	115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	
——《东洋经济新报》杂志的作用——	136
第一节 围绕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的各种思潮	136
一、参战思潮	136
二、反对参战、反对要求利权	143
第二节 围绕着“二十一条”要求的各种思潮	151
一、“应该尽快放弃满洲”	151
二、“二十一条”要求的热潮	158
三、唯一的彻底反对论	168
第三节 大战期间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	173
一、对内——民本主义,对中国——帝国主义	173
二、真正的“日华亲善”论	180

第四节	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顶峰	185
一、	巴黎和会前后	185
二、	“放弃一切的决心”	193
第五节	批判帝国主义论的动摇	203
第四章	侵略中国的七十年	211
序	211
第一节	友好的两千年	212
第二节	对欧美的从属及对朝、中的侵略	220
第三节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	228
第四节	对辛亥革命的干涉	234
第五节	是实行经济、政治侵略？还是采取军事高压政策？	241
第六节	为走向“九·一八事变”铺平道路	247
第七节	战线扩大，国内法西斯体制的推进	257
第八节	日本侵略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	265
第九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中战争	271
跋	278

对新版《日本军国主义》 第三册的说明

新版《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的第一、二两章，相当于旧版《日本军国主义》第一册“天皇制军队的形成”序言中预定编入的项目——“军阀和政治”。第一章“军部的形成”和第二章“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军部”，其内容互相衔接。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主要推行者——“军部”，最初以“军阀”出现，不久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便发展成为“军部”，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牢固地占据了日本国家机构。第三册的前两章旨在阐明这一历史过程及其结构。

其次，第三章收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东洋经济新报》杂志的作用”一文，论述了曾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杂志《东洋经济新报》的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观点在舆论界和思想界所占的地位。由此我想阐明在我国国民中间曾经有过如此了不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潮流，同时还想剖析一下这一潮流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很快受挫的原因。

最后一部分，收录了概观近代日本侵华史的“侵略中国的七十年”。“侵略中国”正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自始至终一贯的主要目标。而这种侵略的不断继续和升级，终于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惨重失败和彻底崩溃。这段历史连同本书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中所载“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的惨败历史，对现代的军国主义分子也好，对其反对派也好，都将成为一面很好的镜子。

第三册各章论文最初发表的标题、发表单位、时间及改动如下：

第一章“军部的形成”是原标题，发表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发行的《人文学报》第二十八期上（1969年）。

在将上述论文收录于本书时，只将原文中的“前言——‘军部’的概念”的“前言”部分改为第一节，原文第一节改为第二节……，以后类推，并对原文略加整理，内容没有改动。但在最后简单补充了宫中设立侍从武官府一事。

第二章“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军部”，是井上清编《大正时期的政治与社会》（1969年，岩波书店）一书中的论文之一。该书汇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集体研究的成果。

原文第一节就“军部的形成”作了简述，这次全部删掉，因为与第一编论文内容重复。所以把原文第二节在本书改为第一节，开头部分稍许作了改动。第一编论文和这个第二编论文几乎可以看成一篇论文的前后两部分。

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东洋经济新报》杂志的作用”，是井上清、渡部彻合编的《大正时期激进的自由主义》（1972年，东洋经济新报社）一书中的论文，该书汇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集体研究的成果。

原标题为“帝国主义批判论”，没加副标题。即使如此，如果放在原书中，还是可以领会题目的意思的，但是，如果单独提出来，是何时、谁批判的就不明确了，因而改动了题目。文章内容几乎并未改动，只在两处补充了不足一页。其一，在第一节末尾收录了提纲挈领地概述《东洋经济新报》对整个国内外政策所贯穿的民主主义（不是民本主义）立场的社论及其纲要；其二，在第三节末尾补充了主张台湾和朝鲜实行“自治”、“独立”一点。

以上两点，在《东洋经济新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中，是重

要的、不可缺少的。本来，我的论文只是在发表集体研究成果时我所分担撰写的部分，所以它不是全面完整的東西。当把它从原书抽出另行编入其他论文集时，按说最好应该把《东洋经济新报》的基本立场、它对朝鲜和台湾的看法以及反对出兵西伯利亚的主张，具体地加以详述，但因这些方面，已由我们集体研究组的其他成员写得很详尽，所以如上所述，本书只极简单地作了抽象的补遗。

第四章“侵略中国的七十年”，是将朝日新闻社编《日本与中国》第二卷（1971年）《日中关系是什么？》中的“侵略的一百年”一文改题写成的。

原文把侵略不仅限于军事侵略，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日本政府仍与中国领土台湾的“中华民国”伪政权保持“邦交”关系，对其继续进行经济侵略，继续推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也包括进侵略时期内，题为“侵略的一百年”。但以日本旧军国主义为主题的本书，只限于军事侵略，将范围定为从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到1945年战败的七十年。日本战败后敌视中国的问题，将在以战败后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为主题的第四册中论述。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刘剑乔同志曾对译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谨此致谢。——译者补记

第一章 军部的形成

第一节 “军部”的概念

凡是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军部”专制时代的人，即使对“军部”一词不能给以一个明确的概念，也能对其基本的涵义和内容有一个感性认识。一提到“军部”，就会使人联想到，它是一股特殊强大的势力，它依靠陆海军或其总体的军事力量，恣意操纵全部国政。“军部”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构，或者甚至可以说，“军部”是由“少壮派军官”、“中坚军官”等组成的一个集团。然而，如果所说的“陆军当局”或“军事当局”，和所说的“军部当局”实质上即使相同，但后者并不单是“军务当局”，另外还有“某种特殊的政治势力”的涵义。本来，“军部”一词就容易具有这后一种涵义的因素。从1930年前后开始，在陆海军逐渐走向与政府相对抗，不久便几乎牵着政府走的过程中，“军部”一词便盛行起来，指的是变成了对抗政府的一股政治势力的陆海军了。

我不准备考证“军部”一词从什么时候用起来的。1898年台湾驻军的一个特务曾以“陆海军当局”的涵义用过“军部”一词（参照本书第50页），但这是极其罕见的例子，除此以外，在1910年以前的公文、报刊、杂志、书籍及其他文件上，我还没见过“军部”这个词。我首次看到这个词，是在1913年2月2日田中义一少将（第二旅团长、前陆军省军务局长）致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的信件里。信中田中向寺内详细报告了日本国内的政情，并谈论了对

策^①。内称：

“自去年年末以来，鄙职从未得见公爵（即当时的首相桂太郎），窃惟当今最须注意者，乃军部之态度。万一海军属政友会^②，陆军属新政党（桂太郎正在组织），各据分野，实为国家堪虑之大事。窃惟今后至要者，乃陆海军协同一致，屹立于政党之外。（中略）再者，此次桂公建立之政党，恐将主张修改陆海军大臣官制^③。”

显而易见，信中的“军部”，意味着陆军和海军的总体。此外还有一种设想，即“军部”要形成对抗政党和政府的另一个世界。但是，假设这封信要写在1930年以后的话，信中的“陆海军大臣”就应该写作“军部的大臣”，可见当时“军部”这个概念还很难说已经确立起来了。

比这封信晚三个月的“大正二年夏初”，陆军省军事科长宇垣一成大佐撰写了《关于陆海军大臣问题》一文^④。文中多次使用了“军部”一词。他所以特意使用这个词，当然可以了解。因为宇垣是在上述田中担任军务局长时的手下的科长，1912年（大正元年）12月，同田中局长共同策划要强行增加两个师团，结果没有成功，从而导致上原勇作陆相单独辞职、西园寺内阁垮台，进而又造成了那年“大正政变”的原因。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宇垣是主谋之一。可以说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部“中坚军官”的先驱。他写这篇文章是在大正政变以后不久，对山本内阁^⑤废除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专任制的问题，提出了如下的反驳意见：

① 《寺内家文书》，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书，全文见本书第79页。

② 政友会：（1900年8月25日—1940年7月），即立宪政友会的简称，由伊藤博文创建，与民政党同为日本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多次掌握政权。——译者

③ 陆海军大臣官制：指陆海军大臣须由现任武官担任的制度。——译者

④ 《宇垣一成日记》1。

⑤ 首相山本权兵卫。——译者

“据吾人所知，从未闻当时^①就后任陆相进行内部磋商之事，故政党者流所谓后任难产云云，据吾人观之，纯系揣度臆测军部之意向，可谓徒自画鬼于壁，望而生畏，自欺欺人……。”

“掌管军政、统辖军人军属^②、且负有行使统帅权、堪称军队首脑之陆海军大臣，竟肆意扩大其任用范围，甚至扩大到可随意加入政党派系之预、后备役军人，使吾人不得不有所醒悟：终将遇上拥戴热狂于争夺政权、具有党派关系之人物为陆海军部首脑之时期。（中略）将政党人物安插于军部首脑要部，能否使属下众多官兵正确遵守先帝陛下之圣谕、陆海军刑法之要求，实在令人怀疑。”

宇垣主张“军部大臣”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的基本理由有以下四条：（1）、如引文所述，将“酿成军人最忌讳之党派思潮”，违反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军人敕谕》，挫伤军队士气；（2）、“军部大臣”平时主宰需要渊博专业知识与经验之军政，战时则成为大本营“重要决策人之一”，故必须是具备“卓越的用兵见识”和“日新月异的军事知识”者；（3）、“危害命令与服从之关系”；（4）、“危害统帅权之作用”。

宇垣也好，田中也好，他们都顽强地想把军事置于一般国政之外，由此便产生了包括军政在内的一切军事，都应该由不受政府控制的“军部”来独断专行的想法。另外，“军部”也可单指陆军，而不是指整个陆军和海军，这可从上面最初引用的宇垣的文章看得出来。这种把“军部”同政府并列起来的思想，在一份标有“绝秘”字样的陆军内部文件《鉴于时弊，关于拥护军令权独立之建议》中，明确地表现出来，据推测，这是1914年的文件，^③摘录于下：

① 指上原勇作陆相辞职之时。

② 军属：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译者

③ 小林幸男：《海军大臣事务管理问题始末》，《法学》杂志，12之1。

“内阁总理大臣虽以首席国务大臣组阁，但对属于政务以外之国防事务，毫无置喙之权，更何况国防所需兵力之裁决乎！（中略）当今正值我军制危机，建军根本行将动摇之秋，故宜在扩充兵力之前，牢记军制要义，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先行协商，基于完全一致之意见，与行政部交涉，以维护军令权之独立，不至贻误国军之建设。如行政部因财政状况，不能接受军部要求，双方则应进而一再协商，自定缓急顺序，决不可仰承内阁之成案。”

文中以“军令权独立”为武器，把兵力的决定也列为内阁不得干预的事项，并在文字上把“行政部”^①与“军部”对立起来。这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军部”的基本涵义。1913至1914年间所以形成这样的概念，正是因为在此前不久已经形成了“军部”的实体。阐明“军部”形成的历史，是本文的主题。本节先回顾一下“军部”这个概念的演变过程。

以上引用的只是陆军内部的史料，而且田中和宇垣都具有强烈的“军部”思想，并且是亲自实践这种思想的政治军人。最后引用的史料，据推测可能是山县有朋或其亲信田中义一写的“建议”^②，如果推测不错，那么山县有朋正是创立军部的最高领导人。在他们当中形成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部”概念，应该说是当然的。在这个时期和大正年间使用“军部”一词的例子，除了陆海军内部的文件以外，我只在军事评论家西本国之辅的文章中，看到一次。西本国之辅是个退役骑兵军官，他始终反对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统帅权的独立和扩充军备。1913年，西本在《修改贻祸之军相官制》^③的短文中，批判了山本内阁一味地把陆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扩大到预备役、后备役将官，强化参谋本部权限的作法。他指

① 行政部：指政府。

② 前引小林幸男的论文。

③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1913年（大正二年）7月1日。

出,在这次修改中,“长州阀军人估计到,在看到文官出身的军部大臣以前,舆论界必将群起而攻之,于是便采取了企图坚守参谋本部的方针。”

这里所说的“军部大臣”,并不是居于政府之外的“军部”的大臣,而是指在政府里负责军务的大臣,但他为什么使用了“军部”一词,却不得而知。这个时期前后,除了前面引用的陆军内部公文以外,一般社会上都把陆海军大臣干脆写作“陆海军大臣”或“军务大臣”。西本的这篇文章,标题用的也是“军相”一词。在下一期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①上,刊登了法学家林毅陆对该问题的意见,文章中只用“军务大臣”这个词。此外,例如《日本及日本人》杂志^②上刊载的以《设置国防会议引起的麻烦》为题的文章中写道:“不称国防而只称防务,实则也是由于内阁屈服于陆海军所主张的关于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员的大权论”,这里所说的“陆海军所主张的……”,如果文章是1930年以后写的话,就很可能将“陆海军”写成“陆海军部”或“军部……”。

总之,这一时期,尽管有极其罕见的例外,但一般社会上还未出现“军部”这种提法。对于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陆海军,社会上只称之为“军阀”。当然,“阀”字是含有贬意的。陆海军当局所说的“军部”,不过是把社会上非难的“军阀”在军队本身的主观上认为没有任何恶意的理所当然的表现罢了。例如1922年2月,众议院有人攻击帷幄上奏权,吉野作造也撰文《论所谓帷幄上奏》,前后五期连载在《东京朝日新闻》,攻击“军阀”。而作为回答各报纸都在《帷幄上奏辩》的标题下,发表了“陆军当局谈”,其中就规定了所谓帷幄上奏权的内阁官制第七条说:“近来认为此条款招致军部专横,妨害一般政务的统一……”;“社会上往往评论说,参谋本部或

^① 1913年(大正二年)7月15日。

^② 1914年(大正三年)7月1日。

军令部是军部最终最高的决策机关,由它来决定军备,对此,内阁、议会也只好唯命是从,这只能说是不符合实际的议论”等等。这里所说的“军部”,就是当时社会上所说的“军阀”。1930年以后的军部,无非也是一种军阀。因此,太平洋战争以后,有不少人把军部叫做军阀。书名上也有这种表现,如《军阀专横的真相》^①、《军阀暗斗秘史》^②、《日本军阀暗斗史》^③、《军阀兴亡史》^④等等。

如果把军阀称为军部,字面本身并无贬意。而且这个词具有始终把政府看作是行政部,军部则是一个同它并列的特殊的国家机构——它正是军阀的本意。因此,宇垣者流在他的《一如庵随想录》^⑤中,一再用了“军部”一词。而且有不少地方涵意是指陆军,可以说,这反映了陆军特别军阀化了。而且我还觉得并非偶然的巧合的是,自从滨口内阁^⑥取代了田中内阁^⑦,宇垣一成再次^⑧当上陆军大臣以后,在报刊杂志上,“军部”一词越来越多地代替“军阀”而出现。田中内阁的首相田中义一,是尽人皆知的长州军阀的巨头,所以田中内阁被反对派称为军阀内阁。而民政党的滨口内阁,由于前内阁不得人心的反动,人们对它比较抱有好感。宇垣陆相在陆军省内组织了一个“军制调查会”,为了适应政府紧缩财政的方针,摆出了陆军似乎也要精简的姿态,使社会上攻击军阀的声浪消沉下去。此事和批评当局时不称军阀而称军部,可能有关系。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的,例如《大阪朝日新闻》在批判

① 1946年,田中隆吉。

② 1946年,马岛健。

③ 1947年,田中隆吉。

④ 1958年,伊藤正德。

⑤ 公开出版的书名为《宇垣一成日记》。

⑥ 首相滨口雄幸。——译者

⑦ 首相田中义一。——译者

⑧ 1929年7月。

“军制调查会”的社论^①中指出，甚至连当初对调查会寄托希望的人们，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这不过是军阀为了缓和社会上裁军的呼声惯用的伎俩而已”。然而，这篇社论还指出，“专门研究军事军略的陆军当局”，根本没有能力判断“国家的思想、产业和财政”，因而反对他们想要审议国防根本方针政策，强调了政治优越于军事，但它的调子却很温和，只停留于攻击“军事当局”、“陆军当局”的秘密主义。若是1920年前后的改革派，在这种情况下，大概不会称它是“军事当局”，而会毫不留情地攻击它是“军阀”。

在此以前的《大阪朝日新闻》上，尚未见过“军部”的提法。翌年，1930年3月，该报在报道政府与海军军令部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②上意见对立的消息时，写的也是“海军和外交当局的意见，处于决不相容的状态？”^③，“海军方面始终强硬”^④等等，并没有使用“军部”一词。“军部”的提法首次在该报出现是4月1日的社论，其中写道：“海陆军与外交当局在国防上犹如车之两轮”，“外交当局同军部当局的协调，绝对必要”。这里所说的“军部”，是与外交部门相对而言，指陆海军所有的军事部门，还看不出它具有对抗政府的特殊政治势力的涵义。但第二天，即4月2日，在报道加藤军令部长凭帷幄上奏反对政府妥协案的消息时，以《咨询枢密院之前，是否采取适当方案——军部保留的最后手段》为题，报道说，“因为条约内容与国防计划有关……，所以军部企图采取奏请召集军令事项的咨询机构——军事参议院会议，以采取适当措施的方针。（中略）认为这大概是军部今后所要采取的最后手段。”就是说，这里是将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与政府相对抗的海军军令部

① 《大阪朝日新闻》1929年（昭和四年）11月10日。

② 伦敦海军裁军会议：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在伦敦召开，会上美、英、法、意、日等五国签订了《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译者

③ 《大阪朝日新闻》，3月28日。

④ 《大阪朝日新闻》，3月31日。

长为中心的海军首脑部门,写成了“军部”。

在批准“伦敦条约”^①的过程中,内阁与海军首脑部门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统帅权独立的问题,骤然尖锐化起来,不管是海军、陆军还是其整体,总之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与政府相抗衡的“军部”的概念,迅速一般化起来了。

可是,在此以前也有过表示对抗政府的军部这一概念的例子。例如1928年6月27日的《国民新闻》,就公布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真相和处罚其负责人的问题报道说,主张坦率地公布事实真相并在较大范围内处罚其负责人的田中首相同持反对意见的陆军之间发生了对立。还发表了以《因满洲某重大事件,首相与军部意见冲突》为题的文章,文中指出:“在上原勇作元帅等军部巨头之间……”、“陆相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懑,待军部首脑之间达成协议后,再作出某种回答……”^②。另外,三宅雄次郎主编的《昭和四年史》^③,在有关宇垣陆相提出的军制改革方案的记述中,曾提到“对于陆相不惜裁减师团的积极意图,在军部内,尤其在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部内,出现了反对意见”,“然而,在军部尚未确定基本意见之前,政友会已先主张整理削减陆军军备。迫于这种形势,陆军部内巨头之间亦逐渐达成谅解。”

通观这些史料可以看出,1929到1930年(昭和四到五年),陆海军当局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用过的“军部”这个概念,已在一般社会上使用,它的涵义是以陆军或海军的各自军令机关作为中心,但并不止此,还包括陆海军省、军事参议官、元帅在内的所有军队首脑或者陆海军的总体,这些都不是只限于本来的军务,而是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在政治问题上或多或少强调自身的政治势力了。在

① 伦敦条约:即上述《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译者

② 据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册中的引文。

③ 1930年(昭和五年)2月出版。

这种军部立场的根子里，已经不仅是统帅权的独立、军人垄断军事、不准政府和议会介入军事，而且还有企图使政治从属于军事的思想。以“伦敦条约”问题为转机，军部同政府、执政党以及广大人民的舆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这时军部固然失败了，但由于这种尖锐的对立本身，使整个社会对军部的存在具有了强烈的印象。另一方面，陆军和海军都对政府和议会越来越不信任，可以说，加强了军部的军阀性。同时，所谓的“青年军官”和“中坚军官”这一伙人成了军部的引爆力，接连制造了1931年的“三月事件”、同年9月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其次是“十月事件”、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和战争，军部逐步确定了对政府、政党、议会的决定性的优越地位。同时，“军部”一词，也逐渐用于那些并非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单纯军事行动的军事当局。例如1932年12月29日的《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以《我军部密切注视热河风云》为题的文章，说：“目前陆军派遣古庄少将赴关东军，令其进行重大协议，军部尚未考虑积极进军热河。（中略）据军部看来，华北各将领间的利害关系，并非以张学良为中心取得一致……”。再如以《关门^①架桥受挫折，军部当局不赞成》为题的文章中说：“就关门架桥问题，土木工程局长唐泽要求陆海军部予以谅解，但军部当局以军事上的理由，不太赞成内务省的架桥计划”^②，这些过去可能写作“陆海军当局”的地方，也用了“军部”一词。

现在如果说军部大臣，只是指陆海军大臣而言，大都没有特殊的政治涵义，随便把军事当局称为“军部”已经成了超历史的概念。随着二十世纪头十年代初期“军部”实体的建成，和其内部形成的历史概念，到了三十年代初期，便成了一般社会上的常用词，后来，

① 关门：指日本的下关和门司。——译者

② 《大阪朝日新闻》，1932年（昭和七年）12月2日。

随着军部对国务的全面控制，“军部”便具有了包括军或军事当局的超历史概念的性质。本篇论文要首次剖析军部实体的建成过程，“军部”一词，只用作历史的概念。

第二节 天皇制军队与人民

军部的建成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为基础的。天皇制下的日本军事机构，早在法制上就得到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保障，成了建成军部的条件。关于天皇制下的军事制度，松下芳男著的《明治军制史论》(上下集)，用法学观点对于法制上的沿革以及关于那些法令的解释，几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所以我不想对法制本身深入详述，只想从政治史的观点，就军事机构的独立性问题，探讨一下军部的形成和它所起到的作用。

天皇制军队是靠国民征兵制建立起来的，但它从建立之初就脱离了国民，甚至同国民相对立。这是军队很快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大前提。

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天皇政权，当初它本身没有一个兵员。1868年正月初三(旧历)天皇政权才首次建立了类似统治机构的组织，把国务分为七科，将其中一科设为海陆军科，二月初三，将七科改为八局，海陆军科改为军防事务局。但是，这个科或局只能向归顺天皇政权各藩的军队下达极其有限的指示，并没有直属的军队。军防事务局成立后不久，在局内设立了“亲兵总管”，由大和十津川和其他乡士^①组成“御亲兵”^②，兵员仅四百名，这便是天皇政权最初固有的军队。

① 乡士：住在农村的武士。——译者

② 御亲兵：指直属天皇的军队。——译者

天皇政权并不是靠人民^①对封建领主进行革命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而主要是一些从封建领主阶级的下层——下级武士中产生出来的改革派，在长州藩和萨摩藩里掌握了藩的实权，以两藩的联合为主力，得到了其他各藩部分政见相同的改革派及各地的地主富农（乡士亦即其中一部分）、商业资本家、批发商式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资本家（大都是兼地主）的支持，推翻了德川幕府而建立起来的，接着迫使反对派各藩臣服了。在这个过程中，天皇政权对于以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给予仿佛把他们从领主的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幻想，因而得到并利用了他们一定的支持。1868年内乱时，天皇政权在某种程度上还准许并利用了民众的民兵组织。然而，随着天皇政权逐步打倒反对派，便背弃了人民。内乱一结束，各地的民兵组织立即遭到了严禁。政府直辖的府县，甚至禁止在管区内拥有武装警察，在需要兵力的时候，责令向邻藩求援。内乱时期许诺人民“年贡减半”、“取消苛政”等誓言，全部化为一纸空文。

新政权利用从旧幕府和反对派各藩没收来的领地，同旧幕府一样，对人民实行封建统治和剥削。因此，这个政权根本不能依靠人民来创建军事力量，而且也不想这么做。连扩充1868年的御亲兵那样的军队也不可能，于是便想让各藩向中央政权交出一定兵员来组成自己的军队。但是，由于这支军队不仅是为了镇压人民的，而且是企图加强天皇政权对各藩的控制力量的，因而各藩并不积极支持，结果也未成功。这里不容详述天皇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是怎样组织起兵力的，总之是把各藩士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来，并拉拢三井等大商业资本家和各地的富农、豪商，以此削弱各藩的力量，强化中央政权，1869年6月成功地实现了使各藩主“奉

① 人民：包括农民、资本家、工人和其他劳苦大众。

还版籍”^①，进而在两年后的1871年7月，又成功地完成了“废藩置县”^②。这些都是通过天皇政权的实权派——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出身的官僚，利用他们在原藩拥有的力量，从三藩抽出受过近代训练的步兵、炮兵、骑兵共约八千名，编成天皇的“御亲兵”，以这个武装力量为后盾，才得以强行实现的。

通过废藩置县，政府解散了各藩全部军队，改编其中一部分，充作新设在全国四处的镇台^③及其分营的兵力。中央的兵力仍旧只有御亲兵。此后军事力量建设得相当迅速。1872年3月，“御亲兵”改称“近卫兵”，拥有步兵三个联队、骑兵一个联队和四门大炮，由都督^④指挥。这个月在兵部省内首次设置了“巡检参谋军官”。其“职责”是“查清各地城塞之方向及地形，推测攻守之便否”，调查“城内市街人烟之多寡贫富”，“总之，万一将来发生暴动，无论敌我哪方占领城池，都必须事先对其攻守方法等，记下设想”^⑤。显而易见，当时的军备，是专门用来防备旧藩士族和人民暴动的，而不是为了防备外国入侵的。所以，海军还是由旧幕府和各藩集中到中央的舰船和船员占大部分。

如果天皇政权仅仅满足于镇压国内反对派势力的军备，这些兵力也就足够了，可是，1868年，日本本土的内乱刚刚结束，天皇

① 奉还版籍：版即版图，指领地；籍即户籍，指人民。奉还版籍即各藩主把其占有的领地和统治人民的权力交还给天皇，旧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实际上是各藩主的“版籍”被政府没收了。——译者

② 废藩置县：天皇政府的一项政治改革，其内容为废除藩制，设置县制，罢免了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担任地方官即知事。——译者

③ 镇台：系师团的旧称。1871年组织的镇台兵分驻在东京、东北（仙台）、大阪、西海（熊本）四个管区。1873年因设军港，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个管区。1889年废除。——译者

④ 最初由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后来由参议西乡隆盛担任。

⑤ 《法规分类大全》兵制门，2。

政权就迫不及待想要征服朝鲜——“征韩”^①。其目的在于企图通过对外战争削弱各藩的力量，把藩士和人民的注意力引向对外作战，以稳定和巩固中央政权；并企图通过征服邻国，取得日本受欧美各国半殖民地压迫的补偿。这是明治政权一贯的基本政策和基本设想。^②为此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1871年12月，兵部大辅山县有朋等已向太政官^③提出建议：“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外”，为此必须做到，第一，实行国民征兵制，建设常备军；第二，建立沿海防御，即建造军舰，构筑海岸炮台；第三，“积蓄海陆两军之资本”，即培养军官、生产和蓄积武器，不依赖进口外国武器，还要做到能够出口的程度等三点。这就需要巨额经费。当时虽然也出现过“不能竭尽天下财力，供兵部一省使用”的反对论调，但如果“察天下大势之缓急”，这种大规模的军备建设，“国家虽实不能胜其费用，但乃必需之大业，欲罢不能”。^④

太政官是不能照此办理的，但作为一种设想，不仅是军事当局，而且也是整个天皇政权的基本想法。众所周知，“富国强兵”是天皇制在当时的总路线，具体说来，就是上述山县有朋的建议。所谓“富国”，就是扶植资本主义产业，这也是“强兵”的手段。事实上人们都知道，日本的现代工业首先是从军事意义建设起来的。当然，这个建议的理想，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全部实现，但建议第一条的征兵制度，却凭第二年（1872年）年底颁发的《全国募兵诏书》得以实现。当时太政官发布的“布告”指出，古代日本是全民皆兵，并痛斥武士说，“原非后世所称武士，厚颜坐食，甚至杀人亦不治罪

① 征韩：征服韩国。韩国：公元936年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国号为“高丽”。1392年高丽亡，成立李氏朝鲜，国号为“朝鲜”。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10月，朝鲜改国号为“韩国”。在这以前，日本往往称朝鲜为“韩”，只是一般称谓，并非正式国号。——译者

② 具体论证请见本书第2册第1篇“征韩论和军国主义的确立”。

③ 太政官：明治初年最高行政机构，统辖八省（部）和各厅的政务，1873年改为内阁制。——译者

④ 德富猪一郎：《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册。

者”。接着又指出，“然而，大政维新，各藩奉还封土，及至辛未，恢复远古之郡县制，坐食之世袭武士，减其俸禄，准其免佩刀剑，自是四民始得自由之权，此乃平均上下，齐一人权之道，亦即兵农合一之基也。”“世上每一事物，莫不课税，以充国用，然则人人固应竭尽心力，报效国家，西人称之为‘血税’。（中略）且国家若有灾祸，人人必皆分受其殃。须知人人竭尽心力，防止国家之灾祸，亦即防御自己灾祸之基。苟有国家即有军备，既有军备，则人人不得不服其役。由是观之，民兵之法，固属自然之理，非偶然臆造之法也”。

这里根本没有要求向天皇尽忠而服兵役之类的话，而是说明明治维新实现了四民自由之权和人权均一，国家之灾即个人之灾，由自己保卫国家是“自然之理”，据此来施行征兵制度。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脱离人民甚至与人民对立的军队，因而，也就不会有后来形成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部”。征兵制度是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政权同君主专制制度及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进行斗争，为了人民获得自由、平等，并维护它、发展它而建立起来的。它以人民主权为前提，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创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然而，日本的征兵制度，却与此恰恰相反，它是为了保障专制主义天皇制对于旧封建领主阶级（华族^①和士族^②）和革命人民的胜利，并作为天皇制侵略邻国的武器而建立起来的。1863年，征兵制很快付诸实施，在正月初四（从这年开始使用阳历）天皇的“政事始”^③时，陆军卿山县有朋在向天皇上奏募兵顺序的奏章中称：

“征兵之法，牵涉民政极大，故至要者为与地方官吏臣下等同心协力，深切晓谕天下之民，令其贯彻朝旨。若朝旨贯彻，则

① 华族：有爵位的人及其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消。——译者

② 士族：明治维新后授给武士阶级的族称之一，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译者

③ 政事始：即一年之初开始处理政务的意思。——译者

天下之民必由衷乐于向之。至此兵制始告完备，内足以镇压草寇，外可与列强争衡。然则兵实为治国之要道，民赖之以安，法赖之以立，国赖之以稳固”^①。

政府对国民的布告和陆军卿对天皇的奏折，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当时征兵也称为“赋兵”，这正表明征兵与旧幕府加给封建隶农的徭役之一——征集“兵赋”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在最初的征兵令中，有很多免役条款。甲：（1）在中央各部及府县任职者，吏役亦准此，村镇保长及区长亦准此；（2）陆海两军学校学生；（3）国立公立专门学校学生、国外留学生及学习医术、兽医者，亦即官吏、公吏和将来可能成为官吏、公吏的官僚统治阶层的人，都免除兵役。这就是说，兵役只是被统治者所担负的义务。乙：缴纳代人费二百七十日元者，可以免役，这就等于大地主、资本家和富豪都可以不服兵役。丙：（1）一家的户主；（2）嗣子及承祖孙；（3）独子、独孙；（4）替代父兄治理家务者；（5）养子；（6）应征服兵役者的兄弟，这些人也都免役。这显然是为了维持家长、家族制度。正如以上第（6）点所表明，兵役并非个人的义务，而是所谓每户出一人的家庭义务。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且主要靠家族劳动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下，维持家长和家族制度，不仅在经济上是必须的，而且在思想和政治上，家庭的天皇制作为国家的天皇制的基本细胞也是非维持不可的。^②此外，丁：被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者也免役。

从这些免役规定中可以明确看出，征兵是为了维护天皇制及其基础的一种封建徭役，决不是日本人民为了保卫人民的国家而规定的制度。对这样的兵制，广大人民是不会欢迎的。因为它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痛苦。对前科者实行免役，本是为了企图炫耀当

① 山县有朋：《陆军省沿革史》。

② 在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天皇制的“民法”仍然规定了家长和家族制度。

兵是一种荣誉的特权，但人民不但不感到光荣，甚至讥诮说：“‘征兵’和‘惩役’只是一字之差^①，一个是腰间带刀，一个是腰系锁链”。人民纷纷掀起暴动反对征兵令。众所周知，1873年日本发生了福冈县嘉麻、穗波两郡等三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暴动等，大小合计共十四起之多。

暴动遭到残酷的镇压，1874年以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人民转而采取了利用免役规定来逃避兵役的作法，无法利用免役规定的，就干脆毁伤自己的身体，或者把户籍迁往尚未施行征兵令的北海道、冲绳等地，千方百计逃避兵役。1879年，对征兵令进行了部分修改，但关于免役的规定基本没有改动。在人口变动较大的城市，报假户口逃避兵役尤其容易。1881年陆军卿大山岩建议说：“长崎县的长崎区中竟无一人应征者”，“向来担心东京、大阪两镇台管辖区内应征员额缺短，不无缘故”。1882年全国二十八万余名壮丁中，平时战时均予免役者就有十五万四千名，其中户主约七万六千名，五十岁以下的养子两万八千名，嗣子约四万名。

为了防止人民逃避征兵，制定了严密的户籍法，由警察严格进行户口调查，但直到1889年废除维护家族制度的免役规定及其他免役规定以前^②，利用户籍逃避兵役的还有的是。1889年，因不能利用合法手段逃避兵役而无故不去接受征兵检查的人，达三万六千人，竟占全部壮丁的百分之十。^③

万般无奈，被征入伍而又逃出营房的也为数不少，每年的数

^① 惩役，指徒刑；日文中“征”与“惩”在此处读音相同，故原文的“一字之差”是指“兵”与“役”之差。——译者

^② 即使废除了免役规定，对于中等以上学校的在校学生和在外国留学生等（二十六岁以下者），仍然保留了缓期征兵的制度。征兵制决不是全国人民一律平等的义务，而只是无产阶级的苦役，这种本质并未改变。

^③ 在小山弘健的《近代日本军事史》一书中，有1880—1889年“不参加征兵者人数表”，此表是根据陆军省第三次统计年报（1890年）做的。译者补注：请参阅本书第1册，第158页。

目虽不得而知,但在1881年度陆军犯罪总数(已经判决部分)二千八百三十四人中,就有一千四百零三人属于逃脱犯。第二年有一千零六十六人因逃脱而被处刑。^①1881年度现役兵员总数三万一千五百五十人,犯罪人数所占比率约为百分之九,逃脱率达百分之四点四四,由此可见,士兵抵抗该是多么强烈。

此外,诸如士兵在假日外出时,几十乃至几百人结伙同警察发生冲突的事件——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在实行征兵制的初期由于史料关系,这类事件发生在东京的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是屡见不鲜的。其中惊人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84年1月在大阪松岛花柳街发生的六百多名警察同一千四百名士兵的冲突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双方拔刀相斗,结果士兵死了两人,负重伤者十八人,警察中也有十余人受伤。当时有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百余名宪兵赶到现场进行排解,但也束手无策。^②当时的警察大都属于士族,而士兵则是农民。这些事件表明,农民士兵对以士族为爪牙的警察权力和国家政权怀有很大的不满,在士兵的骨子里对兵营生活怀有无法发泄的不满。

在这样的士兵中,并不只是由于酗酒同警察打架,而掀起发自主政治觉悟的反抗,也并不稀罕。在征兵制、修改地税和靠家长沉重负担的义务教育制等构成天皇制基础的体制一起建立起来以后不久,1874年,板垣退助等人便建议设立民选议院,于是自由民权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迅速发展起来,1887年西南战争以后,民权运动开始从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运动发展成为以农民阶级和地方独自经营的工场手工业资本家阶层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运动。其间,1878年8月,发生了近卫炮兵队和步兵联队二百六十多名士兵的

① 陆军省第7、8年报。

② 在盐田保美的《从历史上看宪兵制度的创立》(《军事史研究》杂志,第2卷,第1期,1937年)一文中对此类事件和其他有关士兵反抗事件的详细记述。

叛乱事件。他们对于西南战争的奖赏没有发给士兵和下级士官，并且借口财政困难削减他们的薪饷心怀忿懑，一再向上级申诉不满，上级不加理睬，终于8月23日夜里杀死了大队长和值勤军官，放火烧毁营房，拉起大炮走出皇宫附近的竹桥兵营，首先开炮轰击座落在兵营前面的大藏卿官邸，鼓起气势，然后开到赤坂的行宫门前。他们事先同东京镇台预备炮兵第一大队和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取得联系，计划同这些部队共同纵火烧毁皇宫，待各参议仓皇晋宫时，一举全歼或将其逮捕。但因同盟部队事前已被镇压下去没来支援，叛乱立即遭到镇压，四十七人被枪决。叛乱领导人是近卫步兵第二联队士兵三添卯之助和近卫炮兵大队驭卒小岛万助等人。

据报纸报道，当时在军官和士兵之间对减薪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大阪镇台炮兵第四大队、东京镇台宇都宫分营(联队)和熊本镇台等处，也都发生了军官提出辞呈、士兵情绪不稳等情况。^①以竹桥炮兵队为中心的近卫军的叛乱事件，其动机肯定是反对减薪，但只是为了这个，计划未免过于庞大，根本原因是否由于他们怀有革命思想？对于这次严重叛乱的全貌，军事当局和政府一味加以隐瞒，至今还收集不到史料，但不拘怎样，它与逃避征兵和逃出兵营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一次从根本上动摇天皇制军队的叛乱事件。

惊惶失措的军队首脑，于是煞费苦心地树立“军纪”和统制士兵。其方法之一就是叛乱发生不久的10月，以陆军卿山县的名义，颁发了《军人训诫》。其要点是：

第一，军人对于“圣上”，“即使有关御容等细节，亦不得发一言”。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来崇拜，这是军纪唯一最高的根源。

第二，在服装等各个方面，要严格区别军官与军士和士兵，下

^① 《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

级必须向上级敬礼，这种精神亦适于文官。

第三，对上级的无理横暴，也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申诉不平时，“因结伙为军人所最禁忌，故不得三人以上同时出面，即使事情涉及到三人以上，申诉时亦不得超过二人”，其余人等，除当局对其查询，不得发一言。士兵彼此须亲睦，而“新入伍者，凡事应听从年资高者，不得违抗”。

第四，绝对禁止关心政治。“批评朝政，私议宪法，评议官厅等之布告规章等行为，系违背军人之本分，一人如此，众人效之，终致产生轻慢上级之风，其流弊不可胜言。……喋喋逞辩，动辄愤慨时事，高唱民权等”，绝不允许。严格禁止对管辖以外的官宪提出建议，并不准向报刊杂志投稿评论时事。

第五，军人应经常与警察合作、和谐，维持国内秩序。^①

这里说的“军人”是指什么呢？尽管抽象说来，包括从士兵到大将，但具体说来，首先是指根据征兵制从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中征集来的广大士兵。因此，与人民对立并矛盾重重的天皇制军队，最害怕“军人”尤其构成军队主力的士兵们的政治觉悟。这一点实际上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在太政官采取征兵制以前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激烈论战中，就对若让人民当兵、枪口不知对谁的问题，有了戒心。所以对这支军队必须加强服从命令的纪律和严禁三人以上联合起来。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初期有关维持征兵军纪的各项规定中，竟然没有关于军人不得参与政治一类的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人可以参与政治，倒很可能是当时的军事当局和统治阶层还没有意识到要规定禁止农民士兵参与政治这一点。原因是自维新以前农民就闭口不谈政治，而且也不准谈政治，农民本身不用说早就

^① 这项内容的制定，不言而喻，说明军事当局已经想到了上述屡次发生的士兵同警察的冲突事件。

有自知之明。

然而，士族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关心政治是当然的本分。因此，对于由这种身分的人组成的“御亲兵”，在1871年6月颁发的《御亲兵规则》中，就有一项关于“亲兵不得议论政事之得失及官员之是非”的规定。对于具有关心政论的可能性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确发出禁令。由此也可看出，对于征集的常备军没有规定这种禁令，如上所述，应该理解为由于禁止参与政治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在统治阶层担心民权论有渗透到一般士兵中去的“危险”的时候，爆发了近卫炮兵、步兵的叛乱。惊惶失措的军队首脑便以《军人训诫》训诫军人绝对尊崇神格化的天皇“圣上”，奴隶般地服从上级长官，以及同此构成一体的、使军人同政治隔离开来。于是，天皇制军队特有的、外国军队所没有的一些原则，便有体系地建立起来了。

无论怎样迫使士兵脱离政治，而士兵也是生活在社会中，因而处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所以在自由民权运动暴风骤雨般地发展起来的当时，民权思想必然也要渗透到军队内部。^①为了抵制自由民权思想，1882年1月，天皇颁发了《军人敕谕》。其内容是把《军人训诫》加以整理的，它的立场不同于军队首脑下达的训诫、法令和规则，乃是神格化的天皇本身直接颁给军人的圣谕，具有不同于军队首脑发布的任何训诫和在此以前或以后公布的法律命令和规则的分量。

《军人敕谕》开头说：“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规定这是日本的“国体”，还说，“夫兵马大权，朕所统率，有司之事，自可委诸臣下，而其大纲朕亲揽之，非可委之臣下”，极力强调天皇对军

^① 1882年12月，右大臣岩仓具视关于停止召开府县议会的意见书中提到，日本的现状如同法国大革命的前夜，照此下去，恐怕“即使士兵军士，亦难保其不离心而倒戈”。

队的绝对统率权，并以高压姿态说，“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还强调“军人应以竭尽忠节为本分”，这是首要，接着谈到“礼仪”（身分制度）、“武勇”、“信义”和“质朴”。所谓“忠节”，乃是“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这里是说忠节只有在脱离政治（因而脱离一般社会）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在“礼仪”一项中命令说：“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在《军人训诫》中规定：“为部下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可有失恭敬奉戴之节”，而在这里，长官的命令规定为超越一切“情理”的天皇的命令，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它服从的深度和坚定性。

松下芳男解释《军人敕谕》说，《军人敕谕》并不是天皇从“国家统治者的立场”提出来的，而是“从大元帅的立场，即统帅军队的元首这一立场来讲的”。他还说，《军人敕谕》中还明确指出，军队并非天皇的军队，而是国家的军队。^①不过与此相反，这篇文章本身也不是不能把日本的军队解释为天皇的军队。即使松下芳男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想到天皇制下的国家不是国民的国家而是天皇的国家，国民是天皇的臣民，那么国家的军队也好，天皇的军队也好，本质上是一样的。松下芳男强调了《军人敕谕》中竭尽忠节的对象不是天皇而是国家的意义，不过，如果天皇并不等于国家的话，那么，对于国家的忠节就是如何把国家建成强盛这种政治上的忠节才是根本，这就同只有在脱离政治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忠节的说法矛盾了。正因为天皇就是国家，所以对国家竭尽忠节就必然是对天皇竭尽忠节。因此，对天皇任命的政府进行批判等这种政治行动就不成其为忠节了，军人的忠节只能是与政治隔绝的、奴隶般地一心一意为天皇卖命，和对分享天皇权力、权威的各级长官以及天皇的政府的绝对服从。

^①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第3篇，第3章，第2条。

把国家同天皇区别开来的是后来的天皇机关说的解释。这种解释在政治上起到积极作用,是个重要的事实。正如上一节所述,二十世纪十年代以后,对军部的批判变得强烈起来,其理论根据就在于机关说对宪法的解释和更为进步的民主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是以对抗专制主义天皇制、发展民主势力为基础的,所以如果民主势力软弱的话,就搞成天皇即国家了。无论《军人敕谕》也好,还是《帝国宪法》也好,只是在它们字面上可以作出把国家同天皇区别开来的解释这点上,有着一个古典专制主义或纯粹封建专制与天皇制专制主义的不同。这个不同来自世界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来自自由民权运动中人民的力量,它迫使明治维新及后来的天皇不得不制定了《军人敕谕》和《帝国宪法》。

在此期间,1881年3月,日本创建了作为军事警察的宪兵制度,并于1881年12月制定了陆军刑法和海军刑法。宪兵“担任巡察、检查、视察军人违法乱纪,……掌管国内安宁”。从此以后,士兵在营外的犯罪,定为不准一般警察过问。唯其如此,使军队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隔绝程度就越发加强了。而且,根据这个规定,一般警察无权干预军队、军人的事情,但宪兵却以“掌管国内安宁”的政治警察身分,具有超出一般警察的权力而介入社会了。自由民权运动的革命家不但受到警察的监视,还经常受到宪兵监视。在对待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上,半官方撰写的宪兵史竟自我夸耀说:宪兵队“先于地方警察^①,着手社会主义思想的取缔和调查,而且不分军内军外,明确了系统界线”^②。另外,在镇压群众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中的暴动方面,宪兵队起到了比警察更为有力的作用。

在陆海军刑法中,与本书主题有关并特别重要的是,刑法中规

① 地方警察:军队用语,指社会上的普通警察。

② 田崎治久:《日本的宪兵》。

定：“凡军人就政治事项上书建议或谈说议论，或以书面广泛传播者，处以一月以上三年以下之监禁”。^① 军人干预政治，不仅按道德或纪律加以禁止，而且还要课以刑罚。在此以前，1880年4月，一般法律也为了镇压自由民权运动，颁布了《集会条例》。其中第七条规定：“陆海军人、在常备、预备、后备役军籍者、警察、官公私立学校的师生、农业工艺的见习生等，均不得参加讲说议论有关政治事项之集会，更不得加入其社团”。不仅现役军人，甚至连过着一般社会生活的预备、后备役军人也被禁止参加政治集会和政治团体。由此可知，统治者们该是多么害怕人民的政治思想渗入到军队里去。在陆海军刑法中，也没有禁止预备、后备役军人参加政治集会、政治团体的规定。当1890年，《集会条例》改为《集会及政社法》时，相当于上述的条款改为“现役及应征中的预备、后备陆海军人”，这个规定由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继承下来。

根据《集会条例》和陆海军刑法的规定，军人当然也不能参加议会的选举。根据1882年2月修改的府县议会规则，现役军人也没有府县议会议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后，实施了《帝国宪法》，但仍然不准现役军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上叙述了天皇制军队同人民的矛盾和对立，设法使军队脱离人民和社会，尤其同政治隔绝并独立出来，但天皇制军队所固有的基本特征，必须从它所有各种制度的基础来进行考察。这样一来，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制度，也就是这个本质上的必然产物。因为要使军队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设想变为一种制度，就只好使军队的统帅制度也从政治机关——政府中独立出来。这种制度一旦建立起来，政府就不能干预统帅，而统帅部却有可能介入政治或政府了。这恰恰与军事警察由于从社会一般的警察中独立出来便大力介入社会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实际上军事与政治是不可分

^① 陆军刑法第110条，海军刑法第126条。

割的,掌管军事的统帅部和掌管政治的政府不可能不发生关系,所以,实际上归根结底不是政府领导统帅部就是统帅部领导政府,二者必居其一。可是,政府在制度上要受不能介入统帅的制约,而统帅部却无需受这些约束,而且拥有掌握国家权力核心的实力结构这种有力地位,所以在政府同统帅部的关系上,后者具有动辄领导前者的条件。不过,根据政治形势,特别是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势力处于上升时期,政府也很有可能领导统帅部。

第三节 军队从政府独立出来

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早在1878年就实现了。在此之前,1872年,兵部省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当时撤消了兵部省的参谋局,它的任务分别移交给陆军省第一局和第六局。随后于1874年2月,又撤消第六局,设立了参谋局。当时还明文规定陆军卿“由将官担任”的武官专任制度,海军卿就没作这种规定。当时的海军卿由文官胜安芳担任。不久,1878年12月,又撤消了参谋局,重新建立了参谋本部。

以前的参谋局以及它的前身,都是设在陆军省或兵部省内的一个局,因而归太政官统辖,最后要接受太政大臣的指挥和监督;而参谋本部不仅由陆军省独立出来,而且从太政官的管辖下也独立出来。参谋本部长只限由将官来担任,直属天皇,“统辖部务,掌管参与帷幕之机务”。参谋本部条例第五、六、七条中,列有参谋本部长在平时和战时的任务,这里从略。一般说来,其任务均属统帅军队的事项,即所谓“军令”事项,例如第六条规定:“凡军中的机务,战略上的动静,进军、驻军、调动命令、行军路程的规定、运输方法、军队的派遣等等,其有关军令事项,专由本部长主管,经参与策划、天皇批准后,立即下达陆军卿,责令执行”。因此,参谋本部在

责令陆军省执行军令这点上，就介入了陆军省。而陆军省是太政官的一个部门，所以，参谋本部不仅独立于太政官之外，而且还可以通过陆军省介入太政官。因为当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向政府提出执行军令的某种要求时，如果陆军省坚决贯彻执行，政府就不得不屈服于陆军省，否则就得垮台。如前所述，陆军卿^①只限由武官担任，所以当其要求不被采纳时，就得辞职，如果不提出后任的人，政府就得垮台。

然而，军令事项和所谓军政事项——这时陆军省已成了只掌管军政事项的机关——，往往难以具体划分，所以军事当局希望将与军队有关的事项尽量纳入“军令”之中。参谋本部设立五天以后，又在参谋本部以外另设立了一个监军本部作为军令机关。监军本部设在东京，“平时统辖我国全部陆军之检阅及军令出纳之事项”。所谓“军令出纳”，即执行军令之意，监军本部内不设本部长，只设三名监军部长分别管辖日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监军部长在战时担任师团长。监军部长也直属于天皇，既独立于陆军卿和太政大臣之外，也独立于参谋本部长之外。后来，监军本部的组织和任务有过种种变更，终于1898年撤消，另在陆军大臣管辖之下新设“教育总监部”，1900年4月，教育总监部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成为直属于天皇的机关。

关于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的任务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只看各自的条例搞不清楚，详情请阅前引松下芳男的著作。上述三个机关的任务、权限的增减，以及随之而来的部局机构的改组和撤消，主要是由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队”内部的争权夺力和观点变化的问题，属于本书主题以外，所以只在与政治有关且有必要时，本书将提出这些问题，这里姑且要强调的是，他们利用军令事项和军政事项界限模糊这点，建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些军令

^① 陆军卿，即后来的陆军大臣。

机关并不断扩大了其权限的倾向。

因为参谋本部长直属于天皇，所以对其管辖事务，可无须顾及政府，直接报告天皇，或提出希望和要求。这就叫作“帷幄上奏”。通过帷幄上奏，参谋本部对天皇做工作。在施行帝国宪法之前，天皇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制君主，所以一打动了天皇，就能左右国政。1880年11月，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将有关调查清政府军备的情况《邻邦兵备略》六册呈递天皇，向天皇陈述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上奏文称：

“方今欧洲议论兵之多寡，较议论国之贫富为急。是故各国兵制均按其人口，常备兵多则七十分之一，少则不下百分之一。且战时定员多则十五分之一，少亦二十分之一，又何暇计较内外国债，顾虑岁出岁入不相抵乎。（中略）

当今兵备之急犹渴之于饮、饥之于食。使其臣民乐生，安于富贵，开畅胆识，振起爱国之志，从进取之计者，非兵力而不能。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言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平等之交往，始可收贸易之利益，始可积蓄国民之劳力，始可保国民之富贵。故富国与强兵，古今互为本末。此乃形势之必然，欧洲各国汲汲于兵备，亦不足为怪。今如言富国为本，强兵为末，则民心将日趋于私利，不知公利之所在……苟一旦如斯，则重耿直、俭朴、忠厚、勇敢、廉耻，尚节义之风将一扫而尽，一旦遇开衅端，则叛君卖国之贼，将群起而不可御焉。（中略）

明治初年，陛下宵衣旰^①食，励精图治。而官僚百司亦有奋然从事之风。而今身为臣僚者，刷新鼓舞，或已不如昔日。

此虽时势之所然，亦岂非耽于安逸之所致哉。是以诸如兵备海防等事，臣虽再三论之，但倾耳听之者甚少。今则安于小康，姑息是事，漫然不察时势之所趋，一旦面临势成事迫，则将噬

^① 原文将旰误刊为肝，兹更正。——译者

脐无及矣”^①。

一读便可看出，这里面没有一条涉及统帅军队这个参谋本部长
长的本职任务。他在专门论述政治，强调应将国政的根本放在强
兵上面的彻底的军国主义，增强军备优先于一切。他攻击政府由
于财政困难不能按照他的要求拿出扩充军备所需费用，耽于安逸
松了劲，甚至恫吓天皇说，照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里已经出现
了后来的军部的萌芽。

过了半年以后，1881年5月，山县参谋本部长和大山岩陆军
卿联名上奏天皇：说东京湾的防御设施是当务之急，请求天皇“赐
给”总经费二百四十五万余日元，以十年为期，每年二十四万五千
余日元。天皇接受后于同年7月5日颁发命令，把军方所要求的
款额如数由本年度另行“拨付”。^②然而，陆军当局并不满足于此。
第二年1月，山县参谋本部长和大山岩陆军卿就增强军备达成协议。
其协议内称：“试观目前宇内大势，东方论尚未绝迹，琉球藩^③问题
还未彻底解决，固非高枕无忧之时，万一遇到有事之日，始论兵备
不足，可谓已迟。因此，即使财政上受到若干影响，亦须自明治十
五年度即十六年的征集期起，年年征足征兵令规定之员额”。^④

这是为了显示日本周围的局势紧张起来而故意夸大的。碰巧

① 《山县有朋意见书》。

② 前引《陆军省沿革史》。

③ 琉球藩在此三年前的1879年4月既已废除，改为冲绳县。关于琉球群岛的
归属问题，日本与清政府间的激烈争论也是在此以前的事。1880年9月，日清两国全
权代表曾经议定条约，把群岛分为两部，宫古、八重山群岛归属清政府，以北归属日本。
但因清政府没有同意，所以未能签约。因此，不能不说琉球归属问题在国际法上“还未
彻底解决”。不过，当时清政府并没有积极主张领有琉球群岛，而日本却巩固了领有全
岛的既成事实。所以，日本才竟把冲绳县叫作“琉球藩”，似乎在说其归属尚同清政府
存有争议。山县有朋和大山岩的这个协议说“东方论尚未绝迹”，这是说由于“东方”
(主要指朝鲜)的问题，仿佛存在着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夸大了日本周围的国际局势似
乎非常紧张。

④ 《陆军省沿革史》。

这年在朝鲜汉城发生了朝鲜士兵的叛乱事件，叛乱者杀死了日本军事教官，朝鲜士兵和汉城市民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山县抓住这次事件的机会，煽动危机感，主张以陆军为中心扩充军备，右大臣岩仓具视也主张扩充海军是当务之急。太政官根据这些议论计划扩军，同年11月24日，天皇把地方官员召集宫里，晓谕扩充军备，并为此增征租税。不仅如此，同月22日，天皇又用敕语的形式对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肯定了政府的朝鲜政策，指出“然从邻国感到，或有不虞之变，为此充实军备之议，尤为护国之要点”，同意了以朝鲜和中国为敌的战争准备，仅就扩充海军的经费和具体的顺序、方法命令说：“再经阁议详论，以安朕意”。是谁建议天皇这样干的，不得而知，但从其贬斥海军扩充论说：“定其理论虽易，收其实效却难”；质问“长期支付经费之计划如何？”等简直是无理的刁难看来，说不定就是山县有朋等人策动的。这种臆测姑且不论，是参谋本部的独立开创了这样一条军事当局不经政府而直接搬动天皇的道路。

当时陆军现役兵员总数约三万五千人。军队竟如此弱小，为什么要急于让统帅部独立起来呢？陆军省内的参谋局，是根据桂太郎第一次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建议学习德国陆军而设置的，参谋本部也是根据桂太郎第二次从德国研究陆军回国后建议大力扩大参谋局，经山县有朋等人采纳后才开始设立的。不过，桂太郎的建议是，大力扩充和加强参谋局，以适应陆军发展和扩充的需要，他说“欧洲数一数二的文明国^①的陆军参谋局”，其“局长权力几乎与陆军卿相抗衡”，日本亦须如此。他并没有说军令机关要从政府独立出来。其实，即使在太政官内设立与陆军省平行的参谋本部，把军令机关与军政机关分开，也可以建成桂太郎所希望的那样规模大、而且其长官权力能与陆军卿相匹敌的机构。

^① 此处文明国指德国而言。

可是，参谋局的扩大和加强，竟从太政官独立出来，参谋本部长比陆军卿的地位还高，因为陆军卿位于太政大臣之下，不直属于天皇，而参谋本部长却直属于天皇，这并非由于军事上的原因，必定有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其原因正如上一节已经详述，天皇制军队同人民互相矛盾对立，军部当初关于军队必须与人民隔绝、脱离政治的思想，到了这时，不仅军部首脑，而且在整个政府当中也迅速强烈起来。在参谋本部独立前不久抛出《军人训诫》绝非偶然。正象《军人训诫》明确表示的那样，使军队脱离政治的思想，以桂太郎的建议为契机，不仅促成参谋局的扩充，而且导致设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参谋本部。

以上是最根本的原因。西南战争以后的天皇制军备，其主要目标已经不仅是为了镇压国内反对派，而主要是为了对外战争，实际上当时天皇政权已经开始对朝鲜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军事侵略也早已有了计划，这些都加速了统帅部由政府独立出来。与其说事前作好对外战争的充分准备是统帅部最重要的工作，莫如说统帅部的工作归根结底就是准备打仗。而在完成这项工作已变成现实课题，统帅部必须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当时，在具有让军队脱离政治愿望的天皇制统治者中间，产生让统帅部不受政府约束而独立出来的想法，是当然的趋势。至于让参谋本部长直属于天皇的问题，可能当时的太政官和军事当局的首脑也会认为：对于本来以天皇统帅天皇制军队为理想而缔造的军队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海军的军令事项，自海军省成立以来，由海军省的军务局和军事科掌管，并兼管军政事项。1884年，军务局改为军事部，成为由将官担任部长的专管军令的机关。尽管这样，军事部仍属海军省内的一个部门，按规定，军事部长的职责是“关于军令军略事项，参

与卿（海军卿）之机谋”^①。但军事部于 1886 年 3 月即被撤消，军事部主管的军令事项全部移交给参谋本部的海军部。以陆军的军令机关起家的参谋本部，当时已扩大改组为“负责陆海军军事计划”的机关，按规定，参谋本部长要“以敕令由皇族一人担任”，两名次长由陆海军将官担任。因此，海军的统帅和军令机关也由海军省独立出来，但是这种独立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海军的独立，而是海军被置于陆军之下。两年以后，参谋本部条例改为“参军官制”，原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部分别改称为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本部。

但海军对于实际上低于陆军一等表示不满，1889 年 3 月，海军参谋本部脱离参谋系统，回到原来的海军省，成为海军大臣指挥下的海军参谋部。于是“参军官制”又变成参谋本部条例，“由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帝国全军之参谋总长”，令其掌管“出师、国防、作战之计划”。正如条例明文规定，参谋总长不仅是陆军而且是“帝国全军”的参谋总长、掌管“国防”那样，陆军的“陆主海从”思想十分严重，不断压制海军。后来，在甲午战争之前的 1893 年 5 月，制定海军军令部条例，海军军令机关终于也由海军省独立出来，成为与参谋本部平行并直属于天皇的机关。

海军与陆军不同，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接触面也窄。因此没有受到民权运动的威胁，对于重新建立一个军队脱离人民的制度，也不象陆军那么痛感有其必要。而且，从 1883 年准备发动甲午战争的时候起，在扩充陆海军军备的过程中，海军也大大地扩充起来，当时海军的实力只有一艘大型军舰（排水量三千七百七十七吨）、四艘中型军舰（排水量二千八百吨左右）和五艘小型军舰（排水量不到一吨），计划以后八年间只再建造五艘大型军舰、八艘中型军舰、七艘小型军舰以及十二艘鱼雷炮艇。处在这种政治和军事形势下的海军当局，恐怕还没感到军令部独立的必要。

^① 条例第 11 条。

不久,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海军预算也将由议会审议,即与人民发生了直接的政治关系,与此同时,在海军内部也有了把军令部独立出来的意图。

当时,政府正在计划发动甲午战争,大肆扩军备战,1890年9月,海军省向首相提出了从次年度开始的扩军计划。扩军目标是中国现有军舰与英国东洋舰队实力之和,即要保有约十二万吨的舰艇。其中除现有实力五万吨外,其余七万吨,按艘数计算,要求再建九千五百吨的装甲舰一艘、六千吨的装甲巡洋舰三艘、一千五百吨至四千五百吨的巡洋舰九艘和鱼雷艇十一艘。估计总费用为五千八百五十五万日元。此外,还有增设海军镇守府及其他新的要求。^①

阁议原则上没有反对这个计划,但因财政关系,不可能全部完成,因而编出从当时的1891年度开始连续五年支出五百二十一万余日元(第一个年度为二十五万七千一百二十一日元)的预算,在第一届议会上得到批准。但考虑到老朽舰的代替时,这样下去,装备十二万吨的基本计划永远无法实现,于是第二年,1891年9月,海军省重又向阁议(松方内阁^②)提出了从下年度起连续九年共计五千八百五十五万日元的造舰计划。但这也认为财政上办不到,经过阁议向第二届议会提出的预算案是:连续六年的造舰费用二百七十五万日元,建立炼钢厂的费用二百二十五万日元。对此,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虽然承认扩充海军的必要,但认为海军部内存在着藩阀派系之争,弊害累积,当局不能信任,因而否决了预算案,并且自由、改进两党的民党联合,竟然搞出了一个关于改革海军的上奏案。于是政府解散了众议院。在此后的大选中出现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力干涉选举的现象,尽管这样,民党联合还是取得了

① 海军省《海军舰船扩张沿革》,收于原书房出版的《山本权兵卫和海军》一书。

② 首相松方正义。——译者

胜利。因此，在第三届议会上又一次否决了扩充海军的预算案。随后在第四届议会上（1892年11月25日—1893年2月28日），政府（第二届伊藤内阁）提出了建造两艘装甲舰和其他舰艇的造舰预算案。在这届议会上，民党与政府的对立仍很尖锐，造舰预算案又被否决了。政府不同意这个否决，要求议会重新考虑。议会不但不答应，反而上奏弹劾政府。对此，政府以议会休会、闭会进行报复，在此期间，伊藤首相上奏天皇谴责议会。天皇咨询枢密院，于1893年2月10日，向内阁和贵族院、众议院下达敕令：“国家军防之事”，不得疏忽一日。朕今后六年间，每年下赐三十万日元，同时，令文武官员在此期间将其薪俸十分之一献给国家，以补充造舰费用。朕望内阁和议会作为立宪机关，“各慎其权威，循和协之道，辅佐朕躬完成大业，以期有终之美”。议会屈服于天皇的敕语，不但恢复了以前削减的造舰费用，而且还全部承认了政府提出的自1893年度连续七年共一千八百零八万日元的造舰费用。

这样，海军的第二次扩充计划总算就绪了。在以前议会上攻击海军的过程中，第四届议会民党联合的代表杉山定一等人曾提出海军改革建议案。其内容是：“建立扩充海军之方策，以与海外各国保持均势，实为我国当务之急”，政府提出的以十二万吨为目标的计划是保守的，必须保有十五万吨。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清除海军省内积弊的彻底改革。

改革大纲的第一点是，“确定军令与军政之区别”。“若海军大臣管理一般政务，统辖材料部、会计部、人事部等事务，无须专门的海军武官。至于诸如指挥、统率海军军队、舰队等事，则非由专门海军武官担任不可。如军令与军政相混相侵，则有弊害百出之虞”。因此，为了明确区分二者，“应另设海军司令本部，使其直属于天皇陛下，其长官应由具备海军将级资格之人充任”。

第二点，“革除该省武官组织之积弊”。在这一点已经建议，作

为军政机关之长的海军大臣无须限于武官，认为大臣以外的海军省职员也不要仅限于武官，“会计事务应建立由文官办理的制度”。

第三，“限定将官和佐官的名额”；第四，“培养军官”；第五，“改革镇守府制度”；等等，共提出九项改革要点。在结论部分概括了以下几条：

第一，确定国防方针；

第二，改革海军制度；

第三，整顿海军财政；

此即建议案之要领。当局者如确立国防之方针，制定一定不变之计划，在造舰上设计得当，其事并非不成。又，如改革海军制度，矫正武官组织之弊，录用军官时，亦厉除私情，广录人才，则我国海军面目必将为之一新。再者，若整顿海军财政，慎防滥用冗员，大力节减经费，则经常军费可削减百万余日元、跨年度经费可削减四百万余日元。减下之经费可充作将来扩充海军所需之费用”。^①

1892年12月20日，这个建议案提交给众议院并立即委托给特别委员会。后来，因有了上述的天皇敕语，在特别委员会上，有人提议，在此颁发敕语之机，海军已有自行改革之决心，应观其后效。于是特别委员会并未作任何结论。翌年，1893年2月25日，建议案又“交回”议会的全体会上进行了讨论。犬养毅等人认为，海军已经决心进行改革，现在此建议案业已无用处，遂被否决^②。

这个建议案把军政机关和军令机关分开、和废除海军大臣及海军省职员的武官专任制这种极其重要的军制原则上的根本改革，同现行制度下的海军内部各种弊害的改革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问题混为一体，而且在结论中又说：“当局者须确立国防方针”，

① 杂贺博爱：《杉田鹑山翁》、《大日本帝国议会志》，2。

②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2。

造舰计划也必须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一定不变”的计划，又把性质不同于前两类的问题，随随便便提了出来。确立国防方针的“当局者”，并不限于海军当局，陆军的军令、军政当局和整个政府，如果主张议会政治的话，议会也当然必须是参与其事的“当局者”。但从这份建议书的整个措词来看，可以认为只指海军当局。而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就委员会内审议情况向全体大会所作的报告也好，在全体大会上的讨论也好，全然没有谈到军政、军令机关的分离、武官专任制的废除、如何确立国防方针等原则问题，谈的始终只是议会是否信任政府遵奉敕语，全面进行行政改革的问题。

如果从这些情况推测起来，只能说建议者提出的分离军政、军令机关和废除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等意见，并非考虑到陆海军在军制上共同的根本原则问题，只是站在把它作为改革眼下海军内部弊害手段的立场提出来的。就是说，可以认为，对于“政治高于军事”还是“军事独立于政治之外”（实际上是“军事高于政治”）的问题，当时无论是建议者还是众议院的其他议员根本没有考虑。假如他们对于这一问题多少有些考虑的话，那么就不仅海军大臣和海军省职员，陆军的大臣和职员也应废除武官专任制；在军令机关同军政机关分开并由政府独立出来之后，其职责权限应严格限于用兵和统帅，这种制度问题，当然哪怕是用极其普通的言词也应谈到才是，却全然没有触及。对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有关统帅权独立的原则（后述），就连一直攻击藩阀政府的民党，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他们仅仅从振兴海军业务的观点出发，随便地提出建议，又随便地加以否决。从振兴业务的观点来说，海军内部还产生了“军政、军令机关最好不分开”的意见^①。

^① 在《伊藤博文秘书类纂》的《兵政关系资料》中，录有批评杉田定一建议的《海军改革意见》一文。作者不详，据推测可能出于海军内部之手。该意见基本赞同杉田定一建议中第二点以后的部分，关于第一点，作者认为军令、军政机关的分离反而会产生“政令多歧之弊”。

当时，陆海军当局、政府、议会以及地主、资产阶级的舆论全都一致热衷于军国主义，正在准备发动甲午战争，以达到把朝鲜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之下的目的。杉田定一的建议也是其中表现之一，他是从有效地实现军国主义和完成战争准备的观点出发，要求海军军令部独立出来的，可能唯独这一点——其他的改革项目姑且不论——受到了政府和海军首脑的普遍欢迎。特别是海军当局，希望拥有一个能与陆军抗衡的军令机关，便借此良机，于当年5月实现了海军军令部的独立。这样，海军统帅部也从政府和议会中独立出去了。

在极端专制的专制君主制度下，不管军队统帅部是否独立于政府之外，因为军队本身是脱离人民的，所以如前所述，既然以军队独立于国民之外为基础，军令机关还有可能独立于政府之外。但是，宪法既然颁布、议会干预制定法律和编造预算，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执行情况，通过审议法律案和预算案，议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介入军队，人民也要通过议会介入军队，这就产生了或多或少妨碍军队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可能性。因此，在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时候，伊藤博文等人为使军队始终保持对国民和议会的独立性曾煞费了苦心。即在宪法第十一条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规定，“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伊藤对此解释说，第十一条“表示统帅兵马乃至尊之大权，专属帷幄之大令”，就是说统帅独立于政府之外；关于第十二条则解释说：“本条表示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亦由天皇亲裁，这固然要由专职大臣辅佐，但亦同帷幄大权，属于至尊大权，无须议会干涉”。^①

如果按照伊藤的解释来运用宪法，则陆海军统帅完全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唯独军政是构成政府即内阁的陆海军省的业务，议会因而人民对此都没有任何发言权。就是说，军队全面保持了

^① 伊藤博文：《宪法义解》。

对国民的独立性。从法学上来评论伊藤的解释是否正确，并非本章的主题。但历史的事实则是，如前所述，初期的议会曾连续否决了海军的扩充方案，并干预了海军“常备兵额”的决定。这就是说，在议会势力强大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推翻伊藤博文对第十二条的解释的。

还有，伊藤博文等天皇制官僚和军事当局，把军政机关的陆海军大臣及其职员定为武官专任制，以此从人事方面堵死了军队以外的势力特别是议会势力介入军队的途径。

陆军大臣的陆军将官专任制，如前所述，是1874年制定的。1881年11月，在制定太政官《诸省事务章程通则》时，规定陆军省的职务制度也以此为依据，在法令上取消了陆军卿限由陆军将官担任的规定。但这并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1885年底，废除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在1886年2月的陆军省官制中，规定陆军省职员“由武官担任”。如果大臣也包括在这个“职员”以内的话，那么，这就等于把“武官”专任制重又明确地写进法令条文上了。接着又通过1888年6月陆军省职员定员表的修改，明文规定了“大臣：将官”、“次官：将官”。

关于海军省长官，最初在制度上非但没有武官专任制的明文规定，而且还曾有过由文官胜安芳担任海军卿的时期（1873年10月——1875年4月），但在1886年2月的海军省官制上，和陆军省一样，明文规定职员由武官担任。不过，在1890年修改的海军省官制中，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制度上并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只好理解为不是武官专任制。

这就是说，在1890年召开帝国议会的时候，陆军大臣和次官是将官专任制，海军大臣和次官则不然。而且在1891年7月改革陆军省官制时，取消了另表中大臣和次官的任用资格限于将官的条款。此类大事究竟因为什么搞的？几乎不得而知。据春亩公追

颂会编纂的《伊藤博文传》中册记载，“在此之前，松方内阁改组时，军部主张扩充军备，并摆出若不接受就不推举军部大臣的态度，故当时阁僚中有人提议可让文官担任军部大臣，遂于这年^①7月修改官制时”，删去了上述陆军省定员表中的“大臣：将官”、“次官：将官”一项。

上面所说的“在此之前，松方内阁改组……”，是指这年5月6日，松方任首相时上届内阁^②阁员全部留任下来，同月17日，陆相大山岩辞职，由高岛鞆之助接替，接着外务、司法、文部、内务各大臣相继更换。我还不能确认当时有过“军部”的高压。如果确有过高压，那么，在这届内阁里有递相后藤象二郎和农商务相陆奥宗光等旧自由党派的颇有影响的人物，说不定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当这年7月改革内阁各省官制时，对陆军大臣和次官的任用资格问题也进行了上述的改革。其中的情况有待今后再研究。

废除陆相的武官专任制问题，在天皇制机构的最上层中间似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这在当时及后来很久都丝毫未向外部泄露出来。最令人费解的是，据说连当时的陆军省步兵科科长长冈外史，都对这次官制改革全然不知。^③这且不论，争论竟然麻烦起明治天皇来，9月15日，侍从职干事岩仓秉承天皇旨意到神户去访问旅行中的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就陆海军大臣的将官专任制可否实行问题进行了咨询。对此，伊藤答复如下：

“担任陆海军大臣者，非将官不可的规定，在欧洲各国亦非法定的制度，可能出于实际上防御的必要。原因在于，保持立宪君主

①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

② 即山县内阁。

③ 在平塚笃编纂的《伊藤博文秘录》(1929年3月)一书公开发表伊藤博文的一段日记和答复天皇文之前，学术界甚至不知有过这个问题。《伊藤博文秘录》一书中载，有长冈外史关于伊藤答复天皇文的谈话。长冈说，答复天皇文看来似乎姑且废除了大臣武官制，可是我作为步兵科长，对此毫无所知。

政体之主义，苟欲不使大权旁落，则不应将国家实力之兵权，委诸议会或政党去玩弄。欲不使兵权旁落，必须由皇室即君主亲自来直辖。君主如欲直辖之，管理军政的大臣，与其任用易为政党或政治热潮所动摇的一般所称的政治家，莫如任用军事上经过磨炼，精通军制军纪，熟悉军人情况并有素养的将军，不轻易变更其军制组组为善。（中略，主要陈述了欧洲各国亦非固定任用武官或文官）。在根据我国国体的立宪制下，最重要的当然是由武官管理军政，以使政界风波不易波及军事。故上次在官制上废除将官任大臣的限制，博文不赞成。”伊藤还说，陆军限于陆军将官、海军限于海军将官，这样作，在当前海军中合适人选较少的情况下，实际上可能很不方便，所以姑且以陆海军将官哪方面都可以为好，但陆海军应尽量由各自的将官担任为宜。

这些话似乎无须再加说明。不让议会和政党介入军事，这是坚持专制主义天皇制所必须的。这决不是军事当局的排外主义或军事要交给军事专家那种单纯的技术观点。伊藤这份答复天皇文作于何月何日不详，在有了这个答复天皇文以后直到1900年5月以前，陆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在制度上始终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可以认为，武官专任制就凭伊藤的这份答复天皇文确定了下来。如前所述，1893年，“废除海军大臣武官专任制”曾在议会上略微提到这个问题，不过会上根本未谈到当时官制上并不是武官专任制。陆海军当局自不待言，就连政党也确信当时的现状是武官专任制。

此后，1897年4月，即松方、大隈内阁时期，由于以大隈重信为首的进步党的压力，各省设置了简任参事官，政党人士被任命担任该职，但陆海军省内没有设置文官的参事官。后在1898年5月，第三届伊藤内阁因“地税增征案”在议会中失败而辞职，根据伊藤的推荐，组成了自由党和进步党联合的宪政党的大隈、板垣内阁。

接受组阁救命的大隈推荐各省大臣时，^① 他向天皇上奏说：“唯陆海军难于荐举”。按法律来讲，当时陆海相并不是武官专任制，所以按说也可以从政党人员中推选大臣，但实际上却根本不可能。于是天皇特命前内阁的陆相桂太郎和海相西乡从道留任，使新内阁建立起来。当时，桂太郎和西乡从道是在大隈首相答应了新内阁完全接受陆海军提出的“扩充军备方案”之后，才参加组阁仪式的。

大隈、板垣内阁是破例组织起来的，^② 所以陆海相不但无意协助首相，反而伺机要打倒内阁。其他各大臣和执政党的宪政党，则热衷于同旧自由党派和旧进步党派争权夺力，抵制不了山县有朋等人策划的绝对排斥政党内阁的倒阁活动，结果这届内阁仅仅三个月就垮台了。此后又组成了山县内阁。为了防止以后再度出现政党内阁，或者即使出现非组织政党内阁不可的形势时，陆海军也不至于受到它的控制，1900年5月，山县有朋便伺机修改了陆海军省官制，明文规定其大臣和次官只由现役将官担任。至此，陆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终于名副其实地确立起来。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不仅为了防止军政大权落到文官或政党人士手中，而且还使陆海军大臣在内阁的地位成了总理大臣实际上也难以指挥、控制的独立的東西。因为任命陆海军大臣，虽说形式上通常是由受命组阁的人向天皇推荐，但在他向天皇推荐之前，必须先同掌握陆海军实权的人进行协商，取得他们的推荐和同意，即陆海军大臣实际上是由陆海军的实权派送进内阁的。

① 按照当时的惯例，天皇根据元老的建议，选出适合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令其组阁，再根据受命者的推荐，由天皇任命各大臣。如果天皇不按首相的推荐，直接任命国务大臣时，深恐首相就不能担负起内阁官制第二条规定的“总理大臣作为各大臣之首席，保持行政各部之统一”的责任。天皇没有根据大隈的推荐，而让陆海相留任，这是专制君主的干法。

② 参考上条注释。

再者，陆海军大臣不仅掌握军政，还掌管军令机关要求实施的军令事项，而军令的实施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所以这一点也造成了陆海军大臣独立的一个侧面。1889年12月制定的内阁官制第七条关于帷幄上奏权的规定，使这种情况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第七条规定：“事关军机军令上奏者，除据天皇圣谕下达内阁者外，须由陆海军大臣报告内阁总理大臣”。陆海军当局就解释说由于所谓帷幄上奏取得保障，便一直蛮干下来了。

关于这一条的由来以及陆海军解释的不当，在松下芳男的《明治军制史论》（下，第187—188页）中已经阐明。尽管法理上是不当的，却终于形成了按照这种解释的惯例。军政和军令的界限本来就含糊不清，于是陆海军大臣就尽量扩大“军令”的解释，进行帷幄上奏。因此，1896年4月，伊藤首相（第二届）通知大山岩陆相说：“事关军机军令上奏者，首先应属于军队机密、军事命令者，固不待论，但因界限不清，往往属于行政事项之事件，亦不无通过帷幄上奏经天皇钦裁之虞，故凡与行政事项有直接关系者，或不经阁议则会妨碍行政各部保持统一者，望于上奏之前，先经阁议讨论。请按此处理。”把帷幄上奏权的根源——统帅权的独立规定在宪法上，还制定了前述的内阁官制，并确立了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的伊藤博文，如今身居首相却对陆海军大臣的帷幄上奏感到苦恼了。^①

第四节 军阀的形成

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陆海军大臣的武官制和帷幄上奏的惯例，形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本来与人民对立并脱离人民而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天皇制军队和军事机构，竟把独立于人民之外作为国家体制确定下来。在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建立议会之前，

^① 陆军省编，《军事关系明治天皇传记史料明治军事史》，下。

军队的这种独立性，在国家体制上是军队对政府的独立。而在宪法颁布和议会建立之后，它既独立于政府之外，同时也成了确保独立于议会之外、从而也成了确保独立于政党之外的东西了。

试看宪法颁布以后的政治史实则是，陆海军不但不与官僚政府相对抗，反而成了官僚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柱，同时取得官僚政治家的支持，极力防止议会和政党势力对陆海军的渗透。如上节所述，1891年7月至1900年5月，尽管制度上没有明文规定大臣的武官制，陆军内部对此却满不在乎，陆军省的一个科长对此却全然不知，这是因为当时垄断政权的藩阀官僚与陆海军之间，在确保军队的独立性上，意见完全一致。正如上节所述，文官官僚的巨头伊藤博文为了维护军队的独立性，曾经付出多大努力！可是，1900年，又明确规定，陆海军大臣不但限于将官，而且还只限于现役将官。这完全是为了警惕政府的结构从藩阀官僚转到政党手里的缘故。

随着陆海军独立性的增强，掌握陆海军实权的将军们的政治影响力也增大了。不是军人就不能当陆海军大臣，而军人却可以当陆海军以外各省的大臣、总理大臣和枢密院顾问。山县有朋就是这类军人的最高代表。他是征兵常备军制的缔造者，从担任兵部大辅开始就掌握了新陆军的实权，历任陆军大臣、参谋本部长、监军、参谋总长等陆军所有最高职务。他不仅当了大将和元帅，而且从1883年起连续六年任内务卿，在此期间，在内务官僚中占据了牢固地盘。而后又任两届首相，共达三年零四个月，还当了枢密院议长。陆军的最高人事要凭他的意旨，至少违背他的意旨就寸步难行，内务省的人事也全由他和他的嫡系来控制。山县有朋出身于长州藩，他所提拔的军人几乎全是长州出身，形成一大派系。在陆军中，如果不加入长州阀的派系，就抬不起头。山县派的内务官僚，固不限于长州人，但这些官僚派全以山县为首领，与长

州陆军阀沆瀣一气。手中握有陆军、内务官僚和警察的山县有朋及其同党,不仅形成天皇制机构中最强大的政治势力,而且陆海军对政府也保持独立地位。萨摩藩出身的陆军大将、元帅大山岩,是在陆军中不属于长州阀的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外,他主要担任参谋本部长(总长)和野战军司令等职务,政治势力较小。

长州陆军阀的另一方面则是萨摩海军阀。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于1885年当上了海军大臣,在任四年零五个月,其间还兼任农商务大臣约半年,后来又当内务大臣和枢密院顾问,1893年第二次当海军大臣,在任约五年,其间还兼任或代理陆军大臣,1894年,由陆军中将升为海军大将,1898年再次任内务大臣。西乡从道的经历颇与山县有朋相似,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山县内阁中,西乡都曾担任内相,这一事实既说明了两者配合、协作的情况,也反映出两者在地位和势力上的差别。这一差别也是陆军与海军的势力之差。海军以西乡从道为头头,由萨摩藩出身的人把持着。在幕府末期的各藩中,也曾有过堪与萨摩藩相匹敌的诸如佐贺藩出身的中牟田仓之助等几个海军高级官员,但到了甲午战争时期,这些藩阀势力便全被萨摩阀压倒了。在政治方面继西乡之后拥有实力的山本权兵卫,也是萨摩藩出身,在西乡最后辞去海相职务后接替了他。山本于1898年11月至1906年1月担任海相达七年零两个月之久,1913年任首相。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海军始终没有陆军那么大的政治势力。

由于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情况,在天皇制权力机构中,不论文官还是武官,原长州和萨摩两藩出身的人占压倒优势,很早就形成了藩阀,所谓长州藩的陆军阀和萨摩藩的海军阀,就是以此为前提的。随着陆海军军备的扩充和它对政府独立性的加强,由藩阀就派生出来了军阀。同是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虽然都是政界的长州阀代表,但他们并不一定是同山县军阀结成一体的

长州藩阀。从“阀”的角度来看，长州的陆军和萨摩的海军，正如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是好搭当一样，陆海军联合之后形成了一个“军阀”，它是与通常所说的维新元勋阀——伊藤博文、井上馨、松方正义^①、黑田清隆^②等势力^③并列的另一种“阀”。

陆海军阀不顾财政状况如何，一味要求扩张军备，难为政府，并滥用帷幄上奏权超越政府为所欲为；还不管内阁由于什么情况更迭，陆海军大臣完全根据陆海军内部情况决定去留^④。从1885年年底建立内阁制^⑤以来，到本文论述的年代末尾，即1914年组成大隈内阁为止，内阁共变动十六次，其间陆军大臣只变更十次，海军大臣只变更六次。在辞职的陆相当中，同内阁一起辞职的有第一届松方内阁总辞职时的高岛鞆之助，第二届松方内阁时，还是高岛鞆之助，第二届桂内阁时的寺内正毅，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时的上原勇作，第一届山本权兵卫内阁的楠濑幸彦，前后总共不过五次。

而且这五次辞职都有不得已的特殊情况。高岛鞆之助是萨摩藩出身，为了协助本藩阀的首领松方而入阁的，所以松方一辞职，高岛也就不得不一起辞职；寺内正毅则是作为长州陆军阀的后辈，和他的先辈桂总理一起辞职的。关于上原勇作陆相的辞职问题，从日期上看，是和西园寺内阁一起辞职的，但实际是上原勇作为了反对不接受增设两个师团要求的西园寺内阁，单独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从而把内阁搞垮的。至于楠濑幸彦是因为当时陆军内部骂他是“窝囊废”^⑥，要寻机撤换他，恰逢山本内阁因意外变故倒台，陆相便趁机换了人。就是说，与内阁共进退的只有因阀族关系

① 松方正义系萨摩藩出身。

② 黑田清隆出身同上。

③ 其内部存在着萨长对立。

④ 松下芳男的《明治军政史论集》中的《政变史和军部大臣制》(1937年)，最先提出了陆海军大臣留任和辞职的政治意义。

⑤ 即第一届伊藤内阁。

⑥ 楠濑幸彦的绰号，姓的谐音。——译者

结合起来的高岛鞞之助和寺内正毅。反之，也有象上原勇作那样，陆相不经首相而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的。陆海军大臣的去留，就这样实质上是由军阀的意志决定的。

可见军阀哪里是不干预政治，倒是严重地影响了政治，象最初的隈板内阁和后来的第二届西园寺内阁的情况那样，他们敌视内阁，并指使陆海军大臣反对内阁，最后竟想打倒内阁。然而，这种政治行动的目的，在甲午战争以前，只是为了迫使政府和议会接受他们所要求那样的扩军，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本来就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还没有介入全部内政外交，尤其是外交，对国家的前进方向给与重大影响。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从1900年前后，军阀开始大力介入日本的国际政治了。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夺取中国领土台湾作为它的殖民地，从中国索得大量赔款，迫使签订不平等的高压条约，并企图迫使割让中国要地辽东半岛，以打开通向列强竞相瓜分中国的近代帝国主义阶段的大门；还特别围绕着对朝鲜的统治权问题，想与沙俄帝国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甲午战争以后的日本，在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都借“战后经营”之名，把全力投入到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去了。

军备接二连三地扩充起来，到日俄战争开始前的1903年底，陆军已由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时的七个师团增加到十三个师团。甲午战争开战当时仅有五万多吨的海军舰艇，到日俄开战时已达到三十二万八千吨，增加了五倍半。甚至可以说，日本经济归终只是为了维持和扩大军备、装备和供应陆海军。尤其钢铁、造船和机械工业，这一时期开始正式把军需生产放在一切的首位。国家财政则集中力量设法筹措军费。如下表所列，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结束，军费总额在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除1902年低于百分之三十以外，其他年份通常都是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以上。

直接军费在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年 份	一般会计与临时军费的合计	直接军费	百分比(%)	
1893年	84,582	22,832	27.0	
94	185,299	128,427	69.2	甲午战争
95	178,631	117,047	65.5	
96	168,848	73,408	43.5	陆军扩充十年计划
97	223,848	110,543	49.2	海军开始第一次扩充
98	219,758	112,428	51.5	海军第二次扩充
99	254,166	114,308	45.0	
1900	292,750	133,174	45.5	出兵镇压义和团
01	266,857	102,249	38.4	
02	289,227	85,763	29.6	日英同盟条约
03	315,969	150,415	47.6	
04	822,218	672,960	81.8	日俄战争
05	887,937	730,580	82.3	
06	696,751	378,723	54.3	

注① 此表根据大藏省编:《昭和财政史》,4,“临时军费”。

② 直接军费,是指陆海军省费、临时军费、各种名目的直接战费、征兵费的总和。

在全力以赴地大搞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点上,藩阀官僚、陆海军阀以及它们所敌视的政党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不得不增加陆海军对国家和社会的压力,因为它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重要的手段。占国家预算总额一半以上的军费,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提供了最大的国内市场。当然,大部分人民财富都被非生产性的军费浪费掉,妨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长远看来、从本质看来,它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妨碍了资本积累。但是,对于以三菱、三井为首的那些同政府相勾结、同军需直接联系的、势力雄厚的产业部门来说,却可以带来巨大利益。政党的资金主要依靠这些大资本家来提供。因此,对大资本家和政党来说,军阀固然是个不愉快的政敌,但陆海军本身却是宝贵的。军阀领导下的陆海军当局,正

象担负起帝国命运似的，觉得一天天地强大起来。而且他们可以凭统帅权的独立和大臣武官制，可以不受政府约束采取独立行动。于是军队便开始撇开政府擅自开展对外活动。下面举几件日俄战争前的重要事例：

1896年8月，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在阿奎那多的领导下首次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日本刚刚占据了吕宋岛对岸的台湾，刚刚开始武官总督下的殖民统治，菲律宾人民的起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的陆军参谋部便派遣楠濑幸彦前往调查实际情况。这时菲律宾人民的起义在年底曾一度与西班牙官厅达成妥协，楠濑幸彦调查数月后回到台湾。后来，为了经常得到情报，台湾军于1898年3月派遣台湾铁道队会计员坂本志鲁雄常驻菲律宾。

1898年4月，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发生了战争，5月，美国舰队驶进马尼拉湾，诡称要援助阿奎那多领导的独立斗争。阿奎那多轻信谎言再次起义，8月中旬解放了除马尼拉市和其周围地区以外的吕宋全岛。当时，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很快达成停战协议，驻在菲律宾的美军背弃了菲律宾人民军，并与之为敌。随后，同年年底，美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媾和条约，菲律宾全部地区成了美国领土。被叛卖的菲律宾革命党掀起了新的反美独立斗争。而日本政府却承认美国占领菲律宾，对革命党请求驻马尼拉的日本领事给予援助不予理睬。但是，一年半以前台湾军派到马尼拉的坂本志鲁雄，在此以前的8月15日，却向台湾陆军参谋部提出建议：“当今我国若不占领马尼拉并在此扶植日本皇威，美国即将扎根于这些岛屿，势必危害东亚神国之自由与发展。请从速统一朝议，援助阿奎那多军，以帝国之力，实现其独立。如帝国军部同意，请拨给小官一营陆战队，将在顷刻之间奋勇夺得马尼拉城。”对此，台湾军认为，须请示中央的方针，此时经略南方，只是理想而不可实际动

手,于是指示坂本要严守中立。^①

以上是日本政府和陆海军当局的官方态度。但参谋本部却暗中“援助”了菲律宾革命党。1899年2月,在菲律宾革命党展开反美武装斗争的同时,革命党代表波赛来到日本,奔波筹措武器和弹药。国权主义政治家犬养毅、学者志贺重昂、政治骗子中村弥六等人帮助波赛。经中村弥六介绍,波赛与陆军次官中村雄次郎搭上关系,进而又与参谋总长川上操六接了头。后来中村弥六、波赛等人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众说纷纭,不知哪个正确。据《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载,川上操六参谋总长支持这一运动,不顾外相青木周藏的强烈反对,陆军把武器弹药售给大仓组,大仓组又把这些武器弹药卖给中村弥六认识的德国人瓦音贝格尔,然后转手交给了波赛。这些武器装在中村弥六从三井物产公司买来的轮船“布引丸”里,于1899年7月13日驶出神户港,但于同月21日在上海附近的海面上遇到暴风雨,轮船沉没,人和武器全都沉入海底。在装运这批武器之前,台湾陆军参谋部的上尉原禎,脱离军籍,伙同四名预备役陆军军官、军士及著名的大陆浪人平山周,为了参加阿奎那多军队,一同搭船到马尼拉去了。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的记述是否可靠?也有不大准确的地方,不过确有确凿证据证明参谋本部介入了这一事件。在外务省编的《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二卷(明治三十二年)的《布引丸一件》中,录有1899年5月31日大浦警察总监写给青木周藏外相的秘密报告。据这个报告说,东京的摄影师铃木真一受波赛委托,请求川上操六大将协助筹措武器弹药,川上大将经同桂陆相协商后,决定卖给毛瑟枪和施奈德枪共六万支。但在同年年底,日本政府同意了美国政府关于不要援助菲律宾人的要求,取消了上述出售武器的决定。于是,铃木真一又托胜海舟,胜海舟再次劝说川上操六

^① 尾崎卓尔:《平坂本志鲁雄》。

和桂太郎，领到废枪支的样品。据同一文件集中的其他文件载，中村弥六从三井物产公司买到的轮船“布引丸”，自7月13日驶出神户港后，在门司市除了装载航海所需煤炭外，还装载了三百吨弹药，经长崎驶往上海，21日因海上暴风而沉没。这些弹药就是大仓组卖给瓦音贝格尔的。

从这些材料可以断定，川上参谋总长和桂陆相两位陆军最高负责人曾经参与了这件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台湾军也显然参与了。川上等人是否确实取消了曾经约定出售六万支枪这点，极其可疑。是否考虑到日本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就取消了呢？虽然还不能说川上等人当时企图通过“援助”菲律宾的独立运动，向那里扩张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但总会有一些想为日后有个抓挠吧。这件事后来日本政府和陆海军都打消了入侵菲律宾的念头，结果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史上的一段插曲，但陆军“军部”化的萌芽在这里也已经冒头了，从这点看来，它在历史上也可以说是个重大事件。

1900年发生了更加重大的事件。这年夏天，为了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反帝民族斗争，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等八国联军出兵中国，在三万三千名联军总兵力中，日本出兵达两万二千名。义和团起义并没有直接把日本也当作斗争目标，日本并没有参加镇压的理由，但山县有朋首相、桂陆相、参谋本部等认为，如果各国出兵镇压需要大军，必定要依靠日本出兵，日本可将此机变成“将来称霸东洋之开端”，参谋本部很快就作好了出兵准备。6月8日，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议联合出兵，日本政府立即同意。关于这一点，陆军省编纂《军事关系明治天皇传记史料》^①一书中所引用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②战史卷七》中有

① 校订者将该书题目改为《明治天皇传记史料明治军事史》，并已公开发行。以下本书使用《明治军事史》名。

② 清国事变：指义和团起义。——译者

如下重要记述：

“6月15日上午，内阁召开会议，国务大臣及参谋总长出席，决定派遣陆军事宜之后，内阁还想就其陆海军兵力进行讨论，但大山参谋总长发言：出兵与否，固须经内阁决议，至于兵力及编制等项，当由本职负责调查决定。遂未议论。”

当时的首相是陆军军阀的最高首脑山县有朋。参谋总长在阁议席上一说不准政府置喙出兵的兵力问题，连这个山县首相都默不作声，这是怎么回事？上引史料接着还说：“在此之前，参谋本部业已在进行关于派遣兵力及编制的调查，并制定出编制提纲，阁议一旦作出决定，参谋总长便立即将此编制提纲上奏天皇，取得批准，决定先派出少于提纲的兵力为先遣队”。参谋本部事先不同政府商量，就把出兵的兵力问题作为“军令事项”擅自作出决定，待阁议刚一决定出兵，便立即上奏天皇取得批准。天皇已经同意，政府就再也不能吭一声，只能照此办理。山县一想这样怎能完成首相的任务呢，或许出于一时的气愤，当天便向天皇提出了辞呈。前引《明治军事史》中引用的《明治天皇年表稿本》，对此有如下记载：

“*因清国事变，内阁会议决定派遣陆军；参谋总长侯爵大山岩上奏天皇。

*因内阁总理大臣侯爵山县有朋有意辞职，赐予优渥圣旨。（是否关于出兵华北问题与大山总长意见冲突之结果？）”

上文括号中的注释，出于《明治天皇年表稿本》作者的手笔。这位作者属于哪一机关？不得而知，但注释所作的推测，恐怕是有根据的。关于派遣陆军问题，只由参谋总长上奏而没有首相的上奏，首相因而向天皇流露辞职意，这说明上述阁议的记述是真实的。不言而喻，对外出兵时，应派出多少兵力，不应首先取决于军事观点，而应按出兵目的把政治判断放在首位。然而，关于军队的动员和编制问题，甚至连陆军的缔造者和元帅山县有朋都没有发言权。这

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军部独裁的先驱。

当时还有一件海军也参与了的重大事件——出兵厦门事件。为了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列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北京。1900年8月，陆海军当局和台湾总督府企图占领台湾对岸的中国福建省的厦门。从上一年6月份以来，台湾总督(第四代)儿玉源太郎中将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极力主张：为了统治台湾，必须占领厦门，把福建省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第二代总督桂太郎也曾有过此类主张，割取福建始终是日本政府当时的基本目标。义和团起义一爆发，陆海军当局和台湾总督府便企图借此机会实现历来的野心。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策划的？以惨败告终的这次阴谋的史料藏到哪里了？由于材料奇缺，不得而知。但是，8月12日，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电训军舰高千穗号舰长，令其为了“保护侨民”，“迅速驶进厦门，继承先前发给和泉号舰长的训令，该舰高千穗号、和泉号、筑紫号中之一舰务必停在厦门”。14日，海相又向停在厦门的和泉号舰长发出如下秘密训令：

“作好以高千穗、和泉、筑紫三舰之兵员，于必要时占领厦门港口两岸炮台的计划。再者，待与外国共同行动之时机一到，自当不迟于他国，且决心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务使他国致力于居留地，而我军则极力占领炮台，如占领全部炮台力有所不及，应着眼于攻占主要炮台，要事先秘密慎重作好计划，并速将计划要旨直接报告海军大臣。如厦门地方发生不稳情况或有其他可乘之机，务同驻在当地的帝国领事协议，借口保护帝国侨民，派若干兵员登陆，切勿踌躇失机。”^①

这个训令，海相当日通知陆相，由陆相电告台湾总督。台湾总督接到训令后，立即复电说：“占领厦门炮台必须同时占领川石山电信局，请记住。请与海军省协商为盼。”此后，台湾总督与陆相之

^① 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第1章，第7节。

间,就由台湾派遣陆军问题,曾往复电报多次。22日,大山岩参谋总长将发给台湾总督的训令上奏天皇,并得到批准。训令的内容是,要作好战斗准备,如和泉号舰长提出要求,应立即从台湾军中调出一大队步兵、两中队炮兵和一中队工兵以内的兵员,派往厦门,与海军合作占领该港。第二天,训令由桂陆相作为“奉敕”传达给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

24日拂晓,捏造了一起厦门本愿寺传教所“被暴徒纵火”的事件,^①于是海军陆战队登陆,和泉号舰长请求台湾出兵,^②台湾军出动等,立刻受到各国的强烈抗议,结果政府立即命令台湾和驻厦门的舰队停止军事行动。^③

关于这一事件,海军大臣官房编的《山本伯实历谈》一书有如下记载:山本海相向警备厦门的和泉号舰和高千穗号舰发出“秘令”,内称,为了保护侨民,“须相机行事”,事先调查研究“一旦发生要占领厦门炮台的情况,应如何行动”的办法,拟定方案后报告海相。“按照惯例,将‘秘令’通告了陆军大臣”。可是,山县总理大臣给山本海军大臣挂了电话,海相应首相之邀来到外相官邸,山县首相、大山参谋总长、桂陆相、青木外相均已在座。桂陆相对山本海相说:

“已将所收海军秘令厦门警备舰之通知传送参谋总长。海军既已企图占领厦门,陆军亦须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经报请天皇批准后,已向儿玉台湾总督发出命令。然而,接到报告说,儿玉总督性急,已从台湾守备军中调出若干陆军,正在令其开赴厦门。情况如此,须就今后措施进行协商。”

山本听后大吃一惊。他说,发给和泉号舰长的秘令,是属于平

^① 据说实际上是传教士遵照台湾总督府的密令,自己烧掉的。

^② 实际是台湾让和泉舰长请求出兵。

^③ 这件事的概况,请参照本书第2册、第2篇、第2章《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史料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北清事变》上;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

时的军舰外务令的性质的，并不是为了占领厦门炮台等在外地进行战争，陆相等人误解了秘令的意思，要求陆军停止出兵，并说服参谋总长，促使他取消了由台湾派兵的命令。

山本后来(1926年8月或1927年8月)的这段谈话，奇怪得很。第一，8月14日海相发给和泉号舰长的训令，显然是企图伺机占领厦门炮台，并不是同当时的行动计划毫无联系的平时的预备调查；第二，如果桂太郎确对山本说过：海军既已企图占领厦门，陆军亦须采取相应措施，即向台湾总督发出训令，台湾总督竟贸然出兵等等，这些话句句都荒谬绝伦；第三，所谓经山本说服，陆军取消了由台湾出兵的命令，不符合事实。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些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话收进《山本伯实历谈》里呢？不会只是由于山本记忆混乱所致吧。可能是山本后来为了对海军当局企图计划和实行占领厦门炮台终归失败进行辩解，说成陆军误解了海军的秘令，险些误了大事吧。

关于这个事件，外务省只是接到了陆海军省决定出兵的通知，除厦门以外，华南其他地区的领事都全然不知。上海代理总领事到了8月30日^①才询问外相说：“据闻台湾已派一千三百名兵员去厦门，此消息是否属实？果真如此，又因何出此一举？”甚至连与厦门同在福建省的福州领事，事前也一无所知，这从该领事于8月28日和31日发给外相的抗议电报中便可了解。该电谴责武装占领厦门的想法，在28日提给外相、参谋总长和海相的意见书中指出：厦门地方并没有形势不稳的事实，本愿寺纵火事件，“风传是故意搞的”。

就是说，这个事件或许是台湾总督府和海军省、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共同策划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最为积极。这与后来关东军总想要占领“满洲”如出一辙。这次出兵是

^① 这时台湾军业已撤退。

否根据阁议的决定？以及山县有朋事前对出兵计划参与到什么程度？都不清楚。后藤新平9月7日进京会见了山县有朋。后藤就此向儿玉报告说：“总理似颇辛劳，厦门及台湾情况不尽了解，总理之意亦不过欲归咎于领事及舰长”。政府以外的元老伊藤博文等人也一无所知，听到出兵的命令后，慌忙从大矶赶到东京加以制止。尽管是小规模的，不仅向海外派出军舰，甚至向外国派遣陆军发动战争，这样策划并付诸实行，这说明陆海军阀正在形成本质上不同于因军备预算对抗政府或阻碍政党出来掌握政权等的一股势力。一言以蔽之，已经开始了由“军阀”向“军部”的过渡。

第五节 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部”的形成

日本派出作为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主力部队以镇压义和团以及占领厦门的失败，对于日本政府、元老和军阀来说，一方面增强了自信，另一方面也从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所谓的自信是，日本从此也加入了“列强的行列”^①，当列强镇压东亚的反帝民族斗争时，不得不借助日本的力量。列宁于1916年就曾指出，“日俄两国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②这段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著名论断，如果加以必要的改动，也适用于金融垄断资本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的1900年左右的日本。在远东，无论何处，日本都能立即集结大军。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军事力量，是帝国主义世界中所独有的。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日本统治

① 桂太郎语。

②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4页。——译者

者就可以弥补经济实力上明显的不足，并能加入列强帝国主义的“行列”，这在镇压义和团中已显示出来。

其实，桂太郎在任台湾总督时就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些地理条件和军事条件。1896年7月，桂太郎向本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冗长的意见书《割据华南福建一带归我所有》。他预料会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强行侵略中国，将与列强势力范围毗连，引起纠纷，而加以反对，他对此满怀信心地反驳说：“虽然与列强接壤，但列强只是扩张版图，建立殖民地而已。其本国主力远在欧洲，由于列强彼此嫉视反目……，绝不可能在隔绝的异域扩张其主力，十分显然……。利用台湾的地利在华南扶植我国势力不仅不是难事，亦地势所使然者。”但是，占领厦门的惨败，给了他们深刻教训，他们认识到，日本只靠独占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和军事力量，还不能同帝国主义列强抗衡，必须同列强中某一国家结成同盟。八个月后的1901年4月，山县有朋拟出《东洋同盟论》，主张“与欧洲的一国结成同盟”。桂太郎也在1901年6月初任首相时，规定国政的最高方针是“独力承担远东大局实属困难，必须注意相机与欧洲某一国家缔结某种协定”。^①

占领厦门失败以后，日本统治阶层暂时放弃了南进政策，改为“北进”，企图确保在朝鲜的独占统治力量，以及向与朝鲜接壤的中国“满洲”方面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由于沙俄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义和团起义的机会，旁若无人地将“满洲”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还加强了对朝鲜的压力，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日本统治阶层认为，“北进”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同欧洲的哪个国家结盟，是俄国还是英国？众所周知，围绕这一选择，政府、元老、军阀内部意见分歧，最后1902年2月结成了日英同盟。日本靠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发起了

^① 关于这段时间前后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已在本书第2册、第2篇、第3章《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详细论述。

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

如上节所述，日俄战争前的陆海军阀，已发展到试图独自发动小规模对外武装侵略的程度，但在重大战争决策方面，政府或政治还掌有领导权。甲午战争时，政府掌握着决定开战的领导权。当时的大本营里，说是根据明治天皇的特别命令，允许伊藤首相以文官身份列席法律规定“文官不能介入”^①的大本营会议。这并不单是为了便于政府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系，而是伊藤以与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对等的地位，参与战略的讨论，实现了政略与战略的统一。在停战和媾和上，政府也完全领导了军队。

如前所述，在决定出兵镇压义和团时，在派遣兵力问题上，就通过了参谋本部的独裁，不准政府介入，但对是否出兵的问题，还是由政府决定的。在日俄战争开战时，自1903年春季，参谋本部的各个部长就在内部高唱强硬的开战论，斥责政府，批判大山岩参谋总长优柔寡断，但并没立即诉诸社会或向政界做工作，而是把内部意见归纳起来，然后由大山岩总长于1903年5月向天皇提出了意见书，认为当前日本的军备能够同俄国对抗，但越往后将越对日本不利，并说现在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良机。末尾还说：“我等军人本不应置喙政治，亦不愿介入”，只是职责攸关，不能对国防计划和敌我兵力关系漠然处之，故提出意见，略加辩解。这些话并不是捎带而已地敷衍一下。

政府还得到了元老的全面监护，但对“和”与“战”这一国家最高政治决策，却负起责任来对待，没有受统帅部的摆布。谷寿夫中

^① 战时的大本营即设在天皇之下的统帅部，按其第二条规定：“在本营参与帷幄机务，计划帝国陆海军重要作战，乃参谋长之职责”，第三条规定：“幕僚由陆海军将校组成，其人员另定之”，文官不能担任幕僚。当时最初是伊藤要在大本营的御前会议上主管并说明“出师经费等事宜”，经天皇批准，列席了大本营会议。对此，伊藤认为，“不仅只是经费，在外交政略方面，如不熟悉军事行动”，亦有妨碍，因而这点也被批准了。

将在其《机密日俄战争史》^①一书中谴责说：在1903年10月24日的元老会议上，除元老以外，只有首相、陆相、海相和外相出席，连参谋次长^②、海军军令部长和藏相都未被邀请，后来也是一样。在政府明确决定开战后的1904年1月7日的阁议上，才允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各自率领次长出席，这些作法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谷寿夫弄错了。

在开战后的战争指导上，也没有军略无视政略而独断专行的情况。在全局方面，政府与大本营也彼此沟通了意见。1905年奉天^③会战之后，陆军军官严重缺乏，大炮和弹药也精光了，要迅速补充根本不可能。不要说进一步追击敌人，就连长期保住现有占领地区都困难了，而且并没有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些情况，大本营和“满洲”军总司令部都对日本人民一概保密，但却告诉了政府和元老，说是“政略与战略要一致”，要求政府早日实现媾和。这一点，和后来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的情况——尽管连续大败，军部还是硬拉着日本一直走到最后的惨局——，迥然不同日俄战争的开战，名副其实地是由政府负责决定的，同样，媾和也是由政府负责决定的。

虽说如此，实际上这时就连得到明治天皇特别信赖的伊藤博文，已不能以十年前的发言权参加大本营了，只能以一名元老的资格“列席”大本营的御前会议，旁听幕僚对天皇的各种报告。在大本营内已经没有甲午战争期间的政治与军事的统一，只是还没有严重的分歧，基本上能够保持协调局面而已。

而且，在这次日俄战争中，局部出现了军事优越于政治的体制，这主要表现在对韩国的政策方面。日俄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

① 该书是1925年在陆军大学校的讲义。

② 大山岩总长以元老身分出席。

③ 奉天：辽宁省和沈阳市的旧称。——译者

在于把沙俄势力从韩国全部赶走，把韩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开战两周后的1904年2月23日，日本急不可待地迫使韩国签订了《日韩议定书》，把韩国变成了“保护国”。3月，伊藤博文作为天皇特使派到韩国进行视察，根据他的视察报告，6月11日，系统地制定了为把韩国搞成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地的具体政策，并稳步付诸实行。而实行这个计划的保证，就是日本在韩国的军事力量。

在此之前，进攻韩国的日本第一军追击俄军北上以后，3月11日，大本营又编制了五个后备大队作为韩国驻屯军，归大本营直接指挥。于是韩国驻屯军与驻韩日本公使之间发生了争执。驻公使馆的武官为了“操纵”韩国宫廷和政府，“经常采取超越公使的行动”，韩国驻屯军司令官也上报说，“必须操纵韩军、干涉韩国政治，公使、武官、司令官之间产生三角斗争，呈现难以统一的情况”。结果，“以威压为主的当今对韩统治，如不将军司令官的职权置于公使之上，则我政策不能贯彻”的主张取胜，8月21日，桂首相、小村外相、寺内陆相在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改编韩国驻屯军，确定驻屯军的任务为：（1）“根据日韩议定书第三条之规定，确保韩国独立及领土完整”；（2）驻屯军为“防御来自大陆方面敌人袭击之帝国国防轴心”，决定把驻屯军扩大为由两个师团和若干特种兵组成的一个军，驻公使馆武官兼任驻屯军参谋。配备两个师团的计划在此后若干年也未能实现，但当时的后备军增加到十二个大队，9月5日，将近卫师团长长谷川好道中将提升为大将，任韩国驻屯军司令官，直属天皇指挥。^①

由于新的韩国驻屯军司令官直属于天皇，所以其地位远远高出驻韩公使，由他“操纵”韩国宫廷，推行独自的对韩政策。外务大臣无权指挥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只接受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

^① 前引《机密日俄战争史》、《明治军事史》。

监督。这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原则性意义的重大事件，这次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便形成了，即日本在对朝鲜和“满洲”政策方面，军人总督勾通军队中央，超越政府采取行动。《机密日俄战争史》就这一点评论道：“如此重大问题，采纳武官方面的主张，并顺利得到解决，乃伊藤侯爵于3月中旬以特派大使身分渡韩，目击现状而推行的改革步伐……”。这就是说，因为韩国上下隐蔽和公开的对日反抗情绪非常强烈，所以日本的对韩政策，必须以威胁镇压的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这种想法通过伊藤的赴韩视察已经广泛传布到政府之中，所以这种重大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

掌握军队指挥权、凭军事力量来统治异族人民，这在台湾总督已有与韩国驻屯军相同的先例。

日本凭1895年5月生效的中日“马关条约”占据了台湾，5月11日立即制定了《台湾总督府临时条例》，任命桦山资纪海军大将为总督，令其接收台湾岛。桦山总督利用一个陆军师团和一支五艘军舰的舰队，排除台湾岛居民的顽强抵抗，6月17日进驻台北，建立了总督府。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半师团的兵力，用以镇压汉族和土著居民的武装抵抗，到11月下旬基本上平定了全岛。但这只能是“基本上”而已，后来台湾人民对日本统治的反抗斗争非常激烈，每年台湾都发生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

按照《台湾总督府临时条例》建立起来的总督府，属大本营领导，可是6月11日，内阁设立了台湾事务局，由伊藤首相任总裁，川上参谋本部次长任副总裁，具体事务分成各部，任命有关各省次官担任各部委员。随后，8月6日，将《台湾总督府临时条例》改为《台湾总督府条例》。根据这个条例规定，总督府为军衙组织，确定了大本营与台湾事务局的职责范围，民政归台湾事务局管辖，总督府同事务局直接联系，有关军事事宜，总督府同大本营或陆海军

省直接联系,至于虽属军事事宜但与民政有关的问题,则由大本营或陆海军省与事务局协商处理。^①

以军事组织开始的台湾总督府,其领导机关在大本营复员后改为陆军省,另一方面,台湾事务局仍继续研究总督府的统治原则和总督府官制,在1896年2月2日的台湾事务局全体大会上,审议了拓殖务省官制、台湾总督府官制及其他问题。根据外交部委员原敬日记载,他主张驻台湾的日本陆海军,应由主管省直辖,无须委任给总督,关税、邮电等项亦由各主管省管辖(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但因居少数未被采纳。至于陆军大将或中将任总督的原案,“除川上中将外,全会均不同意,但总理可能考虑到陆军的感情,仍采取了原案”。另据交通部委员田健治郎的传记载:当海军出身的军事部委员山本权兵卫刚一表示赞成文官担任总督时,川上副总裁便痛斥山本身为军人却赞成文官担任总督,对此,山本反驳说,没有军人不准赞成文官担任总督之理,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篇传记还写道,结果台湾事务局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仰呈天皇裁决,即“呈请天皇批准武官担任总督的原案”。这与原敬日记的记载不符,但从内容看来,原敬日记可能是正确的^②,而且从史料的性质来看,后人编纂的书籍与当事者当时的日记比较起来,当然是后者的价值要高一些。

伊藤所以排除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采用武官总督制,或许是“考虑到陆军的感情”,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在战争期间他就在大本营极力主张占领台湾,其中包藏着企图把台湾作为向南推进帝国主义扩张之据点的祸心,而且要想统治台湾,首先必须用武力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因此,让武官担任总督,使其拥有军队指挥

① 《台湾总督府条例》,见于《伊藤博文秘书类纂》所收的台湾资料。

② 很难设想,由于这种程度的问题,会议意见不一致便仰呈天皇裁决。当然,最后要采取呈请天皇批准的形式,但我想在此之前,伊藤总裁已经作出决定。

权为好。于是在1896年3月底，用敕令公布《台湾总督府条例》，从4月1日开始实行。

总督直属于天皇，只限陆海军大、中将担任，在委任范围内统辖陆海军，为维持安定秩序必要时可动用兵力。另外，根据与该条例同时制定的法律第六十三号《关于台湾应施行法令的法律》规定，总督可以在其管辖区域内发布“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府令）。这个“法律第六十三号”在议会中酿成重大问题（所谓“六三问题”），宪法学家们也认为，授予行政官员台湾总督以立法权是违反宪法的，直到后来始终是个问题。但不管法律论如何，总之，台湾总督变成了一个在台湾具有军事权和立法权的独裁者。随着这一条令的实施，在形式上从军政过渡到民政，内阁的台湾事务局撤消了，其事务由新设的拓殖务省接管。中央政府对总督府事务的管辖后来还有变动，但那些都不是本文的主题。

日本对于第一个殖民地——台湾，实行了直属天皇的武官总督独裁统治。关于民政，尽管说受到政府监督，但是总督人事的实权掌握在军队手里，可以说军队把台湾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那里，军队独裁在制度上也确立起来。而且对于这种作法，统治阶级根本没有表示原则性的反对。在台湾事务局的会议上，虽然原敬和田健治郎等官僚曾主张文官总督制，但伊藤一说原案较好，也就不反对了；虽说议会曾因“六三问题”反对政府，但也决非反对总督武官制和军事权；再者，对于用敕令，亦即不经过议会就决定了殖民地统治体制，也没有任何批判；它不是反对总督具有双重意义的专制——既是独立于议会和人民之外的对于殖民地统治，又是对殖民地人民的专制——，他们所争论的只是使其专制合法化的技术问题。原敬等人的内地延长主义（同化主义）和竹越与三郎等人的殖民地主义之间的争论，也同样只是以双重专制为前提的技术性的争论。这种军人专制体制不久竟反应到国内来，这在计划

占领厦门上台湾总督府所起的积极作用中业已表现出来。

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割取了库页岛南半部，接管了中国辽东半岛南部旧沙俄租借地作为关东州，并把朝鲜实际上变成了殖民地^①。这些地区再加上台湾，日本把面积相当于本国百分之七十七以上的土地和拥有人口相当于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作为自己的殖民地；此外，还把同日本本土面积几乎相等的中国东北三省——“满洲”南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大殖民帝国。在这前后，日本同美、英、俄、法等国缔结了关于瓜分东亚和东南亚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同盟和协定，成了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在东亚的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对于韩国，1905年11月，伊藤以特派大使身分前往汉城，一面凭韩国驻屯军威压韩国皇帝和大臣，一面迫使签订了“保护”条约^②。接着，12月，为了对韩实行“保护”统治，以敕令制定了韩国统监府官制。当时议会没有任何发言权。按规定，统监“监督”韩国的外交活动，但实际上并不限于外交，统监已经通过指挥安插在韩国政府的财政、警察、教育等部门的日本“顾问”，还统治了韩国的内政。并且规定，“为保持韩国安定秩序，必要时可命令韩国守备军司令官行使武力”，兼而掌握了军事权。

1906年3月，伊藤任首任韩国统监。由于统监当然拥有韩国守备军的使用权，因而对于这一任命认为文官伊藤对军队司令官拥有命令权触犯了统帅权的独立，掀起了文官统监反对论。在反对派中，参谋本部各部长和第一部成员田中义一中佐等人是首当其冲者。据《田中义一传记》载，海军方面也卷入反对派中，山县参谋总长代表反对派同伊藤发生了激烈冲突。伊藤以得不到军队指

① 1910年全部吞并。

② 即1905年11月17日日本以高压手段迫使签订的《韩国保护协约》，这是第二次“日韩协约”。——译者

挥权就不当总监，坚决要求军事权。当时认为除了伊藤以外找不到担任总监的合适人选，所以元老和陆海军都感到为难。1905年底，由于取代山县当上参谋总长的大山岩元帅和寺内正毅陆相的斡旋，才总算说服了山县和参谋本部的成员，特以天皇发布命令的形式，承认韩国总监拥有兵力使用权。就是说，1906年1月16日，天皇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下达诏敕，内称：“朕考虑韩国当前事态，为达保持其安定秩序之目的，假韩国统监以命令韩国守备军司令官使用兵力之权，故卿等应采取适当措施，以免在国防用兵计划及上述兵力使用方面互生障碍，以符朕望”。这就开了一个通过行使天皇大权的特例形式。大山参谋总长接到诏敕后，向韩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如下的“训令”：

“一、贵官受韩国统监之命使用兵力维持韩国安定秩序时，须按命令酌情处理；

二、关于上项使用兵力，须注意避免影响作战计划，且应尽快将统监命令之要旨及执行要领，报告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

三、如认为为执行上项韩国统监命令须变更作战计划时，则应经参谋总长，将理由上奏天皇，等待裁决；

四、当理事官要求出兵以维持其地方之安定秩序时，应令其地方驻军指挥官酌情答应”。^①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尽管对于辅佐天皇统帅大权的统帅部的独立在此出现了一个例外，但毕竟还是要靠行使天皇大权，对统帅部独立的制度本身，没作任何修改。毋宁说通过这次争论，军事当局可能重新强烈地意识到了统帅部的独立问题，更加坚定了坚决捍卫这种独立的决心。这在诏书和参谋总长的训令中，都强调要采取适当措施，以免统监命令使用的兵力同“国防用兵计划”之间不至发生障碍这点上也可感觉出来。第二，更加重要的一

^① 前引《明治军事史》。

点是，这次争吵是由参谋本部的部长和成员发动的。山县只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就是说，参谋本部的部长及其成员串通一气反对政府，并不同于过去那种军阀巨头随便摆布政府，它说明参谋本部这一组织本身正在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正在发展成为“军部”。

承认韩国统监拥有兵力使用权，正象义军蜂起所表现那样，说明韩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力量比台湾人民更加强大、更有组织、更为持久。既然如此，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承认统监拥有兵力使用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任统监是文官伊藤，所以承认了文官拥有军队指挥权，形成了一个例外，仅就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在统帅部的独立上暂时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裂痕，但统监的权限本身，也就是建立军事统制朝鲜体制的第一步。

1909年6月，伊藤辞去统监职务，后任还是文官曾祢荒助，他也拥有统监府官制第四条规定的权限。按例外处理表示妥协承认了伊藤拥有兵力使用权的军事当局，所以也同意曾祢荒助统监拥有同样权力，是因为当时山县有朋和桂太郎首相已在研究吞并韩国的时机和具体的程序，为了加速这一时机的成熟，正如桂首相写给山县的信中所说的，安排平庸人物担任统监，促使韩国和皇帝政府“犯错误”^①，此乃“今后政策上最妙之方策也”。^②

在将近断然吞并韩国的三个月之前，桂太郎首相将统监换为寺内大将。当时伊藤认为最好通过统监政治，名义上仍然保存韩国，实际上把它变成殖民地，所以对早期吞并不积极，但对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队势力也没有积极抵制。当时伊藤也已无力控制军队的势力，这一点留待后述。吞并韩国是在1909年7月6日的阁议上才作为国策正式决定的，但在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队首脑

^① “犯错误”：意思是韩国皇帝等可能利用韩国统监的平庸无能，采取自主的行动。

^② 1909年4月17日桂太郎首相致山县有朋的信。参见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

之间，在此之前早就背着内阁秘密定下来了（1910年8月实行吞并）。

在吞并的同时，韩国国号也被迫废除了，“朝鲜”定为只是一个地名由总督府统治。朝鲜总督直属于天皇，由陆海军的大、中将担任，对驻在朝鲜的陆海军拥有指挥权，在朝鲜须用法律规定的事项，可用总督的命令（制令）加以规定。即朝鲜总督也和台湾总督同样拥有立法权，但实际上，朝鲜总督是一个比台湾总督权力更大的独裁统治者，他所指挥的军队也比台湾总督多一倍以上。在台湾，从儿玉源太郎任总督的时代起，军事以外的事宜，均由文官的民政长官指使警察名副其实地掌管起来，台湾总督府的陆海军参谋不干涉民政工作，这已形成惯例，而朝鲜的文官政务总监就不然了。在朝鲜，受陆军大臣和总督指挥的宪兵司令官垄断了警察权，民政也由宪兵掌管。警察政治也好，宪兵政治也好，对受压迫的民族说来，没有多大区别，但对压迫其他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体制来说，却是个大问题。朝鲜作为军队特别是陆军直辖领地的意义，比台湾更为重要。其理由有二。第一，由上述可以看出，为了镇压朝鲜民族顽强持久的抵抗运动，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第二，吞并朝鲜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下一个最大的扩张目标是统治“满洲”，而朝鲜被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绝对重要的军事前哨基地。由于这些原因，在统治朝鲜上，军事比台湾更加优越于民政，更加强化了军事统治。

对关东州的统治也和朝鲜一样，是强有力的军事统治。对那里的统治，始于日俄战争期间的军事占领，日俄媾和条约^①签订以后，1905年9月26日，日本设立了军政机关“关东总督府”，1906年9月废除军事统治体制，实行新的关东都督府制。都督直

^① 即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朴次茅斯签订的《日俄和平条约》及附加条款。——译者

属于天皇，由天皇特任陆军（海军不行）大、中将担任。其职责为担负关东州的施政和防务，负责守卫南满洲铁道，监督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都督拥有对驻满日军的统率权，在“满铁”附属地的要地设置宪兵队，责令兼负维持治安和军事警察任务。

日本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的统治以及对满铁的经营，不同于日本对朝鲜、台湾或南库页岛的统治，不仅要直接同清政府（后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利害发生密切关系，而且还要同英、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利害发生密切关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中国领土，同中国和列强进行争夺。如前所述，在关东州，都督在制度上可以说就是陆军的都督，这就意味着陆军统治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政策。因为陆军的中央——统帅部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陆军省虽然仍属政府内的一个机构，但它凭大臣武官专任制和帷幄上奏权，等于半独立于政府之外，尽管陆军省和统帅部两者内部存在着矛盾，但对外它们却是一个陆军的整体。陆军控制着日本帝国主义将来“发展”的最大目标——统治“满洲”的前哨基地，这就决定性地加强了陆军对于日本全部国政的发言权，成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其他军令军政机构本身形成政治势力的最重要因素。

在关东总督府阶段，由于它是由统治占领地区继续下来的军事统治，所以总督接受大本营的监督，复员后接受陆军中央的监督，对于政府或外务省的指示置若罔闻。这种军事统治践踏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前和战争中曾一再宣称、在《日俄和平条约》中也明确规定的关于“满洲”的“门户开放”、“各国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机会均等”等原则，全然无视中国的主权，采取一系列旨在只把日本势力渗透到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措施，甚至连铁路运输货物的处理细则也是如此，这就触怒了日俄战争时期在财政和政治方面大力援助^①过日本的英美等国。由此造成了围绕中国和西太平洋地

^① 日本的胜利全靠英美等国的援助。

区的势力的、日本同英美特别是同美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的对立^①。

在政府内部，外相加藤高明等亲英美派，主张对“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因未被采纳便于1906年3月辞职了。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担心日本同在财政上所依靠的英美之间对立的加深，多次向中央提出意见。1906年5月22日根据他的要求，召开了有元老、政府首脑、陆海军最高首脑等参加的“满洲问题协商会议”^②。会上伊藤首先发言。他慷慨陈词，强调不开放“满洲门户”，与英美为敌是日本的“自杀政策”；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必将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不满，照此下去“最后势必导致中国二十三省人心走向抗日”，强烈要求军政当局改变现行政策。山县元帅、寺内陆相和儿玉参谋总长以各种理由强词辩解，反对伊藤的意见。伊藤针对儿玉等人一再说“经营满洲”，指责“儿玉参谋总长等人根本误解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痛斥他们把并非日本领土的“满洲”完全视为日本领土的作法。会议的结论是：“全会意见大体一致”。这种结论与其说形式上用了暧昧不明的言词，莫如说实际上用空洞的言词承认了伊藤的主张，会议决定把关东总督府改为平时组织。此后，总督府制便改为都督府制了。

不过，即使改成都督府制，日本在“满洲”的政策活动比过去并没有根本改变，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没有实现，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只有加强，没有丝毫减弱。因此，日本同英美的对立，以及同中华民族的对立却日益加深。1907年11月，伊藤自汉城向政府呈递意见书，警告说，由于日本不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

① 日本同英美的对立，尽管时张时弛，但总的看来日趋激化，终于发展成1941年的日美战争。

② 参加这次会议者除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井上馨五元老外，政府首脑有：首相西园寺公望、陆相寺内正毅、海相斋藤实、藏相阪谷芳郎、外相林董等五人，军方有：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桂太郎、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等共三人，总共十三人。——译者

将加深日本同英美间的对立，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本有孤立于世上的危险。然而军事当局对此却充耳不闻。

伊藤还在意见书中提到，日本在财政方面必须依靠英美，在资本方面无力与列强帝国主义竞争。所以伊藤等人主张要与英美协调。然而军人们却认为，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确保和扩张势力范围。只要日本想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就必须靠“军事力量的独占”、“独占掠夺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特别方便条件”来弥补或代替日本体质上经济力量的不足。换言之，即必须维持和强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事统治。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对立与日俱增，朝鲜、中国大陆、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日益高涨的时代里，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越发加强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更加推进了军备的扩张，这不单是军事当局利己的要求，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体质上的需要。

这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掌握军事力量并统治着殖民地的陆海军尤其是陆军的实权派，已经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在对华政策方面，他们在自己认为必要时就随时无视政府，强制推行独自的政策。其先例表现在1900年占领厦门的计划上，到了日俄战争以后，军队在“满洲”的政策行动，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

尽管是军队的擅自行动，但在外国看来，也认为是日本国家的行动。日本政府对外要直接负责，不得不设法加以处理。就是说，政府只好被军队造成的既成事实牵着鼻子走为它进行辩护；或者只好制止军队的行动。再让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队服从政府的领导，当时甚至连伊藤博文也无能为力了。日本与美、英、俄等国的外交中心，也是围绕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所以，谁执对华政策之牛耳，谁就可以对日本的全般对外政策直接给予决定性的影响。而对外政策是与内政密不可分的，因而他们也必然介入内政。这就是说，陆海军尤其是陆军，以推行独自的对华政策

为中心，介入了外交内政各个领域的政治。

这样，独立于政府、议会和人民之外，必要时干脆对立起来，试图操纵国政的政治势力——军队即军部就形成了。军部已不是过去的军阀，正如围绕韩国统监的军队指挥权问题的对立中所看到的那样，它是整个军事机构形成政治势力后的产物。

通过1907年4月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国防所需兵力》这些日本最高国策，以及1907年9月制定的《军令》，使军部的势力在国策上和制度上得到了新的强有力的保障。

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始于山县元帅于1906年10月采纳参谋本部成员田中义一中佐的意见，拟出《帝国国防方针的私案》，上报天皇。天皇将这一方案交给元帅府^①进行咨询。元帅府答复说，准备将此案交给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让陆海军协商起草“帝国国防方针”。经过两个统帅部门的协商，1907年2月，他们共同向天皇呈递了《帝国国防方针草案》、《国防所需兵力草案》和《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草案》。天皇只把《帝国国防方针草案》交给西园寺公望首相，令他组织研究，而《国防所需兵力草案》则只准首相自己“秘阅”，至于《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草案》连秘阅也未准许。3月，西园寺首相上奏天皇，内称：“我认为国防方针极其适宜，但国防所需兵力当今难以立即全部实现，请暂假以时日，结合国力斟酌缓急”。于是，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的方案全被天皇采纳，并作为天皇本人的意志和方针确定下来。这些方针政策是由天皇只特别交给军队和政府的最高首脑的事项，至于议会和人民则根本不晓得有这码事。

国家存亡攸关的最高政治方针——国防方针，只由军部来策划，首相只能就天皇下达的方案发表意见，这就等于首相只能承认陆海军的决定。如果也让首相发言，统帅部就应该从起草阶段同

^① 元帅府：天皇的最高军事顾问机关，1898年设立。——译者

政府协商，或者起码在统帅部制定出成案后即就此同政府协商才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由统帅部策划以后立即上奏天皇。天皇制下的惯例是，对于天皇受理的方案，一般说来，首相不可能加以修改或者提反对意见。正因为如此，军部才故意这样做的。在决定最高国策方面，这种程序便确立了陆海军的统治势力绝对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制度。国防方针的内容是，把俄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美国作为第二假想敌国，还设想了对美战争。这种设想的根据在于，山县有朋在私案中提出的所谓“将来扩张我国国利国权，以谋求面向中国为有利”这一日本发展方向的规定。如果日本继续侵略中国，首先同俄国、其次同美国的对立是必然的，军部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这纯粹是政治判断，本应“不介入政治”的军队统帅部竟擅自做出政治判断，并通过天皇强加给政府头上了。

执行国防方针所需的兵力，陆海军的指标都是日俄开战时的两倍，陆军定为平时二十五个师团、战时五十个师团；海军则是以八艘战舰和八艘巡洋舰为中心的“八八舰队”。此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日本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便围绕着这次以天皇旨意确定下来的扩充军备问题而展开了。

1907年9月，又制定了《关于军令事宜》，作为“军令”第一号。文件只有两条，第一条，“有关陆海军统帅事项，几经钦定之规定，均称军令”；第二条，“凡军令须公告者，附以上谕，天皇亲自签署后加盖御玺，主管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标记年月日，并副署之”。规定什么是“军令”的军令第一号就是以政府和议会根本不得介入的“军令”制定的，它本身就明确表示，这么一来，军事当局想把什么叫作军令就可以把什么叫作军令。这也是根据超越法理的明治天皇的判断，作为天皇的意旨制定出来的。^①因此，能够与其对抗的不是法理，而只能是可与军部对抗的政府或议会的实力。这种实

^① 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论备忘录》，《法学》杂志 12 卷 3、4 期。

力只能凭政府或议会在政治方面到底能把多少人民力量集结起来来决定。

1908年12月，皇宫内设立了侍从武官府，府内置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①侍从武官长由天皇亲自任命陆海军大、中将担任。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在天皇身边担任有关军事的上奏、答复和命令的传达，可以说是天皇与陆海军省、统帅部之间的纽带。虽然设在宫中，但并不受宫内大臣或内大臣的监督，是完全独立的。通过这个机构，军部便可完全抛开政府经常直接地与天皇取得联系。

这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统治着执行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实力部队——陆海军的势力，已经形成了一股无论在政治实践中还是在法制上都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并牵制政府和议会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军部。这股势力的中枢人物，明确意识到自己属于与“行政部”对立的“军部”成员而最初表现出来的就是本章开头引用的田中义一少将1913年2月2日致寺内正毅大将的信。

第二章 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军部

第一节 军部同政党和人民的对抗

通过日俄战争，天皇制日本变成了亚洲唯一的殖民帝国，开始同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的霸权。同时，天皇制帝国主义最大的实力组织——陆海军，以统帅权的独立和陆海军大臣武官制为两大支柱，与政府相抗衡，成了每每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治势力。当时的进步评论称之为“军阀的跋扈”或“军阀的蛮横”。我认为，这种“军阀”的形成，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决定日本命运的“军部”的形成。军部是怎样形成的，上一章已经叙述了，因此，

^① 明治四十一年第319号敕令。

下面就直接叙述军部实际上是怎样干预政治的。

最早出现的军部与政府对抗的著名事件是，1912年年底，军部要求增设两个师团，西园寺内阁拒不接受，于是陆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单独辞职，从而迫使内阁垮台。

《帝国国防方针》和《国防所需兵力》均由军部独断，作为天皇的意旨和国家最高方针确定下来，议会和政党对此全然不得而知。实际上政党人士和大资本家们迟早肯定知道了，但表面上他们始终佯装不知。日俄战争后的政局是，围绕着实现“所需兵力”的扩军问题，在政府、陆军、海军和政党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三角、四角的讨价还价的斗争，这样说并不过分。经过这些斗争，到1911年8月组成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时，陆军已拥有十九个师团。^①但距陆军要求平时二十五个师团的目标，还差六个师团。陆军认为，为了镇压朝鲜的民族独立斗争，并为了准备《帝国国防方针》中设想的对俄战争，主张迫切需要增建两个师团常驻朝鲜，改变过去由本国派遣师团轮流驻在朝鲜的编制。陆军过去每年都向内阁要求这项预算，但因日本财力实在担负不了而一直拖延下来。这次陆军又向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提出了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

海军也不示弱。它正在用总计两亿五千一百五十七万余日元的预算实行建造新式舰艇的七年计划。但1910年5月，它又向阁议提出了四亿余日元的要求，作为由次年度开始连续八年的充实海军费用。这项要求因财政困难被搁置起来，但阁议决定提前实施以前的计划，还决定从1911年度开始六年之间再支出两亿四千八百六十七万日元，并得到了1910年底召开的第二十七届议会的承认。尽管这样，海军还不满足，1912年又向西园寺内阁提出了从1913年度开始为期七年的“紧急扩充”计划，要求拨款三亿五千一百九十九万日元，以建造七艘最新式的大型战舰和两艘巡洋舰。

^① 日俄开战时是十三个师团。

陆军和海军竞相提出了财政根本担负不了的要求，内阁对此全部予以拒绝。海军考虑将来再说撤回了，但陆军却不肯撤回要求。陆军为什么唯有这次如此强硬呢？赶快增建驻朝鲜师团一事，从一味要坚持对朝鲜实行军事统治的观点来看，觉得实属当务之急；但心里未尝没有要乘后述的中国辛亥革命混乱之机大肆侵略中国的企图，因而急于扩军。不仅如此，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山本四郎说，陆军讨厌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有着以在议院中控制着绝对多数的政友会作为执政党的政党内阁因素，因而企图用增建师团问题谋求藩阀官僚势力的东山再起。^①言之有理。

在政府方面则是，整理行政和财政势在必行。一般说来，资本家也因军费过重妨碍他们的资本积累反对扩军，支持政府整理行政、财政的政策，尤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广大中间阶层和民众的舆论，由于反对日俄战争期间延续下来的苛捐杂税的掠夺，以及前桂内阁集中表现出来的军阀内阁对人民的压制，对于比桂内阁还差强人意的西园寺内阁的整理行政、财政寄予期待。政府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没有屈服于陆军的要求。起首反对增建师团的财界头目涩泽荣一等人，由于元老井上馨的劝说，11月中转变立场支持扩军，但并没能左右财界大势。政府越坚决，陆军就越顽强。

11月17日，上原陆相写信给桂太郎大将。信中阐明他的观点说：“试观政府方面情况，此次似欲逞不易成功之阴谋，以此一举博得彻底胜利，以达到政党政治之目的，当然不仅针对增建师团问题，亦不止针对陆军”，进而表明他们的立场说：“当今，君主主义一派，第一步调不一，阵容不整，各行其事，所一致者唯有自豪及轻敌一事。……总之，今后如不以非常之决心与非常之准备，克服危机，

^① 参阅山本四郎：《大正政变的基础研究》，此外，山本四郎：《围绕增建师团问题》（《华顶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6号）中也有相当详细的分析。

确立国家永世不可动摇之基础，更待何时？”^①他把增建师团问题看成是政党势力和君主主义的决战，所以始终不肯让步。11月30日，陆军的妥协方案在阁议上最后被否决以后，第二天，12月1日，上原同山县元帅进行商谈，12月2日，没向首相打一句招呼，就滥用帷幄上奏权单独向天皇提出了辞呈。这么一来，陆军根本不会推荐后任陆相，于是西园寺内阁便于12月5日垮台了。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陆军省军事科长宇垣一成大佐在“大正二年(1913年)夏初”的《关于陆海军大臣问题》^②一文中，针对社会上所谓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是因没人担任上原陆相后任而垮台的说法，说：“据吾人所知，当时从未听到有就陆相后任进行内部磋商之事，故政党者流所谓后任难产云云，纯系揣度臆测军部之意向，徒自画鬼于墙，望而生畏，自欺欺人。”然而，当时确实从现役陆军大将或中中将当中选不出来陆相，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西园寺要求山县、寺内和桂推荐陆相后任而遭到拒绝，社会舆论定会更加激烈攻击军部，西园寺所以并没有这么做而干脆辞职了，可能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一员，不愿意让民众更进一步地攻击军部吧。

关于围绕着增建师团问题的军部同政府和国民的斗争，一般的定论是，若是以前的话，军部的最高巨头山县有朋必定首先跳出来拥护陆军的势力，可是这次当初并未积极活动，上原陆相起初也并不那么强硬，后经田中义一军务局长和宇垣一成军事科长等中坚军官极力活动，鼓动山县、寺内、桂等人，一再怂恿上原，还说服井上等元老和财界。在《田中义一传记》中大肆夸耀了当时田中的活动情况，说明陆军省、参谋本部这些机构本身发展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形成军部的时候，其中掌握实权的干将——局长、科长等中坚军官，根本无视严禁军人干预政治的规定，热中于政治活动，这正

① 前引山本四郎：《围绕增建师团问题》。

② 《宇垣一成日记》1。

是由军阀统治转化为军部的特征。田中和宇垣等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坚军官”和“少壮派军官”的先驱。如果联想到后来的“中坚军官和少壮派军官”不仅把日本军队而且把整个大日本帝国导致崩溃的事实，那么田中传记的作者大肆夸耀田中军务局长的政治活动，未免有些滑稽可笑。

西园寺内阁垮台后，其势力仅次于长州陆军阀山县有朋的桂太郎巨头，辞去仅任职数月的大正天皇侍从长兼内大臣的职务，组成了内阁。当时海军由于同陆军争夺势力，不肯提出后任大臣，想迫使桂内阁流产。于是桂太郎请求天皇颁发敕诏，让前内阁的斋藤实海相留任新内阁。斋藤无奈，以桂内阁接受扩充海军的要求为条件答应了留任。可见，制定军部大臣武官制的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陆军阀也为这种制度受到打击。可以说是“因果报应”吧。军部的形成同时也使陆海军的对立激化起来。这和后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部独裁越发展，在大战方酣时陆海军的对立越激化是一样的。

陆军依仗帷幄上奏权扼杀了西园寺内阁，后任的桂太郎“以玉座为后盾，以诏书为子弹，狙击政敌”^①，挥动天皇大权的权力政治，激化了人民的反军部情绪，掀起了打倒军阀、拥护宪政的大规模国民运动。1913年2月10日，数万民众包围了议会，要求内阁辞职，演成了如同原敬日记中所描写的情况，即“倘若还不辞职，将引起革命骚动的事端”。桂太郎让三菱财阀拿出资金，收买了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人，组成新政党“同志会”，策划对反对派搞“中央突破”，但归终屈服于民众的包围和攻击，于2月11日辞职了。

在这次政变的高潮中，由军务局长调任第二旅团长的田中义一少将于2月2日寄给驻汉城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②一封长

① 尾崎行雄语。

② 寺内正毅是仅次于桂太郎的长州陆军阀巨头，而田中义一则是长州阀属望的人物。

篇信，信中论述了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如何捍卫军部势力的问题。^① 信中还写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由此可以了解当时一些政治军人的想法，因此特将信件全文刊录于下^②。

“久疏问候，伏维阁下愈益康健，是所至禱。鄙职自去年末调任以来，只顾忙于当前军务，敬请释念为盼。

去年末政变以来，发生种种变化，结果桂公组成政党，虽说不会立即如何，但早晚将使(议会)休会，然后解散议会，着手建立公开组织。由于去年以来发展情况，促成如此形势，但桂公关于政党之想法，似自始即有道理。去年为抑制政友会之横暴，标榜决不妥协，利用国民党派系人物，造成此趋势，是为此次决心之动机。

自去年末以来，鄙职未得会见桂公，窃维当今最须注意者，乃军部之态度。万一海军支持政友会，陆军另属新政党，各据分野，实为国家堪虑之大事。窃维今后至要者，乃陆海军协同一致，屹立于政党之外。再最须注意者，乃逢迎社会之趋势，政府丧失权威；政府若无权威，终将影响皇室尊严，社会将对钦定宪法作英国式之解释。再者，此次桂公所建政党，恐将主张修改陆海军大臣官制。桂公目前并无此意，但将来实不可逆料。

然而，当前形势，视政友会之态度如何，或许立即解散议会；但另一面，因政府坚决不辞解散议会，杀减政友会之气势，或不至解散议会亦未可知。桂公之决心似极坚定。新政党方面，对解散议会分有利与不利两派，但就大局而言，如今社会已陷于混乱，如不解散议会恐无医治之途。惟桂公组织政党，竟俯首于国民党，实属遗憾之至。去年末元老会议召开之前，如阁下(寺内)组织内阁，彼等将完全无条件驰驱麾下，大隈亦必约定

① 《寺内家文书》，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书。

② 文中的()是我的注释，我还加了标点，并改了行。

支援阁下。今者国民党如前所述，竟前来邀请会见鄙职。然今桂公却利用此已定之趋势，对之屈膝逢迎，甚属可耻。当前唯一支持桂公者为大隈伯爵，大隈已将阁下之期待转移于桂公。当时，不论阁下出马或桂公出马，均将造成目前形势，所不同者显然唯有无条件之驰驱与屈膝逢迎之差，而此差异必将对政府前途发生重大影响。

今后固不待言，目前苦于处置者为政友会之原(原敬)与野田(野田卯太郎)等人。由目前情况推断，将来新政党如不能顺利发展，桂公或许将推荐阁下而下野，而原敬等或将接近阁下。总之，近期须特别注意。陆军此时如不保持坚定意志，恐将面临严重困难局面。以前曾言那件削减五千万日元一事(因财政紧缩，桂内阁要求陆军省也要削减预算)，大臣、次官等人有意再增加陆军经常费用，因而向冈次官提出坚决意见。如因首相更迭，对陆军之处理有所不同(即不同意西园寺内阁的削减预算，而答应桂太郎的要求)，则陆军将失信于天下，因此(陆相和次官)似乎都打消了削减预算之意。但据悉，最近(桂内阁)又向陆军提出更高要求，对此陆军将采取如何立场？当然会出现诸如停止临时军费之意见。从大臣(木越安纲，从德国留学期间是桂太郎的密友)与桂公之关系以及冈次官已向桂公透露陆军财政内情看来，前途颇不胜忧虑。

此时尤需参谋本部进行活动。考虑今后趋势，莫若如前将动员、编制(由陆军省)移交参谋本部，以在政治斗争之外确立坚实基础，实为至要。否则深恐将遗噬脐之悔于将来。此类问题终属人事问题，鉴于各种关系，鄙职亦认为由上原中将任参谋总长，目前属实必要。

此外，考虑大局，将来尤应注意者，为对六七年后将达三百万人之在乡军人加以适当领导，并将其推广至一般青年，以

健全引导国民思想，巩固国家基础。此次教育令亦大致含有此意，所谓良兵即良民之主义将贯穿于教育与内政中。在乡军人会机关刊物《战友》杂志，目前发行量已达七万左右。此刻应将其改为旬刊，至少改为半月刊，以大力指导国民，实属当务之急。但因经济关系，不能轻易着手实现，颇为焦虑。阁下如能赐与关照，在阁下领导下取得此事之巨大发展，为国家作出贡献，实属我国最大幸福。在乡军人会发展形势良好，地方（指一般社会——军用语）与军队之关系颇有改观，此刻尤须奋勉从事，伏请阁下赐教为祷。

上月二十一日，伏见宫殿下就任总裁，并将于后日（四日）在殿下宅邸召集全国联队区司令官，届时拟请殿下为军人后援会颁发令旨，因正值皇孝期间，联队区司令官和军人声援会干事拟在偕行社^①聚餐，相互疏通思想，实行合作，并乞谅解。

与去年增建师团问题时一样，大部分国民总对陆军怀有不可理解之成见，致使陆军蒙受莫大不利，今后必须随时采取措施，消除国民之成见。诸如增建师团问题，军人中了解真相者亦甚少，何况在乡军人！因此，《战友》避开政治性报道，从教训出发，刊登说明真相文章，亦无不可。果对社会思潮顾虑重重，何时能了解真相？结果将始终抱怨陆军。另册稿件已邮寄河本（名不详，可能是寺内的亲信）处，请大致检查后赐与斧正，准许载于《战友》。山县元帅亦恳切希望予以刊登。

上原中将现仍居乡。窃维总须先回东京，正在劝告，烦请阁下亦顺便给予劝告。依愚见，果待命时间过长，将等于加强大臣不限武官之意，阁下在任地如无妨碍，能否于下月左右暂且返京。由各方面考虑，暂时返京似属必要。以上汇报近况，并候安好。请为国家保重身体。时局多难，想阁下对逢迎社会趋势情

^① 偕行社：日本军人俱乐部。——译者

况，定感不快。但国军永存，请勿因一时变动而过度伤感，是为至
祷。所陈杂乱，恐有失礼之处，诸乞海涵。

专此谨呈

田中义一拜启”

对这封信的内容全部加以注释，会过于冗长，这里只好从略，
不过在后文将一再谈到此信。

继桂内阁之后组成了萨摩藩海军阀巨头山本权兵卫内阁，实
际上政友会变成了执政党，以犬养毅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变
成了准执政党。桂太郎遗留下来的同志会改称“立宪同志会”，由
加藤高明担任总裁，它是唯一的在野党。当时，前内阁由于打倒军
阀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垮了台。无论谁来组阁，都不得不做出相当
的改革。山本内阁首先把陆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从现役将官扩大
到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其次修改“文官任用令”，对警视总监和
内务省警保局长等高级官员实行了自由任用制；第三断然整理行政
和财政，把1913年度的预算比前届内阁的原案又削减了百分之
十三。

尽管这样，这届海军内阁虽然削减了一般预算，唯独增加了海
军扩军费，既没有废除群众盼望已久的素称苛税的纺织品消费税
和交通税，也不倾听中小工商业者拼死要求废除营业税的呼声。

在军部大臣任用资格扩大的另一方面，正如上述田中信中所
计划的，陆军的编制、调动及其他业务均由陆军省移交给了参谋本
部。这就在制度上规定了这些业务均属内阁不得干预的军令事项，
而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进行协商，《田中义一传记》称赞田中在这
个问题上的功绩说“尔来参谋总长的势力愈益扩大”。参谋总长势
力的强化正是当时进步舆论最激烈攻击的目标。进步的民族主义
杂志《日本及日本人》，是攻击军阀、要求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反
对统帅部独立的急先锋。它在这年7月1日刊载了预备役军官西

本国之辅题为《贻祸的军相官制的修改》如下的批判言论：

“军队是国家的设施、国家的机构，为国家交战的工具，故必须服从国家的旨意。即军备的设施、改革、废除、国防方针、陆海军的安排和调整等自不待言，凡有关整个军队的事项，均须由内阁来统一，由国务大臣承担一切责任。”因此，“诸如妨碍内阁旨意的机关，即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各机关，应先废除。”然而，这次对陆海军大臣任用资格的扩大，“据说是把原属陆军权限内的动员、编制等职务移交参谋本部，以此为交换条件，才得以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军官”，“这只是长州阀军人估计到军部大臣若不由文官出身者担任，舆论界必将群起而攻之，于是便企图采取坚守参谋本部的方针。”西本断言：“所谓预备役和后备役军官，均属老朽不能胜任现役而被淘汰者”，即使把大臣任用资格扩大到他们，实际上根本也不能让预备役和后备役军官来担任大臣，这种以更加强参谋本部为交换条件的名义上的扩大，反倒越改越坏。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继 1913 年 7 月 1 日之后，又刊登了法学家林毅陆以《军务大臣的权限》为题的文章。该文批判说，如果扩大陆军大臣的任用范围，交换条件是缩小陆军大臣的权限，毫无意义。“为了便于解决军务大臣的资格问题，迎合部分阀族意图，从陆军大臣的权限中划出一些拨归参谋本部管辖，在运用国政上并非上策。应将军务大臣的权限日益扩大，同时令其负起责任。而在法律上不能提责任问题的特殊机关，即直属于天皇的特种机关，应尽量缩小其权限，以明确国政的责任，并使其不能牵制和妨碍当局的行动。”

西本的批判宛如已经看过上述田中的信似的，看透了军部的意图。军部虽然由于大正政变受到了打击，但仍不肯轻易退却。

由于强烈要求废除营业税的全国性运动和在众所周知的西门

子事件^①中，海军当局长期以来的腐败被揭露出来，山本内阁垮台了。在1909年2月20日至24日的《读卖新闻》上，对于海军高级官员利用购买军舰和其他军需品的机会，从中取得回扣一事，极其具体地揭露说，“陆海军军部的阴暗面，他们表面上装作清廉洁白，背地里却肮脏卑鄙，对于大批采购的军需品，经常掠取巨额回扣，悄悄伸出舌头舐这些香甜的汁液。”1911年，预备役海军大佐太田三次郎在名古屋组织召开了海军演讲会，从战略理论上批判海军扩充军备计划对日本的防卫毫无益处，并揭露海军内部的腐败，为挽救海军提出几条意见说：“第一，取消海军大臣只限现役将官担任的军刀主义，应和外国一样，由文官担任；第二，在军需部门应掺进非军事人员；第三，仿效陆军，隐瞒海军编制员额的作法，固属出自对外的战略上的担心，但这不仅是可笑的，而且实际上是出于不经法制局、运用帷幄上奏的卑劣手法而已。”1911年8月6日的《东京日日新闻》详细报道了这次演说的要旨。在发生西门子事件的1914年2月的一次讲演会上，太田大佐激烈主张说，最先拉出来的靶子——海军舰政本部第四部长藤井光五郎少将、和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的泽崎宽猛大佐等人不过是一些小辈，要把罪魁祸首山本权兵卫干掉。太田因此立即受到“惩戒免职”处分，并被剥夺了军阶和功勋章。国民党、同志会和中正会^②共同为太田募集慰问金，各报社也都帮助传播。^③此外，在职的海军主计大监片桐酉次郎早就主张改革海军的预算，西门子事件败露之后，他揭露出作证的事实，因而和太田同时被惩戒免职了^④。

由于上年桂陆军阀的专横和本年山本海军阀腐败的暴露，使

① 西门子事件：指日本海军官员接受德国大军火商西门子公司贿赂的事件，1914年1月23日被议会揭发出来，牵连山本首相及海军部门多人。——译者

② 中正会：反对政友会的小党派。

③ 《日本及日本人》1914年2月19日。

④ 同上，1914年3月15日。

人民过去对陆海军的尊敬扫地，在当时的报刊杂志等上，到处充满了要求废除大臣武官制和废除统帅权独立的舆论。但是，政党无论是政友会、同志会，还是国民党，都只是为了自己钻进政权，暂时利用民众反对官僚军阀的情绪，并没有为坚持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原则而领导民众进行斗争。反对桂内阁的政友会摇身一变成了山本海军内阁的执政党，该党首脑原敬等人参加内阁，犬养也暗中支持山本，这些都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尽管有这么绝好的机会，却没能给军部以任何严重打击，也没有真正要废止军部独立的意图。

山本内阁垮台后，元老会议推举山县的嫡系官僚清浦奎吾为首相候选人。清浦奉天皇之命，喜不自胜地着手组阁，但被山县派搞垮了山本内阁的海军，利用推荐海相之机要求清浦同意根本办不到的海军扩充方案。清浦果然没有答应。于是海军拒绝推荐海相，迫使这次组阁流产了（4月7日）。由此可见，海军不仅腐败，而且还很专横，毫不亚于陆军，只是海军手腕巧妙，没有受到陆军那样的舆论谴责。而且这一时期，海军内部也和陆军一样，“少壮派”非常活跃，他们开始向前辈们施加压力。这些“少壮派”以斋藤海相留任为条件迫使第三届桂内阁接受海军扩充方案，大肆活动，1912年12月21日的《国民新闻》对此作了报道。

清浦组阁失败以后，制造内阁的元老们也束手无策，提不出首相候选人了。最后根据井上馨的提议让大隈重信来组阁。大隈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曾是改进党的创始人，后来又长期担任改进党后身的领导，还当过首相。由于这种经历和他爽朗的为人，使一般人们把他误认为不属于萨长藩阀的颇有能力的政治家，是一个主张政党政治的论者，因而欢迎他来组阁的气氛相当浓厚。新闻出版界中有很多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人，他们为制造欢迎大隈组阁的舆论，帮了些忙。然而，其实大隈当时不过是一个只有“政权欲”

的老牌政客，元老们想利用他来压制政友会，他情愿实行增建师团，才承担了这个任务。大隈让加藤出任副首相兼外相，把同志会拉来作执政党。不过，这届内阁的实力派是警察出身的官僚大浦兼武，他和清浦同属山县一派，任农商务相，后改任内相。大隈内阁于4月16日组成。

大隈内阁首先抓的第一件大事是6月23日设立了防务会议。防务会议是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以及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构成的，它是一个“审议有关陆海军备设施重要事项”的机关，尽管财政困难，还是试图寻求扩充陆海军备的办法。

以前也曾有过设立类似防务会议但比它还胜一筹的机关的计划。第三届桂内阁在元老井上馨的支持下，曾经设想建立一个调整财政与军备关系的“国防会议”。设想的内容虽不太明确，但桂太郎的目的是想统一陆海军备。桂太郎在1912年12月9日写给山县有朋的备忘录中说，“增建师团问题，应就国防概况（设立国防会议）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再行决定，在上述调查决定之前，陆海军均不得施行（扩充计划）”^①。1913年1月8日，桂太郎还向田健治郎谈了对于整理财政和国防方针的抱负说，为此必须组织新政党，“陆海两相应改由文官担任”^②。在前述田中致寺内的信中，也汇报说担心桂太郎的政党会主张修改陆海军大臣官制。由这些史料推测，可以认为，桂太郎设想建立“国防会议”的目的在于抑制陆海军竞相扩充军备的企图，对攻击军阀的社会舆论作一些让步^③。

在政党方面，大正政变的中心人物、国民党党魁犬养毅在1914年1月的第三十一届议会上提出了“设立临时国防会议的建议案”。他说：“为了确立帝国国防的总方针，须以国务大臣、军务当

① 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一书中所引宪政资料室收藏的桂文书。

② 《田健治郎日记》、大久保利谦：《日本全史10近代III》中引用的史料。

③ 参阅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论备忘录》（见《法学》杂志，第12期3、4号）。

局首脑及特别任命的人员为成员，组织临时国防会议”。其宗旨是，“国防这样的大计划，应在一国的大势来推断，在一国的大方针来推断，然后斟酌财政、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情况”来决定，因此，要设立建议案中所说的、不仅军人而且有各有关大臣也参加的临时国防会议，作为天皇的咨询机关。犬养未就会议的组织权限提出具体方案，他说：“总之，只要能够协调国务大臣与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作出任何让步。”他还着重说明这份建议书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控制军备的扩充，而是为了实施现有的国防计划。提案交给委员会审议，但因审议未完而流产了。^①

同这些比较起来，大隈内阁设立的防务会议，并不是一个讨论国防方针或者重新制定包括陆海军军备基本计划的机关，而是为审议如何实现陆海军扩充军备的要求而建立的首相咨询机构，为了避免陆军反对文官议论国防侵犯统帅权的独立，他们甚至回避了“国防会议”的称谓。^②总之，它不过是一个为了既能顺利通过陆海军的要求，又可避免人民的谴责集中指向要求扩充军备的陆海军而建立的组织。经过防务会议的审议，海军军备补充追加预算，在第三十三届临时议会上得到通过。陆军增建两个师团的预算也准备在下年度提交议会讨论。桂太郎和犬养毅设想的国防会议还多少含有抑制军部独裁国防的因素，而防务会议甚至却具有军部反扑的因素。一贯进步的议员泽来太郎等人在议会上揭露并批判了防务会议的欺骗性。1914年7月1日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也批判防务会议是贯彻军部既定计划的工具，并在批判中指出，所以设置防务会议，是由于政府“屈服于陆海军主张的关于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员的天皇大权论”，否定了伊藤博文从军部立场对宪法第

①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9。

② 若槻礼次郎：《古风庵回顾录》。

十二条所作的解释^①。这就说明把对军部的批判引向到宪法论的高度，这很重要。

军部对外界批判军部言论的高涨，警惕得有些神经过敏，这在田中那封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犬养毅等人关于设立国防会议的建议可能也刺激了他们，当时陆军内部拟定了一份题为《鉴于时弊，关于拥护军令权独立之建议》的绝密文件。执笔者大概就是田中义一。该文件内称：“关于国防，只应由超然于政务以外之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长任辅佐之责，……制定符合机宜之计划，仰乞天皇圣断，别无他途。岂有军部自身玩弄权术，诉诸舆论，求其援助之必要？”关于扩充陆海军问题，则说，“先由参谋本部与军令部进行协商，根据完全一致之意见，再与行政部交涉，以维护军令权之独立……。若行政部由于财政情况，不能接受军部要求，双方则应进而重新协商，自行制定缓急顺序，决不可仰承内阁之成案。”就是说，陆海军在进行军备竞争时，如果双方为此都想分别利用军部以外的势力，则在反对统帅权独立的社会舆论异常强烈的当时，军部自身恐将走向损害统帅权之路，所以文件严禁此类作法，要求陆海军的统帅部协同一致，以捍卫“军部”的独立。^②

军部就这样摆脱了对它说来最初的严重危机。军部威信虽然大大降低了，但结果只在制度上把大臣的任用资格由现役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实际上是个微不足道的让步，代价则是参谋本部得到了加强。扩充军备虽然迟迟不见进展，但这些要求从财政来看本来就极其勉强；在财政困难和当时舆论那么严峻的时候，海军的扩军竟多少取得进展，陆军的增建师团问题也由于防务会议的反击有了眉目，这些毋宁可以说是军部的成功。

度过这次危机不久，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元

① 参阅本书第3册，第1章，第39页。

② 参阅本书第3册，第1章，第7页。

老和政府以及一些当权派以为这是“天佑”而手舞足蹈，便以日英同盟义务为借口，尽管英国并不欢迎，强行参战到协约国一方。一到战时便是军部的天下了。参战不久，在第三十四届临时议会的预算委员会上，上届议会提出的本应纳入海军补充计划的驱逐舰建造费，却硬塞进临时军事费里，受到在野党的追究。看来或将被否决，但声言“战时要举国一致”，便在预算委员会和议会全体会议上全场一致地通过了临时军事费预算。开战的第二年，即1915年6月，在第三十六届特别议会上，以执政党在上次大选中赢得的压倒多数的胜利为后盾，陆军增建两个师团的悬案也顺利通过了。

山县等人原想让大隈内阁干的事情到此算全都干完了，此后便打算把他们本来就不喜欢的大隈内阁搞垮。于是1916年10月，迫使大隈内阁总辞职。随后长州陆军阀的寺内正毅大将辞去朝鲜总督职务组成了纯官僚内阁。《朝日新闻》等报纸虽然抨击了元老和军阀内阁，但当时政党都热衷于党的利益和策略的斗争，民众也陶醉于大战景气的高峰，废税减税的呼声敛迹了，哪里也没出现高举旗帜阻止军阀内阁和“拥护宪政”的运动。

军部似乎又飘飘然起来。他们要在这时用军国主义思想把人民打成一片，由陆军掌握的在乡军人会加以灌输，凭陆军的压力，由文部省和内务省把自主的青年团强行改编为用军国主义思想来统制和教育青年的组织。

甲午战争以后，陆军内部就产生了组织在乡军人会的想法。日俄战争以后，根据“国内外形势及国军编制要点”，陆军越发痛感到有其必要。所谓国内外形势当然是说日本为了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必须拥有强大的后备军。日俄战争以后一再发生工人运动和租佃争议，民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统治者看来，这是“国民思想的恶化”——，这些很快就会影响到军队中来。因此，寺内担任陆相时曾经调查了外国（主要是德国）的情况，1906

年10月,首次制定出《在乡军人会规程草案》,经同海军协商,征得了海军的同意,但因“战后经营极为繁忙,且因各种情况不得不拖延”下来。1910年7月,陆军又拟定了一个修正案同海军进行协商,而接到海军的答复是“为时尚早,碍难协同共事。但因形势不容踌躇,决定暂先由陆军单独设立。”于是寺内陆相将此案上奏天皇,得到批准,在同年11月3日即明治天皇的诞辰,举行了“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开幕式。^①

当时促使陆军决定单独组织“在乡军人会”的所谓不容踌躇的“形势”,是指前此不久的5月下旬至6月上旬,逮捕了所谓“大逆事件”的犯人幸德秋水等,这一事件使陆军当局深受冲击,他们感到“国民思想竟已恶化”到如此地步,于是便把设立“作为思想对策的在乡军人会”看成当务之急。^②陆军省军事科长田中义一是创立该会的积极鼓动者之一,他恪守“良兵乃良民”的信条,鼓吹“要使在乡军人成为地方良民的模范,同时还要使之日益锤炼军人精神及增长军事知识,并使会员采取互相扶助及慰藉的方法”,以此作为创立该会的宗旨。^③当时海军所以没有同意,可能是因为海军复员的水兵为数极少,并未感到有训练在乡军人的必要;而且对于用在乡军人会加强社会上的陆军势力,怀有对抗意识。

据陆军文件记载,在乡军人会创立之前,全国各地业已组织了在乡军人^④团体。实际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拘怎样,在乡军人会是经过天皇批准这种最高级的正式程序而创立的,本部设在偕行社,支部设在联队区司令部,分会设在各市町村,聘请皇族担任总裁,特邀两名陆军高级官员担任顾问,称之为“会老”。在乡军人会接受陆军大臣的监督,各支部接受所属师团长(在殖民地则是

^① 前引《明治军事史》。

^② 《田中义一传记》。

^③ 《明治军事史》、《田中义一传记》。

^④ 在乡军人:指退伍后居乡的预备役和后备役士兵。

驻军司令官) 的监督。修改在乡军人会规章须经陆军大臣认可。这种全国性组织是把由上至下单方面进行指挥和发布命令的军队组织照搬过来的, 通过这种组织, 实际上把全国的退伍军人都强行组织到各个分会中去了。

从前引田中致寺内的信件可以了解在乡军人会的发展情况, 以及田中是如何期待该组织发挥机能, 防止民主舆论侵入军部中去。1914年初, 田中视察德国, 看到德国工厂里有退伍军人组织, 在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 深受启发。同年8月, 田中回国后, 就企图不仅在居住地区, 还要在工厂也把在乡军人组织在分会里。根据这种设想, 1917年5月, 对在乡军人会章程作了部分修改, 规定工厂、矿山也可设立独立的分会。于是同年7月, 九州的三池煤矿根据所辖久留米市联队区司令部的指示, 便建立了四个分会, 并组成“三池煤矿联合分会”。在第二年8月的米骚动中, 这个联合分会与军警密切配合, 充当了镇压暴动的急先锋^①, 还有很多地区的分会在镇压米骚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田中期待的效果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从此以后, 各地的大工厂都陆续建立了分会。1917年, 除了为会员发行的机关刊物《战友》以外, 还发行了面向会员家属的《我家》杂志。

1914年, 田中义一在德国看到中央集权的青年军事组织之后, 深受启发, 回国后便企图把过去农村自发形成的民间自治青年团体, 一举统一为中央集权的“修养”团体。他的设想是: 第一, 团员的年龄自义务教育结束至二十岁^②; 第二, 不是自治团体或事业团体, 而是修养和被指导团体; 第三, 使同在乡军人会直接挂钩; 第四, 磨炼身心, 尤其要锻炼体力; 第五, 以统一或“诱导”青年思想为目的。其中重点在于使青年团同在乡军人会直接挂钩, 通过

① 新藤东洋男:《三井矿山和舆论岛》。

② 二十岁为征兵体检的年龄。

小学校——青年团——在乡军人会这样一个系统，把全国青少年都组织起来。田中虽说青年团不搞军事训练，但又说，根据全民皆兵的方针，一定要让青年们学会使用武器和掌握射击方法。

1915年9月，日本内务和文部两省向各地方长官发出了《关于领导和发展青年团体的问题》的训令，田中的纲领全都实现了。陆军省所以没在训令中列名，是为了避开社会对军阀到处插手的责难。对这次建立青年团最卖力气的是各地联队区司令部。当时内务和文部两省内心虽然反对军队强行介入，但一下子就被军队压倒了。^①

军部就这样在社会舆论谴责“军阀”专横的高潮中，稳步地打下了它的势力基础。另一方面，又乘中国辛亥革命及后来的中国政局动荡之机，军部无视政府，独自推行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政策，牵制了日本的国际政治路线。

第二节 军部对中国的干涉

自从对日俄战争中占据的地区实行军事统治以来，军部一直把南满看作是陆军的领地，每多无视政府指示为所欲为，致使元老伊藤博文十分痛心。在1900年，满不在乎地炮制出厦门事件的军部，当1911年10月中国爆发辛亥革命陷入混乱状态时，立即开始了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革命起义。革命的烈火开始蔓延全国，于是清政府在10月13日要求日本政府^②援助三十万发炮弹、六千四百万发步枪子弹以及其他武器。日本政府马上答

^① 《田中义一传记》。日本内务和文部两省1920年的反击情况，容待后述。

^② 时为第二届西园寺内阁。

应，16日，内田外相训令伊集院驻华公使^①，让他向清政府申明：鉴于日本政府不避莫大风险，提供援助武器的善意，清政府应改正那种视日本为满洲侵略者的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10月23日，日本泰平公司^②代理店与清政府陆军部签订了订购武器的合同，这种“援助”便付诸实行了。日方出售野炮、山炮、榴弹炮、步枪子弹、机枪等，总计价款达二百七十三万多日元。^③

在天皇制统治阶级的最上层中，元老山县有朋和前首相桂太郎等实力派，对邻邦变为共和国本能地感到恐怖，坚持拥护清朝，希望清廷实行“立宪君主制”。这就导致内田外相以及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政策僵化起来。当初标榜立宪君主制的袁世凯，在通过同英国的交易、观点转向共和制之后，唯有日本仍然对他施加压力，令其采用立宪君主制，终归失败^④。这个外交过程，不属于本书范围，故不论述。

虽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使它实行立宪君主制，但日本统治阶层在对华政策上，步调并不一致，并没有始终坚持拥护清朝的政策。在日本政府内部，内阁的头号实力派内务大臣原敬，10月20日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形势，叛徒^⑤和官军情况均不详，

① 伊集院公使：日本外交官伊集院彦吉(1864—1924年)，1911年4月到1912年7月，任驻华公使，还曾任驻意公使等职，1923年出任外务大臣，旋即病死。——译者

② 泰平公司是1908年由三井物产、大仓洋行、高田商行等三个公司与陆军签订合同，为了出口陆军的“陈旧”武器而组成的合伙组织。当初合同期限为10年。经过两次延长后于1926年解散。通过向中国各派“援助”武器，泰平公司成了日本陆军操纵中国各派的桥梁，同时，它交给陆军的回扣，又成了陆军操纵政党和议会的资金来源。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清国事变》。

④ 臼井胜美：《辛亥革命——日本的对应》，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一大正时代》。

⑤ 叛徒：为对革命党及革命军之诬称，习见于辛亥初期日本官方文件。——译者

故只凭外交上的理论，未免于我不利”，在看不准到底哪方面将会取胜的情况下，为了无论哪方面取胜都不至于吃亏，认为也可以多少答应革命军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援助武器的要求。于是参谋本部这回还是从独自的立场出发，10月20日，将少量的雷管和炸药以运往马尼拉的名义出售给中国革命军，为此请求原敬内相令警察给予默许，原敬内相当即同意。石本新一陆相请求原敬内相说：陆军省“讨厌参谋本部直接插手中国各派，故凡未经陆军省者，请勿理睬”。^① 参谋本部根本没有支持中国革命，只是企图让中国混乱局势加深，长期延续下去，趁机向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在这点上陆军省也是一样，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军部内部早已存在着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争权夺力。

整个政府根本没有看清中国的革命形势，原敬内相等人打算对中国双方都插手。1911年10月24日，阁议决定的《关于对清政策》内称：“帝国应不断努力，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地位，并应讲求方策，使满洲现状永远持续下去。此乃前任内阁执政时经庙议决定之方针”，不想乘中国动乱之机采取新的行动，“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则须待对我最为有利、且最有把握之时机，再行着手，方为得策。”“今后应着重努力在清国本土扶植势力，并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② 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只能作出这样一篇抽象的文章，难怪连原敬内相也叹息道，它对辛亥革命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政府无所作为，束手无策，被中国的形势搞得晕头转向；军部也同政府一样无能，但军部不但不是无所作为，甚至可以说它过于有所作为了。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一传到日本，陆军省的田中义一军务

^① 《原敬日记》。

^② 参阅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109—110页。字句略有删改。——译者

局长等人便立即着手拟定侵华计划。10月13日,就很快将拟好的《关于对清国的用兵问题》的文件传给了海军省。文件说,“当向清国出兵时,第一步应给制定战略之首脑部以沉重打击,同时须根据战后情况,占领政略上经济上最为有利之要地,以作抵押”,“宁肯在战略上输一筹,也应根据政略上之要求,谋求取得战役之最佳效果,方属得当。即我方是否应满足于获得南满洲,或是否应占据直隶、山西地区,攫取清国中部地区之资源,或是否应扼制扬子江口占据长江资源及大冶矿山等,或是否需要令其割让广东及福建。凡此等等,必须确定政略上之要求,使作战计划符合此要旨,以期对清策划万无遗误。”^①

上面所说的“政略”,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基本对外政策,而是指军部关于占领中国哪一部分对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最为有利的判断。据《原敬日记》载,在陆军省把上述文件传给海军省的10月13日,石本陆相在阁议上“把一份文件交给阁员传阅。文件说,并非要求阁议通过,亦非陆军的成熟意见,只是当清国发生事端时,我国是否应该安于现状,还是应该占领一些地区,如果占领的话,该占领哪块地方,希望决定下来。”这份文件的内容,肯定和前面传给海军的文件是一样的。陆军省虽然将如此暧昧的文件交给政府和海军传阅,但实际上却准备日本单独出兵“满洲”,并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出兵华北,第二天,14日,陆军省次官向参谋本部次长发出了如下的照会:

“应特别注意者,乃当战局波及华北时,我国当然须下决心,即一方面以保护满洲铁路为名,单独加强对该方面之防卫;另一方面则应采取共同出兵^②华北之手段。盖当共同出兵华北及长江流域时,为以后计,必须先于列强独占白河口及长江口之有利

① 栗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之一面》,资料2。

② 指日本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出兵。

根据地。征诸过去经验，我国此时似常处于列强背后而失去机宜。故必须预期事变，配备海军于主要地点，使之应急首当其冲，以采取制先机之手段。因此，请将事先研究与海军联系之事项，火速告知。”

由此看来，陆军策略确已定下来了。但它却对政府和海军说，陆军也还没有定下来，在阁议上也不说让大家决定政略，只说通报一下，这是玩弄什么阴谋呢！是否因为让内阁来按照陆军的意图决定日本国家的方针没有十分把握，才故意把陆军的意图说得含糊其词，想要无视政府擅自行动，殊属可疑。而且值得注目的是，上述文件讲的是作战用兵的战略，本应由参谋本部作为军令机关来拟定方案，而陆军省却以“照会”形式通知参谋本部，几乎仿佛是在指示参谋本部。后来陆军省也有类似行动。如1912年3月8日，陆军省次官用“绝秘”文件秘密通知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说准备利用驻满师团换防时机，向满洲派遣第五师团新兵三千名，就地训练这些新兵作为留守部队，换防的兵员不调回国，准备令其开赴华北。^① 策划这一阴谋的中心人物是军务局长田中义一。

参谋本部也在擅自活动。除了上述向革命派提供武器外，中国爆发革命运动以后，1911年10月14日至1912年初，参谋本部分别向南京、上海、福州、北京、“满洲”、长江沿岸、华北地区、山东省、外蒙古、广西省梧州、内蒙古、云南、“满洲”郑家屯及整个中国其他各地派遣了三十七名谍报军官，令其同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北京公使馆武官、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及驻其他各地的武官、谍报机关、台湾陆军部等有关军事机关进行必要的联系。其一一览表请见前引栗原的编著。

10月14日，海军也对形势作出了分析并制定了行动方针，

^① 防卫厅战史室藏书《清国革命动乱关系集》，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的引文。

将其下达给海军的下属机关。内称：“当前我国之方针是，暂时观望形势之发展，苟宜扩张我国权域，则不失可乘之机，并毫不丧失既得利权，且须避免中国之猜忌及各国之恶感”，这是总的方针。海军当前的具体措施则是，第一条，在接到有关命令之前，保持中立；第二条，对待清廷官宪和“叛徒”，态度要十分谨慎。虽然这么说，但在第四条中却提出，“必要时可诉诸武力保持大冶，事实上占领之”；在第十条还提出，“马公之第十驱逐队要按缓急，作好向对岸厦门、汕头、福州等地出动之准备”；第十一条，“若北方兵力薄弱，不能排除直隶方面发生暴动之可能，第二舰队主力要准备奔赴该地”等等。海军当局看了这个通知以后，便在策划占领政略要地。^①

元老、政府、军部、军部内的陆军和海军、陆军内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都在各行其事，国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统一方针，难怪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中经常充当最侵略的集团的吹鼓手德富苏峰哀叹道，日本应付中国辛亥革命归终只是“右手欲为之事，以左手打消之，终未取得任何可计之功。总帐算来不过是，中国任何党派均不领情，而且遭到各个党派之抱怨或轻侮而已”。^②下面仅就“右手欲为之事，以左手打消之”试举一二具体事例。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一方面向清政府赶紧援助武器，同时参谋本部也在向革命派提供武器。而与参谋本部关系密切的民间一部分“支那浪人”却为“援助”革命派大肆活跃。黑龙会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中卷，写得相当详细，而且不愧是一部粗糙的冒险主义者集团的著作，是用粗糙的豪言壮语写成的，在此从略。这些“支那浪人”的所谓“援助”，不过是为了革命胜利后攫取利权的手段而已，内心却绝对反对中国变成共和国（后述）。1911年11

① 前引栗原编著。

② 德富苏峰：《大正政局史论》。

月，革命形势逼近北京。于是在各国公使团之间提出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守备”北京—奉天铁路的问题。日本政府同意由列强共同守备，同时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南满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北京—奉天铁路的山海关外一段理应由日本单独守备。英国当然对于日本的野心存有戒心，最初认为，问题是关于山海关内京奉线的守备，至于关外，在发生必要的事态时再由各国另行协商，但结果还是原则上承认了日本的单独守备。当然这是在发生必要事态时，而不是立即这么办（11月13日）。关内的京奉线由列强共同守备一经决定，陆军省便立即制定了《华北派遣队编制要领》，决定从第三师团调出一个步兵大队和步兵机枪队（六挺机枪），置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之下。这支部队分别于12月2日至3日到达天津、北京，因此，中国驻屯军的总兵力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三名。

在此之前，驻北京的伊集院公使曾要求派遣精锐的部队。但政府认为，派遣过多的陆军会增加列强对日本的戒心，对日本不利。^①然而，陆军省却计划向华北派遣一个师团，11月30日，军务局拟定了《华北派遣师团编制要领》，接着取得了参谋总长的同意。12月2日，军务局又草拟了将第十二师团全部调往“满洲”的《满洲派遣师团编制要领》，1912年1月23日，参谋总长予以批准。参谋本部最初认为向“满洲”派遣一个旅团即可，但田中义一军务局长向山县有朋报告说：“对此决不同意，立即叫来第十二师团参谋，令其作好出兵准备。”^②

1912年1月14日，山县有朋拟定了一份乘此时机与俄国签订瓜分“满洲”的协定，并制定了由日本占领南满和东部蒙古派遣

① 1912年1月2日，内田外相致伊集院公使电。

② 1月17日，田中义一致山县有朋的信，前引角田书中的引文；《山县文书》，宪政资料室藏书。

两个师团的方案，翌日将其递交给前首相桂太郎。然而，1月16日西园寺内阁的阁议却未采纳山县的意见，并决定陆军当局出兵一个师团的方案亦须待取得俄国和英国谅解之后再说。

另一方面，满铁总裁中村是公接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的亲信朝鲜宪兵司令官兼警务总长明石元二郎的命令，策划“援助”“满洲”的革命派首领王国柱，在“满洲”炮制混乱，以制造日本大量出兵的机会。中村派出若干满铁公司的职员与王国柱接头，迫使其服从这个策略，于是关东都督掌握着警察权的满铁附属地便成了他们策划的根据地。11月12日，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请求内田外相，“此时应赶紧严重告戒中村，切勿对其本职以外事宜玩弄小计”。13日，西园寺首相电告中村说，有人说阁下在奉天操纵革命党，“此固系毫无根据之报道”，但鉴于目前局势，望严加注意。

满铁当局的策划似乎就此停止了，但情况不详。而且关东都督府仍旧借“援助”革命派之名继续进行扰乱“满洲”工作。清廷要求日方交出王国柱，总领事等人再三要求都督府和本国政府让王国柱离开满铁附属地，但直到12月初，都督还没让王国柱离开。12月1日，与王串通的一伙日本人向奉天城里的钟楼和市街投了三颗炸弹，并继续向王国柱一派提供武器。^①1912年1月30日，陆军冈次官秘密告诉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说：“现正就将来“满洲”秩序混乱时向该方面增派若干兵力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当前即使在满洲酿成少许纷乱之事端，贵职亦须注意避免过于死板之措施”。^②在这期间，革命运动发展起来。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2日，宣统皇帝逊位。在外务省预想到这种形势的2月初，日本政府也就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政策，1912年2月1日，落合^③

① 《日本外交文书》，别册，《清国事变》。

② 前引角田书。

③ 落合：即落合谦太郎，1911年11月14日，接替小池张造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译者

驻奉天总领事致电外务省，就关东都督任凭革命党将满铁附属地作为策源地一事，询问政府的方针。^①内田外相在2月2日的复电中指示，“现在，满洲朝廷让步之大势已定；今后赵总督^②等人态度如何变化，亦难预料。因此，当前对革命党施加压力之分寸，须慎重考虑。即使革命党势力壮大，致使“满洲”秩序发生紊乱，或将构成我国更进一步推行“满洲”政策之动机亦未可知。故既定方针^③固属未变，但在具体执行时，则应多少略加斟酌。”^④这就是说，外务省及政府都在被军部牵着鼻子走。原敬内相等人早在前此1月12日召开的阁议上主张，“对于革命军，应采取更加主动援助的政策。俄国已以帮助外蒙古自治之名，进行插手。现在是我国对东三省采取相当措施之时机，请政府仔细讨论”。松田正久法相和斋藤实海相也都同意了这种意见。^⑤

正当政府看来也要决心出兵的时候，2月3日，山海关外发生了京奉线铁桥^⑥被炸，列车翻车、死伤多人的事件。凶手是谁不得而知，但根据列强各国的协定，事件发生在日军负责守备的关外地区，而且日本主张关外要由日本单独守备，所以中国固不待言，列强各国也怀疑这是日军干的。加之，日军立即派遣山海关的铁路守备队一部奔赴事故现场，所以就更加深了列强各国的怀疑。1912年2月6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西吉电告外务省说，中国方面曾透露，这次铁桥爆炸使用了大量炸药，若以十余人操作，至少需要一两天方能完成，故不能认为是革命军干的等等，怀疑是日本干

① 参阅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233页。——译者

② 赵总督：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译者

③ 所谓既定方针指不能把满铁附属地作为变乱策源地的方针。

④ 前引《清国事变》。译者补注：参阅前引《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235页。

⑤ 《原敬日记》。

⑥ 即金子屯铁桥。——译者

的。电文又称：“此外，近日风传，还有破坏山海关—奉天间另一铁桥之计划。倘我陆军当局为向满洲运兵确有此类计划，考虑对外关系，必须在绝对秘密中进行。”^①

铁桥爆炸事件发生后的2月5日，大岛关东都督致电内田外相，内称，“在满洲秩序紊乱时，曾说我方应采取相应对策，现在已经紊乱，怎么办好？请予指示^②”，暗中催促出兵。然而，当时袁世凯的地位、势力已经压倒了革命派，宣统帝逊位三天后的2月15日，由十七省选出议员组成的参事院一致推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了。列强估计袁世凯将完成统一中国，便对这种事态表示欢迎。所以日本军部也不能不担心，如果日本单独大量出兵“满洲”，造成新的混乱，那时日本将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结果，关东都督也不得不断定，利用革命党扰乱满洲的阴谋也到了限度，于是2月27日，都督指令各民政署长，令革命派中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退出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③关于在利用革命派扰乱“满洲”问题上军部同政府间的争吵，由于中国形势变化这一日本以外的因素便消声匿迹了，这决不是政府对军部的胜利。

政府也在长江流域一带向革命派“援助”武器，企图打进英国的势力范围。1912年1月10日，外相、大藏次官、日本银行总裁以及三井、三菱、台湾、正金、第一各银行代表和大仓喜八郎等人在外相官邸召开会议，决定以上海—杭州铁路为抵押、由大仓组单独向革命军提供贷款，并于1月27日签订合同，立即实行。大仓组既卖给清政府枪炮，也卖给革命派枪炮，从中赚钱。另外，还以把汉冶萍公司改成日华合办为条件，决定由正金银行向汉冶萍公

① 前引《清国事变》。译者补注：参阅前引《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145页。——译者

② 参阅前引《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240页。——译者

③ 前引《清国事变》。

司提供三百万日元资金,该公司把这笔款交给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用这笔钱向三井洋行购买武器(2月10日)。还有,2月6日,以招商局的船舶为抵押,招商局与日本邮船公司之间签订了一千万日元的暂定借款合同。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这笔借款未能签订正式合同。另一方面,日本企图向袁世凯政权做工作,但如前所述,袁世凯本身也转向赞成共和制,唯独日本想把君主立宪制强加于他,结果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使日本与中国革命派的关系自不待言,甚至与中国新统治者的关系也疏远了,在列强中间也孤立起来了。^①

在“满洲”,军部一面利用革命党制造混乱,企图伺机出兵,另一方面还策划利用最反动的反革命宗社党^②炮制“满洲独立”,并企图利用内蒙古部族的王爷举兵炮制蒙古“独立”,以一举将“满洲”和内蒙古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参谋本部是推行这个计划的中心。关于这次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在栗原健的《满蒙政策史的一面》一书中载有详细的论文,本书下面只作简单叙述,并加上一些该书没有提及的情况。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有一批“支那浪人”。他们是为日本统治阶层侵华政策服务的侦探,也是出谋划策者——当然其中也有象宫崎滔天那样真心实意想通过中日两个民族的合作谋求解放亚洲的一些人。它们的主流即玄洋社和黑龙会企图通过“援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达到其侵华的目的。辛亥革命时期,玄洋社和黑龙会也曾站在革命派一边;而川岛浪速等人一派却一直与清朝皇室保持联系,宣统帝逊位以后,他们还想拥立皇族肃亲王,在清朝的发源地“满洲”恢复清朝皇室。参谋本部也支持这个阴谋(参谋本部同时还在“援助”革命派)。2月2日,怂恿肃亲王逃离北京,把他窝藏在

① 前引白井论文。

② 宗社党:企图在满洲恢复清皇室的一派。

旅顺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的官邸，随后于16日送到宗社党的根据地——奉天，拉他当宗社党首领。利用宗社党搞的“满洲独立”运动的总指挥实际上是参谋本部特派来的高山公通大佐，参与策划者是多贺宗之少佐和松井清助大尉等人，北京守备队长菊池武夫等从中协助。关东都督府耍两面手法，既袒护革命派，又支持高山公通等人的阴谋活动。在参谋本部里，福岛安正次长是这一阴谋活动的总指挥。可是，奉天总领事获悉这一计划后，建议外务省加以制止(2月21日)^①。经政府和军部协商后，停止了这个阴谋活动。

在宗社党策划举兵炮制“满洲独立”的同时，多贺少佐和松井大尉等人在内蒙古策划着另一阴谋，即唆使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在日军的指导和帮助下举兵“独立”。对外务省也曾插上了一手。1911年12月6日，川岛浪速向福岛参谋次长说，喀喇沁王已向正金银行提出申请，愿以所辖领地内的矿山为抵押，借银二万两^②，望促其实现。参谋本部同外务省进行协商，结果，12月12日，外务省政务局长告知正金银行副总裁说：“喀喇沁王的借款，内田外务大臣希望促其实现”^③。1912年1月30日，驻北京的高山大佐电告福岛参谋次长说：“关于蒙古举兵事，刻下稳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内离开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到运出)”^④，还报告了喀喇沁王要求二十万日元借款的事宜，拍电“请赶紧把现款寄来”^⑤。内田外相将此电文抄件一并发给驻北京的伊集院公使，令他贷给喀喇沁王和巴林王一定数额的现款，并说：“若能在东部内蒙古区建立某种利权关系，在万一时可能对我国有利”^⑥。伊

① 参阅前引《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83—84页。——译者

② 参阅上书，第87页。——译者

③ 参阅上书，第87页。——译者

④ 参阅上书，第88页。——译者

⑤ 参阅上书，第89页。——译者

⑥ 参阅上书，第89页。——译者

集院公使2月15日电复内田外相，陈述己见说，喀喇沁王和巴林王俱系昏庸之辈，既无实力，又无节操，但“认为此时通融若干资金，并非无用”^①。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3月5日正式签订借契，由大仓组贷给喀喇沁王九万日元、贷给巴林王两万日元。^②当时宗社党在“满洲”举兵的阴谋业已停止，而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却仍旧进行着上述内蒙古举兵的准备。关于外务省通过这次借款积极参与内蒙古举兵阴谋的问题，不知为什么，还没有人写出文章。

松井大尉等人继续囤积武器^③，5月下旬，在他指挥下，把这些武器装在五十辆大车上，由公主岭运往内蒙古，途中被中国政府军队发现，遭到阻拦，结果松井受重伤，日本人十三人、蒙族人九人、中国政府军三十人，共五十二人被打死，武器弹药也不得不丢掉了。

值得注目的是，政府、外务省也参与了这次内蒙古举兵的阴谋活动，“无所作为、束手无策”的内田外相和西园寺首相，为了乘辛亥革命的机会，设法对中国搞帝国主义侵略，竟然如此粗暴地对中国进行了武装干涉。他们之所以反对军部对中国进行干涉，只是因为生怕伤害同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关系，怕没有效果，只是战术上的意见分歧罢了。如果真正按刑法、陆军刑法的规定说来，军人搞这些阴谋是犯了“外患罪”，但他们却根本没有受到政府或军部的任何责难。可能是因为军部中央参与了阴谋，也就不应该只惩罚下边的执行者了。这就造成了只要是为了侵略中国，干什么都不受惩罚的先例。不久，这就变成惯例和理所当然的了。

1913年7月，中国江西省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当时日本军队和中国方面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兖州事件、汉口

① 参阅上书，第90—91页。——译者

② 前引《清国事变》。

③ 估计这些武器可能是从关东都督府领来的。

事件和南京事件等纠纷。

兖州事件发生在1913年8月5日。情况是驻在北京的日军川崎享一大尉穿着便衣在津浦路沿线从事间谍活动时被中国的北军逮捕，“监禁”在兖州兵营一天。据驻北京的日本山座公使调查，只是因为川崎用商人护照进行活动，被中国北军怀疑他是革命派（南军）的间谍。怀疑一冰释，川崎立即获释了。汉口事件发生在8月11日。情况是驻在汉口的日军西村彦马少尉带领一名士兵在北军戒严的江岸车站搞间谍活动，不听北军哨兵的制止，硬要闯进戒严区。由于西村首先动手砍伤了中国哨兵而被逮捕，没收了他的军装和军刀，把他拘留在北军兵营内仅仅几个小时。南京事件发生在9月1日。情况是当北军占领南京时，三个日本人举着国旗向领事馆避难途中被北军杀害，南京的日侨住房也遭到抢劫。当时那一地区参加南军的日本人有十三人，其中包括日军的陆军中尉，被杀害的三个日本人也经常出入南军司令部。^①

兖州事件和汉口事件应该完全归咎于日本人，南京事件固然可以说是中国方面不对，但本来发生这类事件的背景，是因为本应保持中立的日本驻屯军“支援”了南军，这就加强了北军对日本的疑心，过错根本还是在日本方面。可是，驻当地日军对这些事件完全加以歪曲，颠倒黑白，造谣夸张，大肆宣扬，说中国方面对日本军人，即对帝国军队、日本帝国进行无理的迫害和侮辱；侮辱日本国旗，是凶恶残暴的行为。“支那浪人”则更变本加厉，大肆叫嚣“膺惩支那！”向国民煽动排外主义情绪。报纸也净刊登这类蛊惑人心的报道。军部中央也迫使外务省要求中国处罚肇事者，“赔偿”损失，中国政府要向日本道歉。不仅如此，在汉口事件发生时，军部还要求把汉口日军兵营用地和所属道路划入日本居留地，要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中，载有当地领事、公使等人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

求在汉口取得军用无线电信的敷设权。对于这些要求，就连山本权兵卫首相等人也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因而没向中国提出。

陆军的驻外机关、军人以及关东都督府无论怎么胡作非为，在外国人看来，这都认为是日本国的行为。所以作为日本国外交机关的外务省，就不得不一一进行处理，又不能说这些都是军队擅自搞的。因此，只好牵强附会地说对方不对，一旦理屈词穷，就采取高压手段。这就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日本的反感和不信任，而且激起了同日本帝国主义角逐的列强各国对日本的不相信和反感。当时即使日本的无理得逞，也不能完全满足军部或排外主义“舆论”的奢望。于是，国内攻击“软弱外交”的势头便凶猛起来。外务省官僚对此吃不消，当然希望把外交统一起来。

1912年5月，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在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内田康哉外相手下就职。根据外相的命令，起草了一份《对华政策》，经过部分修改后，于第二年山本内阁组成不久便将这篇冗长的意见书提给了牧野伸显外相。《对华政策》的重点在于“解决满蒙问题”和“统一外交”。关于前者，阿部说，“所谓解决满蒙问题，往往意味着获得领土，帝国须以割取南满及与其毗连的内蒙东部，求得问题之解决”，但是，如此则(1)“不能最后获得中国之承认”；(2)“与保全中国领土之主张相抵触，与日英同盟、日俄协约、日法协约、日美协约等条文相矛盾”；(3)“若欲断然实行之，则牵累帝国甚大”，例如会促进中国的抗日运动，引起各国对日本的疑心，造成各国瓜分中国的开端等等；(4)“将给日本财政带来巨大困难，并对国运发展之全局造成不易克服之障碍”。

关于统一外交问题，阿部严厉地指名批评了军部。他说：“陆海军省自不待言，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官署，亦均须遵循政府之方针，不仅决不能与之背道而驰，且应按照外交机关之要求，为其活动创造条件，此点至为重要。因此，主管长官亦应针对此点向中国

各地驻屯军司令官下达详尽之指示,以使将来无丝毫之误解,此固不待言;而以往参谋本部、军令部等机关公开或秘密派往中国各地之军官亦应牢记上述意旨,实属当务之急。”阿部的意见书还指出,在满洲由于领事馆(外务省系统)、关东都督府、满铁会社和朝鲜总督府四个机关各自为政,因而造成了日本外交不统一,前后自相矛盾,应该尽快予以纠正,要求外交应由外务省来统一。阿部虽列举了四个机关,但当时满铁是在军部(关东都督府)操纵之下,所以实际上应该归结为军部同外务省、政府的对抗。^①

阿部政务局长由于持有这种政见,被军部及其爪牙“支那浪人”看作是最坏仇敌。1913年9月5日,当他到新桥车站迎接归国的前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的返回途中,在私邸门前遭到黑龙会两名凶手刺杀,翌日身亡。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以后军部及其爪牙法西斯恐怖的雏型。黑龙会等不但没有受到政府和资产阶级“舆论”的谴责,而且在阿部被杀后的9月7日,还召开了“国民大会”,掀起了侵略中国的热潮。

所谓“支援”中国革命派的黑龙会,还联合川岛浪速等宗社党派,组成了所谓“对华联合会”。他们“支援”革命派的司马昭之心,仅就这点已昭然若揭。试看1914年10月29日黑龙会提给政府的《对华问题意见书》,他们的真心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在我帝国支援中国民众上有个诀窍。即促使革命党、宗社党以及其他不平不满的党派到处掀起暴动。一旦其国内陷于混乱状态,导致袁政府土崩瓦解”,日本军队则援助中国人中孚众望者,使中国统一起来。“而我欲使革命党及不平不满的党派掀起暴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不能把力量集中于中国)现在是不易多得的最好机会”。“而中国的共和政体,是将来谋求日中合作的一大障碍。因为共和政体和立宪君主政体,其伦理道德标准根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本不同，制度法律亦颇背道而驰，与日本领导中国、使中国取范于我、日中合作处理东亚问题格格不入”。“改中国的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实是改造中国的根本”。至于是让宣统皇帝复辟，还是另外拥立宗社党的皇族，或是推选革命党中德高望重之士充当君主，则要根据时宜而定。若说这帮人的“亚细亚主义”似乎还有什么亚洲一体思想，岂不荒谬透顶。

在三十一届议会(1913年12月到1914年3月)期间，连经常批判“军阀横暴”的立宪同志会^①代表大石正巳也怒斥政府，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方针。无党派人士林毅陆在征得“宪政之神”尾崎行雄等人的同意后，提出了《关于满蒙政策的质询要点书》，要求保卫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除此之外，其他各派也纷纷提出了《关于对华外交的质问要点书》、《关于保全中国领土、实现机会均等的质问》等等。他们都大声疾呼，在俄国控制了外蒙古、英国插手西藏的现在，为了“保全中国领土”，要向俄国和英国提出抗议，实行“机会均等”主义，以加强日本在南满和东蒙的“特殊地位”。在这点上，军部、政府和政党，三者没有任何分歧。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军部才得以搞起无视政府的侵略活动。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统治阶层认为这是“天佑”，趁欧美列强无力侵略中国之机，企图大力侵略中国。8月17日，驻在“满洲”铁岭的日本军队，在身背实弹的行军演习途中，在郑家屯与中国巡逻队发生冲突，结果日军的一名准士和一名士兵负伤。关于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真相，我只看到日本方面的史料，所以不详。巡逻队说把日军误认为匪徒了；而日本方面则说所说“误认”纯属谎言，不可能有这种事，本来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排日气氛强烈，所以才故意挑起事端。即使看日本方面

^① 即后来的宪政党。

的史料,也会使人怀疑是日本方面故意挑起的争端。^①

关东都督福岛安正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于9月11日致电加藤高明外相,希望“在交涉谈判时,务必要让中国官民知道应该如何畏惧帝国的权威”,主张除了处罚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员以外,要以“获得日本人在满洲的居住权、不动产所有权及矿山开采权等重要利权”为目标,使之成为“为帝国势力培植牢不可破之基础的良机”。^②连不逊于军部的帝国主义分子加藤外相对此都似乎感到大吃一惊。他责难都督说,“本件本是一时的偶然事件”,福岛都督提出的这种“涉及全局问题”的要求,“根本不应予以考虑。”

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借口,挤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攻占了青岛的德军要塞,并占领了胶济铁路。这条铁路按条约规定是德国和中国民间资本合资经营的,日军管理这条铁路全线,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当然中国要向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本军队和政府却对此置之不理。

当时,中国有发生三次革命的动向,日本军部照例要搞一些“援助”南方的各种活动,其意义和前述一样,很明显,故在此从略。1914年10月,前述黑龙会的《对华问题意见书》炮制出来。如前所述,这份意见书认为当时正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绝好机会,提议“根本解决”的办法是缔结“日华国防协定”。协定的内容为,(1)在中国外战内乱之际,日军应对中国进行援助,维持中国领土的防卫秩序;(2)“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并将统治权交给日本,以确立国防之基础”,等等,共有十条。总之,是企图把中国的陆海军全部由日本来掌握,“委托日本整理中国财政”,让日本的教育顾问统治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国的外交权置于日本监督之下。因为以袁世凯政权为缔约对象来缔结这个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2册。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2册。

协约是不行的，所以如前所述，必须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建立新的“立宪君主制”傀儡政权。

当从民间向政府提出如此露骨而且实质上是吞并中国的意见时，在政府内部炮制出了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条”要求。“二十一条”中既包括前述郑家屯事件发生后福岛都督提出的日本人在满蒙的居住权、不动产所有权、独占矿山开采权等要求，还包括黑龙会主张的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武器供应，实际上由日本掌握中国的警察权等要求。这个在外交技术上史无前例的“二十一条”的总括的要求，究竟是怎样炮制出来的不详，但可以肯定，它是加藤外相和政府都全盘接受了军部等各方面提出来的要求。后来军部又单独策划了第二个“满蒙独立”的阴谋。

从1915年年底以来，中国掀起了反对袁氏政权的新的武装斗争。日本政府1916年3月7日的阁议断定：把袁氏赶出政界以外最为得策，但由日本政府从正面对袁施加压力不合适，因即决定了帮助中国反袁派的方针。具体策略之一是日本“默认”“民间有志者”支持中国反袁派的活动，坦率地讲，是“鼓励”这种颠覆活动。尾崎行雄法相抓住这次阁议的决议中日本的对华政策要“尽量与各国协调”这句话，竭力主张应是“关于中国问题，为与各国协调，必须不受其束缚”。石井外相解释说，所谓“尽量”，已包含了尾崎所说的意思，说服了他。

政府的上述方针，意味着鼓励“支那浪人”和接受参部本部密令的现役、预备役军官利用宗社党进行活动。关东都督府指令各地警察要“酌情”处理日本人支持反袁派的活动，这实际上是纵容和放任。为此，参谋本部把土居市之进大佐和小矶国昭少佐派往“满洲”，令其在都督的全面协助下，准备以宗社党的名义举兵反袁，实现满蒙独立。然而，外务省根据驻华领事和公使的判断，认为不应利用宗社党那样毫无实力的组织，而应利用奉天军阀的实

力派张作霖，阻止土居等人的活动。军部则是，驻满洲的师团长本乡中将和独立守备队长藤井少将等人同意领事的意见；参谋本部的上原总长和福田第二部长主张利用宗社党，田中次长则主张利用张作霖，众说纷纭。5月27日，宗社党一派企图炸死张作霖，结果失败了。于是张作霖不得不怀疑日本的居心。恰好6月6日，袁世凯暴病而死，黎元洪继任，参谋本部便和政府商定，全面停止满蒙“独立”运动。

但是，土居等人仍然声称奉参谋本部的密令（真假不详），企图利用宗社党和蒙古的巴布扎布策划在蒙古举兵。独立守备队内部也不统一，有的军官违背藤井队长的意图秘密参加活动。8月14日，他们集结在满铁沿线的郭家店，以满铁附属地为根据地，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关东军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让他命令中国军队停止应战。后来日本政府派来特使，说明参谋本部的方针也是停止举兵，9月2日，收回了关东都督府发给土居等人的部分武器，另一部分^①送给了宗社党和巴布扎布，令其退回蒙古地区。^②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是此后仅仅十二年的事情，而关东军和陆军中央的中坚军官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者中也有小矶少将。

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刚一停下，驻满洲日军又制造了第二次郑家屯事件。情况是，郑家屯镇内一个日本人到中国鱼店去买鱼，硬要少给钱。眼看要动手抢鱼，被中国第二十八师的士兵看见，一怒之下打了这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就报告了当地巡查川濑某人。川濑巡查立即赶到中国兵营，声言逮捕“犯人”，便与卫兵发生口角，最后跑回日军守备队去班兵求援。于是松尾少尉带领二十名士兵急忙赶到中国兵营，在与卫兵争吵中，突然用军刀砍伤

① 一千二百支步枪，二十四万发子弹，四门野炮，五百六十发炮弹及其他武器。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

了对方的右臂。营内的中国兵立即出来与日本兵彼此开枪，川濑巡查和日本士兵八人被击毙。中国士兵死亡四人，负伤十四人。第二天，日军调动一个骑兵连和一个大队步兵袭击了中国兵营，当时中国士兵根据上级命令已撤出兵营。

林权助公使9月6日致电石井外相，汇报了事件的经过，内称：整个事件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一个驻外军队竟然立即答应一个根本无权请求出兵的巡查的要求，“殊使本使不解”，并责问陆军当局是否允许驻满部队这么干。林权助公使还援引以前发生的兖州事件和汉口事件为例，慨叹军部这种行动致使日本陷于不利。

然而，在日中两国政府的外交谈判过程中，日方压迫中国，不仅要求处罚肇事者，并按一贯手法，乘此良机提出了好多无理要求：在驻南满和东蒙古的中国军队内配置日本军官顾问；中国军官学校聘用日本教官；在日本认为必要的南满和东蒙古地方派驻日本警察；南满的中国警察官署聘用日本顾问等等。负责谈判的林公使明明知道日军不对，军部却以日本国内舆论激昂为由，迫令赶快解决，使他不胜愤慨。这些要求就是“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的内容，是想借此机会实现“二十一条”谈判没能实现的要求。中国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对日本进行抵抗，中国民众的抗日怒火高涨起来。于是军部也不得不有所收敛，用警告第二十八师长等办法，年底双方达成了协议。当时日本还恋恋不舍地提出在中国警察和军队内配置日本顾问等三条“希望”，作为口头记录交给中国，并说对此无需回答。这也和“二十一条”谈判之际，迫于中华民族的抵抗和欧美的压力，眼看第五号所列各项要求不能实现时所采取的处理方法同出一辙。

就这样，驻外部队惹出事端，牵制军部中央，军部则迫使外务省追认既成事实，牵着政府鼻子走。这可以说是十二年乃至十五年以后从炸死张作霖到“九·一八事变”全部过程的“预演”。

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这是日本军部、政府、政党及其所有统治阶层的共同目标，即日本的最高国策。通过日本的寺内军阀官僚内阁与中国的段琪瑞政权于1918年5月缔结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军部在贯彻这一最高国策中的优越地位已经形成了制度。这两个军事协定同寺内内阁有名的西原借款，构成侵华一车的两轮。如果说西原借款是日本对中国的“胡萝卜”政策的话，那么军事协定则是“大棒子”政策。而且这两个军事协定与日本军部的武装干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侵占东部西伯利亚、从而把过去沙俄在北满和整个蒙古的势力范围据为己有等大规模的侵略计划是分不开的。

1917年11月，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取得胜利，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便急不可待地支持反革命势力，列强本身出来直接武装干涉苏联。同年年底，日本军部在与北满接壤的西伯利亚地区迅速展开了支援反革命派的活动。1918年1月初，日本军部以保护侨民为名，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派遣军舰，企图协同英国舰队镇压当地的革命派。于是由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和次长田中义一带头，会同外相本野一郎及其后任后藤新平等人共同策划，制定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当时田中参谋次长等人认为，必须把中国作为对苏作战的前哨基地取得军事上自由使用的权利。这不仅是出于出兵西伯利亚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把北满和蒙古置于日军控制之下，构成北从这一地区、南从日本本土夹攻整个中国的战略态势。^①

出兵西伯利亚，要尽量在取得帝国主义列强谅解之下进行，这项外交谈判当然由外务省来承担，参谋本部只能在幕后督促外务省。但是，关于日本取得军事上自由使用中国领土权利的谈判，已从1918年年初由参谋本部背着政府、亲自直接指挥其驻外机关

^① 出兵西伯利亚本身就含有这个目的。

及配置在中国政府内的日本军事顾问干了起来。向段琪瑞政权提供贷款——所谓“西原借款”的谈判主角西原龟三（寺内正毅的亲信）也进行了幕后活动。对于日本企图出兵西伯利亚，美国轻易不肯赞同，山县有朋等人也唯恐在没有取得美英谅解的情况下贸然出兵，一旦战争长期化或扩大化，日本财政将陷于崩溃，因而对出兵问题举棋不定。而参谋本部却认为，即使日本单干也要出兵，同时也急于确保对中国领土的军事使用权。军部强行牵制政府，迫使它1918年3月同意了军部的意见，5月17日，日中两国全权代表便签订了两项军事协定。这次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只有以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人，协定的正式名称也定为“军事”协定，把内容基本相同的协定分别缔结为陆军协定和海军协定，因此文官代表没有参加，另由日本外务省和中国外交部之间交换了军事协定的文件，日本国内则只公布了这份换文，协定本身付诸秘密。甚至对于向枢密院“披露”协定内容一事，田中都表示反对，竟写信给山县有朋说，“完全属于大权之军事协定”，不同意这样处理^①。协定的内容是，（1）日中两国陆军（海军）“为了预防远东全局和平之危险，及履行两国参加欧洲战争之义务起见，采取协同防敌的行动”；（2）两国军队在北满采取协同行动；（3）日本为此得在中国境内同中国共同建设和共同使用必要的基地；（4）相互交换必要的联络员。^② 这些内容在政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处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下的当代日本人，会立即明白的。这两个军事协定缔结两个多月以后，日本就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了。^③

① 《田中义一传记》，上。

② 参阅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1981年1月第1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253—259页。——译者

③ 参阅本书第2册《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

第三节 军部的后退和准备反击

1918年5月，军部牵着政府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强加于中国，并在同年8月1日迫使政府宣布出兵西伯利亚，这是军部在大正年代的政治上最专横跋扈的时期。后来，军部的政治势力表面上暂时有所收敛。

但从外部却看不出来，军部后退的最初一个重要事实，可从它在全盛时期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作法上看得出来。在此之前，1917年6月，“宫内”设立了一个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作为直属于天皇的外交政策审议机关。调查委员会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三位枢密顾问官即伊东巳代治、平田东助、牧野伸显、以及政友会总裁原敬、国民党总理犬养毅任委员，寺内首相任总裁。关于设立调查委员会的发起人及其动机、目的的各种说法，这里不一一介绍。总之，设立外交调查委员会是出于内政的需要，为了巩固和加强一味依靠军阀和官僚而没有执政党的寺内内阁，用外交活动应该举国一致的“大义名分”，把政友、国民、宪政三个党派的首脑拉笼到政府方面来；同时，正如外交调查委员会的“设立理由”第一条所表明，估计世界大战不久即将结束，为在将来的媾和会议上处于有利地位，要开展外交活动，并出于“回顾以往对邻邦中国之政策和行动，须谋求匡正厘改之策，是当务之急”的迫切心情，把目标放在尽量真正地作到举国一致的外交上（但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反对设立外交调查委员会，拒绝担任委员）。

可以设想，世界大战一结束，日本帝国主义显然不但不能再象大战中那样趁火打劫大发横财，甚至还会遭到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攻势。设立外交调查会的理由中所列“匡正厘改”过去的对华政策和行动，究竟如何改革以及改革什么，根本没有具体说明的

文件。但是可以肯定,当时的决策人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要消除军部与政府不一致的局面,推行统一的对华政策。

在统治阶层内部,可能谁都会想到,假如大战结束,欧美列强重新致力于对华政策的话,那么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就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旁若无人地推行下去,因此必须以明确的统一方针,采取慎重的行动。这种想法,对于妨碍外交一致的军部来说,是一种牵制力量。

当时的寺内首相是长州军阀巨头,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是寺内直系的长州阀,山县有朋是军队的最高权威,三者构成了山县一寺内一田中系统,形成长州军阀权势的最高峰。通过这种人事关系,内阁和参谋本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行动,长州阀的独裁与军部的独裁形成一个整体。向段琪瑞政权提供巨额贷款也好,缔结日华军事协定也好,都把外务省放在不闻不问的地位,甚至演成由首相、参谋本部和仅仅是首相私人亲信的西原龟三来策划的局面。当时一般说,军部的一意孤行在这届内阁执政时期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这并不是我所说的军部,而是长州陆军军阀最后一次的“昙花一现”。这届内阁不得不设立外交调查委员会牵制军部的对华政策,表明面对国内议会和政党势力的扩大、大战结束后可能出现的列强之间的角逐以及中华民族抗日热潮的高涨等形势的变化,军部和军阀也难以抗衡了。

我对外交调查委员会的这种看法,和今井清一的《大正时期军部的政治地位》^①一文中的评价正好相反。今井的论文,整个说来我是同意的,并从中受到很多教益,只是对外交调查会的看法,我的意见完全相反。今井说:“尽管这个会议不同于后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或御前会议只任幕僚左右而流于形式,尽管会上原敬和牧野伸显等人反对武断外交并展开了活跃的论战,但是仍然不

^① 《思想》,1957年9月、12月号。

可否认,总的看来军部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支持,增强了其在外交方面的发言权。”然而,即使在过去,军部在内阁里对于外交事务的发言权已经够充分了,再者,在朝鲜和满洲的情况,前面已经详细谈过,即使陆海军大臣参加了外交调查委员会,军部的发言权也不会特别增强。相反,正如今井所说的,牧野伸显、原敬以至伊东已代治在会上一番压制军部的发言,使军部觉得难堪,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这一点,小林龙夫编的《翠雨庄日记——伊东家文书》中收录的伊东已代治关于外交调查会的议事日志,写得很明确。下面试举一些具体例子。

第一,关于出兵西伯利亚的问题。调查会上就出兵目的以及可否出兵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关于派出的兵力和出兵地点,文官的枢密院顾问以及身无官职的政党总裁也大发议论,结果使得军部不得不在表面上基本服从调查会上的在极其有限范围内出兵的决定。实际上军部和后藤外相(寺内的心腹)干脆无视调查会决定的精神,向东西伯利亚一带派出了七万五千名士兵的大军,事实上军部还是自行其事了。但尽管在表面上也好,军部毕竟还是服从了军部以外机关的决定。这一事实试与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的情形比较一下。那时在阁议上,参谋总长甚至压制山县首相,不许内阁插嘴出兵兵力问题,相形之下,不能不说这是军部重大的后退。

在最初出兵的时候,军部哪怕是表面上也好,不得不服从外交调查会的决定,这就成了军部后来受到外交调查会牵制的条件。在1918年12月22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在田中陆相缺席的情况下,加藤海相代替陆相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兵约三万(11月底已撤兵一万三千八百名),留下约三万兵力。前首相寺内正毅也以委员身分出席了会议,并未表示异议。接着,12月25日,田中陆相事先未同参谋本部协商便擅自将撤兵决定上奏天皇,得到批准后才

通知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的地位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①

1919年8月，日本支持的俄国鄂木斯克反革命政权受到苏联红军攻击难以坚持下去。面对这种形势，田中陆相可能接受了参谋本部的要求，认为“维持”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反革命“秩序”，“防止过激思想东渐”，必须增强兵力，要求外交调查会同意增加兵力。若是以前的话，只需军队内部进行协商便立即决定出兵了。而在这次外交调查会上，伊东巳代治、平田东助和犬养毅等人认为，在当初的出兵目的中并没有规定日本要单独守卫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这也不是日本国力所能胜任的，因此一致表示反对，不同意增加兵力，最后会议决定“鉴于当前形势，无须变更过去出兵方针”，“将来形势发展，处理手段随时酌定”。^②从这次会议决议是田中在会议席上起草的看来，是否田中内心也反对增兵，为了压制参谋本部的增兵要求，才借助外交调查会决议的力量呢？殊属可疑。面对这种事态，参谋本部不可能忍受下去，于是上原总长和田中陆相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起来。田中对原敬首相说，我用“西伯利亚问题并非根据战争，而根据政府政策来决定”的说法压服了参谋本部。^③无论是因“战争”而出兵也好，还是根据“政策”规定而出兵也好，在使用军队上并无两样。如果以前的话，军部在统帅权独立的名义下，绝对不准军部以外的机关干预军队的使用、增兵和撤军等问题。这从为了承认文官韩国统监对朝鲜驻屯军的使用权问题而一再争吵，便可了解。而现在，参谋本部竟被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说法压制住了。

这时，政府的实力派甚至唱出撤消参谋本部的论调。据《原敬日记》大正八年（1919年）10月15日条载：“高桥藏相作为个人意

① 《原敬日记》、《田中义一传记》。

② 前引《翠雨庄日记》。

③ 《原敬日记》，大正九年八月十日。

见，印制了旨在消除军国主义误解的意见书，秘密交给我看，并由我酌量，可散发给别人。我读了一遍，恰值田中陆相在座，便秘密交给他看了。结果决定也给山县看看。高桥建议将参谋本部和文部省一并撤消，将农商务省分为农林和商工两省。农商务省问题姑且不论，撤消参谋本部和文部省，实际上办不到，徒只制造反对派，对国家亦毫无利益。再者，如欲撤消，必须统一内阁的意见，排除万难，坚决执行。总之，既属个人意见，暂不发表为宜。高桥也听从了我的话。”话只是这些，不过，撤消参谋本部问题已提出来了，仅就这点也可看出时代的空气与过去不同了。

在对华外交方面，军部的独断专行作风受到了相当抑制。在1918年12月2日的外交调查会上，牧野伸显认为，在大战后^①困难的国际关系中，同英美列强保持协调至为重要，因此他说：“例如日华亲善。表面上声言亲善，背地里实际上是‘霞关外交’^②、‘私人外交’和‘军人外交’三足鼎立，外国大使、公使等均在啧啧批评。今后必须尽量排除威压、权谋的手段，以走正道、扶助弱国为主义”。在8日的会议上，牧野再次重申反对表里不一、权谋术数的外交，强调要消除军部与外务省在外交上的“扞格”局面。犬养毅针对牧野的发言逼问道，如按牧野说来，日本是否今后逢一寸土地也不应谋求，只在经济上求得发展？伊东巳代治则责问牧野，你说日本是“无信之国”，请举出例子来。田中陆相也叫嚷要牧野举出陆军同外务省扞格的例子来。牧野对此未作任何答复。牧野说的话的确属实，不要说犬养和伊东，就连田中也清楚得很。如果说，就连在如此绝密的外交调查会上，还居然隐讳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把重点放在这种事情上来对会议进行评价的话，那么，可以说调查会是软弱无力的，但从牧野能做出那样的发言，而在陆相等人

^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牧野伸显当时是媾和会议筹备委员。

^② 霞关：日本外务省所在地；霞关外交：指日本外交部的外交活动。——译者

为了遮羞而愤然作态看来，可以说这也是军部后退的又一表现。

可能是由于牧野的发言吧，第二年，即1919年1月2日的《原敬日记》载，由中国归国的福岛道正访问原敬时说，驻在中国的外国人怀疑日本的“军人是否依然跋扈。”因此应为消除外国人的这种疑虑而努力。原敬回答说：“陆、外两省已发出训令，指示外交由北京（指日本公使馆）统一进行，军人不得擅自行事。”在1919年6月26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内田外相汇报上海发生了对天皇照片不敬的事件。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内田主张：“考虑当前周围的情况，扩大此事件，将酿成时局的纠纷，尤须审慎”，对此看法，伊东和田中陆相也都表示赞同。假如此类事件发生在几年前的话，军部和在中国的浪人定会大造舆论，而这次却没有发生类似情况。

1919年7月，在长春附近，一个满铁职员被中国军队用枪打伤了，于是驻宽城子的日军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与汉口事件、郑家屯事件不同，似乎不是日本方面挑起而是中国方面挑起的。外相训令关东军司令官说：“因诸如此类的事端，无论是非曲直在哪方面，中国方面都将用来中伤日军或借机排日，”故贵职应立即调查原因提出报告。日本方面决定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伊东已代治在外交调查会上听到有关这一事件的汇报后也认为：“此时，尤须警惕审慎，不要给欧美列强以日本帝国恃强凌弱之感，如欲极力坚持日方要求而使问题僵持下去，外交上并非得策。”^①

1919年11月，在福州发生了台湾籍人与中国大陆学生的冲突事件，经日中两国官方共同调查，结果认为咎在台湾籍人一方。1920年11月，以日方道歉和支付抚恤金而了事。若是在过去，会颠倒是非，把责任归诸中国方面。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反对日

^① 《翠雨庄日记》。

本帝国主义的情绪高涨起来，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强行压服下去了。^①

这是因为，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角逐，和战前的性质不同，愈演愈烈；第二，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经发展到与过去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运动性质不同的高级阶段，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势不可挡。在朝鲜，通过同年3月1日掀起的以“独立万岁”为口号的“三一”独立运动，朝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日本国内，自从上一年夏季遍及全国的米骚动以来，民众的政治势力取得迅速发展，人民对于那些镇压米骚动、有的地方甚至用刺刀刺杀人民的军队，越发怀有反感；出兵西伯利亚是不顾国民反对、没有取得国民支持而强行蛮干的，并且没有成功，这也造成了军队威信降低。这种状况迫使日本统治阶层不得不收敛一下新的对华侵略，军部中央及其驻外军人也不得不在政治上退后一步。

军部在政治上的后退，从改革殖民地总督的武官专任制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但这里也不无退一步进两步的性质。

改革殖民地统治制度的先导是1919年4月废除关东都督府。据《田中义一传记》载，1919年2月1日或2日，田中陆相访问寺内元帅，当偶尔谈到日本的殖民地时，元帅说即使任用文官担任关东都督也无异议。田中为武官绝对论者寺内的突变而高兴，便急不可待地制定了都督官制改革方案，5日提交阁议，作出决定，10日又经枢密院副议长清浦奎吾的口头同意，4月12日用敕令公布了关东厅官制及有关法令。据此废除了关东都督府，规定关东州附属地的行政、司法均由关东厅管辖，关东厅长官文武官员均可担任，由天皇亲自任命，关东厅为受外务省指挥和监督的纯粹的政务

^① 《翠雨庄日记》。

机关，旧都督府制的军事部门完全从政务分离出来，成为直属天皇的关东驻军。

从时间上看来，在田中访问寺内时，可能陆军内部业已拟好了都督府制改革方案，田中就是为了就这个问题试探寺内的意向才去访问的。我手头没有说明陆军当局为什么需要进行这一改革的史料。当时还没爆发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朝鲜的“三一”运动，所以不能把改革都督府制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朝两国抗日民族斗争的冲击。若大胆推测的话或许是这样：即使军部想要掌握关东都督府推行一元化的侵略“满洲”的政策和策略，由于国内发生了米骚动，国外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等国内外形势的激烈变化，统一外交的要求日益强烈起来。在外交和民政方面受政府监督的都督府，不能使军部随心所欲地推行其“满洲”政策。因此，都督府只能是军部的累赘，所以才把政权与军权分开，军部只掌握军权，让关东军司令官直属于军部中央，不受政府约束，便可自由行动了。即使没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垄断着军事力量，结果还能压制关东厅，所以军、政分开丝毫无损于军部。不过，军部却因此失去了通过关东都督来监督满铁的权利，满铁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摆在首位的经营方针，在制度上得到保障，这对军部并不可取，而对垄断资本有利。都督府早就想把都督府迁到统治南满的军事中心——奉天（沈阳），但奉天不是租借地，不能把租借地关东州的统治机关设在奉天，于是就想把军、政机关分开，把驻满军事机关中心迁往奉天。

让文官来担任殖民地总督，这是原敬自从创办台湾总督府担任台湾事务局委员以来的一贯主张。现在他当了首相，似乎正在等待实现他多年来宿愿的时机。当时，1918年11月23日，田中陆相对原敬首相说，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大将有意辞职，我认为让他辞职也好；又说，山县也说愿意辞就让他辞吧，以此试探原敬的

心意。原敬答道：“长谷川事已有耳闻。当时我想，在目前情况下，朝鲜总督不能永远限于武官。应把军、政分开，指挥国防由陆军直辖，总督改成由武官、文官担任均可为好。现任山县伊三郎（山县有朋之养子）担任政务总监已达数年，让他担任总督亦属当然。我认为这是修改官制的时机问题，请详加考虑这点，并仔细讨论”^①。这里玩的伎俩显然是想通过任用山县养子为总督来刺激山县，以期及早实现文官总督的目的。

于是原敬首相和田中陆相暗中进行协商，认为修改总督任用资格的问题，如不采取陆军大臣提议的形式，而由其他方面提议的话，对于统辖军队内部不方便；这次只限于朝鲜总督，不涉及其他。田中根据这一方针拟定了官制改革方案。^②

其间，1919年3月1日爆发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震撼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美国传教士访问原敬时谈到“对朝鲜军阀政治的详细考察”（5月12日）；朝鲜的卖国贼旧贵族宋秉峻也向原敬谈到总督府歧视朝鲜人的情况和“宪兵苛政的详细情况”，并“举出大小事例，要求撤消总督政治”。宋秉峻还谈出山县政务总监要尽快修改总督武官制的口信，他极力主张“首先必须把总督改为文官制，若不改变这个原则，任何改革都无效果”。

原敬和田中等人于是紧抓朝鲜总督府官制的改革。起首，山县有朋反对文官担任总督的方案，同时也不同意让养子山县伊三郎担任总督，参谋本部也坚决反对。于是，田中决定在制度上规定文武官员均可，但实际上任用海军大将斋藤实为新制总督，以此来缓和陆军内部的反对意见，请求原敬予以谅解（5月23日）。原敬没有立即答复，四天以后，他察觉到陆军内部和山县、寺内等人反对任用文官的意见，觉得也只好按照田中的方案，便同意了。以此

① 《原敬日记》。

② 《原敬日记》，大正八年一月十五日。

说服山县后，田中陆相在6月13日的阁议上提出了修改朝鲜、台湾总督府官制的方案，得到全体一致赞同。^①会上原敬叙述了建立现行制度的沿革，指出现行制度是模仿欧美各国殖民地的产物，根本就是错误的，因此，“应采取和国内相同的方针，进行相当的改革”。“内地延长主义”和“同化主义”是原敬的一贯主张，其意义与本书第一章所述(63至64页)相同。

8月19日，公布了改革朝鲜和台湾总督府官制的敕令，和废除关东都督府制的前例一样，规定政务、军务分开，总督只负责政务，其任用资格文武官员均可；军事部门规定为朝鲜(台湾)驻屯军司令部。同时还废除了朝鲜宪兵兼任警察工作的制度，改为普通的警察制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对朝鲜或台湾人民的压迫、掠夺较过去有任何缓和。根据田中的提议，海军大将斋藤实被任命为新制度下的朝鲜总督。斋藤实当时已编入预备役，又特意恢复为现役，才当上了总督。看来军部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朝鲜的政权。继斋藤实之后的朝鲜总督也净是陆海军大将。唯有台湾总督选任了文官田健治郎，直到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由文官连任。因此，军部对朝鲜的统治力量，实际上和过去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制度上把政务和军事分开了。政务不归军部管辖，说明军部后退了一步，也意味着专制主义的殖民地统治机构向近代帝国主义的统治机构的演变。

军部在国外的政治势力的削弱，连同政府和外交调查委员会对出兵西伯利亚的兵员增减、配备等发言权的增强，致使政党和知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要求裁减军备和改革军部的呼声。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平主义和裁军的呼声形成了

^① 据《田中义一传记》载，经退役将军三浦观树劝说，最初坚决反对的山县有朋，也以让山县伊三郎担任总督和修改朝鲜及台湾总督府官制为条件表示了同意。这和《原敬日记》中记载的经过不符。《田中义一传记》一书还载有海军主张台湾总督武官制，这也违反事实。

世界潮流。根据“凡尔赛条约”创立了以维护和平为招牌（仅仅是招牌而已）的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盟约》第八条中规定：联盟会员国承认，必须裁减本国军备；联盟理事会按照各国情况，制定裁减军备方案；接受方案的国家必须实行。^①1919年2月，日本召开外交调查会，当讨论《国际联盟盟约》时，伊东巳代治等人认为，接受《盟约》第八条则违反日本宪法关于天皇决定常备兵额的规定，对完全同意第八条的牧野全权代表，大肆谴责，但又生怕否认第八条，日本就加入不了联盟，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结果还是同意了《盟约》规定，决定加入联盟。

然而，当时不要说军部，就连政府骨子里根本不想裁军。不但如此，由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财政宽裕了，有了依仗，于是原敬内阁便从1919年度预算开始建设“八八舰队”^②、改善陆军武器装备等，大肆扩充军备。社会舆论不加谴责，致使日本的裁军舆论落后于国际舆论。到第二年，即1920年11月，国际联盟召开第一次大会以后，日本国内的裁军呼声才逐渐高涨起来。特别是1920年，由于战时景气的反作用，日本陷入严重的危机，后来转入慢性萧条，一直未能恢复正常，从1919年下半年起，贸易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由于扩军、出兵西伯利亚以及原敬内阁推行的“积极政策”，财政支出猛增，财政困难和第一次大战以前一样，与年俱增，越来越严重，于是扩军与财政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就使裁军舆论有了有力根据。

另一方面，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估计将来的战争可能是可怕的消耗战，要取得最后胜利，应平时缩减常备军，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加强军备的产业基础，由国家来完全把它掌握起来，并提

① 参阅《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269页。
——译者

② 八八舰队：即八艘主力舰和八艘巡洋舰。——译者

高全体人民的体力、军事知识和技术水平；战时则动员国家的经济力、人力、国民精神力。这种“总体战”的战略、策略思想成了各国的执政者和军人的主导思想。这本质上并不是裁军，只是在缩减常备军这点具有裁军的表象。这种“总体战”思想也传到了日本。在1921年1月的国民党大会上，犬养毅提倡“产业立国主义”或者“经济军备”。他主张：整理行政、财政；建设产业主义国家；消除外国说日本是军国主义的误解；为了准备综合武力和经济力的总体战，要缩短士兵服役年限，削减师团。在政党政治家中，犬养毅是从总体战的观点出发主张推行缩小常备军政策的先锋。

同年2月，在第四十四届议会上，尾崎行雄以外国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在国际上有陷于孤立的危险以及财政困难为理由，提出了限制军备决议案，虽然得到了《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等舆论界的支持，但在议会上以三十八票对二百八十五票的悬殊之差被否决了。政府和执政党的政友会自不待言，就连在野党的宪政会也是一样，供给他们资金的三井、三菱等特权垄断资本由于扩充军备才得以大发其财，所以裁军等等根本谈不到。

然而，虽然同是资本家，纺织业资本家钟渊纺纱厂厂长武藤山治却创立“大日本实业公会联合会”，以轻工业资本家为中心掀起了限制军备运动。同年6月，东京商工会议所会长糖业资本家藤山雷太访问原敬首相说，大坂商工会议所在会议所召开的全国联合会上提出了裁军的建议，“看来也太露骨，这样可不行，因此建议修正后再提出。”“藤山并把建议案交给了原敬”。对此，原敬警告说：“近年来，会议所的言论全是政治性的，而且是书生之见，老实说，无论提出什么建议，谁也不重视，只是束之高阁。可否考虑一些更加稳健扎实的实际问题如何？”^①。当时商工会议所的主力是中小资本家，他们经不起扩军带来的经济负担，因而要求裁军，但

^① 《原敬日记》，大正十年六月十五日。

控制会议所的确是藤山那样的垄断资本家，他们和政府串通一气。

不愿倾听日本人民呼声的原敬内阁以及其他历届政府，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力量薄弱、在金融上要依靠英美，因此他们不同于无知的军人，对于在国际上陷于孤立非常敏感和担心。1921年秋季，美国呼吁召开关于裁减海军军备的美、英、法、意、日国际会议（华盛顿会议），日本政府唯恐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虽然十分不愿意却参加了会议。由于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民间的裁军呼声更加高涨起来，1921年9月17日，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政治家和吉野作造等学者团体一起组成了“裁减军备同志会”，掀起了小资产阶级的舆论。与此相反，同年10月，三井公司的团琢磨、涩泽荣一、藤山雷太等垄断资本家巨头，经同原敬首相进行了仔细磋商之后，组成了以团琢磨为团长的“访问英美实业团”，为了向美国垄断资本家阐明日本的立场，把华盛顿会议引向有利于日本方向，同出席华盛顿会议的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等人同乘一船前往美国。^①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召开。在此一周以前，原敬在东京车站遭到暗杀。政友会闹得人仰马翻，结果高桥是清当上了总裁和内阁首相。由于华盛顿会议的国际压力，日本的裁军呼声这才变成了政党的议论，自从1921年12月召开第四十五届议会以来，裁军和改革军制的主张在议会中也强硬起来。因为海军的裁军问题在华盛顿会议的国际压力下是不容分说的，所以裁军的主张便集中在裁减陆军上了。1922年1月，在面临第四十五届议会的宪政会大会上，总裁加藤高明提出的通过缩短士兵服役年限来缩减陆军的主张，就是它的前奏。

这个时期，曾直属在乡军人会的青年团又变成了独立的团体。即1920年1月，文部和内务两省发布训令，确定青年团是青年的

^① 《原敬日记》，大正十年九月三十日、十月十三日、十月十五日。

自主、亲睦、修养、为社会服务的团体，团员的年龄仍按原规定不得超过二十五岁，团长须经团员选举产生。训令虽称：“考虑本团体之宗旨，以自主自力之精神，大力发展其能力，颇为紧要”，但改组后的青年团也绝不是自主的、民主的青年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把青年团从军部的手中夺了回来。

结合裁军的主张，改革军制的呼声也高涨起来。这一主张的中心是废除陆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在1919年3月的第四十一届议会上，国民党的植原悦二郎等人向政府提出《质问书》，指出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妨碍宪政的发展，表示反对武官专任制，这是在议会上打出改革军部的第一炮。于是对陆海军大臣武官专任制的批判席卷了整个舆论界。大正政变前后，军部凭陆海军大臣武官专任制这个武器露骨地策划倒阁或阻挠建立新内阁，所以政党和舆论界对它的攻击也能够动员广大群众走出街头进行斗争。但到大正后期，由于军部为了避免受到“干预政治”的谴责，行动谨慎起来，加上米骚动以后，政党已经害怕动员民众，因而政党和舆论界改革军部的舆论只停留在宪政理论上的泛泛批判，实际上没有任何魄力。而且若是理论的批判，如果不触及宪法第十一和十二条的天皇大权问题，批判就不可能是彻底的，可是，当时谁都不敢碰上一下。当政府内部高桥藏相等人认真考虑撤消参谋本部的时候，政党和舆论界中竟根本没有人把参谋本部当作问题，这也说明他们批判军部的不彻底性。

原敬首相非常善于抓住舆论动向并加以利用。原敬说：“维新以来，赖先辈的努力，万事都是政府走在前头，进行改良。所以我也要遵循这个宗旨。迫于人民督促才采取措施的作法，为国家实堪忧虑”^①，军部大臣任用资格的问题，原敬也抢在“人民”的前头。即1921年10月，在海相加藤友三郎作为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华盛

^① 《原敬日记》，大正八年七月十日。

顿会议的外出期间，原敬首相担任了“临时署理海军大臣事务”。陆军当局认为这是破坏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的第一步，坚决表示反对。不过，为了始终贯彻反对，例如陆相辞职，把内阁搞垮的那种强硬干法，过去还无不可，当时业已行不通了，所以只好说这次对海军的处理办法不能作为适于陆军的先例而默认了。

在比华盛顿会议晚一个多月召开的第四十五届议会（1921年12月到1922年3月）上，宪政会的野村嘉六等人向政府提出了《关于修改任命陆海军大臣官制的质问书》；国民党的植原等人向议会提出了《关于任用陆海军大臣官制的建议案》。两者都主张废除武官专任制，而植原等人的《建议案》在许多反对武官专任制论中最有条理也最有说服力，它把陆海军大臣应有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建议案》说，第一，根据法律理论，指出武官制不合理；第二，用政治史实论证了武官制对宪政的危害性；第三，在裁军势在必行的今日，武官大臣不可能坚决实行裁军，从现实的政治形势说明裁军的必要性；第四，为了准备将来的国家总体战的军政，比起军事知识来，更需要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广博而综合性的远见卓识。

在第四十五届议会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大冈育造等人提出了《整理并裁减陆军的建议案》；国民党的犬养毅等人提出了《关于裁减陆军军备的决议案》。后经两个建议的提案者协商后，归纳为《关于整理并裁减陆军的建议案》。其主要内容是，把步兵的服役期限由两年缩短为一年四个月、精简机构、削减经费四千万日元等。在审议该建议案的委员会上，山梨半造陆相声明：目前陆军当局也正在努力整理和裁减军备。

这届议会顺利地通过了裁军建议和关于陆海军大臣任用资格的建议。从此以后，一般认为裁军和改革军部两者是不可分的。例如，大冈育造在前述裁减陆军建议中也指出，现代战争不是军人

的战场，而是全体人民的战场，裁军后浮余下来的费用要用作文化事业和军事教育；还说“然而，在宪政之下还有什么帷幄上奏，实在不可思议”，进而主张废除帷幄上奏。大冈说，由于有了帷幄上奏，军部就可以任意制造将官，结果费用也增多。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必须废除帷幄上奏这种东西。

大冈的论证比较粗糙。吉野作造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论所谓帷幄上奏》的文章，连载一周（2月13日至19日），有理、有据地详细论述了废除帷幄上奏的观点，在唤起社会舆论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军部针锋相对地以“陆军当局谈”的形式在各个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帷幄上奏辩》的文章，进行强辩。文章说：当前社会上所以谴责帷幄上奏，是因为不了解帷幄上奏的法律根据和运用的实际情况，“社会上往往认为参谋本部或军令部是军部最终最高决策机关，在这里决定军备，对此，内阁也好、议会也好，只能唯命是从。这不能不说是脱离实际的议论”，文中举出了可以进行帷幄上奏的“军令”项目。但文章没有任何说服力。^①

在第四十五届议会上，尾崎行雄在阐述裁减陆军的观点时指出，日本所以孤立于世界文明各国，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陆军兵员臃肿，到处违法乱纪”，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裁军，“陆军当局军阀者流无论怎样专横跋扈，若没有二十一个师团，则蛮横不法的区域也会减少”。当时社会上关于裁军的主张，一般都归结到经济、财政与军备的调和论上，而尾崎却揭示出了“陆军兵员臃肿”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确是卓见。要让这些议论收到效果，必须反对军备背后的帝国主义政策，而尾崎却是一个不亚于军部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一点前已述过。

正如山梨在议会上说过的，在华盛顿会议的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内阁时期，陆军削减了六万多名官兵约合五个

^① 《论所谓帷幄上奏》，收在《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三卷。

师团的兵力、马匹，但却增建了机关枪队、野战重炮队和航空队，整备了无线电通讯器材。海军则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裁减了主力舰，但却增加了辅助舰艇。因此，在预算中陆海军总共只削减了七千万日元。而且这些资金却用来增加了养老金和遗族抚恤金。宪政会认为这还不够，1923年2月，又向第四十六届议会提出了裁减陆军的建议，但由于政友会反对而被否决了。

但是这届议会却通过了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废除大臣武官制的建议。植原悦二郎在阐述这个建议案的发言中指出，在“去年的议会”^①上，现总理大臣即当时的加藤海军大臣曾经声明“海军省认为文武官员哪方担任海军大臣均无妨碍”；在本届议会的贵族院预算委员会上，加藤首相还说过陆海军大臣也可不由武官专任。情况既然如此，如果政党下定决心团结起来推动社会舆论，必要时把民众动员起来，那么就有可能打垮武官专任制。不过，哪个政党也没有这样的决心。过去原敬首相在鼓励田中陆相果断改革参谋本部时曾经说过：“陆军的改革，只有陆军内部有了改革之士方能成功，外力无济于事。但利用社会攻击军阀的呼声，靠它的势力，亦非不可凭外力进行改革。不过，这样做陆军固然可以改革了，但将来的陆军恐怕变得无力了，所以不能采用这种手段。”^②怀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不止原敬一人，政友会自不待言，宪政会和国民党的干部可能都有这种想法。第四十六届议会是最后一次，后来议会上再也没有出现废除大臣武官专任制的主张。

当时正是军部的政治势力处于最低落的时期。1922年7月公布陆军裁减方案时，教育总监部的宇垣一成中将在日记中写道：“明治以来一再增建的军备走向缩减，可悲！”他慨叹军人遭受社会的诅咒，诅咒不久变成了轻蔑，裁减军备论很快升级，走向军备无

① 指第四十五届议会。

② 《原敬日记》，1920年8月10日。

用论。军备从扩充转向裁减，这是军部后退的集中表现。

在公布裁军方案前后，日本开始从西伯利亚全面撤兵。^①为了扼杀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1918年8月开始出兵西伯利亚，在整整四年间，兵力最多曾达七万八千名。他们纵横奔驰于西伯利亚的辽阔原野，结果彻底失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首次尝到的军事上的惨败。最初出兵正赶上发生米骚动，所以人民对于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就非常冷淡。与日本共同进行武装干涉的美、英、法三国已于1920年1月撤兵了，而日本仍以维持西伯利亚治安等根本不成理由的理由不肯撤兵。从那时起，人民反对出兵的呼声越来越高。军部无视人民呼声，一味继续战争。苏联人民的武装部队和红军的反击攻势越来越强，日军到处遭到失败，最后终于不得不偷偷逃出西伯利亚。陆军的威信由此扫地。本来，人民对军阀在国内政治上的专横的诅咒，并没有直接联系到对军队和军人本身的轻蔑，但由于军部强行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落得军队和军人本身都受到了唾弃。

然而，军部的后退只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本来，军部之所以形成，是以军队乃天皇的军队而不是人民的军队为基础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军部作为它的先头部队随之而形成。使军部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是，军令机关完全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帷幄上奏权和军令第一号等法制；以及议会根本不得干预决定国防方针及国防所需兵力问题，实际上政府也只好被迫承认既成事实的惯例。所有这一切，在军部后退期间也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在军部大臣武官制方面受了一点轻伤（即由首相署理海军大臣事务）。殖民地总督虽然不是专由武官担任，但军部仍然垄断着统治殖民地的军事大权，实际上殖民地驻屯军司令官比文官总督高高在上。

^① 1922年6月24日日本发表撤兵声明。

军部所以后退,不仅是由于日本国内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而且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过于蛮横,战后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击;当时还正面临方兴未艾的中朝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卷土重来镇压中朝民族斗争并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角逐之时,也就是军部在日本的政治势力中企图东山再起之时。即使军部在后退时期,也丝毫没有停止反击的准备。有时伪装后退,实则前进。

在1923年9月发生关东大震灾^①时,军队不仅显示出“维持治安”的实力,而且田中义一陆相还把军用物资发给在乡军人会令其救济灾民,收得成效。这对于温暖人民对军部、军队冷淡到极点的心情起到很大作用。从此军部的政治势力开始发动新的攻势的准备。这是因为,加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以补偿关东大震灾中日本遭受的严重损失,已经成为日本军部、官僚、政党、资本家、地主阶级等整个统治势力的一致要求,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军部创造了活动的条件和日益成熟的时机。

1922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②,在这期间,过去一直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加以扶植的日本政府和外务省,警惕吴佩孚背后有英美在支持,便声明中立,并企图接近吴佩孚。可是,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却支持张作霖,这就出现了“双重外交”的情况。因此,7月27日召开的阁议对军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明确的批判,控制了军部的活动。阁议指出,“隶属于参谋本部的帝国现役军人,应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宪之聘,到处处于军事顾问等地位……,这些顾问同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中国各地的特务机关、武官、研究人员等保持联系,与日本国内的参谋本部及陆军省遥相呼

^① 关东大震灾:1923年9月1日发生于整个关东地区和静岡、山梨二县局部地区的大地震,计烧毁住房五十七万余户,受灾四百三十余万人,死亡九万余人。——译者

^② 直奉战争:直隶军阀吴佩孚与奉天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应”，军部中央经常根据驻外军人的报告，背着政府自行其事，“暴露出极端的双重外交”，“使帝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经常陷于不利地位，始终不得不站在辩解的立场”，这种情况今后决不允许。

1922年时，政府还有上述这种力量。到1924年，中国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共同密谋支持奉系军阀，唆使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武装政变，迫使吴佩孚逃离天津。当时日本正是加藤高明任首相的护宪三派^①联合内阁，外相是币原喜重郎，陆相是上届内阁留任的宇垣一成。陆军唆使冯玉祥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驻中国的领事和公使等人似乎有所觉察，但因他们同吴佩孚及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的对抗关系，也希望张作霖取胜，所以对于军部的阴谋不但未加干涉，甚至也没向外务省作任何汇报。详细情节请参阅栗原健编的《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由于冯玉祥的武装政变，张作霖轻易取胜，币原外相等人为此皆大欢喜。假如日本公开援助张作霖，很可能因干涉中国内政而招致中国人民和列强的谴责。由于外相断然坚持了不干涉政策，因而日本在未遭到外部任何非难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便大吹大擂起来。宇垣一面从旁冷眼看着，在日记中写道，“社会上似乎有很多愚蠢透顶的人认为，新局面的展开是一种天佑。社会上这样看是可以的，满好。”但是，“既不知张为什么打了胜仗，也不知冯为什么倒了戈，而得意忘形的他们^②，实在可怜，而且可笑之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强化，是加深“双重外交”，使军部可以无视政府在中国强行独自侵华政策的基础。军部和关东军从此又开始走上一意孤行的道路，一直发展成为四年以后炸死张作霖和七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

在国内政治方面，军部的态度是表面上老老实实，骨子里耍弄

① 护宪三派：即宪政、政友、革新俱乐部三派。——译者

② 指日本外务大臣等人。

阴谋，正在制造准备的态势。1925年，在宇垣一成担任陆相时期，撤消了四个师团，使反对军国主义的国内舆论趋向缓和，但这种做法并不同于山梨那种为了招架外部压力而被迫裁军，实质上是一种积极扩充军备的做法。宇垣把裁减兵员和马匹节约下来的经费全部用于改善坦克队、航空队及其他装备上了。就这次“裁军”的意义，宇垣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抢在裁军舆论之前，先发制人，谋求充实军备；第二，让人们知道，裁军会造成该地方经济的困难，使人们不再提出裁军；第三，创造“军民一致”（即军队掌握人民）的开端。一面减少师团，另一方面在中等以上的男生学校里配备现役陆军军官，把学生的军事训练列为正课。在市町村还设立青年训练所，对没进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规定修完军训课程者，在入伍服现役时，服役期限由两年改为一年半。

宇垣陆相设想用这些方法，陆军可掌握“二十余万现役军人、三百多万在乡军人、五六十万中学大学学生和八十万青少年”，“无论平时、战时，实现真正的举国一致，使七千万同胞驱驰于至尊之下，听从指挥”。宇垣在日记中还写道，“在国家非常时期，统帅权不单是指挥军队，而且是一种支配国民的权力。要按照社会现状来行使这种大权。”他所看到的“社会现状”，是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和工人、农民斗争的激化。宇垣当时的思想已经形成波拿巴主义，其形成的过程，可以从他的随想录中看得出来，在此不谈这些。在这个时期的议会上，以退役军人出身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为首，一再建议或决议，要求政府尽快进行国家总动员的准备工作，为此要求建立直属于天皇的国防会议等等。这些论调，和大正政变时期为了抑制军部而提倡建立国防会议的主张截然不同，毋宁说是政治和经济的专家们为了帮助军部建立“总体战”体制的叫嚣。在议会的讨论中，就“总体战的能力”的最高领导权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能由军人掌握，必须由政治家掌握的主张。面对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共合作的、如火如荼发展着的革命斗争形势，军部、政府和政党协同一致地制造保卫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的舆论。军部又一次干预了政治，不久，不仅是干预，而且稳步地打下了独裁国政的基础。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

——《东洋经济新报》杂志的作用——

第一节 围绕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问题的各种思潮

一、参战思潮

1914年（大正三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英国对德宣战后仅四天的8月8日，日本政府和元老们便匆忙召开会议，背着人民秘密决定以履行日英同盟义务为口实参加对德作战。9日，元老井上馨写信给元老头目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说：“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举国团结一致，享受此上天之佑”，要停止一切为一党一派利益的减税、免税等争执，此时要“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①”，争取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世界地位”。山县和大隈也都“完全赞同”井上的意见。至于日英同盟义务云云，不过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寻找机会的借口罢了。

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把在中国山东省胶州湾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限定了答复的期限。理由当然是确保东洋和平，还煞有介事地宣布，要求移交胶州湾是为

^① 指袁世凯。——译者

了把它“归还给中国”。德国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在过了限定答复的期限——8月23日，天皇便宣布了对德作战。

日本的“舆论界”顿时沸腾起来，狂热支持这一决定。甲午战争期间创刊的《太阳》、《新日本》等永井柳太郎编辑的杂志，当时发行量最大，是日本鼓吹帝国主义思想的急先锋，属于大隈派的评论杂志，当然主张积极参战。从“大正政变”以前就站在攻击军阀、反对扩充军备的前列，坚持反对军部大臣武官制、反对统帅权独立，在内政方面极力主张民主改革和政党政治而首屈一指的三宅雪岭主编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竟然也积极主张参战。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在8月15日的社论专栏“东西南北”中刊登了题为《日英同盟与日本的义务》的评论，表示赞成政府的措施，认为当前正是确立日本“东洋霸权”地位的绝好机会。文中写道：

“欧洲战乱或许扩展成为世界动乱。即便不扩展成为世界动乱，也必将波及东洋，给以重大影响。当此时机，承担日英同盟的义务，终归会使日本得以取得置喙于世界利害问题的地位，在日后收拾时局时，日本可以东洋霸权国家占据获得有力发言权的地位。当局的声明，可谓极得时宜。”近来，欧洲各国对东洋压迫过甚，甚至连日本应得的胜利成果也没能得到。国民对此记忆犹新^①。“现在正值欧洲多事之秋，正是我们多年努力取得总收获的时机。以鄙人观之，我们倘若失掉这个机会，将永远成为世界的落伍者。”

显然，这种设想和前述元老井上馨的信件如出一辙。但该杂志在9月1日的“东西南北”栏中，就政府的决策是否“英明”又作了如下批判，说：

“德国是三国干涉的罪魁”。德国是以中国人杀害了德国传

^① 可能指俄、德、法三国对中日马关条约的干涉。

教士为借口,占据了胶州湾的。“这次大战,责任也在德国”,所以“我们当然认为,此次帝国的(参战)决定实属至当”。然而,这是否是最英明的决策呢?假如把德国势力从东亚全部驱逐出去的话,列强在中国的均势就将保持不了,英俄一打进来,难保日本将从南北双方受到压迫。“时局之英明决策”应是首先与英国达成协议,“把印度以东置于战局以外,以谋求东亚商业市场的安全,乘欧洲因战乱无暇东顾之机,掌握在中国的商业霸权,通过外交努力,对中国表示亲善,排除我商业贸易上的一切障碍。这样一来,在欧洲因战乱处于疲弊之际,我则稳步充实国力,可拒绝任何国家对东亚的发言权。此乃安定东亚的最好方策,亦我国富强的策。然而,当局目光短浅,不能远观十年以后,只为眼前利害决策,致使局势紧张,未免过于轻率。”

这就是说,不是有个不需参战就能成为东亚霸主的办法吗。这只是当时书报杂志上特有的倾向,无论什么事都要对政府批判一番,不这么作就不过瘾似的。所以,继前文之后,“东西南北”栏又以《喙探残肴》为题,说日本参战是“行使自卫权力”,与英国达成协议本来是个失败;并说政府对德最后通牒中关于要求移交胶州湾,“其目的在于交还中国”,可以说这也是被英国骗了;还大骂日本政府在对德宣战时“把帝国的活动范围限于中国近海和帝国商船的通路,把南洋除外”,这简直就象让英国来吃盛馐佳肴,而日本只用筷子去捡“残羹剩饭”。这种论调远比政府更富有冒险性和侵略性。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本来一贯标榜国粹主义和国权主义,所以不难看出,尽管平时高唱民主论调,一到战时,它的国权主义就原形毕露。而每期都刊登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民本主义评论家文章的《中央公论》杂志,在其9月号的前言中竟也说日本对德宣战《谁不觉得大快人心呢!》,文章说:

德国从中国夺去胶州湾，“德帝在东亚实现其雄图的策源地基础，即将完成。德国势力已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势将控制山东、河南，并因地形关系，要塞化的胶州湾势必形成对北京的威胁。正如德国本土是欧洲的祸源，胶州湾实危害远东百年。

呜呼，天乎！命乎！德国皇帝将不得不放弃其倾注多年精力所经营的宝贵成果，我帝国将一举根除远东和平的一大危害。谁不觉得大快人心呢！”

在同一期《中央公论》上刊登的石川半山的论文《毕竟是中国问题》，说欧洲大战是“期待已久的战争，这次大战持续得越长，对日本越有利”。文章进而提出了以下看法：

在欧洲对东亚的压力减少的时机，“日本应选择道路，第一，在北方应将南满及东蒙古划为势力范围；第二，原封不动地继承山东省的德国势力；第三，采取向南洋扩展之方略。如果袁世凯在政治统一遭到失败，中国大陆发生巨大动乱，日本必须及时地采取保持此四百余州秩序之措施。日本必须下定东亚盟主的决心，果断地确定扩展的方策。”

这可以说预示了政府的“二十一条”要求。

在制造舆论上比杂志具有更大渲染力的新闻界，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主编的《国民新闻》自不待言，在内政上与《国民新闻》针锋相对、大正政变时高唱打倒军阀的急先锋《大阪朝日新闻》，竟然也竭力鼓吹参战和帝国主义狂热。

在政府尚未秘密决定对德参战以前的8月6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欧洲战乱与日本》的社论，为日本参战大造舆论说，英国参战、“祸乱波及东方国家时，日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履行同盟的义务”，在7日的社论《战争之价值》一文中，声称这次大战是实现世界和平理想的一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该报还在8月12日的社论中暗示政府要在对德最后通牒尚未发出时赶快

占领青岛。社论说：

“同东亚及中国大陆本无任何领土利害关系的德国，在中国占有防御地带以至策源地的租借地，纯属侵略行为。在平时也大大危害和平。如德国无所反省，为了东亚和平，青岛难免要作为眼中钉加以处理。”

该报在 13 日的社论中还进一步煽动战争狂热说，日本切断德国所占青岛要塞这个“东洋和平的祸源”，“完全出于道义”，如第三国^①介入进来，“为了道义，也毫无忌憚地把它击退”。在对德最后通牒中规定的答复期限——23 日，该报又发表社论，估计日本将对德宣战，认为那时议会和政党应举国一致通过军费，自不待言，还应确定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社论说：“这岂不是时刻迫近的天赐良机，让我们来最充分地利用它，积极发展国运。我们既要力戒轻举妄动，同时也要警戒不能抓住天赐良机的那种深谋远虑”。

《大阪朝日新闻》这样的观点，当然不会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等的约定予以重视。在对德宣战前的 8 月 19 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胶州湾的处理与中美》的社论。社论说：“归还胶州湾是为了中国还是为了日本帝国？抑或为了东亚的全局？不看今后的实际情况，很难确定。如果帝国付出了许多牺牲才得以归还胶州湾，就不得不作相当的考虑”，暗示日本必须占领青岛。社论还说：因为“中国本身”没有靠自己的力量要求德国归还胶州湾保全本国领土的实力，所以中国觉得“除与帝国合作以外，在东亚别无依靠，那就希望无需拘泥于‘为了归还给中国’等字样”。

日本对德宣战以后，中国政府立即要求日本保证归还胶州湾。《大阪朝日新闻》对此评论说：“真奇怪！”，“中国太也现实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对我帝国不信任的表现”，“中国政府应诚心诚意信赖

^① 第三国即指美国。

日本”^①。

《大阪朝日新闻》也好，《中央公论》的知名人士也好，他们本来就是极力赞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活动的，所以当面临他们所谓的“绝好机会”时，提出上述这种主张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大战爆发的前一年，曾经主张日本应决心放弃一切殖民地的茅原华山等人，在大战一爆发也竟然主张起“新帝国主义”来了。

大战前一年的1913年(大正二年)8月15日，他在《日本及日本人》上发表了《日本的孤立与新人生观》一文，主张日本应放弃“以武力为中心之国家主义”，不要对中国追求领土扩张，“要下重大决心果断地把朝鲜、‘满洲’都丢掉不顾”，建立一个“在内不妨得个性发展，对外与世界协调而平等的新型国家”。但在大战爆发后不久出版的茅原亲自主编的《第三帝国》杂志9月号的前言中，却以“赞美战争”为题说，“日本民族今后个人也必须实现自我；作为一个民族，今后也必须以改变世界地图颜色的雄心进行扩张”。^②

茅原华山还在《中央公论》9月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从文明史和国际史来看欧洲战争》。文中写道，“由于大战的爆发，已无须担心日俄再战。第一，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更加巩固；第二，‘满洲’暂时也不会遭到日俄重新瓜分；第三，中国政府不管愿意与否，也只得依赖日本。因此，日本的势力将遍及全中国。问题在于日本人是否善于利用这种势力”。他竟如此恬然写出了与一年前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

在同年12月号的《中央公论》上，他又发表了长篇论文《战争的两大焦点和日本出兵论》。他说，由于日本已经占领了青岛，已尽到了日英同盟的义务，今后为了防备德国的复仇，必须“扩充、整

① 《大阪朝日新闻》1914年8月30日社论《要表示对日好意之实》。

② 《第三帝国》杂志创刊于1913年10月，标榜“新人的唯一战斗机关”，实际上聚集了当时的自由主义的进步评论家。

顿、改善陆海军”。接着又说：“不过，我并不赞成增建两个师团”。他到底想说什么？令人费解。可是他进而又主张“新帝国主义”。他说：

“如果彻底实行君主主义，就必然达到民主主义，如果彻底实行民主主义，就义然达到君主主义。与自治主义合一的专制主义，就是新专制主义，将国家经济置于世界经济（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上；而将世界经济置于国家经济之上，是第三经济主义。首先要让日本国民扩大起来；首先要充实日本国内；要建立一个以发展个人为主的新型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帝国主义。首先要将剑、肉和灵，军备、财富和思想融汇为一体。国威国权自然光被八表，皇威自然遍及宇内。”

由此可知，他在着眼于“建立一个以发展个人为主的新型国家”这点上，和上述一年前在《日本及日本人》上论述的观点相同。他要建立的国家，说是君主主义、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总之，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不过是一种一旦遇到发扬“国威国权”和“皇威”的良机，便立即和它“融汇为一体”的那类东西。

著名的民本主义领导人吉野作造，当时也写道：“我认为，所谓最好的政治，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①。吉野的这种观点也贯穿在两年后他发表的《谈宪政之本义及其善始善终的途径》^②这一著名论文中。吉野的文章比茅原的更通俗易懂，更具鲜明的“民本主义色彩”。不过，不能不说他们二者是属于同一基调的。而且吉野也支持过“二十一条”要求，后面将例举史料。茅原和吉野都是《中央公论》上经常出头露面的所谓流行评论家。如果将此与当时最“民主的”报纸《大阪朝日新闻》也在鼓吹参

① 《中央公论》1914年4月，《论民众的示威运动》。

② 《中央公论》1916年1月。

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不难看出,当时的“民主”言论,其水平是何等肤浅。如果没有对帝国主义的明确批判,也就不可能有彻底的民主主义。

二、反对参战、反对要求利权

在上述思想状态中,只有《东洋经济新报》坚持真正的民主主义,在要求内政上实行民主改革方面,它要求与当时任何民本主义者都在本质上不同的彻底的民主主义;^①在参战问题方面,它也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值得大书特书。

在日本参战尚未确定以前,《东洋经济新报》于8月15日发表了题为《警戒好战态度》的社论,其要点如下:

当前正面临着欧洲战乱波及东亚的危险。东亚变成战场,日本也将参战,这“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考虑,都对我国不利。如果可能,最理想的是,让他们那些交战国不在东亚采取一切军事行动,把战祸坚决局限在欧洲。如果难以办到的话,则我国目前所应采取的唯一方策,就是倾注全力缩小、缩短东亚的混乱状

^① 1914年第1期《东洋经济新报》(1月5日)社论阐述了民主主义的纲领。内称:

“按照我国民生活之现状,当前无论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诸方面,均须进行彻底整顿并开展大规模改革运动”。需要彻底整顿的项目如下:

“在政治方面,变限制选举为普通选举;在产业方面,取消保护政策,确立自由开放政策;在对外政策方面,抛弃帝国主义,奉行工商主义;在国防政策方面,缩减当前过于臃肿之军备,改为高效率之小型军备;在教育方面,废除官学特权;在社会问题方面,把妇女和工人从当前穷困境遇中解放出来。吾辈确信以上宗旨即为我国民前进之方向。”

接着,1915年7月25日《东洋经济新报》又发表了署名为石桥湛山、题为《论国会政体》的文章。该文指出,“无论任何政体”的国家,其“主权亦属全体国民”;“无论任何政体,最高统治权亦属全体人民”。该文主张建立议院内阁制,实行普通选举,以实现政府也“由人民代表组成”的制度。《东洋经济新报》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以上纲领。《东洋经济新报》不是民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而是真正坚持了民主主义的革命原则。

态。当前我国若稍许采取一些军事行动，其目的绝不可越出这一范围”。

日本始终“根本日英同盟的精神，同英国交涉，共同合作，承担维护东亚和平的重任即可。这时可能将不得不与德国为敌，固属遗憾，但德奥在东亚的军事势力也不过只有几艘军舰而已。压迫它，加以封锁，以保持东亚海面的安宁，可能只需举手之劳。至于德国在胶州湾微不足道的陆军，即使置之不理，它也无所作为。如果要发动大军，把它攻陷，我们必须说，这是超出了日本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范围”。

显然，《东洋经济新报》的这一立场，和日本政府以及上述报刊杂志认为大战对日本帝国主义说来是“天佑”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诚然，单从字面看来，它也不是主张绝对不参战，但它希望不要以东亚为战场。它是说这个愿望，“如果因为当前德奥英法俄等交战国在东亚及其附近地区，各自拥有相当规模的军备和领土的情况下”，即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在东亚也很尖锐的现状下，实现不了，则日本也只好利用日英同盟，为了把东亚的战乱控制在最低限度，采取最小的军事行动。这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参战论，丝毫也不想乘此机会扩张日本领土，或在中国确立统治地位。因此，它坚决反对日本出兵青岛。

《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还警告说，如果日本企图乘此机会“实现侵略野心，则必将造成使日本陷于危险境地之重大事件”。社论说：

“部分好战之徒，竟想驱使人民走向这种无益而又极其危险的事业。对国家来说，实属害群之马。对国家心怀危险思想的正是他们”。这些怀有危险思想的人们主张要趁此机会“在东亚努力获取利权”，但“他们到底说要在哪里、如何努力获得利权呢？请看现在胶州湾的贸易情况如何呢？过去德国向该地投入

了多少资本不得而知，由于开发该地而得到了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实际并非德国，而是中国和日本。现在胶州湾贸易的七八成难道不是由日本商品占着吗？既然这样，假使我国占领该地，岂能得到比此更大的利益吗？至于说担心德国在该地拥有基地会威胁东亚和平，正如前述，愚蠢透顶，不足为惧。而且并不限于胶州湾，欧美势力打进东亚，其投资越大，则我国所得利益越多。这是我们一贯的论点，过去已一再论证。”

《东洋经济新报》所以反对扩大战火，反对那种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行径，正如上述该报社论中所看到的，它并不是出自道德观点和人道主义，目标是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即使通过战争扩张领土，或获得利权，对日本并不有利，这是《东洋经济新报》社论记者从前一贯的主张，后来也贯彻这一主张。这里有着《东洋经济新报》独特的经济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东洋经济新报》才能始终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下面试稍详述它的独特的经济理论。

1912年1至3月，《东洋经济新报》连载了该报主编三浦铁太郎的文章——《放弃满洲乎、扩张军备乎》。文章明确表示反对扩军、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放弃“满洲”。而且在同年，大战爆发以前的3月5日，该报发表社论，竭力主张“在中国攫取利权无用”。社论说：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欧美各国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取得铁路和石油的利权。于是“我国人动辄就说，中国的资源若由欧美资本开发了，其利益将悉为欧美人所攫取，我国就只好袖手旁观了”。然而，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论者说，“如果利益意味着靠资本赚取的利润”，那么，象日本这种资本匮乏的国家，纵令由外国借来资本，再投到中国，“只是把借款转手贷放出去，并不能取得多少利润。若是从赚取工资说来，中国幅员辽阔，工作繁

多,对中国人从事劳动,并无任何妨碍”。

(中略)“又如从这些事业带来种种好处说来,铁路也好,石油也好,把它由敷设、生产带来的便宜一股脑儿都由少数资本家或企业家揣到腰包里,这决不是人力能办到的。不论何人投资或由谁来经营,结果那些好处是利用最多的人享受最多。如果在中国铺设铁路或增产各种产品,显而易见,享受最多好处的当然是生活在当地的中国人,其次则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人。又何苦必须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与欧美人竞争,努力获得空头的利权呢?如果我国拥有可投入中国的资本,最好用于其他事业。如果欧美人有愿获得利权者,多多益善,我们应该大力欢迎。因为投入中国的外资越多,越能促使我国与该国外成有利的经济关系。

不过,中国人讨厌欧美资本涌入中国的另一较大原因是,唯恐中国会因此沦为埃及或波斯第二,这完全是杞人之忧。当今试图从政治上瓜分中国的人,恐怕不仅欧美没有,而且即便有这种人,谁也不能无视日本的势力就办得到的。”

上述理论的前提似乎无视了以下的事实,即列强在中国攫取利权,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却意味着由该国垄断了利权事业和利权区域,并不排除中国和其他各国资本的自由活动。各国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还得到现实的保障,并不由此带来瓜分中国或使中国在政治上从属于利权国的问题。这样的前提只是《东洋经济新报》记者的极不现实的一种愿望。从上述引文的最后一段还可以看出,该报记者认为列强不会在政治上瓜分中国的根据是,第一,“从主观上希望欧美各国不会有如此企图”;第二,“断定日本的势力”不会允许欧美那样做。但是,第一点纯属主观臆断,并非现实;第二点的断定,它本身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处于一定的相互角逐状态,这种“均势”可能随时打破。即使该报记者的愿望全属现实,

推测也正确，它也是一种无视中华民族所处的现实，在客观上美化帝国主义的逻辑。因为中国业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上了不平等条约，不断受到军事威胁，被瓜分为若干势力范围，被剥夺了民族独立，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因此，只要根据这种逻辑，结论就会是，如果认为日本在中国攫取利权是有利的，也可以那样做。事实上上述论文中已经说：“如果情况是，我国资本充裕，国内本来用之不尽，把它投到中国去，铁路也好，油井也好，可随便拿到手里，那或许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只能说‘或许’，而决不能说‘一定’”。

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作者的论点原则上都不是否定帝国主义利权的。它是一种“对欧美列强攫取利权要听之任之，但日本以不那样做为得策”的现状认识论。为什么日本以不那样做为得策呢？第一，“众所周知，当前日本是一个资本极端贫乏的穷国，在日本国内铺设一点铁路，尚且立即发生资金不足，不能如愿，哪里还谈得上在中国铺设铁路呢！哪里还谈得上在中国钻油井呢！”第二，攫取利权“势必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引起同欧美人的竞争。”就是说，即使同欧美竞争，资本薄弱的日本也不能取胜，所以不要搞这种无益之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唯恐“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这说明《东洋经济新报》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力量，估计到即使设法通过压制攫取利权，从长远观点来看，经济上毕竟划不来。这个问题容待后述。

《东洋经济新报》对日本资本主义脆弱的认识和对中国人民民族抵抗的评价完全正确。因此，尽管该报原则上没有掌握否定帝国主义利权的逻辑，但从现实问题的剖析中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资本输出的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理论，说攫取利权没有用，如果确有向中国投放的资本，应该把它投在国内。并说日本可以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投资中吸取巨额利益，所以无需羡慕列强攫取利权，

反倒应该表示欢迎。这里所说的“利益”，是指通过自由竞争的商业贸易的利益。列强攫取利权和向中国投资，决不象《东洋经济新报》仿佛是自明之理似地阐明的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任何利益，但是，对于同欧美列强一样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具有同中国接壤的地利条件的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却有使日本对华贸易额增加的可能性。于是《东洋经济新报》便力图证实日本在中国攫取政治势力范围，对日本经济未必有利；即使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利权，日本的对华贸易还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种论点体现在《东洋经济新报》大正三年四月十五日社论《我方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政府》和大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社论《我国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上。

《我方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政府》的社论举出在华日侨按地区和职业的人口统计说：

侨居日本政府政治和军事势力较大的关东州、南满的日本人，主要是官公吏、军人、满铁职工及有关工作人员。“我们不能不怀疑，除了我国拿出经费在关东州和南满经营的事业以外，我们的经济活动究竟能有多少呢？”

反之，“在北满和中国中部，我国官公吏和机关雇员总共只有一千人（包括家属）。那里根本没有南满铁路那样的企业，而进出口商、杂货商、药材商、鞋商等却均比关东州、南满两地区还多，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在几乎没有我国政府庇护的地方却分外取得优势。这些侨居的工商业者和工人，都是不靠国家出钱的独立活动者。由此估计，我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与关东州和南满相比，北满及中国内地反而更为旺盛，这么说决不是不恰当。而且这并不是单从在华日侨看来是这样，从贸易及其他活动方面看来也可得出同样结论，这是不言而喻显而易见的。”

上述论断，若就“经济活动”规模的大小来看，譬如把“南满”的满铁一个公司同“北满”及中国中部的许多杂货商、药材商等的活

动成果用金额来一比较，立即站不住脚；而且这种论断的严重错误在于，它没有把北满和中国中部的日本中小商人和工人也在享受治外法权和关税上的特权这点考虑进去，从不靠国家保护的独立自主的经营者立场来把握“经济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东洋经济新报》的阶级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该报记者得出结论说：“如果有人认为，攫取的利权大了，则我在华的经济发展就指日可待，这是大错而特错。前车之鉴已在关东州、南满清楚看到，我们呼吁天下人予以注意。”结果归结到反对攫取利权的论点上。

前面提到的第二篇论文《我国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分析了1901年至1913年香港以及日、英、德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地位的演变情况，举出日本如何取得了迅速发展，已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情况，并阐明在中国商埠、港口进出的船舶统计上，日本所占的比重也迅速增大，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英国。于是得出结论说：

“在贸易政策和海运政策方面，过去并没有采取任何方策，一再犯错误和失败，尚且取得这样的发展。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所处位置对我国发展极为有利，如果推行符合这种位置的明智的政策，将会得到或可以得到何等强大的势力，简直无法估计”。文中还论述了今后应采取的贸易和海运政策，最后得出结论说：“总之，我国在中国市场的势力发展如何，并不在于些许外交、军事和攫取利权等。问题的中心只在于改变我国本身在产业上的保护主义即只局限于内地市场的做法，采取自由主义即海外发展主义一点上。如果这样，则在贸易方面压倒香港，压倒英国，压倒印度，压倒德国，而且在海军方面压倒英国，决非难事。”

一提“海外发展主义”，也许会引起误解，但《东洋经济新报》的意思是，不要为了保护内地市场而高筑关税壁垒或者保护特定的大资本，不要把目标放在凭军事和政治来扩大势力范围和攫取利

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要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主义,开拓海外市场。这显然不是代表金融资本和重工业垄断资本等,而是站在专靠自由竞争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们的立场上。具体说来,就是站在经常给《东洋经济新报》投稿的中国贸易商行松昌洋行的经营者山本唯三郎等人的立场上。^①

《中央公论》也倡导过同《东洋经济新报》看来极其类似的主张。《中央公论》1914年7月的一篇题为《论我对华国是》的社论指出,日本现在资本匮乏,即使在中国与列强争夺利权,也徒劳无益。因此,应隐忍一时,倾注全力扩大贸易。文中还列出了1891年以来日本及各国在中国对外贸易和中国沿海海运方面所占地位的变迁表,论述了日本发展的惊人速度,指出如果各国在中国攫取利权、进行投资,那便是日本的利益。

到此为止的论点和《东洋经济新报》的主张极其相似,但有两点根本分歧。其一,《中央公论》主张原则上要大力攫取利权,遗憾的是当前办不到,并不象《东洋经济新报》那样原则上反对攫取利权;其二,最重要的分歧是,《东洋经济新报》毫不重视“南满”的既得利权和势力范围,甚至主张干脆放弃(见后文),但上述《中央公论》的社论却说,“据说社会上部分人主张‘满蒙撤退论’”(恐怕

^① 《东洋经济新报》在1914年6月25日的“时论”一栏上,刊载了山本唯三郎撰写的题为《日华实业协作的急务及其方策》一文。内称,资本匮乏的日本,是否应该不与欧美列强在中国争夺利权,把整个中国作为我国市场,“利用列强铺设的铁路,经销列强采掘的矿物,在各处努力扶植我国商权。只限定局部地区作为势力范围,而置广大中国领土于不顾的作法,在对华贸易上可谓最大的错误”。文章还说,“当务之急是,必须进口廉价的中国煤炭,谋求降低(日本产业的)的成本;进口中国的粗制品,再转手输出,以打开一条同欧美各国竞争的道路。……即使设立日华合办的一个大公司,如果目的在于供攫取利权的工具或只为提供铁路材料那种规模,则对日华实业究竟能有多大好处?所以,应该不再干诸如既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又会引起欧美各国猜疑那种狂热争夺利权的蠢事,全力研究增进中日两国实际利益的方法。例如把中国什么货物输入我国,加以精制最为有利?通过什么途径方能与中国人合资经营企业?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运用日华实业合作的方策?这些应该是日华合作的前提。”

这是《东洋经济新报》的论点),日本撤退之后,那里不会建立“中国的权势”,只会被外国势力侵入进来,所以绝对撤退不得。《中央公论》的社论还说:

“而且帝国本来在南满有一个重大的天职。那就是在该地区拥有势力,以尽监督保全中国的职责。譬如,驻满蒙的日本军队,可以说是维护远东和平的一个宪兵师团。一旦列强有人心怀不逞,或一旦中国内政紊乱以至不可收拾,日本应带头与列强共同努力恢复和平。此即帝国不可撤出满蒙的一大理由。”日本既然要“保全中国”,就“绝不可能吞并满蒙,充当瓜分中国的先锋”。“帝国对于满蒙的要求”,是居住、土地所有和开发矿山的自由。换言之,“想要在和帝国国内大致相同的自由之下,谋求开发满蒙,并想让列强均沾这些自由”。

日本并不想独占“满蒙”,而要把它变成列强各国共同的殖民地,在这点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软弱性。即使如此,以上这些要求仍然属于帝国主义性质的。《东洋经济新报》就完全没有这类主张。

第二节 围绕着“二十一条”要求的各种思潮

一、“应该尽快放弃满洲”

日本对德宣战后还不到两个月,1914年10月14日,日本海军很快就占领了赤道以北德属南洋群岛;11月7日,日本陆军不但攻陷青岛,还不顾中国的抗议,占领了山东省的铁路。从一开始就煽动参战的《大阪朝日新闻》等报刊,大肆宣扬“帝国军队的威力”,国民大众白天举旗游行,夜晚提灯游行,陶醉于大规模的军国主义示威游行之中。

在对德最后通牒中,日本要求为了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把

它移交给日本。但是，日本政府和各报刊杂志的评论家们，都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归还给中国”的问题。12月9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必须冷静》的社论，就这一问题作了如下论述：

“青岛归还与否，并不是值得加劲讨论的事情。关于山东省铁路、矿山的各种利权，中国既已让给德国，由德国来继续行使也好，由日本取代德国继续行使也好，对中国来说，均无损益。因此，诸如日本的野心等，根本就不成问题”。

社会贤达的论调虽然没有这么露骨，却基本上同它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对日本的野心存有戒心，一再就日本侵犯中立或侵犯主权提出抗议，中国新闻界也提高了批判日本的调子。日本政府对这些抗议当然根本不加理睬，各个报刊却不停地谴责、攻击“中国不诚实”、“排日”。例如《大阪朝日新闻》11月7日的社论《青岛沦陷之日》，对袁世凯总统提出要求说，总统直系的报刊上充满了排日消息，要彻底取缔。《东京日日新闻》等报刊也对中国于1915年1月7日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兵一事大发雷霆，扬言要派“问罪大使”等等^①。总之，各报刊从根本就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性，似乎中国只有对日本唯命是从、任凭它在中国为所欲为，才是中国对日本的“信义”和“友好”，如果中国稍微有一点要独立自主，就是“排日”或者“背信弃义”。

唯有《东洋经济新报》对抗这种“舆论”的逆流，始终坚持反对攫取利权、反对参战的立场。下面一系列的社论，旗帜鲜明地显示出其毅然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

- (1) 《战争无休止乎》(大正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第 679 号)
- (2) 《反驳侵略领土论》(十月十五日,第 684 号)
- (3) 《不可占领南洋》(十一月五日,第 686 号)
- (4) 《决不可占领青岛》(十一月十五日,第 687 号)

^① 《东京日日新闻》1915年(大正四年)1月11日社论。

(5) 《再论不可占领青岛》(十一月二十五日,第 688 号)

以上第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否定了侵略战争。社论说,

现在社会上到处是一片讴歌战争的论调。他们常说:“反正生意人离不开算盘。而且,人类是,盘算之后有活力,利害以外有感情”,战争是无休止的。这就是说,我国将不惜巨额国帑和亿万生灵,企图采取重大的行动。然而,我国真的有进行战争的必要吗?“所谓举国一致的精神,确是国民的一个美德,我们相信这点,决不落后于他人。不过,举国一致,也有多少种,所谓盲目的雷同、虚伪和随声附和,是一般最应唾弃的国民的堕落”。因此,我们至今仍然敢于坚持反对战争。在不久的将来,战争或许还不会停止。这正如文明社会里“会有盗窃的可能一样”。但是,也正如靠盗窃可得利一时,而他们的生活毕竟不会幸福一样,战争也是一种“无益而极其愚蠢的勾当”。

“为什么说战争愚蠢而且无益呢?我们说,因为战争绝不会带来任何有形或无形的利益。社会上有人认为,战争的结果,可以扩张领土或获得赔款,这就会给国家增加财富,这是荒谬绝伦的想法。事实胜于雄辩,我国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了台湾,通过日俄战争吞并了库页岛和朝鲜,究竟得到多少利益?诚然,我国得以在台湾兴办了一些事业,在朝鲜、库页岛也正在兴办各种事业。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战争兼并,而是由于投入了巨额资本。假如不兼并这些地区而投入这些资本,也一定会取得这些结果。如果说在他国领土上难以进行投资,那就应该把它投入国内。投资所得,可能并不低于台湾和朝鲜。至于获得赔款,毕竟只会给接受赔款国的经济界带来混乱,这点在此不予赘述。从经济方面来看,战争并无益处,就连积极鼓吹战争的人现在似乎也大致承认了这点”。

尽管如此,战争鼓吹者还说:“除经济利益外,战争还会带来

诸如发扬国威、振奋国民精神等利益”。“他们若能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发扬国威、振奋国民精神，离开国民经济生活，会有多少实质内容呢？恐怕只能令人感到空洞得几乎无法捉摸。……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战争是毫无益处的勾当。因此，为战争而花费巨资、牺牲无数生灵是愚蠢透顶的，我们任何时候都敢于证明这点”。

第二篇社论《反驳侵略领土论》，力图从日本近代史来论证这个论点。文章在开头指出，“维新以来，使我国濒于危险、陷于困境者，莫过于我国国民的侵略领土论”，下面回顾历史说：

甲午战争期间，由于侵略领土论者统治了议会，煽动国民，致使“当局战后在同中国交涉中丧失了取舍选择的自由，任凭国民感情的驱使，强行割取辽东半岛，终于招致三国干涉”。幸亏当局英明、有勇气，放弃辽东半岛，使我国摆脱了同三大强国交战的严重危机，但“当时此种侵略领土论的确使我国陷于累卵之危，这是无需争辩的”。

不仅如此，日本一要求割让辽东半岛，竟把沙俄及欧美列强的势力引进远东，引起瓜分远东的竞争，从而日本也不得不扩充军备，给国民增加负担十亿余日元。日俄战争的处理也因侵略领土论而贻误，阻碍了国运的发展。日俄战后，“我国的大陆扩张主义终于占了上峰，并贯彻于实际政策之中”，因此，日本国民负担增加，“中国人民的排日情绪弥漫全国，日趋强烈，曾是日本最亲密的友邦美国人民也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危险，以至动辄就说日美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日俄战争以后，乘俄国威胁业已消失之机，停止扩充军备，专门从事工商业活动，则早就偿清了日俄战费，积累了充分资金，成为强有力的对华投资者，还可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和信赖，消除欧美各国人民的误解，博得他们的尊敬。

“每十年发动一次战争，是滥用国民的爱国心，或过分迫使发扬爱国心，我们不禁窃为此担忧。此点现在只好说不得已了。然而，目前最可怕的是，侵略领土论又照样逐渐在控制国民的感情。……我们希望遵守诺言，事后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关于占领马绍尔岛问题……，我们也殷切希望，不要由于企图永久占领如此区区弹丸之地，致使将来滋生事端那种欠考虑的做法。”

这个论点极为明快。但是，说侵略他国领土是“国民”的要求，它迫使政府没有选择政策的余地，根本颠倒了政府、军部以至整个统治阶级才是侵略他国领土的元凶，而国民则是受煽动、被诱惑这个事实，是错误的。然而，这种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文章作者具有“好也罢，坏也罢，国民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人”的思想。即作者经常告诉国民说，只要国民坚定不移，政府若违背民意毕竟一事无成。这种思想本身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从这种思想出发，民主改革的要求也就有了基础。但是，如果不顾现实的权力机构，立即把它用来解释具体的历史事实，就会陷入上述的误谬。这种应用是由于作者对于国家权力的阶级性质根本没有分析和认识——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而来的。不过，如果我们只抓住作者的这个错误和局限性，看不到作者站在“只有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一政治哲学及历史原理的立场当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结果就会误解了作者。

以上第一、第二篇社论，从理论和历史上阐明了反对战争、反对扩张领土的论点，而把它应用于现实的是第三篇及后几篇社论。

社论《不可占领南洋》首先明确指出，日本能够占领的不过是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等一千英里的窄小地区，即使占领了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社论紧接着说，该地的地理位置在威胁夏威夷和菲律宾上具有重要军事价值。“所以，我国国民若悍然攫取德属南洋群岛，欧美国民就会普遍推测，其目的的一定是并不

在于经济，主要在于扩张领土和侵略。这种推测很难说没有道理”。尤其对美国人民的刺激可能更大。这样一来，势必加深日美间的对立，挑起日美军备竞赛。结果或许会酿成战争。在处理甲午、日俄战争时，由于国民被侵略他国领土的思想所驱使，致使经济上受莫大损失，使国家受到莫大危害。占领南洋是与此一样的严重错误。“再也没有比主张占领南洋群岛更无益、危险更大的了”。

社论的作者期待大隈首相特别是加藤外相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而结束了全文。其实，当时日本政府业已同英法政府秘密进行谈判，要求它们同意日本永久占领德属南洋诸岛。《东洋经济新报》接着于11月15日和25日分别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占领中国青岛。其论点与11月5日的社论相同，说占领青岛不但不会给日本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使日本变成中国及欧洲列强最凶恶的敌人。笔锋非常尖锐。社论说：

“所谓德国占领青岛，危害东洋和平；而日本占领青岛，却无害东洋和平，其理由何在？如果说中国以外的国家占领中国部分领土，会启瓜分中国之端，或破坏列强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导致以中国为舞台的国际关系趋于恶化，那么，日本占领该地，将与德国占领青岛危害和平一样，也必然会危害和平。”

这个逻辑，含有超越日本“国家利益第一”的国家主义的因素，如果再彻底一些，就不得不否定日本在“南满洲”的垄断地位。而这篇社论的确也否定了日本的这种地位。社论继续说道：

“不，岂止占领青岛。此外，诸如日本在南满、英国在威海卫、法国在广州湾等，必须说都危害东亚的和平。”

作者在这篇社论开头提出应该如何处理占领后的青岛问题，并作出如下论断：

“我们对于这类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不能向亚洲大陆扩张

领土，满洲也应及早放弃，这是我们一向的主张。如果再在中国山东省的一角霸占领土，真是祸害上更加祸害，危险上更加危险，必须坚决反对。”

关于《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是彻底的“南满洲”既得权益放弃论这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它和前面例举的茅原华山的轻率说法不同，它的理论基础是，攫取利权，对于日本说来并非有利，因而后来也一再提出这种主张。如上所述，这篇社论在这样断言之后，全面否定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瓜分中国的行径，进一步指出：

“天下公认，英法美各国没有瓜分中国的野心。^①不，此三国衷心唯恐他国瓜分中国，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防止瓜分。而公认动辄对中国领土包藏野心的，是俄德日三国。因此，我日本深为中国人所恐惧，并遭到排斥，而且被美国视为危险，连盟邦英国人都非常猜疑。

现在若把德国从中国山东驱逐出去，即使仅仅如此，日本占据中国“满洲”本来就很引人注目，若再以青岛为根据地，把山东地区视为领土进行经营，其结果将会如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越发明显，势必耸动世界列强的听闻，自不待言。”

有人说，日本占据“满洲”和山东，一旦中国出现国际或国内动乱的时候，日军便可以立即出动，恢复和平。^②“若从同中国人民或中国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欧美各国立场来看，决不可能有如此危险、可怕的状态”。只因现在战争方酣，英法人才对日本

① 所谓英法美对中国领土没有野心，是指此时它们不想瓜分中国领土，只想进行帝国主义的角逐。这三国也想在中国攫取利权，加强政治势力，和日俄德一样。《东洋经济新报》记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对英法美三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抱有幻想，所以才作了如上论述。不过，上述论述不够正确，这并不有损记者的根本论点。

② 本书第3章第1节《中央公论》的社论就是其中一例。

表示好感。现在就完全可以设想，一旦战后人心稳定，他们也“必定愕然有所畏惧，视日本为威胁远东和平的最大危险国。欧美人民将互相团结起来，奋力颠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这样看来，日本割取青岛，实际上将同中国人结下不解之怨，被欧美列强视为危险，决不会增进东洋和平，反而会导致形势紧张”。

如果把把这个论点同 1921 年华盛顿会议的《九国条约》结合起来，同后来的日中战争联系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会惊叹，这是何等正确的预言家的预见！

《东洋经济新报》记者这样论述可能仍然感到不够，11 月 25 日又发表了《再论不可占领青岛》的社论，批判了那种认为：“占领青岛旨在开辟向中国发展日本经济的立足点”的谬论。该报记者的立场，正如上述那样，反对一切利权主张。在这篇社论中，又反复阐明了这种观点。

二、“二十一条”要求的热潮

尽管《东洋经济新报》怎样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反对战争、反对领土扩张主义，对社会舆论也没能产生任何影响。如果说句讽刺话，正是因为《东洋经济新报》对舆论没有影响，一点也没有打击政府，政府才让它随便云云。

当时日本一般的报刊杂志都掀起了更加高涨的好战热潮。尤其是素以露骨而急躁地鼓吹侵略中国著称的黑龙会等组织，早就满不在乎地说出了日本政府不敢公开讲的话。从大战爆发以前，黑龙会就或者组织包括许多政治家在内的“对华联合会”，或者召开“国民大会”，以“日华亲善”和“保全中国”为名，煽动侵略中国的热潮。他们把欧美势力因大战无暇顾及远东看作是“千载难逢之时”，企图趁机一举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势力之下。1914 年 10 月 29 日，黑龙会以其会长内田良平的名义，秘密向日本政府提出了

《对华问题解决意见》^①。

黑龙会炮制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是：使中国陷于混乱，废除现在的共和制，建立“立宪君主制”的傀儡政权，与该政权缔结《国防协约》。其协约草案如下：

“我日本帝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维持东亚全局的和平，与中国共同担负防御中国内乱及外寇的义务，中国对日本的国防设施提供特殊方便，日本将保护特殊利益。为此，兹缔结协约如下：

第一，在中国发生内乱或中国对外宣战时，日本应派军队予以援助，负责防卫领土，维持秩序；

第二，中国须承认日本在“满洲”及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并将其统治权委任于日本，使之确立国防基础；

第三，日本占领胶州湾以后，应占据过去德国拥有的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利权。又，恢复和平后将青岛归还给中国，使其成为开放的世界贸易市场；

第四，为适应日本海防之需要，中国应将福建省沿岸要港租借给日本，作为日本海军基地，同时将该省的铁路敷设权及矿山开采权交给日本；

第五，中国应将陆军的改革及军队的训练均委托给日本；

第六，（采用日本武器）；

第七，应将海军的建设及训练均委托给日本；

第八，（把中国的财政、税制的整顿及改革，委托给日本人，聘请日本人担任财政最高顾问）；

第九，（聘请日本人担任教育顾问，并在中国各地设立日语学校）；

第十，中国与外国签订借款合同、租借或割让土地时，以

^①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7。

及对外国宣战、与外国媾和时，须预先与日本协商，征得日本同意。

这个协约草案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它比日俄战争中日本强加给韩国的《日韩保护协约》还要厉害。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在酝酿与《国防协约》的设想基本相同的对华政策。不论政府派还是非政府派，除了《东洋经济新报》以外，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想一举将整个中国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主张甚嚣尘上。日本政府在这年（1914年）的12月3日，指令驻华公使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强加于中国。

“二十一条”要求共分五号。第一号，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享有的一切权益等共四款；第二号，要求延展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把“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实际上变成日本领土等，共七款；第三号，要求把中国最大的铁、煤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日中两国合办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答应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割让给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财政等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机关，并聘用多数日本人；要由日本控制中国军队的武器供给；要求日本人在中国拥有土地所有权、布教权、铁路和港湾的利权等，共七款。^①

试把“二十一条”要求同前述黑龙会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作一比较，可见两者非常类似。中国如果屈服于这些要求，中国必将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当然，全中国人民掀起了强烈的反对运动。就连过去一贯屈服于日本高压政策的袁世凯大总统，也拼命抵抗“二十一条”，把英美拉到自己这边。于是日本增加在山东的兵力，用以恫吓中国。但因中国仍不肯屈服。日本无奈于1915年（大正四年）5月7日撤回第五号要求，发出最后通牒，迫使中国表

^①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6卷，第73—77页。——译者

态是否答应其他条款。9日，袁政权终于不得不予以接受。

“二十一条”要求的全貌是在交涉的末期公布的，但把它递交给中国后不久，新闻界似乎就已经知道了它的内容。例如：《大阪朝日新闻》1月28日的社论《对华交涉要速决》中说道：

“此次日置公使所提案件的内容尚不详悉，但我国有民间外交，日华间存有早该解决的悬案……，特别是日德开战以后，中国的态度，对日本每多不利，因而中国的将来实堪忧虑。故现在求得根本解决，对双方均极为有利。日置公使所提的要求，也是根据国民的要求的。如果是这样，谋求解决，不应拖延，应一气呵成，以保全两国亲善之谊。

（中略）

日本的提案，并非仅限于处理山东问题，另外还有许多悬案，它同处理山东问题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在日中谈判期间，《大阪朝日新闻》继上述社论之后，又连续发表社论，一再宣称为了“日华亲善”、为了“保全中国领土”、中国必须立即答应日本的要求等等，并谴责拒不接受要求的中国是“不诚实”、“远交近攻”、“旧式外交”、“耍弄小把戏”等等，还屡次用诉诸武力进行威胁。另一方面，一味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例如2月15日的社论《日华谈判的拖延》中说道：

中国方面正在“鼓动排日情绪”，拖延谈判。但“中国反复这样错误，只能越发陷于不利。因为日本会越来越对将来感到不安，出于国家自存的需要，不得不向中国提出更为严峻的要求。

（中略）我们不详提案的内容，但确信其中必有很多对中国有利之处。然而谈判至今尚未决定，完全由于中国的旧式外交所致，莫非我国当局中了它的圈套？（中略）我舆论界正以慎重态度等待此次谈判的结果，而中国却以舆论为武器，向我进攻。这样危害两国关系很大，中国政府若不加以制止，我政府将采取

适当措施，迫使袁总统进行更加彻底的交涉，以求尽早解决”。

《大阪朝日新闻》2月26日和27日的社论《将被德国贻误的中国》内称：

“如果日本欲以强力压制中国，何以拖延至今。日本提案的内容，本是为了保持日中的睦邻友好，真正确保东洋和平，解决日华间多年的悬案，进而为中国铲除祸根。因此，即便中国拖延时日，日本仍隐忍持重，保持和平，不肯使用暴力，谆谆诱导，促使中国醒悟。如果日本真要侵犯中国主权，采取诸如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手段，则寻找时机和借口，并非难事。然而，日本始终要维护友谊，奉行保全中国的主义。因此，谈判开始后已过四十天的今天，仍不厌烦不必要的会见和手续”。

在了解“二十一条”要求内容的人看来，这篇社论侈谈的“友谊”和“保全中国主义”等论调，和黑龙会的“日华亲善”和“保全中国”异曲同工。如此谰言该是多么无耻，不禁令读者为之作呕。而《大阪朝日新闻》自己也明知这是在撒谎。

“中国高唱独立和主权，真是愚蠢透顶。所谓保全、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实际上是无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東西。各国出于权宜之计，才遵守这三項纲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各国的权宜之计也不得不发生变化。中国不能自我保全，各国才权宜予以保全。这已暗中在无视中国。这种无视或许表面化起来。我国为此暗暗忧虑，为了未雨绸缪，这次提案才有所触及^①。而其提案并非十全十美，中国又为何迷惑不解而拒绝呢？”

《大阪朝日新闻》4月21日发表了题为《危害日本的是中国，须采取强硬态度》的社论，竟然暗示要颠覆中国的现政权。

“中国本身虽然高唱独立和主权等一个普通国家所必备的条件，其实中国并不真正具备这些条件”。中国不是已被列强各

^① 指“二十一条”要求的第五号。

国夺去了租界，强占了铁路、矿山和税关的利权了吗？邻国日本对此感到困惑，所以为了实现真正的日中睦邻友好和保全中国，才进行了这次谈判。那种歪曲日本的真意，认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独立，真真岂有此理！”

“这次谈判若被中国贻误了，我国政府不仅会立即丧失国民的信任，这个国家的前途又将如何？国民正以非常的决心等待这次谈判。万一我方作出让步，留下后患，则不仅会引起在华日侨的愤懑，即国内人民也决不会答应。对于中国，要根据帝国国策的根本原则，堂堂正正地对待。手段可有多种。既可追究袁总统的责任，也不妨改革中国的国体”。

此后，《大阪朝日新闻》又于4月25日发表了《日华关系与世界政策》、5月6日发表了《对于毫无诚意的拒绝》、5月7日发表了《发出最后通牒》、5月8日发表了《交付最后通牒》等一系列社论，对中国百般威胁，直至中国屈服，打出了威胁的连珠炮。而当日本撤回第五号要求，中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其他全部条款，“结束”谈判时，《大阪朝日新闻》当天又发表了以《对华问题并未结束》为题的社论，谴责日本政府对华过于妥协。社论说道：

“由于我方过于谦让及这些过失，致使这次谈判幸而未动干戈而告一段落，但并不能说对华问题业已结束。因为作为今后的问题，暂且取消了第五号条款，未能达成协议，还须继续谈判，决非撤回之意。中国人之特点是，别人一让步，就翘起尾巴；别人一强硬，就畏缩回去。”恶毒地中伤中华民族。并说此后谈判时，要丝毫也不让步，即使有第三国稍加干涉也不去管它，“当决定如此重大事件时，应该具有相当的决心”。

社论主张要以诉诸武力的决心，坚决贯彻第五号要求。

一般说来，当时报刊上的论调都和上述相同，甚至还更“强硬”。这种情况，从早稻田大学教授、论坛的老前辈浮田和民——

他是自从日俄战争前后就提倡“伦理帝国主义”，即“对内民主主义”（或者也叫社会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鼻祖——在那年《太阳》杂志6月号上刊登的题为《对华外交上的大问题》一文，便可了解。文章说：

“今年1月日中谈判以来，每读有关中国问题的消息、评论，觉得健全的舆论大都并未现于纸上，隐蔽在里面，不堪一读。如果政府依照所谓舆论来决定事宜，问题或许不会得到和平解决，如今已经酿成大战。在此期间，唯有《读卖新闻》的社论，较其他报刊别具一格，始终发表公平意见，对国民给以痛切忠告，值得社会称赞”。

浮田所赞扬的《读卖新闻》，笔者尚未看到，不过，即使较其他报刊怎么“公平”，也赞成“二十一条”要求，这是确定无疑的。赞扬《读卖新闻》的浮田自己也说：“‘二十一条’要求谈判，解决了日俄战争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还获得了各种利权，尽管在外交程序上有了好多失策，但从国民立场来看，并不是了不起的失败。”

在同一期《太阳》杂志上，还刊登了“中国学家”内藤湖南题为《论日华交涉》一文，说“二十一条”要求的谈判完全失败了。他所说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这些要求蛮不讲理、残暴。他说：

“日本对华关系，目的在于什么都要求，这一点本身就是失败。”即使日本不提什么要求，“由中国来自行决定，也会成为日本的利益，并可巩固将来的团结。所有这些条件全然不顾，白白放过中国迫切希望的时机，而在中国已经摆脱了危急感之后，才提出方案。”这本来就是失败。失败的具体例证之一如下：

“在南满提出混和审判等，纯属胡来（中略），现在中国人的实际思想情况是，与其把生命财产委托给本国官宪，莫如把它委托给外国人。放弃中国政府主张的审判权，从中国人民方面说来，反倒有利。提出混和审判等，终归是不了解这种情况的

结果。”

从这段文章^①即可了解，以头号“中国通”自居并著称的这位著名的“中国学家”，对中国古代的事情姑且不论，对当前汹涌澎湃兴起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丝毫也不理解，丝毫也没有共鸣之处。内藤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很好地操纵他主观臆造的“中国人的特点”，就能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他在侮辱中华民族、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政策上，并不比任何强硬论者差。

“民本主义”的头头、曾作为袁世凯的私人教师去过北京^②、当时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头号人物吉野作造，也是“二十一条”要求的支持者。据认为在日中谈判结束后不久脱稿的《论日华交涉》^③一书中，吉野指出：

“我个人的想法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理想，在于援助中国，同中国合作，日中共同作为东亚的强国向各个方面扩张势力，以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保全中国领土，经常成为我国的议题，但绝不能瓜分中国领土。保全中国的领土，尊重中国的独立，使它充分发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能力，必须是我国日本对待中国的根本政策。”

只看这一段，的确不含糊。这是吉野所有政论文章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他说的仿佛象现代“公平”的报纸评论一样，即理想是这样，而现实则是那样；这一点必须加以考虑，而那一点也不可忽略等。《论日华交涉》也是如此，当讲到抽象的理想时，确是不含糊；但一接触现实，就说：

“中国将来是否真的不辜负我国的期望成为强大的国家？这在许多研究中国问题人员之间是有争论的。有人说，中国颇

① 此外内藤湖南还举出一些例子。

② 1906年—1908年。

③ 单行本。

有希望；有人则认为中国没有希望。我当然不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不过，也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非常强大起来”。

这段引文是吉野文章和议论的典型。他接着又说：

在中国尚未强大的时候，列强拼命扩张势力，或许中国已经处于不能独立自主的状态。因此，在研究“中国的将来”时，“既要考虑中国本身的发展进步”，“也不可忽略欧美各国在中国扶植势力。我们的理想是，期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面对当前各国各自竞相在中国内部扶植势力的现实情况，我们也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换言之，我国对待中国的理想政策，不得不由于列强在中国竞争这一现实，多少受到一些影响”。^①

如果照抄吉野这种论调的文章，未免太占篇幅，这里干脆援引吉野在《论日华交涉》一文中对“二十一条”要求的评价。他说：

“总之，我认为，这次对华提出的要求，表面看来，固然不无侵犯中国主权，或使中国丢脸之处。但从帝国立场来看，大体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且抓住了同中国谈判的适当时机；即使再从同西方各国的关系来看，也可谓选择了颇为适当的时机；从帝国将来对中国采取的步骤来看，相信它是极其适合机宜的措施。”^②

即便对于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的第五号要求，吉野也说：

“我认为，这次所提的要求，基本上是最起码的要求，是日本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取消第五号要求，实在令人遗憾。（中略）若因担心英国，而对第五号要求作出让步，则大错而特错了。更何况如果象社会上传说那样，只因生怕加上第五号要求中国

^① 吉野作造：《对华政策的理想》，见《论日华邦交》，收在《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6卷。

^② 引自松尾尊允编，《论中国、朝鲜——吉野作造》（1970年）一书中抄录的《论日华交涉》第3章第3节“帝国对待中国之实际态度”。下面的引文亦同。

决不会同意，始终一心要和平解决日华两国间的问题，勉强取消了第五号要求，这岂不是外交上的一大失策吗？”

由此看来，吉野比主张取消第五号要求的日本元老山县有朋更富于侵略性和帝国主义性。他一方面这么说，而在结尾部分却说：“日本帝国的理想政策，在于始终援助中国，做中国的后盾，谋求中国完整而健全的发展。现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时会引起他们反感，其实这是迫于列强在中国角逐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决不是日本的本意”，日本国民“应深深印入各自脑际，对于中国的事物，将来应寄于深切的同情和尊敬”，“这就是我深望于国民的”。

吉野这样写，他心里可能真的这么想，不是在说谎。尽管是这样，这种说法该有多么自私、多么富于欺骗性、多么卑鄙啊！难道还有比这更巧妙的为“二十一条”要求作辩护的吗？

当时的舆论界，除了后面提到的《东洋经济新报》以外，根本没有否定“二十一条”要求的。《日本及日本人》等刊物，虽然嘲笑日本政府外交手腕如何拙劣，但对于“二十一条”要求本身却是十分赞成的。拥护“二十一条”的热潮席卷了整个日本，只有一次例外。在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以前，1914年11月和12月号《中央公论》的社论认为，无论从道义观点还是从利害关系来考虑，都不应该占领青岛和山东铁路，主张应“在一定条件或保证之下”，把它交还给中国，以此向中国表明，日本没有领土野心。不过，《中央公论》的这种主张，只是帝国主义气味少了一点而已。

它所说的“条件或保证”是以下三条：第一，把青岛划为开放贸易市场，创建“可保障其将来繁荣的组织”，“为此，中国政府须采纳日英政府的建议”；第二，把山东铁路定为中国所有，但日本以资方身分参加经营；第三，将来中国一旦无力保全领土，而任凭外国宰割时，日本为了“自卫，将采取必要行动”。这是舍占领之名求占领

之实的作法。即使仅仅是舍名，也不能不说它对“二十一条”要求的想法比起吉野的观点来，帝国主义气味要少一些。

不过，“二十一条”要求正式提出以后，这个《中央公论》再也没发表过反对的意见。1915年（大正四年）6月，《中央公论》刊登了吉野的《严正批判对华外交》一文，其观点当然是和这一时期他写的上述《论日华交涉》完全相同的。

三、唯一的彻底反对论

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利权，甚至主张放弃“满洲”的既得权益的《东洋经济新报》，当然反对“二十一条”要求。1914年^①2月5日，该杂志发表了《莫做俄德第二》的社论，首次评论了“二十一条”谈判。社论说：“大隈内阁就根本解决‘满洲’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政府之本意”在于“将‘满洲’也和朝鲜一样吞并为我国领土”。这是《东洋经济新报》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这样干，必将引起中华民族的反抗，并同欧美列强对立起来，结果孤立于世界，就象过去俄国失去“满洲”、现在德国失去青岛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也会丧失一切。“要毫无领土野心，以与资本家投资事业全然相同的精神，努力开发中国”。这就是《东洋经济新报》的主张。

当日华谈判迟迟不见进展，中国排日情绪高涨，其他报刊大肆叫嚣“中国没有诚意”、“没有信用”时，《东洋经济新报》却认为中国排日是对日本的“蛮横的报复”，指出，日本“对中国新闻界横加干涉”，要求取缔排日，而对美国的排日舆论却不吭一声。“日本国民欺软怕硬的根性”着实可怜。主张若想取得中国的好感，“首先要尊敬中国”。^②当舆论界谴责日本政府“外交失败”，《东洋经济新

^① 1914年疑为1915年之误。——译者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3月15日“小评论”。

报》也加以谴责,但是它说:“然而,并不象社会上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采取强硬态度造成了失败,恰恰相反,强硬地‘赤膊上阵’才造成了外交上的失败”,要纠正“轻兵之弊”。^①

当日中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5月5日,《东洋经济新报》发表社论——《贻下祸根的外交政策》,全面地反对日本在这次谈判中的态度和要求。社论说:

“看到我政府当局和国民对待外交的态度和行动,我们不胜忧虑。其一,断然实行露骨的侵略领土政策;其二,轻率的举国一致论。此二者将导致全世界与我日本为敌,可谓结果必将给国帝贻下百年祸根”。

这次的对华交涉是,看穿了英美德俄法等国无暇顾及远东的形势之后,“我国企图从中国攫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掠夺物,才向中国提出来的。可谓阎王不在小鬼偷油”。为此便“发动各界舆论恫吓中国,还在守备队换防的名义下,实际增派几个师团的兵力,悍然采取威胁中国的高压手段”。还恫吓说,如果中国不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日本全体国民便认为中国没有诚意,要采取最后手段。这种恫吓恐怕只能在日本人中间行得通,而在世界大多数公平的旁观者看来,反而肯定加深了日本是否具有诚意的怀疑”。

现在来读这篇文章,谁都会认为它讲的是至属当然的道理,但在当时,在“轻率的举国一致”的热潮中,发表这样至属当然的正确言论,需要具有何等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啊!

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因为日本政府没有公布出来,《东洋经济新报》只好根据日本其他报刊以及中国方面英文报刊的报道来进行推测,似乎完全不晓得有关山东半岛的各条要求(第二号)。《东洋经济新报》推测日本要求的主要内容是:(1),把“南满”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4月5日“小评论”。

的占领问题落实下来,并企图以此为根据地,向“蒙古”和中国其他领土进行扩张和发展;(2),“进一步明确落实日本帝国在台湾对岸福建省的势力”;(3),“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日本国民在整个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利益”。《东洋经济新报》的这种推测当然并不正确。“二十一条”要求里并没有日本企图独占福建省铁路、矿山利权的要求。但是,《东洋经济新报》指出,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日本军阀为了实现他们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是为了日本一手承担保全中国这个大业奠定基础。”这种说法,却完全正确。

中国竭尽全力抵抗日本这一“主要意图”是理所当然的,而对此进行高压和恫吓,扬言“诸如中国的独立和中国人的希望等,根本无需放在眼里,摧毁了蹂躏了也无妨”。《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对于“日本朝野的举国一致论”的这种说法,“不禁不胜汗颜,至今心里难过”。中国果真屈服于日本的威胁,接受日本的要求,将会如何呢?只因当时在大战中,欧美才任凭日本为所欲为,到了战后,必然会给以反击。

“到了那时,决不会仅仅丧失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权益和通过这次对华谈判得到的权益就算了事。恐怕从明治二十七、八年战争(甲午战争)积累下来的所有掠夺物,全被剥夺,弄得鸡飞蛋打。这是我们所以认为此次对华外交会给帝国贻下百年祸根而忧虑不置的。这个大祸根,固然是远自甲午战争、尤其日俄战争以来既已明显化的日本领土侵略主义种下的,但把它推向上述那样可怕的危险境地的,实际是日本全体国民的糊涂观念造成的结果,而其直接的责任,不能不说在于身居领导国民地位的现内阁诸公,尤其是大隈首相和加藤外相的失策”。

当日中谈判结束、政府公布了其大致经过时,《东洋经济新报》

发表社论,评论了《日华新条约的价值如何?》^①。

《东洋经济新报》首先评论说,“幸亏新条约里取消了我国提出的所谓‘第五号希望条件’”,第五号要求“共列七款条件,对于独立国家——中国来说,断难接受”。试把该报的这种论点同前述吉野作造和《大阪朝日新闻》的观点比较一下,便可以看出《东洋经济新报》的精神更加明显。《东洋经济新报》还说:“这些要求,由日本方面通过政府间的谈判和条约提出来,实在无聊得很。……要实事求是”。乍一看来,似乎和内藤湖南的说法相仿,但是,《东洋经济新报》是说,无需要求让日本人去充当中国顾问,如果有中国想聘请去当顾问的日本人,自然会实现的。这和内藤湖南的“中国人操纵论”,本质上截然不同。

然后,《东洋经济新报》就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攫取“满洲”铁路利权等问题评论说:“乍一看来,这些要求似乎并非没有道理,一般人也觉得理所当然,但依我们看来,其中令人遗憾之处甚多”。其理由是《东洋经济新报》一贯坚持的“利权无益有害论”。

“当前,旅顺对我国来说完全没有用处,即使大连、南满铁路、安奉铁路长期由我国来控制也没有益处。尽快把它归还给中国,则我国受益只能增加,无需担忧减少,而且,我方放弃该地之后,会减轻多少负担。……总之,我们认为,通过新条约进一步向中国大陆扩张帝国主义的作法,极为不利”。我国国民嫉妒其他国家在中国攫取利权,企图妨碍它们,由日本来独占,自己本来没有开发资金,却偏攫取了铁路和矿山的利权。其实,“这对我国国民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因为邻邦中国赶快富强起来,是促进我国富强的原因。而这一原因却被这次缔结的新条约给断送了。即它成了妨碍我国富强的阻力。我们通过如此观察,断定这次日华谈判终归是一次彻底的大失败”。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6月15日社论。

总之,对于参战问题也好,南洋和青岛的占领问题也好,“二十一条”要求谈判自始至终也好,《东洋经济新报》始终坚定地贯彻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坚持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中国的一贯主张。我曾在拙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①中写过,对于“二十一条”要求的问题,连反对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洋经济新报》也“没提出原则性的反对”,那是由于对《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只凭讽刺日本政府的“小评论”而轻率论断的,是个莫大的错误。

堀川武夫的《远东国际政治史序说》(1958年)一书,是研究“二十一条”谈判的专著。该书第二章第一节有如下的论述:

“尽管《东洋经济新报》谴责‘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的‘侵略主义外交’,但它却指出日华外交的问题无他,只能是确保南满、侵略蒙古和扶植福建省的日本势力”(第66页)。

这份资料的注释举出了前面我引用过的《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5月5日社论《贻下祸根的外交政策》。不过,这篇社论并没指出“日华外交的问题无他,只能是确保南满、侵略蒙古……”,而是举出日本政府这次对中国提出要求的三项纲要中的两项,与堀川说的完全不同。堀川把谴责日本侵略主义的《东洋经济新报》和《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等同起来,仿佛《东洋经济新报》也在强调“确保在华权益”的重要性。他所以这样写,可能是因为堀川本身也认为“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无可奈何提出来的,并力图说明任何反对侵略的派别都未曾加以反对。

^① 岩波,《日本历史丛书》1968年。

第三节 大战期间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

一、对内——民本主义，对中国——帝国主义

《大阪朝日新闻》在评论“二十一条”要求的谈判业已结束的社论中，提出了对华问题尚未结束、今后不能让步等论点（前引），以这篇社论为代表，日华谈判结束后，日本舆论界的侵华热潮并未平息下来。中国人民则把被迫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5月9日规定为“国耻纪念日”。这表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抵抗运动日趋深入和广泛。在日本看来，中国的“排日”运动，或者会变成公开的行动，或者即使不表现在行动上，中国人民内心的抗日情绪也会增强起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谴责中国“没有诚意”的声浪也就不断高涨。

例如1915年6月25日的《大阪朝日新闻》社论声称：“除采取高压手段以外别无他法。”8月28日，论述了“日华亲善的根本主义”，指出，总之，中国应该无条件地“信赖”日本，中国应该明白，没有日本也就没有“中国的领土保全”。

这年10月至第二年初，中国国内围绕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群情骚然。于是日本政府便伙同英俄两国政府劝告袁世凯延缓复辟帝制（10月28日）。袁世凯在11月曾一度接受了这一劝告，但在转年1916年1月1日却宣布了帝制。对此，日本等国均施加压力，3月22日，袁世凯又取消了帝制。中国各地的军阀纷纷起兵反袁。日本企图借此机会建立一个排除袁世凯的新政权，参谋本部秘密策划了“满蒙独立”的阴谋。以这种形势为背景，《大阪朝日新闻》等报刊对袁世凯政权的谩骂越来越激烈。他们不仅批判袁世凯的对日政策，还逐一攻击其内政方面的各种政策。他们根本不认为这种攻击是干涉中国内政，而以为是出自真诚的

劝告。

1916年6月,野心家袁世凯暴病而死,之后,在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下,成立了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政府。在日本,1916年10月,大隈内阁垮台,组成寺内内阁。为了怀柔段祺瑞政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收买工作(提供西原借款)。《大阪朝日新闻》不断地猛烈攻击寺内内阁是军阀政府、是“非立宪”内阁。《大阪朝日新闻》在日本内政方面的民本主义主张,可以说在日本新闻界是首屈一指的。不过,一旦涉及到中国问题,便仍旧坚持它一贯主张的强硬论,鼓吹露骨的帝国主义。

例如:1917年4月5日,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一出现,《大阪朝日新闻》认为这是由于寺内内阁在利诱中国段祺瑞政权,便猛烈攻击寺内本人及其内阁,并同样地痛斥段祺瑞和寺内是一路货色,都是军阀,谩骂其政权也和寺内内阁一样,是非立宪的、专制的、军国主义的政权。

1917年11月7日,公布了日美签订《石井—蓝辛》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权益”)的消息。《大阪朝日新闻》认为,这个协定“并未谈到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互相冲突的根本原因,仅仅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地理关系,而对于堪称其实质内容的政治及通商方面的权益,却丝毫没有承认日本的优越地位”。而且对于协定中规定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表示强烈反对。还说,“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关系,远在美国以上,并远超过通商关系,而是关系到国家的生存问题,因而理应承认日本的自由行动”。可是,日美协定却规定“对于违犯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行为,日美两国政府坚决反对”。这是日本“做茧自缚,只有寺内内阁才会干出这种蠢事”。^①

这是把反对寺内内阁同“二十一条”要求中关于“日本独占中

^① 《大阪朝日新闻》1917年(大正六年)11月6日《日美协定之发表》。

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对内民本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典型表现。不过，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并不是同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霸权，而是专对付中国的。由于深知自己实力薄弱，企图回避同欧美列强的角逐，看来象是和平主义；在国内攻击军阀，反对扩充军备，看来象是反对军国主义。但一看它对中国的态度，它的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本质就昭然若揭了。由于考虑到高压软弱的中国无需动用大军，所以一贯的反对扩充军备和一贯的对中国高压主张，两者就能并行不悖。《大阪朝日新闻》的这种态度，直到1918年基本上还没改变。只是缓和了对中国段祺瑞政权的直接谴责，重点攻击援助段政权的寺内内阁，并支持与中国段政权对立的所谓南方派、孙中山的国民党。在1918年8月席卷日本全国的米骚动中，《大阪朝日新闻》旗帜鲜明地站在民众一边进行报道和评论，对于这年8月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行动，也采取了相当的批判态度，但在对华政策方面，却以独特的笔法，为反对段政权、支持南方派的干涉主义进行辩护。3月21日和22日两天的社论《不干涉内政主义的动摇》，就是这种辩护的理论。

“一国迫使他国改革内政，或就他国元首的选任以及政府的机构等提出要求等做法，均属不当，即所谓不干涉内政主义，现在在国际法及国际道义上公认具有充分权威的法则”。然而，近年来，“出现了国家集团主义，即在以国家为单位的集团共同扶助之下来进行国际生活的思想”。这种思想“一方面，绝对不准一个国家以超级的权威干涉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又让单位国家担负为世界人类共同目标而协力的义务。因此，在前者意义上固然否定了干涉内政，而在后者意义上并不否定干涉内政。（中略）

在对华政策方面，我们历来所主张的，实际上无非是提倡根据这一近代倾向来决定我国的态度。我国官僚的对华政策，是基于昔日神圣同盟精神的干涉，其所谓的不干涉主义，其实是政

策上企图压迫中华民族自决主义的消极干涉，不在某种情况下，是露骨的积极干涉”。

口称反对寺内内阁“神圣同盟的”帝国主义的干涉，而以“国家集团主义”支持“中华民族自决主义”的“干涉”，真是娓娓动听。《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果真支持过中国“民族自决”的反帝斗争吗？根本一丝一毫也没支持过。它固然反对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但对“二十一条”要求，无论在谈判期间、当时还是以后，一次也未反对过，岂但如此，对于中华民族的“排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却针锋相对。不反对本国日本的帝国主义，又不支持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而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具体做法——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支持中国的反段派，不管它冠以什么“国家集团主义”的美名，也无非是主张一种不同于寺内做法的帝国主义。《大阪朝日新闻》所主张的新式帝国主义，在4月15日的社论《日华经济合作的意义》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篇社论说，所谓日华亲善或合作，不要理解为日华“同文同种”、“唇齿相依”那种习惯说法的程度；也不能说，中国自然资源丰富，缺乏开发资源的资本和人才，而日本资源匮乏却具有资本和人才，所以日华合作以取长补短。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说呢？

战后的世界，恐怕要改变过去那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体制”，“要出现通过以国家及工人为本位的经济体制来进行国际经济竞争之倾向”。届时，日华两国的命运将会如何？现在，日本侨民和中国侨民均遭到白人排斥，而且与其说受到白人资本家的排斥，倒不如说受到白人工人的排斥。“当想到将来会以这些工人为本位、或者保护这些工人的国家必将在欧美各国出现时，我们一想到日华两国人民的命运，不禁不寒而栗。这样想来，日华经济合作的意义，就越发明确了。即不仅为了中国，也不仅为了日本，实则关系到日华两国存亡的问题。日华两

国当政者若想到这里,就应该抛开眼前接二连三的琐事,为了谋求中国真正强盛起来,和日本合作,制定顺应将来形势的大策”。

这是所谓黄种人团结起来对抗白种人的“亚细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最新版。欧美固然也在压迫和剥削中国,然而,当前最露骨、最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的难道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吗?日华之间的“眼前接二连三的琐事”看来象区区的小事,但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事。抛开日华之间的这种原则性对立,侈谈什么对抗白种工人国家,建立永久性的“日华经济合作”等,这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再方便没有了。

刊登这类社论的《大阪朝日新闻》的编辑局确有一些当时进步的评论家。例如编辑局长鸟居素川;主要编辑干部有长谷川如是闲、花田大五郎、大山郁夫、丸山干治等。《大阪朝日新闻》在8月25日刊登的一则消息中,报道了当时与米骚动有关联的、攻击寺内内阁的关西记者大会,其中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典故“白虹贯日”,说是暗示了革命暴动,因此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和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闹得村山社长终于同年10月辞职了,与此同时,鸟居局长及上述主要编辑干部也一起退出报社。其中大部分人又在转年即1919年以长谷川如是闲为中心创办了《我等》评论杂志^①。

据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长谷川撰写的《从“大阪朝日”到“我等”》一文说:现在“利用这一小小刊物,继续宣传我们过去在《大阪朝日新闻》上所鼓吹的主义和主张”。

过去,“我们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在内政方面,一贯极力主张立宪主义和社会政策;在外交方面,则站在尊重他国人民自主的立场,有时竟被所谓实际主义者说成是愚蠢的。”

“我们的对华政策,主张彻底抛弃私心。……所谓恣逞私心,用老话说来就是玩弄权谋术数,搞威压征服、利己主义政策等等

^① 《我等》创刊号在1919年2月11日出版。

……。如果抛弃私心，就无所谓南方（指中国的南方派、孙中山等人）与北方，支持“公正”一方。我们好象在支持南方，这是因为南方比较‘公正’的缘故”。

由此看来，他们在《大阪朝日新闻》社论上拼命鼓吹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想必也确信是“尊重他国人民自主的立场”了。在鼓吹“国家集团主义”的他们在主观上很可能是这样确信的。果真如此，那么，就连当时最有教养、具有民主思想的记者集团，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尽管站在极端的帝国主义立场上，竟然在主观上没意识到这是帝国主义，确信是友好行动，这就不能不说他们早已沉浸在帝国主义意识中了。正好象封建时代武士压迫百姓市民，确信并不是压迫而是保护一样。

实际是，由《大阪朝日新闻》被排挤出来的民本主义者创办的《我等》杂志的对华主张，和把他们排挤出去以后由保守派统治的《大阪朝日新闻》基本上并无二致。最明显的例子可以从它们对于北京大学学生反对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于1919年5月4日毅然决然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所发表的评论中看得出来。

《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是《绝不能让步——山东问题与日本》^①。顾名思义，即日本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这是通过战争从德国手里夺过来的果实，因此完全理所当然，无论中国讲什么道理，也不管美国如何支持中国，日本也“绝不能让步”。接着在5月4日的社论《解决山东问题》中，热烈祝贺日本的主张在巴黎和会上取得胜利，说：“这不能看成是由于国力的强弱所带来的胜负，而只是根据正当协定^②规定的权利取得的胜利。”当然，实际是

① 1919年（大正八年）5月1日。

② 指“二十一条”要求。

根据大战中的密约^①，受到英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制服了中国。对于在发表这篇社论的同一天爆发的北京五四运动，《大阪朝日新闻》根本没有一篇象样的报道，社论中也没把它当作一回事。看来该报根本不了解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重要性。

《我等》的态度如何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该杂志于1919年5月15日刊登在卷首的无署名论文《青岛问题与北京暴动》，这是《我等》杂志论述五四运动问题的唯一的文章。

“对于国家外交谈判的经过，举行群众性示威运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若是竟演成了烧毁房屋或者袭击人身等流血事件，那就已经丧失了群众运动的性质，只能是一时激起的暴行。此种激发性的狂暴行径，在文明程度低的国家里，往往在其政治中心——首都，以外交问题的失败为动机，容易发动起来。

归还青岛问题，是根据1915年日华条约^②两国间商定的既定事项，与其说它是在巴黎和会上按照我方提案通过的，莫如说它不过是按照日华两国四年前的协定，得到了英法美意等国的承认而已。（中略）

本来，在巴黎和会之初，中国使节心想侥幸于万一，在青岛及其他问题上，曾经企图背叛邻邦^③的友谊，是罪恶的开端。这次北京学生闹事，归根结底，可以说是由于陆征祥等人推行的心存侥幸的外交政策造成的”。

赶走“进步派”的《大阪朝日新闻》和被赶走的“进步派”《我等》

① 1917年初，为了摧毁德国潜水艇的破坏通商战，英法要求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舰队。作为同意这一要求的补偿，日本政府要求英法保证在将来的媾和会议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省德国利权以及日本占领的南洋德属诸岛的各种要求，英法同意了这个要求。

② 指“二十一条”要求。

③ 指日本。

的论调,文体虽然不同,但其想法和内容岂不是一模一样。

吉野作造在“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希望,这表明他的见解比《大阪朝日新闻》和《我等》略高一筹。他在论文《论北京大学生骚扰事件》^①的开头写道:“无论怎说,这个事件带有排日色彩,使我们深感遗憾”。可是后来他又说,这个运动是中国“有为的青年觉醒的结果”,是自发的运动,对“五四运动”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这点和上述报刊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这次运动的政治意义,吉野认为,它“并不完全是单纯的排日运动,他们主要是要铲除内部祸根”。吉野只肯定了“五四运动”攻击中国国内的“官僚军阀”,而对其“排日”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则“深感遗憾”,这一点和上述报刊的观点是一样的。

在7月号的《中央公论》的社论上,吉野又发表了批判日本各界的“狂乱的膺惩中国论”说:“虽说如此,对中国人的暴行,要采取自卫方策,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坚决努力维护我国的正当利权,自不待言”。他可能仍然在说“‘二十一条’要求和凡尔赛和约中的山东条款都是日本的正当利权”。吉野对于“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的目标在于废除“二十一条”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的条款,一次也没有表示过赞成。

二、真正的“日华亲善”论

试把吉野作造、《我等》及其同伙《大阪朝日新闻》时代的中国政策主张,同黑龙会和德富苏峰^②等人的观点比较一下,觉得似乎

^① 《中央公论》1919年(大正八年)7月。引自松尾尊允编的《论中国、朝鲜——吉野作造》。下面的吉野论文亦同。

^② 德富苏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头号思想家,自不待言。他于1913年秋和1916年春,分别发表了《时务一家言》和《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等文章,连载于自己创办的报刊《国民新闻》上,后来又改为单行本发行。这两本书成为当时特别畅销的政论书。他的立场是“对内推行平民主义,对外推行帝国主义,而且用皇室中心主义将两者融成一体。”(《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序言)。

都是非帝国主义的。但是，如果同《东洋经济新报》的鲜明的反帝国主义论点对照一下，便立即看出，民本主义者却是非常帝国主义的。下面介绍一下《东洋经济新报》的主张。

《东洋经济新报》1916年6月25日的社论《论对华外交的根本方针》首先发问：过去占我国对华外交主导地位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或曰保全中国，提倡日华亲善；或唱扩张我国利权，甚至主张瓜分中国”，哪个是我国国民的真意呢？然后回答说：“所谓我国国民对中国的要求，归根结底，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我国的保护国，或者至少把它摆在同保护国一样的地位，这就是我国国民的真意”。

“简单说来，我国国民认为，没有独立能力的中国，所以得以保全了领土，主要是托日本之福”。日本不仅是远东，而且是世界上的大陆海军国家。因此，“如果中国抛开日本，不知中国将会陷于何等困境。如果诚恳信赖日本，中国领土就会真正得到保全。所以，中国应该比任何国家都更紧密地同日本结合起来，依靠日本，方为有利。这就是我国国民保全中国论和亲善论的出发点。

那么，同日本紧密地结合起来、信赖日本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一切重要问题，在实行之前均须事先同日本商量，征得日本同意。这是表示信赖实质的办法。就是说，引进外资时也要同日本商量，聘用外国人时也要同日本商量，增建师团、修筑炮台、建造军舰等时都要同日本商量，然后再决定再实行。可见名目是保全中国，实际等于把中国变成了保护国。看来这实际上是我国的保全中国论和日华亲善论不折不扣的内容和结论”。

尽管日本很想这样做，可是中国当然不会马上就听从日本的意愿。于是就进行恫吓说：“中国当局顽梗不化”、“没有诚

意”。这么一来，中国就越发对日本怀抱反感。日本应该赶紧放弃这种过去的方针，重新做起。中国从未拖欠对日本的债务，也几乎没有危害过日本人的的人身安全。“若说多少有过一些，大都是在可宽恕的情况下发生的”。反之，“我国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尤其从日俄战争以来，根本瞧不起中国，我们的对华外交，只顾我国的利益（其实是愚昧狭隘的见解），无视中国的利益，为了强行推销毫无道理的亲善论，滥用威胁手段^①，终于陷入今天的僵局”。如果还要继续强制推行这个方针，最后只好诉诸武力，在中国炮制傀儡政权。不过，这在现代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很强大，列强各国也不会允许这么干。

这种观点完全正确，无须赘述。特别是它还指出，中国以往对日本没做过任何坏事，而日本却一味地侮辱和侵略中国。这种指摘，不仅在当时没有先例，就是现在也应该重新想一想。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归结到《东洋经济新报》的一贯主张：“还是从正面坚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除此别无他途”^②。由这一政策获得利益的，“按顺序说，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日本，欧美各国则为第三、第四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理论大家都熟悉，这里用不着说。再者，这种说法客观上也含有帝国主义的因素，这在本章第一节第二个问题中业已阐明。不过，这篇社论在《东洋经济新报》过去一贯主张的反对侵略、反对利权的观点以外，又加上了一些微妙的补充。

它主张，日本在坚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的同时，还要“当列强中任何一国即使略微在中国采取了同该原则不相容的态度或行动时，要竭尽全力予以抵制。而且，为了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情况，日本要进行监视”。

① 指陆海军。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16年（大正五年）7月5日，《再论对华外交的根本方针》。

所谓“日本监督列强,使其遵守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竞争的一种和平形式吗?按纯理论讲来,如果有哪个国家始终不遵守这个原则时,为了迫使它遵守,就要诉诸武力,也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从现实来看,只要日本坚决遵守这两个原则的话,那么,几乎不会有其他国家敢于出来瓜分中国的可能性。所以,即使说“监视”,提法不太稳妥,记者的本意并不是让帝国主义潜在下去。只是该报记者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对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寄托希望。《东洋经济新报》想到的是由日本来进行“监视”,由此可以看出,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保全中国”的思想影响。

虽然《东洋经济新报》错误地认为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各项政策,事无巨细一律反对,始终坚持谋求真正的“日华亲善”。

例如“小评论”的《日本人的对华经营》^①一文指出:“我国人的所谓对华经营的意思就是从中国人手中掠夺一些利权。例如,矿山开采权、铁路铺设权……,再不就是只看到在华日侨或我国人的对华活动,而不顾及其他的一些设施。换言之,只看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对此坚决反对。这篇文章还说,自从攻陷青岛以来,日本政府在考虑设立“满蒙银行、日华银行”,它必须是“以中国人为对象的银行”,为促进“中国产业”发展的银行。

此类“小评论”还有好多,因论点相同在此从略。另外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东洋经济新报》估计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会走向新的发展而阐述的《去年中国的财政状况》^②及其他评论和报道,都和《东洋经济新报》真诚的“日华亲善论”有密切关系。此外,在1917年5月5日的“小评论”《中国提高关税问题》中,就中国向各国提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11月15日。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3月5日。

出提高进口关税、引起日本财界的反对，并组织了“反对中国提高关税关西联合大会”评论说：“对于我国对华贸易业者深表同情”，不过，“纵令我国工商业因此而全部倒闭，也没有理由反对别的国家提高关税”，这种斩钉截铁的说法，明确表示了《东洋经济新报》真正尊重中国主权的立场。这篇“小评论”接着说：

日本对中国“只能尽量恳求或为互利进行协商。前几天，我工商业者不是确也向英国提出恳求，进行协商了吗。……这时，我们并未听到我国针织品业者组织过什么反对英国禁止进口针织品的大会。然而，对于中国却大肆‘反对’，令人百思莫解。这种态度，我们首先感到不快。诸位可以设想，堪称‘我国制品的最大顾客’的‘四亿中国民众’一定会更加感到不快吧”。

《东洋经济新报》把中国看作和英国一样的主权国家加以尊重，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日华亲善”。

对于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东洋经济新报》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曾经强烈反对日本占领青岛的《东洋经济新报》，临到日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而企图造成占领青岛的既成事实时，却一言不发。对于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东洋经济新报》只在“财界要报”的消息栏中，从对华贸易影响的观点，作了简单的报道。由此看来，《东洋经济新报》反对日本占领青岛的主张似乎是虎头蛇尾的了。实际并非如此，《东洋经济新报》一贯反对日本占领青岛，这一点留待下一节叙述。关于这一时期《东洋经济新报》在批判帝国主义中表现出来的彻底性，试看该报主编三浦铁太郎关于台湾和朝鲜的论述，便可清楚了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东洋经济新报》于1913年1月业已刊登了署名三浦铁太郎的论文《放弃满洲乎，扩张军备乎》一文，主张放弃“满洲”。在大战期间，该杂志从1916年7月到10月连载了题为《陷入僵局的台湾及打开局面的方策》的文章，署名也是三

浦铁太郎。文章认为,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无论在经济上也好,政治上也好,都已完全陷入僵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岛人民的民族抵抗斗争已经势不可挡,压制不了。因此三浦得出结论说,对于台湾的统治,“要改变以住台日侨为核心的方针,须以台湾本岛人为主。换言之,即废除台湾总督府官制政治,允许台湾自治”。

1919年5月15日,《东洋经济新报》还就朝鲜三月民族独立起义发表社论,强调指出,朝鲜民族直到取得独立自主以前,决不会停止对日本的反抗,民族独立的要求,是任何“善政”也压制不了的,日、朝之间“避免无谓牺牲的方法”,只有让朝鲜人“成为自治的民族”。文章所说的“自治”,显然是指“独立”。

此外,对于1917年11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东洋经济新报》也表示有一定的理解,自始至终坚决反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反对武装干涉俄国革命,主张承认“工农苏维埃政权”。

第四节 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顶峰

一、巴黎和会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是倾注全力的战争,所以,开战后不久,舆论界就有充裕时间议论起战后世界的前景。其中大多数人^①估计,战后和平主义将会成为主流。《大阪朝日新闻》1915年9月18日至25日,连续发表了《论世界和平与日本国防》等八篇社论,估计战后世界会转为和平主义,主张推迟海军当局提出的“八四”舰队的造舰计划。许多民本主义者的观点也和这篇社论相同,作为反对扩军备战的论据,主张战后转向和平

^① 据后述三浦铁太郎的论文说,似乎社会上曾出现过“战后国家间的对立将比过去更加激化”的说法,但我尚未见过这类看法的论文。陆海军当局等扩军论者可能会有这类的观点。

主义。

多年来一贯反对军国主义的《东洋经济新报》，特别热情地论述了战后世界的前景以及日本应该采取的姿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还不到半年的1915年1月15日，《东洋经济新报》发表了以主编三浦铁太郎署名的文章《战后的欧洲》，共连载十一期，其要点如下：

所谓战争，有(1)：“国民生存上绝对必要的”和(2)：“危害国民生存的”两类。第一类，例如日俄战争时的日本；第二类，例如日俄战争时的俄国。然而，任何战争之后，为战争献出生命财产的人民一定要考虑：什么是为了国家？自己和国家是什么关系？从而产生把国家作为维护自己的机关的要求。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民众力量的显著增强和俄国的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战争“无论需要或无需，都将伴随政治上的革命”。“其革命的方向，必将朝着建立一个国民各自的意见在政治上比过去更加受到尊重”的组织前进，这是不待言的。

现在的欧洲战争，不论英德哪方胜利，都不能毁灭对方的经济；即使扩张领土，也不会带来经济利益；即使要求赔款，由于现代世界各国金融处于相互紧密依存关系，也不会要到手。若是由于赔款致使战败国的经济崩溃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战胜国，致使它的经济陷于危殆。这样一来，战胜国和战败国的民众都会要求补偿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深重灾难。结果，将会按照“限制军备”和“改变财产制度”的方向，走向“社会组织的改革”。于是，“战后，民众的力量将会出人意料地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增强起来，这就早晚难免发生政治的、社会的革命”。

战后的欧洲，再也不能由“帝国主义(掠夺成性、盗窃成性)”来领导。将由“非帝国主义的、反对秘密专制外交的外交”来领导。具体地讲，必将向下述方向迈出新的一步，即第一，裁减军

备；第二，“公开外交机密。就象国内租税及其他财政问题交由国民公开讨论决定那样，外交问题也要交给国民公开讨论；在国际方面，组织一个以各国为会员的最高团体，两国之间不可解决的争端，均交由这个最高团体开会讨论决定”。

三浦的上述论断未免有些粗糙，还有明显的错误，与其说是论证，莫如说是作者的信念以至对将来所抱主观愿望的写照，但是也有超出时流的远见卓识。对该文的分析和批评不是本文的主题。不拘怎样，三浦就是这样设想战后世界的，而且这是贯穿《东洋经济新报》、包括无署名的文章在内的一贯的观点。该杂志同年7月25日的社论《战争的结局与世界的国际关系》还指出，欧洲在这次大战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惨祸，战后必将广泛掀起争取持久和平的运动。无论大战于何时、以何种形式结束，防止未来战争的计划，必将作为媾和条件之一提出讨论。日本应该促进这种形势的发展，“不要固守旧式外交，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被抛在后面”。

《东洋经济新报》如此展望将来，表现了主观愿望，一方面刊登了署名石桥湛山的论文《世界和平同盟之我见》^①和英国费边协会的《和平同盟协约草案》翻译全文^②；另一方面还发表了《战后经营要点》^③和《如何准备和平战争？》^④等有关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社论。

《战后经营要点》为使日本经济赶快达到欧美水平，提出五大政策。第一，拯救资本匮乏的局面。为此，“新领土^⑤的财政，要根据完全独立经营的方针，改变目前粗暴的对外领土扩张主义”政策，“否定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本年度岁出军费预算和

① 1915年(大正四年)9月5日至10月15日。

② 1917年(大正六年)6月15日至8月15日。

③ 1915年(大正四年)4月5日。

④ 1916年(大正五年)9月25日至10月5日。

⑤ 新领土：指日本的殖民地。

新领土补充费预算总计二亿日元的一半、至少四分之一；还可以减少公债偿还基金，减免盐税、纺织品消费税、营业税、通行税等苛捐杂税，增加民间的资本积累。第二，扩大市场。为此要建设铁路网，其财源可以通过实行第一条政策取得。“铁路比军舰更需要”。第三，废除贸易保护政策。这也是《东洋经济新报》的一贯主张。第四，改善职工待遇，提高职工业务水平，增强职工体质；实行各种社会政策，缩短劳动时间。第五，为了改革和钻研生产技术，兴办各种公、私立研究机构。

对于日本一般的产业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者——他们既没有通过军工产业和殖民地事业受到政府的保护，也没有公债，而且强烈要求减免营业税等苛捐杂税——说来，再也没有比这五大政策更可心的了。不过，第四项政策，大概他们不会赞成的。

《东洋经济新报》所谓的“准备和平战争”，是指“人类的产业革命”，即“变革社会组织，在生产方面高度发挥人的能力，在消费方面高度发挥产品价值。”具体地讲，第一，实行人人收入平等的最低工资制；第二，限制劳动时间的上限标准；第三，完善卫生保健设施（包括上下水道的完备以及贫困者的公费医疗制度）；第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包括对贫困者实行公费教育）；第五，建立和健全失业、养老及其他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用现代话说来，就是施行彻底的社会保障。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主张，可能是从英国费边协会那里学来的。

1918年11月，长期的世界大战出人意料地停了，接着召开了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打着保障世界和平的招牌，把建立国际联盟作为重要课题提了出来。《东洋经济新报》认为果如所料，表示热烈欢迎，对它寄托了过大期望，说来也就是幻想^①。一看1919年6月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以后，发现国际联盟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19年（大正八年）2月5日社论：《国际联盟的中心事业》。

那种强有力的保障和平的机构，但《东洋经济新报》对于虽说是抽象的、但把裁军规定为各国的义务一点抱有很大期待。

同时，《东洋经济新报》对于对德和平条款“极为严峻苛刻”大失所望。该杂志严正指出，削减德国本土；剥夺其海外全部殖民地；只迫使德国在其原势力范围实行民族自决；对协约国殖民地却佯装不知；只迫使德国严格执行军备限制；使德国单方承担战争责任；对德国课以根本无力偿还的巨额赔款；并对德国产业加以限制等，“极其偏颇残酷，是史无前例的”。对英、法、美等国的民主主义一贯尊敬和钦佩的《东洋经济新报》，虽然还没有丢掉这种根深蒂固的感情，但也逐渐觉察到了其帝国主义的残酷本质。^①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最关心的问题是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对此，《东洋经济新报》未有提到，对中华民族的“五四运动”也几乎不大关心，这些前面已经述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反对扩张领土和获得利权的一贯主张。关于山东利权问题，《东洋经济新报》企图通过当时美国政府提议的美日英法四国对华共同贷款团来加以解决。

例如，《东洋经济新报》在6月5日发表的社论《新贷款团与我国的地位》上，表示赞成美国的提案，即同意对中国的政治贷款、中央和地方政府保证的贷款，全都通过新四国贷款团办理；四国现有的对中国贷款的优先权，一律取消。《东洋经济新报》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要把“满蒙”排除在新贷款团活动范围以外的企图。社论说，组成四国贷款团“是对中国适用国际联盟主义”，毕竟“无非是国际共同管理中国”，“冷静地考虑起来”，山东铁路和满铁都要全部交给新贷款团。要认真考虑，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不能莫棱两可。而《东洋经济新报》本身对此显然是赞成的。^②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19年（大正八年）5月25日至6月15日社论：《包藏祸根的媾和条约》。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19年（大正八年）8月25日社论：《满蒙除外毫无意义》。

进而在翌年即 1920 年 5 月 29 日“财界概观”栏中刊登了《中国拒绝谈判山东问题》的文章,指出日本虽然表面上说要把山东利权归还^①给中国,但“在背地却强迫中国接受奇妙的秘密条约,企图从中渔利”,因而遭到中国拒绝谈判。《东洋经济新报》的结论是,青岛利权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长远看来毫无意义,“通过对德和约得到的山东利权,应该统统放弃,把它委托给国际联盟”,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东洋经济新报》并不支持日本攫取德国的利权,由此可以了解。但是,它说让新四国贷款团或国际联盟来经营山东利权,却不说应该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这就说明《东洋经济新报》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认识带有盲目性。

《东洋经济新报》正确地看清了四国贷款团的成立意味着“在中国的国际活动中心,战前是英国,战时是日本,战后转为美国”;以及美国“为了达到抑制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势力的目的”,而狂热奔走组织国际贷款团。因而断言,贷款团规约^②不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是必然的。尽管如此,对日本来说,并非不利。^③

显而易见,《东洋经济新报》并不主张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可是,正如《东洋经济新报》自己也承认的,四国贷款团是四个大国

① 《凡尔赛和约》把山东省的德国利权交给了日本,但一经决定,中国便发生了反对这一和约的“五四运动”,当时,1919年5月17日,日本政府声明把胶州湾原德国的租界地归还给中国。并于翌年即1920年1月,在《凡尔赛和约》生效的同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议举行上述归还问题的谈判。到了5月,中国才答复说,在媾和条约上没有签字的中国,不能同意就和约规定的山东问题进行谈判。于是这个问题便拖延下来。结果,在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时,由于美英的斡旋,基本问题才得到了解决,1922年12月签订了协定的细则。

② 1921年5月制定。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20年(大正九年)11月27日,“财界概观”栏《对华新贷款团成立》;及1921年(大正十年)4月9日,“小评论”栏《对华贷款团规约》。

对中国的共同管理，即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组织，即使把四国贷款团换成国际联盟，也是一路货色，而《东洋经济新报》却熟视无睹。这是由于《东洋经济新报》一直错误地信赖英美，本来“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只是帝国主义任意剥削、压迫中国的口号，却一直错误地认为会给中国带来利益；没有认清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本质，认为它是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机构，抱有幻想。

虽说过去《东洋经济新报》比日本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都更为激进，是彻底的非帝国主义论者，但它也有上述的错误。然而，这时日本出现了完全没有《东洋经济新报》那样错误观点、明确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例如，《中央公论》1919年1月号鹭尾正五郎的论文《战后世界依然是国际竞争的舞台》，便是其中之一。该文笔者的头衔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但关于他的经历，我一无所知。下面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要点。

这次大战，是德国军国主义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德国战败了。不过，战后德国业已民主化了，日本无需与德国为敌。过去，日本盲目追随英美，今后要走自己的道路。其中心问题是对华政策。日本的方针，只能是援助中国民族的自治自决运动。不仅政治上实现自治自决，经济上也要如此。

“所谓中国在经济上实现自治自决，归根结底就是除了自由通商以外，不给列强以任何特殊经济权益。列强过去攫取的利权另当别论^①，日本应该自己确定今后不许再搞攫取利权活动的方针，并一面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巩固日华亲善的基础；一面大力向英美各国进行宣传，用来作为牵制英美政府及实业家的野心的武器”。英美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凭舆论来推行的，而是“凭政府同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实业家的阴谋来推行的”。

（中略）

^① 文章作者在这里有局限性。

“所谓门户开放，是列强相互保护的主义，不是保护中国的主义”。英美的目的是“推行资本政策，即不是根据供求自然关系来扩张商权，而是想在中国由自己来经营中国自己的事业。这也就是企图利用自己多余的资本，支配他国的劳动力和资源的野心”。

这段分析的确正确。笔者进而就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了如下的正确论述。

“日本必须始终在自然供求范围内同英美竞争，参与资本政策的竞争，而且必须为彻底消灭这种竞争而努力奋斗。危害中国独立、进而使日本自己受到打击的，正是这种资本政策的竞争。日本对华实行资本政策，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感，并给英美资本势力侵入中国造成借口，对我国来说，没有比这更愚蠢的政策了。”

日本必须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民主主义的宣传，使他们认识到英美的资本政策是取代德国军国主义的世界专制力量。中国四亿人民的劳动，绝不能供作英美资本的牺牲品。（中略）

日本要向中国和列强表明这一主张，借媾和之时，现在正是绝好的机会。例如青岛，应该按照中国的要求，把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首先让中国认识到我国确有诚意，支援中国，让中国充分参加媾和会议，在会议席上坚持东洋民族自治自决的总方针。但是，据闻我外交计划似乎并非出于这一方针，而是逢迎英法的秋波，为攫取些许利权绞尽脑汁”。英美实业家奉行拥护和攫取利权的政策，一定会到东亚来，届时如果发生国际争端，政府肯定会作为他们的后盾而出现。“为防止这种情况，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自身的民主运动。作为日本的方针，除了援助他们，促进这一民主运动的到来，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为了这一整个大局的目的，必要时，不仅青岛，日本而且应该把“满洲”也放弃掉”。

试把这篇卓越的论文同《东洋经济新报》对照一下，便可立即看出后者错在哪里。虽然《东洋经济新报》有上述那些严重错误，但在国际问题上，对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行径，无论出兵前、出兵后，都始终表示坚决反对；对于朝鲜的独立运动有正确的理解；在国内问题上，它反对军部，主张普通选举权；正确认识米骚动的历史意义；同时，在经济政策方面一如既往地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在反对钢铁工业保护关税的文章中，《东洋经济新报》也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论断。它针对那种认为虽然日本既无铁矿又无炼焦煤，可是“尽管日本没有而中国有”的说法，指出“那是说中国具有兴办这种工业的条件，这丝毫不能成为日本兴办这种工业的条件”^①。

在这些涉及国政各个领域并形成体系的论点方面，《东洋经济新报》依然与《大阪朝日新闻》或民本主义者有着本质的距离。^②而鸷尾的高论后来也没有接续的文章，完全是孤立的。

二、“放弃一切的决心”

新四国贷款团的组成，是美帝国主义对日反击的尝试。1921年，日本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各国更加沉重的打击。即1921年7月，美国呼吁日本政府召开讨论海军裁军和“太平洋、远东问题”^③的会议。于是同年12月至转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美、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19年（大正八年）1月15日至25日社论：《排除保护政策》。

^② 《大阪朝日新闻》等对待中国的态度，比起过去来，虽说调子变得相当温和了，但其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议会内的对华政策论》（1921年1月29日）是这一时期《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的社论中帝国主义因素较少的一例。文章主张宁肯“放弃一些既得权益”，也要“积极地把和平政策贯彻到底！”试看这段时间前后的社论，可以说它并不肯放弃“满蒙的特殊权益”，即使说它没有“领土野心”，但也有“扩张领土的欲望。”（1920年7月15日社论：《与其占领不如收买》，1920年8月20日社论：《列国共同改造中国论》）。

^③ 太平洋、远东问题：主要指中国问题。

日、英、法、意、比、荷、葡、中”等国参加的“九国会议”，缔结了全面否定日本在中国的一切“特殊权益”的“九国公约”^①，同时日、英、美、法、意五国还签订了“海军裁军协定”^②，日、英、美、法四国签订了关于维持太平洋区域岛屿现状的“四国条约”^③。于是，日英同盟条约期满即不再签约；大战期间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权益”的“石井—蓝辛协定”也废除了。在帝国主义世界中，日本完全孤立了。

《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放弃一切的决心》评论说：听到美国提案时，“日本政府和国民都不禁为之愕然，不知所措”^④，但它认为，这次会议是使日本根本改变过去帝国主义政策的极好机会，表示欢迎，并立即以上述标题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论。其要点如下：

本来，日本应该主动发起并在东京召开这种会议，日本现在不要被“小欲”熏心，“而要放弃一切。这是一条最好也是唯一的道路。例如，放弃‘满洲’，放弃山东，放弃对中国的一切压迫，结果将会如何？又例如，允许朝鲜和台湾实行自治，结果将会如何？英国和美国都将会陷于极端的困境。因为它们只让日本采取这样的自由主义时，它们就在世界上保持不了道德价值了，中国等世界弱小国家必将全都信赖日本了。（中略）

贪图小欲者或许会说，这样的话，日本怎能活得下去呢？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要

① “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的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65页。——译者

② “海军裁军协定”：即《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40页。——译者

③ “四国条约”：即《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36页。——译者

④ 《东洋经济新报》1921年（大正十年）7月23日社论。

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①”

乍一看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多么奇特的议论。尤其最后一段引用《圣经》的话，或许会给人一种把政治、经济问题偷换为道德论的感觉。可是，对于熟悉《东洋经济新报》几年来一贯主张的人来说，可以理解这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实际上，在这以后，《东洋经济新报》还多次提到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而且《东洋经济新报》继而从7月30日至8月13日连续三期发表了社论。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一文中就“放弃一切的决心”，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

和主张放弃全部殖民地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如果日本不牢固控制住这些殖民地，在经济和国防上就不能自立；第二，列强各国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国土，却只要求日本放弃殖民地，未免太不公平。然而，上述“第一点是幻想，第二点是‘小欲’”。

首先试看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关东州和库页岛”的经济利益。这些地区对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九亿多日元，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为十四亿四千万日元左右。对美是最高额，对于日本的经济自立来说，美、英、印度等国远比这些殖民地要重要得多。再者，上述殖民地没有多少日本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日本工业最重要的原料——棉花，主要依赖于美国。在煤炭、铁矿和石油方面，朝鲜、台湾、“满洲”等地也不是日本的重要供给地区。即使对中国和西伯利亚进行干涉，也不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利益，反而有害。从中国进口的铁矿为两亿五千万斤，煤炭五十五万八千吨，“为这一点点东西，争夺利权，有何必要？”通过正常的贸易，从美国进口了铁矿十二亿五千万斤，从英国进口了三亿三千二百万斤。

^① 参阅《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至33节。——译者

其次,从军备国防方面来看,到底哪个国家有可能侵略日本?当然不是中国。以前曾经是俄国,如今不同了。有人说是美国,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侵略日本要夺取哪块地方呢?日本本土这样的土地,即使白给人家,恐怕也没有人要,倒是想要殖民地。所以,假如日本说不要“满洲”、朝鲜、台湾和库页岛,战争就决不会发生了。即使日本放弃这些地方,也决不会有哪个国家取代日本把这些地方从朝鲜人民或台湾人民手中夺走。

第三,有人会说,尽管殖民地的贸易额少,资源也不十分丰富,但作为日本人移居地来说,却很重要。可是,现在住在那里的日本人却微乎其微。本来,殖民地只有在那里投下资本,利用技术和企业头脑,剥削当地的劳动力,才能赚得利益,结果必然反映到贸易上来。然而那里的贸易情况却如前所述。

即使假定大日本主义对我们非常有利,也不可占据“满洲”、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因为现在已不同于英国掠夺殖民地的时代了。“朝鲜的独立运动,台湾的建立议会运动,中国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抗日运动”等等,决不是凭警察和军队的干涉和镇压能够压制得住的。纵令大日本主义利益多么大,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总留恋这些,是目光短浅的“小欲”的表现。

“我们认为,台湾也好、朝鲜也好、中国也好,如果日本尽早对它们采取自由解放的政策,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民决不会背离日本。他们必将仰赖日本为盟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将永远与日本保持亲密关系,如同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样。中国人、朝鲜人、台湾人的感情,正是如此。”

有人说,列强各国都拥有广大领土,却只让日本人囿于狭小国土以内,这不公平。让我们来回答他们。“我们所说的放弃大日本主义,绝不意味要局踣在狭小的日本国土以内,恰恰相反,为使我国人民把世界当作我国领土而活跃起来,就必须抛弃大日本

主义”。

(1) 日本想扩张领土也扩张不了。如果硬要扩张的话，反而会造成与四邻各民族、各国人民为敌。

(2) 列强各国过去掠夺的海外殖民地，正处在逐渐独立的命运。

(3) 即使羡慕别国的广大领土，事到如今，已不能再仿效它们。日本反其道而行之，抢在列强前面，让它们解放殖民地，这才是最英明的策略。

如果日本允许朝鲜和台湾实行“自治”(即独立)，那么，英国对待印度和埃及、美国对待菲律宾，总不会老是让它保持现在这样吧。

说美国不让日本人和中国人入境，这指的是移民，并不是不准商人去经商。有人说，不把它变成本国领土，就不能自由投资，例如矿业不准外国人开办，哪个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只要有资本，就必然会有一条投资于外国产业、间接经营的道路”。一投资就有利润，即使不去外国也行。“哪怕把八亿日元军费的一半投到和平产业里去，日本就会拥有丰富的资本了”。

这些看法，当时可能会被人们当作空想家的白天梦呓，但是，对于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多年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潮流的我们来说，不由得体会得到且抱有同感。这种观点，和明治初期革命的自由民权论者反对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主张选择和平、文明和富國小国的道路，以及明治后期社会主义者们利用《周刊平民新闻》反对日俄战争、主张“小日本哉”的思想^①是一脉相承的。

《东洋经济新报》主张，日本要提出这个崇高的理想，在华盛顿

^① 关于小国主义的传统，请参阅松永昌三：《是扩张主义还是和平主义？——日本生存之路》，见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争论的焦点》，1967年，上卷。

会议上“和中国合作”而奋斗。它还说,过去,日本一贯侵略中国,今后要改正,决心“放弃”“掠夺”的态度。这样一来,“日华亲善”一定能实现。现在的太平洋会议,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的绝好时机。并继续强调,会议的筹备期间和会议进行当中,在限制海军、归还山东利权的中日谈判、太平洋岛屿的四国和平协定及其他具体问题方面,日本要表现出“放弃一切的决心”^①。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关于“放弃一切的决心”,当然连作梦也没有想过。尽管他们死求百赖地想保住在中国的“特殊权益”,还是受到了美英等欧美七国和中国的围攻,终于在九国公约的条款上,包括“满洲”在内的日本在中国享有优越地位的主张,被迫改为“放弃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当然也包括日本)剥削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变成了严密的条约。“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是《东洋经济新报》过去一直用来反对日本攫取利权野心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它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因为这一原则已经变成了严密的条约,它本来应该因此而高兴,但却相反地说这是日本“华盛顿外交的失败”。说失败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和人民都不了解“世界大势”,都没有“放弃一切的决心”^②。它并没有具体说出日本在哪一点上、是怎样失败的,可能是指日本没有充当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先锋,反而死抱着不放,终于被各国逼迫着才无可奈何地作出了恋恋不舍的让步。

《东洋经济新报》不再提“门户开放”了,这一定是因为“九国公约”中已有明文规定,无须再提。其实不仅如此,可能是因为《东洋

^① 这一时期,《东洋经济新报》就政治和外交等问题发表了比其他任何时期、任何问题都多得多的评论。其中有《就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会议的几点劝告》(1921年9月24日社论)、《信仰心薄弱的人!》(9月17日社论)、《山东交涉条件》(9月17日小评论)、《就山东问题答复中国》(10月15日小评论)、《华盛顿会议与中国问题》(12月8日社论)、《四国条约签订》(12月17日小评论)等有关华盛顿会议的评论、社论和报道。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1月28日小评论。

经济新报》已经认识到，“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无非是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剥削、管理他国的一种体制，如果日本参加进去，就和“放弃一切的决心”、充当亚洲民族解放的先驱、以此开辟日本前进道路的理想背道而驰了。例如，在华盛顿会议筹备期间，针对会议发表的《共同管理中国是时代错误》^①的社论，和过去对按机会均等原则组成的四国贷款团“共同管理中国”表示欢迎的态度截然不同，立场站得更高了。这时的《东洋经济新报》，主观上自不必说，客观上也摆脱了任何意义的帝国主义。

在经济方面，《东洋经济新报》认为中国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市场，仍然是最重要的（从现实情况看来，中国也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重视，才反对攫取利权和压迫政策。《东洋经济新报》分析形势指出，中国的纺织业以及其他“现代工业”的民族工业将会逐渐发展起来，并将同日本的纺织业、杂货业等展开竞争。它认为，日本面对这种形势不应该悲观。如果中国整个经济繁荣起来，全民的购买力必然随之提高，日本对中国的输出也就会有增加的可能。只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的工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日本应该确定与此相应的方针^②。

所谓新的对策，就是销售比中国更精制的产品。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约定，从1922年3月召开关于中国提高关税问题的各国会议，9月达成协议。新关税对粗制品（日本等国的输出品）的税率比较高，对精制品（英美等国的输出品）的税率比较低。因此，对日本来说，无论在同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上，还是同英美的竞争上，都很不利。“因此，今后只有改变我国人光造粗制品的方针，通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1年（大正十年）8月20日。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4月1日至8日社论：《要重新注視中国》。

过提高工业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努力廉价生产精制品^①。

这篇社论接着阐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向那里移植产业等的企图,可谓无计可施的穷途末路的方策”。资本输出本来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时日本资本主义正处于确立垄断的阶段,对中国输出资本,比纺织业等的商品输出开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而当时《东洋经济新报》还如上述指出,输出资本应尽量避免,这表明了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

在政治方面,当时《东洋经济新报》不仅在一般理论上反对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的扩张,还主张“取消满洲守备队”^②。正值陆军准备压缩编制,其中也包括缩减(其实是改编)“满洲”独立守备队。《东洋经济新报》便针对陆军的这一计划,提出不是缩减而要取消的主张。于是出现了这么搞日俄战争以来用鲜血换来的权益就保不住了、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就保不住了等反对意见。但是《东洋经济新报》却说,“满洲”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在那里的权益,是承袭了俄国从中国掠夺来的利权,所以在历史上是非法的。不配置军队就保不住的权益应该放弃。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想要在不配置军队就呆不下去的危险的异国居住或经商,根本就是错误,它只能意味着军国主义、侵略主义”^③。

这一时期至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东洋经济新报》批判帝国主义最彻底的时期,比前述鹭尾的论文更加激进。例如,在1923年2月24日的社论《改革外交的根本想法》中主张,亚洲国际政局的中心已由英国转到美国,“以中国为中心的日美关系”的这个难关,靠帝国主义的外交是闯不过去的,摆在日本面前的一条光明道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10月14日社论:《中国关税的提高与我对华贸易》。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6月10日小评论。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9月16日小评论:《在满日侨反对撤兵》。

路只能是“我国充当把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进而有色人种从白人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运动的旗手”。

首先要同中国人民握起手来，互相真诚信任。“为此，即使把我国在中国的利权全都放弃了也不足惜。还要尽早同苏维埃俄国握手言欢。”日英同盟业已解除，我国总算幸而摆脱了充当英国走狗的处境，美国恐怕根本不会让我国充当它的走狗吧，“不知对华强硬论者有无对美战争的决心？”

《东洋经济新报》正确指出，“中国的排日”运动就是日本幕末的攘夷，是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①它由此对中国共产党还逐渐有所认识。在小评论《中国共产党》^②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属于什么性质，不得而知。……最近广东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用汉、英两种文字发表的《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值得一读”，并介绍了这本小册子的反帝、反军阀的内容，指出“它的主张，值得倾听之处甚多”。“中国共产党也许是少数无名青年的组织，但不拘怎样，中国有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是不可忽视的。高山彦九郎^③在三条桥上落泪时，时人说他是疯子。然而，就是这个疯子的思想产生了明治维新”。

华盛顿会议后若干年，在不得不裁减海军以至陆军的国际压力下，“和平主义”情绪弥漫整个日本，连日本政府和军部中主张对华执行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人，一时也销声匿迹了。《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山东问题的解决——中日关系的前景和英美》^④等文章中，竟把过去的“日中”改为“中日”了。

不过，不管表面上有怎么改动，轻蔑和蹂躏中国人而满不在乎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3年（大正十二年）6月23日小评论：《中国前途如何？》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3年（大正十二年）8月4日。

③ 高山彦九郎（1747—1793），江户末期“勤王家”，上野人，和林子平、蒲生君平共称“宽政三奇人”，著有《高山朽叶集》。——译者

④ 《大阪朝日新闻》1922年（大正十一年）11月30日。

的心理却丝毫没有改变。最明显的例子是《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误杀中国工人事件——要迅速公布事实消除误解》^①。这是一篇关于关东大地震时，不少侨居日本的华侨和多数朝侨一起遭到日本官宪和民间自卫团惨杀事件的述评。这篇文章是因为看到了惨案发生以后，中国国内掀起了攻击日本政府的群众运动，中国政府准备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的情况，为了缓和这种局势才写出来的，并不是自发的反省。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无论朝鲜民族对大肆屠杀驻日侨胞的罪恶行径表示多么强烈的愤慨，由于受到总督府的镇压，愤怒的呼声也不会传到日本；朝鲜民族没有自己的政府，所以也不会提出什么抗议。所以，《大阪朝日新闻》对于屠杀朝鲜人的事一直佯装不知，而唯恐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才只报道了屠杀中国人的情况，这正好暴露了《大阪朝日新闻》的本质。这篇社论还说：

“据称，在京华侨，特别是多数行商，被误认为朝鲜人而被杀害者甚多。在那种混杂情况下，尤其还有语言不通的人，多数中国工人遭到惨祸，丝毫不容怀疑。其中可能也有行动不慎的人，但在那种混乱之中，肯定会有本来善良而一股脑儿遭到杀害的人。对于这些人实在感到不胜遗憾”。

这不是在说杀害朝鲜人是理所当然的吗？说什么中国人被误认为朝鲜人令人“遗憾”；而且“行动不慎”的中国人遭到杀害是应该的；“善良的人”受到牵连实在遗憾；这些全都是由于“那种混乱之中”和“语言不通”。一看到中国人或朝鲜人“行动不慎”，难道就可以杀害吗？

中国人民对这一行径当然要表示愤慨，而《大阪朝日新闻》却强辩说那是“误解”。还说：

在受到中国政府的抗议以前，“应该尽快表示出日本国民所

^① 《大阪朝日新闻》1923年（大正十二年）11月1日。

怀优美的同情心，安慰死者之灵，消除中国人的误解。（中略）当前若能对不幸在混乱之中遭到误杀而牺牲的人施与抚恤金，想是最好的办法。（中略）

本来，这种事件决不是表示与中国人民为敌，完全是误杀，这点想必中国人早已有所谅解，并理解到当时完全出于无奈，所以此时日本政府若能迅速公布全部事实经过，并表示遗憾，由日本主动对牺牲者施与抚恤金，不仅可以杜绝流言蜚语的宣传，还可能是一个使他们广泛彻底了解日本好意的权宜之计”。

这里连口头上的反省也见不到。对于自己极其非法地屠杀的人们，却重复说什么“抚恤”啦、“施与”啦，以此来表示所谓“优美的同情心”。这连伪善都谈不上，极不诚实，厚颜无耻透顶；说什么被杀是“完全出于无奈”、“想必中国人早已有所谅解”等，这到底是凭什么根据说的呢？而且这篇社论竟把那些对同胞惨遭杀害表示愤慨的中国人称为“专门煽动排日者”，并反脸威胁说：对此“我们还有不得不说的话”，“必须谴责他们这些排日分子”，“开导他们，消灭煽动卑劣运动的余地，这完全是中国有识之士的责任”。看来文章的作者索性甘当侵略者了。

对中国人民抱有这种想法的人，纵令有时表面上主张缓和一下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它的帝国主义本性，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有了一丝一毫的减弱。

对照《大阪朝日新闻》的这种论调，就会了解《东洋经济新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该是多么彻底啊！

第五节 批判帝国主义论的动摇

华盛顿会议前后，《东洋经济新报》的思想高度，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还是在国内民主改革的各种要求方面，都达到了近代

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顶峰。^①我认为，它不是单纯的改良，而是具有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本书对于这点不做介绍，这里仅就其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加以论述。《东洋经济新报》在华盛顿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仍然保持了高度的反对帝国主义思想。1925年初，上海、青岛等地的日本纱厂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由此发展为“五卅运动”，之后，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东洋经济新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最足以说明它的反帝思想。

在介绍《东洋经济新报》的态度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大阪朝日新闻》的态度。因为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稳健派的思想 and 观点。

1925年2月9日，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内外棉纺织厂”^②发生了四万工人的罢工运动，斗争持续到3月1日。厂方公开用暴力进行镇压，杀伤了中国工人。《大阪朝日新闻》对此分别于2月14日、19日、3月8日和21日发表了四篇社论。

第一篇社论《致在华企业家——内外棉罢工问题》说，不要殴打中国工人，现在全世界工人已经觉醒起来，“虽说中国工人非常愚昧，但也不能永远处于世界潮流之外”。今后还会发生“罢工闹事”，所以我国企业家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施展拳头政策，会引起中国工人反感”，要十分慎重。

2月19日社论的题目是《上海罢工之对策——不可空喊强硬》。顾名思义，从题目就可以推测出文章的内容。

3月8日社论《上海大罢工的教训》的结论是，“我国的企业经营者，能否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在利益面前不贪婪，为长久大计，

^① 参阅井上、渡部编《大正时期激进的自由主义》。

^② 内外棉纺织厂：原名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共拥有十九个工厂，其中三个设在日本，十一个设在上海，三个设在青岛，另外两个设在我国东北。这里是指在上海的第八厂。——译者

以从容不迫的态度经营工厂，这将关系到将来能否在中国企业界占据牢固地盘的问题”。

以上三篇社论，只是劝告日本资本家不要干得太过分了。而3月21日的社论《中国纺织业的不安——连续发生罢工事件》，“回顾了以广东政府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左倾分子，近年来把发展政治势力的方向转向无产阶级，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作者总算意识到了这次上海和青岛的罢工斗争的政治性质。但是只看到“国民党左倾分子”的煽动，却全然没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抵抗，或许是知道却佯装不知。于是笔者提出对策说，一方面，日本工厂要注意，切勿上煽动分子的当；另一方面，要清除“不可靠分子”。

对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毫不理解的《大阪朝日新闻》，大肆歪曲“五卅运动”的真相，把它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学生的闹事。原文篇幅过长，在此从略。在文章的结论部分却说，假如中国学生“妄图用集体的力量，无视现有的秩序^①，否认和推翻现在的统治势力^②”，“则只能导致中国重蹈二十五年前遭受世界惩罚^③的覆辙”。竟至暗示要实行帝国主义联合的武装镇压。^④

不过，《大阪朝日新闻》如此露骨的帝国主义主张，后来可能连它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六天后的社论《上海事件的特征及今后的对策》却说：“吾人既反对中国学生团体激进的收回国权运动的手段，同样也反对日本政治家急于求成的解决办法”。

又过了三天以后，即6月11日发表的社论《上海事件（第二次）——有无和解的方策？》说，“五卅运动”并不是《大阪朝日新闻》所说的暴力学生的闹事，上海的工商业团体、资产阶级也都参

① 所谓现有的秩序，即指帝国主义秩序。

② 所谓现在的统治势力，即指外国帝国主义和卖国的官僚军阀的势力。

③ 所谓世界惩罚，即指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

④ 《大阪朝日新闻》1925年（大正十四年）6月2日社论：《上海暴动——各国共同的问题》。

加了。他们连续开展了不屈不挠的罢市斗争。社论对此以举手认输的姿态抱怨说,无论如何,首先总得“让它取消罢市宣言,安定人心”。

以上属于当时日本社会上的一般反应。其中《东洋经济新报》在《上海日本纺织业的罢工》^①一文中批判了日本纺织联合会的决议,正确指出:“我国资本家把这次事件的起因仅仅归咎于外部的煽动。这种态度,不得不说他们今后根本没有在海外经营事业的资格”。在《青岛我国纺织厂的罢工》^②一文中也谴责了在华日本企业压迫中国工人的罪行,告诫人们不要认为罢工是由于外部的煽动。

对于“五卅运动”,《东洋经济新报》也提出了正确看法。它在《关于排日和发展对华事业的对策》^③一文中说:“五卅运动”的起因,在于我内外棉纺织厂的罢工,但“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而且是最顽强的根子是……中华民众对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民族方面对华不平等待遇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抗”。

即使日本企业是靠优秀的技术和经营而得到发展的,中国人也不那么看,而认为由于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处于有利地位的缘故。因此,在华日本企业今后要想得到发展,“首要问题是要让中国人民信服中国人的企业是和日本人的企业站在对等地位上在进行竞争。(中略)要作到这点,为了谋求我国在华企业的发展,就必须赶快修改对华不平等条约”。

如果眼界再开阔一些,要打开日本经济停滞的局面,必须就扩大原料供给和打开销路,要求实现世界范围的机会均等,至少要开辟东南亚的殖民地市场,即必须使欧美解放殖民地、半殖民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5年(大正十四年)2月21日“财界与事业”。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5年(大正十四年)4月25日“财界与事业”。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25年(大正十四年)6月13日社论。

地。而对于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之一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日本只能越来越有必要协同中国促其成功，根本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诚然，日本为此也必须自行放弃对华的既得优越地位和朝鲜的特殊地位，结果所得将大于所失。从这点来讲，日本当前也应赶紧着手制定立即修改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的政策。这才是在中国杜绝一切排日运动的唯一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日本只是出于开辟东南亚市场的需要，为了削弱欧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支持中国的反帝民族斗争，而日本自己依旧在中国占据帝国主义地位的话，那就是和头山满等人标榜的“援助中国革命党”毫无二致的帝国主义政策。《东洋经济新报》则不然，它主张日本本身不但应该首先放弃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地位和权益，而且还要解放朝鲜，放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压迫，支援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所以，这里没有丝毫帝国主义的因素，只有反帝。

由于这个原则十分明确，所以《东洋经济新报》说，日本人侮蔑中国人固然也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原因，而其侮蔑的“根源，还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人拥有治外法权及其他极不平等的优越权所造成的”，这就正确地抓住了不平等的政治结构这个根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东洋经济新报》所要求的并不是诸如要日本人进行反省或律己、不得侮辱中国人等的道德问题，而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把改善中国工人待遇当作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加以援助。因为中国工人被迫满足于当前极其低廉的工资待遇，是现在我国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尽量改善中国工人待遇，进而也是救济日本产业之道”。

《东洋经济新报》这种不仅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反对对中国工人的殖民地般的低工资制度的态度，最大限度地表明了

它的反帝思想。在这之后,《东洋经济新报》接着还把中国的“混乱”比作日本的“明治维新”,正确地理解为“产生新中国的阵痛”^①,还说,“由外部来妨碍中国独立运动的作法自不待言,对于中国的党派,如帮助甲来压迫乙的态度,切望决不要采取”^②,对于田中内阁干涉中国的内战,始终毫无保留地坚决反对^③。

当然,《东洋经济新报》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它毫不含糊地坚持整个产业资本的长远利益的观点,不拘泥于眼前暂时的损失。从《东洋经济新报》本身的表现来看,它站在摆脱“小欲”的立场上,洞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大势,寻求与其适应的道路,使其从过去就一直坚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发展,到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境界。

然而,作为拥护资本主义者的《东洋经济新报》,当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旦深刻化,它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也就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动摇。《东洋经济新报》曾经认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是最愚蠢政策,可是在1925年10月24日的社论《中国的关税会议和对我国的打击》中,却明确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粗制品占的比重大,而中国关税规定的粗制品税率却较高,而且中国本身也正在发展粗制品生产,所以中国修改关税对日本的打击,是和英美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情况本来和三年前《东洋经济新报》反对资本输出时完全相同,但现在它却说:“因此,从对策来看,也不得不说,在向中国移植我国产业的同时,发展内地的精制品工业,最为必要”,提出了与过去相反的论点,认为资本输出“最为必要”了。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7年(昭和二年)4月16日“时评”栏《不可侮辱中国》。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7年(昭和二年)4月16日“财界概观”栏《中国动乱重大》。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27年(昭和二年)6月4日“时评”:《哎!终于对华出兵》;6月4日“财界概观”:《出兵与财界》;1928年(昭和三年)5月5日社论:《无需对华出兵》;5月19日社论:《想一想阵亡者》。

在“五卅运动”之前，1924年7月至8月，《东洋经济新报》连续四期刊登了川岛清三郎的投稿，题为《朝鲜没有独立的资格》。这篇文章一开头就骂朝鲜人懒惰，过着原始的低级生活，而日本人则过于正直，不会象西方人那样觊不要脸，所以恪守兼并朝鲜时的诺言，“一味为了朝鲜民族的安宁和福利采取发展文化的政策，并一直向这个理想奋勇前进”，总之文章通篇就象朝鲜总督府的宣传品一样。文章还说，无论日本怎么努力，由于朝鲜没有任何资源，红土地质贫瘠，想增产大米也办不到。虽然朝鲜志士再三呼吁独立，但“极端贫穷的朝鲜，从国土资源来看，永久也独立不了”，“政治的目的，在于增进和维护人民的安宁幸福和自由，国家不过是实现这个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已”。在朝鲜，日本已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安宁、幸福和自由，所以目的业已达到。再要求达到目的的手段——国家的独立，“犹如满腹之后谈碗论筷一般”。

这位笔者对朝鲜人的侮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赞美，还远不止此。即使它不是出于《东洋经济新报》编辑部内部人员的手笔，但连续四期刊登这类稿件的编辑部，同那个曾经对朝鲜民族的独立斗争表示理解，用充满支援的心意评价过1919年朝鲜独立起义，指责了关东大地震时屠杀朝鲜人的“真正罪魁”是日本政府及其统治者的编辑部，令人难以置信是一个编辑部。

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当1928年6月，中国在北伐基本胜利之后，国民党政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不久即7月7日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七条“临时办法”时，《东洋经济新报》竟为此大发雷霆。

7月28日的社论《中国应先休养实力》做了如下论述：

“中国南方国民政府打倒北京政府之后的第一件事，却是突然通告各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施临时办法，这使记者为中国人民甚感遗憾”。记者自清朝以来就一直同情中国关于修改不

平等条约的要求。然而，这种条约之所以长期存在，应归咎于帝国主义列强，同时，“我们坦率断言，最大的罪过，则在于中国国民本身”。在突然采取废除条约之前，“中国应先休养实力”。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诚然，中国确实因为没有实力，不平等条约才继续存在下来。现在，中国有了足够的实力，可以单方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了。为了把这一宣言贯彻到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去，中华民族还须进行艰苦奋斗。而文章作者不站在支援中国艰苦奋斗的一边，却侈谈要先休养实力等帝国主义分子的陈词滥调。这难道是那个两年前一直热烈主张日本要抢在列强前头尽快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东洋经济新报》吗？

8月4日的社论《娇孩——中国》，又发表了如下对中国带有侮辱性的庸俗低级的帝国主义议论。

中国突然废除条约的作法，表明“中国国民对内不求休养实力，总是依赖外力，以图利己。犹如娇孩，自己虽无任何力量，但一撒娇，父母或近亲一时就会溺爱起来，于是便得意忘形，一天天地变成讨人嫌的娇孩。往事暂且不提，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显然是这样。中国利用忌妒日本向中国扩张的列强，在华盛顿或其他等地大撒其娇。结果形势变得多少对中国有利了。这次废除条约等也是那套手法，用来折磨日本，暗中可能有美国及其他各国在帮助它。中国的政治家和爱国运动者，以此外力为唯一依靠而捣乱闹事”。

这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腔调。即便署上德富苏峰的名字也未尝不可。只是在文章结尾说，各国“把中国人民当作娇孩”，而日本要有日本的坚定方针。所谓方针是指“放弃满蒙的所谓特殊权益”，强调了《东洋经济新报》的一贯主张，略微保留了还象《东洋经济新报》的影子。作者还说，“决不能允许中国政治家废除条约的轻举妄动，同时，日本也要放弃想要独占中国利益那套小气的根性，

这是作者对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殷切劝告”。

的确,后来《东洋经济新报》也没有抛掉放弃“满蒙”的观点。例如同年9月22日的社论《满铁社长的满蒙经济解放论》、12月10日的《所谓对华强硬外交意味着什么?危险的满蒙独立论》等文章,早已洞察出日本政府虽然不想吞并“满蒙”,但企图名义上使它“独立”,把这个“独立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阴谋(三年后伪满洲国就实现了),文章表示坚决反对。看来到底是《东洋经济新报》看问题尖锐。尽管如此,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是娇孩”,难道中华民族一真的宣布完全独立的战斗,就把过去的理想论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在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潮中,和其他报刊有着本质的不同,甚至堪称富于革命性的《东洋经济新报》,由于它没有跳出为日本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圈子,一旦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就难免产生上述的动摇性。在这个阶段,要想贯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哪怕是以和平自由竞争为理想的产业资本,恐怕也只能站在超出资本利害的立场上。而这种立场,这时才在日本也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了。

第四章 侵略中国的七十年

序

当我们访问中国,对过去的侵华战争表示歉意时,中国人民总是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还说:

“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年来保持了极为友好的亲密关系。只是近百年来发生了一些不幸事件,中日间历史的主流是友好的。”

我们不能一听这话就说“可不是呢”,便心安理得了。在历史

的长河里，后一百年远比前两千年具有更重要的内容。因为近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也被后来直至现在连续不断的侵略和反华的一百年历史给葬送了。“百日之功，毁于一旦”。我们只有把近一百年的侵略和反华的历史，真正作为“一去不复返”的事把它埋葬掉，永远不准重蹈覆辙时，过去两千年的友好历史才能苏生，跳过近一百年，直接同新的友好时代联结起来。那时我们才能坦然和中国人民共同高唱日中关系历史的主流是友好的。

为使这一天早日到来，首先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日中两千年的历史吧。

第一节 友好的两千年

一、交流之始

我们远古的祖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到现在的日本列岛生活下来的呢？这段历史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一万多年以前开始具有新石器和绳纹陶器的人们，是我们的直接祖先。

在绳纹文化的早期，日本业已变成四面环海的列岛。从当时的日本及其周围社会的交通手段来看，渡过大海和朝鲜半岛或大陆往来，即使并非绝对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所以，日本列岛社会，几乎有八千多年一直孤立于周围的社会，而不得不走独自的道路。因此，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速度当然缓慢。整个绳纹时代，人们始终未能摆脱渔猎和采集经济，当然也不知道什么金属器。绳纹时代的人们过着氏族制的原始公社生活。

与日本相比，中国社会则不然。它可以同大陆毗连的周围社会进行接触，因而进步颇快。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汉族人民就已经在黄河流域一带开始耕作和饲养家畜，公元前十五世纪左

右，建立了统治广大地区的国家——殷王朝。殷王朝的人们发展了青铜器，创造了文字。就是说，已完全从蒙昧阶段摆脱出来，进入文明阶段。到公元前六世纪，即继殷王朝之后的周朝末期，开始使用铁器。关于铁器的使用，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论证，朝鲜民族的祖先在辽河流域生产、使用铁器的时间比汉族还早。

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体系，建立儒学的孔子等的儒家，和同它对立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的韩非子等法家，以及其他各家的“诸子百家”，陆续涌现，中国古代文化的花朵盛开起来。公元前三世纪建立汉王朝，基本上统一了整个中国的广大领土，其势力竟扩展到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

由于受到这种汉族文化巨大潮流的冲刷，蒙昧的日本社会也进入文明阶段。公元前三至二世纪，随着比绳纹陶器烧制技术更高一级的弥生式陶器以及水稻种植和金属器（主要是青铜器，一部分是铁器）等而产生的新文化，可能是从南朝鲜传到了北九州地区。到底是从北朝鲜沿半岛南渐的文化，进而传到了日本呢？还是从中国江南地区渡海传到济州岛和南朝鲜的呢？还不能最后肯定。但如果只就水稻而言，从北朝鲜南传至日本的可能性极小，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可能是从江南经南朝鲜而传到北九州的。

这种新文化，并不是北九州人到南朝鲜去摄取来的，而是南朝鲜人将新文化带到北九州的。不过，并未形成民族的迁徙，他们的文化立即取代了绳纹文化，但从种族方面看来，外来的人被原来的绳纹人同化了。

以前把日本社会同朝鲜、中国隔绝开来使日本处于孤立的深渊的朝鲜海峡，这时变成了向日本社会不断输送新血液和新文化的通路。日本社会从此有了生气，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公元一世

纪前后,水稻耕种和金属器的使用,从北九州通过山阴^①、山阳^②,传播到近畿,又从近畿发展到伊势湾沿岸,到公元一世纪后半期,便普及到了关东地方。

在北九州等先进地区,原始氏族公社的族长转化为统治者,出现了小型“国家”的萌芽。公元一世纪后半期写出的中国史书《汉书》载:“夫乐浪^③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里所说的倭人,即指日本人,这是记载日本社会最早的文献。到公元57年^④,倭奴国的使者,经乐浪千里迢迢来到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后汉王朝首都洛阳,领到汉王朝皇帝赐予的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⑤。江户时代,这颗金印在现在的福冈县志贺岛发掘出来。

这些“倭国”是族长统治下的规模很小的“部落国家”,到了公元三世纪中叶,出现了把二十八个倭国“征服了”的“邪马台国”。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中国魏王朝首都洛阳派遣使节,贡献“生口”(奴隶)和有斑纹的麻布,并蒙赐予“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以及各种丝绸、大刀、铜镜等物。

二、文明之师

邪马台国究竟位于日本的北九州,还是近畿的大和?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还没有肯定下来。北九州之说在学术界占多数,但

① 山阴:全称为山阴道,包括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等八国,今属日本的中国地方日本海沿岸地区。——译者

② 山阳:全称为山阳道,包括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等八国,今属日本的中国地方濑户内海沿岸地区。——译者

③ 乐浪:汉王朝在北朝鲜的统治地区。

④ 公元57年即中国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译者

⑤ 金印,二、三公分见方,厚零点八公分,蛇形纽,阴文篆书。它同在我国云南省晋宁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滇王之印”,在金质、雕刻方法、字形、蛇纽等方面都非常相似。——译者

大和地区出现的国家，也必定经过类似“奴国”或“邪马台国”那样的发展阶段。到五世纪初叶，这个大和倭国已经发展成为统治日本列岛主要地区的国家，其势力从北九州一直扩展到关东地方。它的最高君主——“大王”，可能就是天皇家族的祖先。在这之后的中国文献中所说的“倭国”，均指这个国家。

公元421到478年间，倭王赞、珍、济、兴、武五代，连续向中国南朝的宋王朝^①朝贡，以宋王朝的“使持节”^②的身份，受命统督倭及南朝鲜五个小国^③的军事，被授予“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称号。现在学术界多数人推测，这五代倭王即相当于仁德(或应神)、反正、允恭、安康、雄略等五代天皇，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在此期间，从朝鲜和中国相继传来先进的农耕、铁和铁器、丝绸、各种工矿业、土木的技术和工具、养蚕、家畜的种畜及其繁殖方法，这些方面的技术人员也陆续来到日本。和这些技术关系十分密切的数学知识当然也随之传来了，也一定有替倭王起草寄给中国书信的人，最初可能是从朝鲜来到日本的朝鲜人。据《日本书纪》^④载，应神天皇的皇太子首次跟朝鲜学者王仁学习了《论语》，由此学习汉字、汉文和儒学的日本贵族，也可能日渐增多。在此期间，地方豪族之间也有使用文字——当然是汉字的例子，同时，还出现了用汉字的音训来记载日语的萌芽。

这样，到了五世纪左右，日本社会确已进入文明阶段。这完全多亏了朝鲜和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些老师，日本或许公元以后还不

① 南朝的宋王朝：南北朝时刘裕在今南京建立的王朝，公元420—479年。——译者

② 使持节：守卫边境的军政官名。

③ 指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五国。——译者

④ 《日本书纪》：原称《日本纪》，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是日本最初的编年体正史，从神代记述到持统天皇年代。当时执笔者多半留学长安、洛阳，在唐朝太学留学多年。全书用汉文写成，并采用了唐以前中国正史的《本纪》、《表》等体例。——译者

得不很久停滞在蒙昧阶段。

日本在这一阶段，不仅在文化方面完全被包括在中国文化圈内(当然，日本有独自的神祇信仰和风俗)，而且在政治方面也被纳入了中国王朝的势力圈内。邪马台国女王和五代倭王对中国皇帝的臣属关系，足以证明这一点。

然而，倭王“武”死后一个多世纪，圣德太子摄政时期，曾于公元607年派遣使臣前去隋王朝，所持国书内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在翌年的国书中又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由此可见，日本力图站在同中国王朝的对等立场。隋王朝对此甚感不悦，仍把日本看作藩属。此后，经过奈良时代直到平安时代前期，前后共约三百年间，日本向隋王朝以及后来的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达十四次。中国仍然把日本来使看作藩属的朝贡使。不过，这些遣唐使到中国去并不是为了请求中国皇帝承认日本天皇的地位，或请求加封等，而是为了通过友好往来，汲取中国的文化，日本实际上已自立于中国王朝的政治势力以外。

这时，六世纪，佛教从朝鲜传入日本，不久佛教便占据了国教地位，超过了自古以来的神祇信仰。这种佛教业已汉化，而且还增添了朝鲜的色彩。随着佛教而来的是建筑寺院以及制作佛像、佛画、佛具等技术，这就一举提高了日本人的造型美术、冶金、铸造、建筑、工艺等各方面的水平，还培育了日本人的哲学思想。

遣隋、遣唐使的船队，一般由四艘船只组成，每次都有二、三百名留学生随行，除大使外，加上留学生、水手等，约达五百人左右。航海是个拼命勾当，往复很少没有遇上因风漂流或沉没的危险。古代的贵族宁肯冒着这种危险和困难，也要同中国友好往来、汲取文化。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始终没能回国，在唐王朝度过一生，著名的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的一个。长安总是住着很多日本人。也有许多和尚由唐王朝来到日本，在奈良建造唐招提寺，把戒律首次传给日

本的鉴真和尚等人便是其中之一。

“大宝律令”等一些古代法制，也是效仿唐王朝的。奈良的都城——平城京，是照长安的原样的四分之一的大小建筑的，排列在那里的宫殿和贵族宅邸，都是红柱、白壁、瓦顶的唐王朝建筑的翻版。学术则都是直接引进的中国各派佛教哲学和儒学。所谓教养，首先就是认识汉字、缀写汉文。音乐也是唐王朝的。日本最初的货币“和铜开珎”^①并不是由于当时日本经济上的需要而铸造的，而是效法唐王朝。所以无论政府怎样鼓励使用，也没有流通起来。这种货币，在中国现在的西安(过去的长安)出土了，或许贸易上使用过它。

三、蒙古的进犯和丰臣秀吉侵略朝鲜

平安时代前期公元894年，古代贵族已经没有活力，停止了派遣遣唐使。从那时起直到明治维新近一千年间，日本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往断绝了。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次往来，即公元1401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从明王朝皇帝接受“日本国王”的称号，在致明王朝皇帝的国书中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他如此奉承明朝，是为了贪图特许贸易的利益，从政治体制来看，幕府并没有臣属于明朝，因此，这种情况只以足利义满而告终。

在日中两国政府关系断绝近一千年里，在两国关系上发生了两件政治、军事上的大事。

首先是公元1274年(文永十一年)和公元1281年(弘安四年)元朝两次进犯日本。众所周知，这两次都由于日本借助暴风雨而英勇奋战，元军立即被击退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这时是由中国方面企图侵略日本的。而且侵略者的主体是征服了中国

^① 和铜开珎：公元708年因武藏地区献天然铜，改元和铜。珎字是“宝”字的简体，也有珎为“珍”字异体之说，因此在日语中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译者

汉族王朝的蒙古族，不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这两次所以都能轻易地击退了元军，也未尝不是由于被迫充当元军部卒的汉人和朝鲜人抵抗了元朝的缘故。毫无造船和航海知识的蒙古人，要想越海侵略日本，只好动员刚刚被他们征服的汉人和朝鲜人，但汉人和朝鲜人内心不服元军，船只也造得粗糙，所以一遇上台风就立即坏了，残存在船上的船员们，也就赶快调转船头仓皇逃跑了。就是说，日本人当时客观上得到了汉人和朝鲜人的搭救。

其次，和元寇来犯相反，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经两次(公元1592~1593年，即文禄2年，1597~1598年，即庆长三年)企图进攻明朝。两次都是丰臣秀吉首先入侵朝鲜，主要由于朝鲜人民的力量，部分由于朝鲜得到了明朝的援助，以致遭到了惨败。这是丰臣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

消灭丰臣政权、当上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德川家康，曾经谋求同明朝恢复邦交，但未成功。不过，明朝(后为清朝)的商船频繁驶来日本。日本锁国之后，幕府在长崎的一角设立了唐人馆，允许清朝人暂时住在那里，经营有限范围的贸易。

四、交流中发展的民族文化

除了蒙古进犯日本和丰臣秀吉试图侵略明朝以外，即使在日中两国断绝政治关系期间，也绝不意味日中双方处于敌对关系。直到德川锁国之前，日本人只要有意志、能力和机会，他们就能够渡海到中国去，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在不断地发展。九州一带的领主们与中国商人自由地开展贸易活动；十三世纪镰仓时代，每年从日本开往中国浙江方面的商船，达四、五十艘。由他们从中国输入的大量中国铜钱，在日本国内广泛流通。这种两国人民的自由往来，一直持续到锁国之前。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也出现过时而是和平商人、时而又是海盗的日本船队，在朝鲜和中国沿岸一

带进行骚扰。朝鲜和中国方面视为倭寇加以防犯。然而中国人和朝鲜人却从未骚扰过日本沿岸。

在此期间，中国的茶树栽培法从宋朝传入日本。大豆也是从中国传来的，因而豆酱、酱油和豆腐的制作技术也是八世纪僧侣从中国学来的，到了中世纪，日本人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生产技术。砂糖也是中世纪末叶输入日本的。大部分蔬菜也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由中国传来的。这样列举起来，不难看出，日本人的食品，从主食的米面、副食的蔬菜，到必需的调味料，以至茶叶等等，总之除了渔猎取得的食品以外，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

在宗教、学术和艺术方面，九世纪以后，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逐渐得到发展。假名文字的发明，就是典型的代表。古代属于中国文化圈各民族当中，日本人最早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在佛教方面，净土真宗和日莲宗也是日本人独创的。在绘画方面，平安时代产生了“大和绘”^①，镰仓时代的雕刻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总之，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自已的独创。然而，正如真言宗和天台宗两大派别是空海和最澄在中国学到的，禅宗也是由中国传来的，在佛教方面中国的影响仍然很深。与假名文字相比，汉字仍占主流，在学术方面，汉语经典的佛教哲学、儒学及其他汉学一直占压倒优势。

尤其是儒学，在近代的幕府各藩，具有国教的地位，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还普及到农民和市民的上层。凡是要求取得知识和教养的人，首先必须学习儒家经典，不懂汉字和汉文是不行的。儒家的道德还渗透到那些不识字的民众中间。近代日本的儒学和中国儒学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它同中国儒学并无本质区别。日本人还广泛学习诸子百家学说，包括中国的历史和诗文在内，汉学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教养的基本内容。

^① 大和绘：即日本画。——译者

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博物学等，大都是由中国传来的。美术、工艺方面的陶瓷器、水墨画和书法等，同中国的关系尤其密切，围棋、象棋也是由中国传来的。

然而，统治近代日本教育、思想的核心——儒学和汉学，基本上是为幕府、诸藩和武士阶级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因此，随着或多或少反对封建制度的农民、市民的社会势力的发展壮大，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国学和兰学兴起，与儒学和汉学对抗起来，不久，前者压倒了后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家和日本人醉心于西方，过去对中国的尊敬，一变成为侮蔑，很快又发展成为对中国的侵略。

第二节 对欧美的从属及对朝、中的侵略

一、日本与中国分道扬镳

十八至十九世纪，当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征服了亚洲国家各个民族，逼近清朝统治的中国时，曾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四千年悠久历史、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文明国家之一的地位的中国，无论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以至在政治、军事方面，都已经完全被西方赶超过去了。

1840~1842年英国蛮不讲理发动的鸦片战争，一下子暴露出中国这个古老大国已经变得极其腐败无能。从此以后，中国很快被从南面压迫上来的英国和从北面入侵的沙俄打头阵的欧美列强变为半殖民地，中国边境的广大领土遭到瓜分。

同一时期，日本幕府及诸藩的封建统治体制，也由于经济和社会上各种矛盾的激化，正在从内部崩溃。正当幕府等被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吓破了胆，面对西方束手无策时，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提督培里率领的舰队开进了江户湾，转年，不容分说地迫

使幕府缔结了亲善条约^①。随后,美、英、俄、荷、法五国,又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②,从此日本就被纳入了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市场。

就这样,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划为半殖民地。然而,日本人民在培里来航后十五年的1868年,打倒了幕府,接着1871年废除各藩,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向着民族独立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在此期间,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却更加深化了。

中国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抵抗,并不比日本人民软弱。公元1850~1864年长达十五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清朝统治和欧美列强侵略的农民战争,在日本并没有多少能和它相比拟的人民革命起义。尽管这样,为什么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越来越严重,而日本却能经过维新走向了自立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想就与此有关的两个问题谈一下。

其一,公元1861年,太平天国军占据上海一带,清政府却借助英法军队对其进行镇压。亲眼目睹这一事实的高杉晋作指出,清朝依靠外国军队来镇压本国人民的叛乱,是亡国的根源。

其二,高杉晋作的契友久坂玄瑞,可能受到了高杉观感的启发,在他1862年的著作^③中说,英法之所以不对日本进行武装侵略,“可能是因为中国的长发贼(太平军)声势浩大。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了,英法必然寇侵我国”。事实上,当太平军在上海地区

① 指1854年3月31日日美两国全权代表缔结的《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最早缔结的一个近代国际条约。该条约于1855年2月21日在日本下田完成了批准换文手续,正式生效。——译者

② 指1858年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国大不列颠国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国鲁西亚国修好通商条约》、《日本荷兰修好通商航海条约》和《日本国法兰西国修好通商条约》。因为当时日本的年号是“安政”,所以这五个条约也称作“安政五国条约”。——译者

③ 即《解腕痴言》。——译者

被迫失败后,1863年,英国东洋舰队就悍然攻击了鹿儿岛。

高杉的观察道破了中国半殖民化所以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的日美安全条约,把日本人民的革命内乱看作外国的“间接侵略”,准许美军出动镇压。一百一十年前高杉晋作对清朝的批判,满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批判日美安全条约。

二、“从朝鲜和满洲取得补偿”

久坂玄瑞的话里含有比他自己所想的更加深刻的历史真理。当日本开港的时候,公元1856~1857年,在波斯^①发动了以巴布教徒为主的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1857~1858年,印度士兵在印度掀起了反英民族大起义。英国虽然把起义镇压了下去,但对它过去那种一味掠夺、分毫不舍的殖民政策和亚洲政策,也不得不因此而有了某种程度的收敛。

接着,英国就碰上了太平天国。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总结了亲身体会后,1863年写了《大君之都——旅居日本三年记——》一书。书中写道:“亚洲任何民族,不经过顽强的反抗,决不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亚洲人即使在战场上败给西方,也决不停止抵抗,只不过是改变战斗的形式而已。因此,英国的对日政策必须慎重。”日本之所以得以摆脱了殖民地化的命运,是由于得到了迫使英国采取“慎重”政策的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斗争的大力支援^②。

可是,幕府末期的志士和明治时期的统治者们,根本没想同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来对抗欧美对亚洲的侵略。甚至看到清政府软弱可欺,便一面搞妥协、屈服于欧美,一面企图侵略朝鲜和中国,用来作为屈服于欧美的补偿。桥本左内、吉田松阴等当时思

① 波斯:现在的伊朗。

② 详见拙著《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

想界颇有名望的人物，就是这样主张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1855年(安政二年)，吉田松阴在寄给他哥哥的信中提出了《同志的一致意见》。其中写道：

“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与沙俄、美国亲善已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严守条约)，敦厚信义，乘机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

吉田松阴的这种想法，由他的门徒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通过明治政府一步步地付诸实行了。公元1868年(明治元年)取代了幕府的天皇政权，从平定东北各藩的反抗斗争那年年底开始，以木户孝允为中心的领导阶层急不可待地拟定了征服朝鲜的计划。虽说这个计划未能立即实现，但公元1870年，日本明治政府即开始同清政府谈判正式建立邦交和缔结通商条约问题。这次谈判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同朝鲜的“上国”——清国之间建立平等的邦交，把朝鲜按低于日本的国家来对待制造根据。

在当时的日中预备谈判中，日本全权柳原前光对李鸿章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①李鸿章相信此言，并说服清政府订约，于是转入正式谈判。但柳原前光说的却是一派谎言，日本不但毫无和中国同心合力的意思，反而帮助欧美侵略中国，以分沾余唾。1870年6月，当英法以天津的传教士被杀事件为借口，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时，日本政府就对驻日英法公使说，日本愿意向远征军提供食品、燃料以及日本办得到的援助。

在正式谈判日中条约时，日本最初提出的方案，要求日本与欧美一样享有单方面的治外法权和关税协定权等特权，是一个不平

^①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1卷，第31页。
——译者

等的条约。清政府看后大怒，便提出了中国的方案。其第二条指出，两国既经通好，自应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等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①这也可以理解为日中两国的政治同盟。日方生怕这样一来会被欧美怀疑两国同盟，表示强烈反对。于是中方嘲笑日本说，“若以迹类连横，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臣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②于是日方把《中日修好条规》第二条解释为不过是作为友好国家对平时的细微纷争加以调停而已。1871年7月，条约正式签订。

这是一份奇妙的“平等”条约。日中两国都互相享有治外法权和关税协定权。当时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侨居的中国人，所以这一规定实质上就等于只有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这就是日本的着眼点。英美法等驻日公使对于条约的第二条内容立即提出了强烈抗议，谴责日本政府违背了过去向公使们作出不与中国结盟的保证。日本政府一面辩解说，第二条绝无同盟之意，同时又重新同清政府交涉，争取在条约批准以前删除第二条。清政府不答应，日本也就只好批准了。

三、“征韩论”和出兵台湾

日本从同中国建立邦交以来，一直就没有遵照条约规定实行平等互利和相互合作，一味争取欧美列强的支持，想在中国享有优越地位。

不仅如此，在批准条约的交涉过程中，日本得知琉球人漂流到

①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1卷，第45页。
——译者

②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1卷，第43页。
文中的“伊大臣”即日本当时的大藏卿伊达宗城，时为来中国议约的全权大臣。——译者

台湾被土著人杀害了以后，日本政府便以确保日本“属民”的安全为借口，拟定了《台湾“蕃”地征伐要略》^①。为此，还接受了美国驻日公使德朗的指导，并经公使推荐，聘请美国退役少将李仙得为外务省顾问。李仙得曾于1867年率领美国军舰征讨台湾，1872年充任厦门领事，在归美途中来到日本。他正式当上日本外务省顾问后，便辞退了美国领事的职务（1872年11月）。

不久，西乡隆盛等人鼓吹的“征韩论”，便成了当时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主要目标，出兵台湾的计划遂被搁置起来。可是，众所周知，从西欧回国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人反对立即征韩，西乡隆盛等征韩派被排挤出政府以外。转年即1874年，以大久保为中心的日本政府准备强行进攻台湾。这当然要引起领有台湾的清政府的强烈抗议。大久保利通以全权大使身份亲赴北京，与清政府交涉，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同清政府达成和解。

这次日中谈判达成妥协，全靠驻北京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斡旋。大久保利通的日记里载有威妥玛对他的谈话：日本不要染指台湾，而应向朝鲜扩张。若这样做，英国将首先支持日本。在大久保利通从北京回国后还不满一年，即1875年（明治八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便非法侵入流经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河口，挑动江华岛的朝鲜炮台开炮，促成两方交战。大久保政府立即捏造说是朝鲜非法攻击了日本军舰，威胁朝鲜政府，转年1876年2月，迫使朝鲜接受了第一个日朝“修好条规”^②。

根据这一条约，朝鲜首次向日本开放，但只有日本一方具有治外法权，根据条约附属的《朝日通商章程》，规定日朝两国间的贸易

①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65页。
——译者

② 即《日朝江华条约》。——译者

进出口“暂时”都不征收关税，并规定日本的通货（包括纸币）可在开放港口自由流通。日本迫不急待地把不平等的高压条约强加于朝鲜，迈出了侵略朝鲜的第一步。这也是日本充当英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凭武力撬开了朝鲜锁国之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在1970年11月说过：“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经常是以强大的帝国主义为后盾而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的”。事实上，日本最初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就是以美国为后盾，侵略朝鲜则是靠英国的后援搞的。特别是英国，自从日本开放港口以来，一贯想把日本当作英国对抗沙俄在远东地区的前哨基地作为它的方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怂恿犬久保利通侵略朝鲜，也是为了利用日本来防止俄国向朝鲜扩张势力。

如前所述，最初的日朝条约虽然是日本压迫朝鲜的不平等条约，但其第一款里却规定：“朝鲜国是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①。其意义在于表明朝鲜不是清国的“属国”，用来防止将来清国反对日本统治朝鲜。

四、主张联合的民权派

从此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政治、经济侵略与年俱增，朝鲜对日本的反抗当然也愈来愈强烈。过去一直把朝鲜作为朝贡国的清政府也没有沉默。为了镇压朝鲜民族的反抗运动，为了准备应付因统治朝鲜而同中国发生的战争，日本从1880年就已经开始倾注全力扩充军备。

日本政府就是这样坚持推行了一条一面屈从于英美，一面又从对邻国的高压中取得补偿的路线。但在民间，当时自由民权运动正在发展。运动的宗旨是在国内要完成自由民权革命，在国际

^① 《日朝江华条约》，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35页。——译者

上要联合朝鲜和中国来抵抗西方对东方的压迫。

例如,对于日本政府要强行吞并琉球王国的企图,民权派报刊《近事评论》指出,如果琉球人民希望自治,日本应努力培育这种萌芽,抢在世界前头承认它的独立,这样来向世界表明强国不得欺凌弱国、大国不可吞并小国的大义。这是日本争取独立之道(1876年6月)。在日中两国围绕琉球归属问题发生对立的1878~1881年,《近事评论》一直批判日本政府一面屈服于俄英等国,一面又对朝中采取高压政策的作法;主张日本应该“合纵亚洲,防遏欧美的势力”,决不可同自古以来唇齿相依的中国打仗。以青年贵族西园寺公望为社长、中江兆民为主编的《东洋自由新闻》也持同样的观点。

1882年,朝鲜士兵和汉城群众举行起义,反抗日本的压迫和剥削。日本立即出兵镇压,还向朝鲜政府索取“赔偿”,并迫使朝鲜承认日本有在汉城驻扎若干军队的权利。于是,以朝鲜宗主国自居的清政府,便出兵朝鲜对抗日本。日本政府大肆煽动日中开战热潮。自由民权派对此一致反对,主张要同朝鲜和中国保持友好。改良主义的改进党最高领导人小野梓也反对日本向朝鲜索取赔偿和进行压迫,极力主张朝、中关系应让朝鲜人自己来决定,日本不应干涉;当务之急是,日本、朝鲜、中国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欧美。

然而,这种国内民主革命和谋求日、朝、中三国联合起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终告失败。围绕朝鲜问题的日中势力之争逐年激化起来。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舰队,7月29日,日本陆军又在朝鲜的牙山和成欢袭击了中国的陆军,三天以后的8月1日,日本政府才正式向清国宣战。

当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进行袭击的前九天,7月16日,在伦敦签署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英国对日治外法权。当时英国外相发表演说指出:“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

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①，明目张胆地支持和煽动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日本政府因此才决心开战。这正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所说的：日本“以强大的帝国主义为后盾”，开始侵略中国。

第三节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

一、和西欧划等号的特权国

甲午战争时，清政府的主流派几乎没作任何准备。具有四千多年悠久历史、幅员辽阔而强大的“中华”帝国，曾经是亚洲的文明中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清朝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实力业已衰竭，仍然把日本看成是一个迎合西洋、狂妄自大的小国。所以他们万没想到“小”日本竟敢向“大”清帝国挑战，以为即使日本敢于冒险，也不堪一击。

清国因屡遭西洋侵略，也认识到必须加强军备，拥有现代化武器和舰船，1883年以来，清政府声称为了购买十几艘军舰，向人民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但掌握国家实权的清国皇帝母亲——西太后，并没有用这笔款去购买军舰，而是以此修建了穷奢极侈的游乐园地——颐和园，寻欢作乐。清国方面认真参加甲午战争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军阀。

日本为了准备这次战争，在军事方面自不待言，在政治、外交方面，以至在动员国民思想方面，都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充分准备，因而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根据在日本下关缔结的《马关条约》^②，规定：（一）、中国要完全停止对朝鲜的干预；（二）、将辽东

^①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60页。——译者

^② 下关：又叫马关，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我国通称《下关条约》为《马关条约》。——译者

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三）、赔偿日本战费三亿日元；（四）、缔结新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及其他协定，规定日本在中国享有与欧美各国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五）、承认日本臣民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有自由兴办各种制造业的权利，以及资本输出的自由和各种免税等，连欧美各国都没有享受的特权。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侵略朝鲜可以不受清国妨碍，同时还确保了日本在中国与欧美列强享有同等特权的地位。至于割让辽东半岛，众所周知，只因受到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才不得不死了心，但却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此外，《马关条约》中虽然没有谈到，琉球列岛（日本已经把它划为冲绳县）的归属问题，最后却作为日本领土在国际上确定下来，这也是甲午战争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清政府也曾提出自己对琉球的领有权，与日本进行过争夺。还有，当前争执的“尖阁列岛”^①，本来是中国领土，但日本却乘甲午战争胜利之机，私自作为日本领土划归冲绳县了。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是一个对朝鲜拥有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国，但它的国际地位，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遭受西方压迫的亚洲小国。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虽然还具有受西方压迫的一面，但它基本上已变成一个与西洋享有同等特权、压迫朝中等亚洲国家的殖民帝国。而且《马关条约》开辟了西洋列强竞相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取得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及各种免税等特权，也立即为欧美列强所均沾。《马关条约》规定的这一条款，与其说是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莫如说是为了唆使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英国资本而规定的。清国为了向日本偿还其财政万难负担的巨额赔款，不得不向沙俄、德国、法国、英国等列强借款，因此，清国在金融方面

^① 所谓尖阁列岛，实指中国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系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不属于琉球。——译者

也成了西方的附属国,从而也就加深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

二、宫崎滔天^①和孙中山

尤其是日本一提出迫使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就引起欧美列强不再象以前那样只掠夺中国的边境一带,而且还企图到中国内地占据租界及其他方式的领土扩张。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干涉,当然不是为了维护清国,而是为了三国自己要占领中国的辽东半岛及其他地区。于是沙俄“租借”辽东半岛的尖端、旅顺大连地区,德国“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也不甘落后,占领了威海卫。列强进而陆续夺取了经营矿山和铁路的利权。

日本非常焦急。屈服于三国干涉的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首相说:“由于这次战争,我们熟悉了辽东的地理情况,将来设法在朝鲜某处制造事端,把辽东夺回来吧。”政府以“卧薪尝胆”的口号煽动国民的沙文主义情绪,来报三国干涉的仇,向人民横征暴敛高出战前好几倍的重税,倾注全力扩充军备。尤其把沙俄视为头号敌人。因为沙俄是三国干涉的罪魁,而且当日本刚刚把清国赶出朝鲜的时候,俄国就把自己的势力伸到了朝鲜。日本急于独占朝鲜,甚至做出诸如袭击并杀害不听日本摆布的朝鲜王妃之类的事情,致使朝鲜统治者去仰赖沙俄,于是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便逐渐被俄国所压倒。

日本既然从一个受欧美压迫的亚洲小国,变成同欧美竞相压迫剥削朝鲜和中国的殖民帝国,那么所谓日、朝、中联合起来对抗欧美帝国主义,或者亚细亚主义等,便失去了现实基础。这种日朝中的反帝联合或亚细亚主义的主张,只有在反对日本本身的帝国

^① 宫崎滔天(1871—1922):日本熊本县人。原名虎藏(亦叫寅藏),号白浪庵滔天,以滔天之名著称。——译者

主义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是真实的。如果不反对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仅仅反对欧美的侵略，那么这种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只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来对抗欧美帝国主义，而自己却在亚洲扩张势力的一种政策。

事实上，甲午战争以后，在“亚细亚主义”和“解放东亚”等名义下，日本“大陆浪人”和“支那浪人”的活动十分猖獗，其中大多数是同日本陆军和一心想向朝鲜、中国扩张的三井等大官僚资本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支别动队，真正希望中国人民从清朝专制和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只有宫崎滔天。即便是这个宫崎滔天，也不得不跟头山满和犬养毅等人一致行动，客观上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圈里的人。

在清国，由于万没料到大败于日本，于是连腐败透顶的朝廷也不得不考虑改革了。在此之前，民间文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非常注目日本明治维新及以后的迅速发展，提倡以日本为榜样，改革制度(变法)和强化国家(自强)。甲午战争以后，他们的意见才达到朝廷，眼看就要实行变法，却立即遭到西太后等极端反动派的反击，改革派被赶出朝廷，康、梁亡命来到日本(1898年)。这些清廷的改革派及康梁等人，并不是对打败了自己的日本煽动复仇情绪，而是想从日本“取经”。这本是日本谋求同中国友好合作的好机会，但是，别说日本的统治者，就连那些亚细亚主义者，也根本不想当个清国改革派的真正的朋友。

曾在夏威夷、香港等地受过近代教育的农民子弟孙中山，和康有为等旧文人不同，早就立志革命，不想改革清廷。甲午战争爆发前不久，1894年，他在夏威夷组织了“兴中会”^①，在清帝国败于

^① 兴中会：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次年设总会于香港，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1905年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译者

日本后返回香港，联合广东群众的秘密结社，策划发动革命，武装夺取广州，因失败而流亡日本。从此，他打倒清朝的决心愈加坚定，后来由美国前往英国。1897年（明治30年）8月，孙文又从英国来到日本。这时认识了宫崎滔天，而且开始与头山满、犬养毅等人交往。

只要一听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革命就毛骨悚然的日本政府和政党的首脑们，对于想要改革、强化清朝的康有为等人，没有予以任何支援，而对彻底的革命家孙中山，却允许他在日本自由活动，还准许与陆军和政府中的侵华积极派相勾结的头山满等人支援孙中山。这可能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如果孙中山等人的运动果能削弱清政府，对日本伺机侵华再好不过了。从甲午战争后到日俄战争前后，中国各地的留学生纷纷来到日本，据说最多时超过一万人。^①后来的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派的领导人，很多是从他们当中培育出来的。

三、英国的宪兵

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必然加剧中华民族的普遍反抗。最初的表现是，1899~1900年，中国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义和团武装起义。英、俄、法、德、奥、意、美、日等八国组成三万三千人的联军，镇压了包围北京外国使馆区的义和团。日本出兵两万二千人，相当于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由此在国际上得到证明，为了保卫帝国主义的利益，镇压中国反帝民族斗争，只有日本能够迅速调动大军。英国对此大为赞赏。

趁着这次事件的机会，日本和其他列强又从中国攫取了新的

^① 参考实藤惠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见《何谓日中关系？》，朝日新闻社编，第113页。

帝国主义利权,其中包括借护卫北京公使馆之名,可让少量军队驻扎在北京的利权。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就是凭这个利权把司令部设在天津的部队。

同时,趁列强各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北京之机,日本急不可待地向厦门派遣舰队,并从台湾调动陆军,企图占领中国福建省,但是,还没等陆军开到中国,就遭到了英国的严重抗议,日本政府便慌慌忙忙停止了占领计划。通过这次教训,日本的政治家和将军们认识到,无论日本具有如何方便的地利条件,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援,单枪匹马侵略中国是办不到的。

日本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寻求同盟者。因为与日本对立的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俄国,所以日本便同俄国在亚洲的对头——英国结成了同盟(1902年)。于是日本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在远东的宪兵,可以在英国的支援下,同俄国在朝鲜和南满争夺霸权。1904年2月,日本的联合舰队在旅顺口外和仁川海面袭击沙俄舰队,三天以后才正式宣战。宣战前的袭击和十年前甲午战争时以及后来偷袭珍珠港的作法一样,是大日本帝国的惯用伎俩。

日本得到了英美,特别是英国在政治上财政上的大力援助,才胆敢发动日俄战争。日本耗费约十七亿日元的战费中,就有八亿左右是从英美资本家手里借来的。因此,日俄媾和条件也不得限于英美允许的范围。日本要求俄国承认日本独占朝鲜,割让库页岛南半部,并把沙俄从中国夺取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的一段铁路连同一切支线(日本称之为南满洲铁道)及其附属一切权利均转让给日本。^①

从此以后,日本完全统治了韩国(1910年吞并),“满洲”南部

^①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201—205页。——译者

实际上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进一步威胁清政府，攫取允许日本驻扎军队守卫满铁的权利及若干新的利权，并以所谓《秘密议定书》规定：中国政府同意不在满铁附近修筑并行干线及有损于该路利益的支线；中国政府说明，在东三省地方兴利除弊，认真整顿，使住在该地的中外（日本）商民得安居乐业，同享中国政府的妥实保护等等。^①这就为日本进一步侵略满洲，恣意干涉中国内政打下了根基。

而且，日本变朝鲜为殖民地，也是日美、日英瓜分亚洲的一次交易。在日俄媾和会议期间，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来到东京，同桂太郎首相订立密约，双方互相支持，即日本支持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支持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后来不久，修改日英同盟，规定日本协助英国统治印度，英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根据这些同英美的交易，才在日俄媾和条约中规定了沙俄承认日本统治朝鲜的条款。日俄媾和以后，日本进而又与沙俄缔结了瓜分满洲和蒙古的秘密条约。

根据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林房雄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1964年）中所谓“日俄战争是从欧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亚洲的圣战”，以及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些牵强附会，该是多么伪造了历史的诡辩。

第四节 对辛亥革命的干涉

一、帝国主义的优越感

日本政府和军部，不但利用学校教育，还利用报刊杂志、戏剧、广播、浪花节^②等各种宣传手段，抓紧一切机会，拼命向国民灌输

^① 所谓《秘密议定书》实为《中日全权大臣会议东三省事宜节录》，并非条约。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225—233页。——译者

^② 浪花节：是日本一种用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我国的鼓词。——译者

说,日本打败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国——俄国;现在已由亚洲的最强国跨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其实,这次战争只是由于得到了英美的援助,才勉强在日本占优势的情况下讲和的,形式上总算是日本战胜了。人民不了解真相,任凭政府和军部任意摆布,相信日本取得伟大胜利,日本已成了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甲午战争以后,不仅日本的当权者,甚至连普通的日本人也轻蔑、侮辱起中国人来了。对待朝鲜人,他们早就抱藐视态度。日本帝国主义本来就在欺压和掠夺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日本人对个别朝鲜人或中国人即使做出多么不公正、非法的事情,甚至加以侮辱,日本官宪非但不加追咎,反而百般袒护;反之,如果朝鲜人或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哪怕稍有一点点正当的抵抗,日本官宪就立即对朝鲜人或中国人予以非法逮捕和残酷镇压,因而日本民众完全被帝国主义的优越感迷惑住了,这也是不足怪的。日俄战争后的“大国”教育,使日本人对于朝鲜人或中国人,推而广之对于亚洲人的这种帝国主义优越感越来越严重,竟至牢不可破了。而且这种优越感,和头顶“万世一系之天皇”的“万邦无比之国体”这种矜夸、同“忠君爱国”的“大和魂”的矜夸结合起来了。

用这种思想教育国民取得成功,使日本统治者越来越露骨地推行起帝国主义政策来了。如前所述,日俄战争由于得到英美的援助才得以取得成功,所以日本向英美约下,日本没有独占“满洲”的企图;一定向英美各国实行门户开放,保障各国经济活动机会均等。但实际上南满驻有关东军的前身部队和借口保护满铁线路的“满洲”独立守备队,这些军队事实上霸占了南满。英美政府一再抗议说日本政府违背了前约。

元老伊藤博文等人,深知日本经济实力不足,只得依靠英美资本,所以生怕陆军独占“满洲”会惹怒英美。1906年(明治39年)5月,根据伊藤博文的要求,召开了元老和政府、军部的最高首脑会

议，确定“满洲”的门户开放，但掌握实权的军部，还是不认真执行这一决定。

第二年即 1907 年 11 月，伊藤严厉批评政府，提出警告说，日本如果不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日本将失去欧美各国的信任，结果会停止对日贷款，那时日本经济就会直接受到打击，尤其会给政府的财政造成莫大困难。他还担心：“日本在‘满洲’的利己主义政策，不仅势必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还会给第三者制造挑拨煽动的借口，难保最后不致重演同一人种的日中战争”，届时日本会遭到全世界摒弃，最后将陷于完全孤立。

到底还是创立大日本帝国的领导者看得准。然而，他所培育的畸型帝国主义和军部，已经不是他能控制得住的了。果然不出伊藤所料，从此以后日本同英美的对立与年俱增，最后竟发展到 1941 年(昭和 16 年)的 12 月 8 日。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恰恰在伊藤写出上述看法的三个月后，首次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中国同盟会

1908 年，日本渔船第二辰丸在澳门偷运武器，被中国官方扣押，日本政府认为这种作法不当，强行要求清政府立即释放第二辰丸，并陪礼道歉，收购该船载运的武器弹药，“赔偿损失”等等，清政府被迫屈服。广东商人提出抗议，并和群众一起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这一运动立即传到汉口等华中地区，当年 6 月“满洲”也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运动还从香港和马来西亚扩展到东南亚各地和澳大利亚的华侨，他们不顾清政府的镇压，把运动一直坚持到年底，给日本贸易造成沉重打击。这是中国人民大众把反帝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日本一国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孙文等领导的革命运动，经过重重困难和挫折，稳步成长起来。1905 年 7 月，当孙文第七次来日的时候，东京的三个中国革

命团体^①，在孙文的说服下，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定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所谓“民族”，是推翻满族的清朝统治，建立汉族的共和国；“民生”主要指土地革命；“民权”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

当时中国的革命运动反映出中国的复杂情况，是把外国帝国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敌人呢？还是把满族的清朝作为主要敌人呢？人们不断为这个问题所苦恼，中国同盟会在孙文的领导下，把推翻清朝确定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不是单纯的种族对抗，而是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阶级斗争被罩上了种族对立的外衣。不过，“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汉族斗争”这种思想意识，阻碍了对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的提高。

特别是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惊人发展奉为楷模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人是亚洲的先驱，作为黄种人受到白种人帝国主义的轻蔑，所以日本和欧美不同，会理解并赞同中国通过革命富强起来的。事实上，日本政界中也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支持”他们，即使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有时压制革命者，但他们还是能够比较自由地在东京进行活动，这就更加难以对日本帝国主义具有正确的认识了。但是，只要推翻清朝统治是当前的课题，这也就不会成为革命的障碍。

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几乎包罗了中国各省的人，是中国最初的全国性政党。而且它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反对清朝专制的群众秘密结社、各种形式的“会党”，结上了一定的关系。同盟会曾动员民众，在各地举行过多次革命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0日，以武昌的“新军”^②士兵为主力的武装起义终于取得成功。以此为突破口，革命浪潮扩展到全国，

① 即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译者

② 新军：清朝用汉族人民编制的新的军队。

1912年1月1日，革命派宣告建立中华民国，推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清政府讨伐革命军总司令袁世凯看到清朝已命在旦夕，便与革命军进行交易，约定以自己充当民国大总统为条件，倒戈投入革命派。因此，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宣统被迫退位，清朝灭亡。袁世凯遂接前约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三、东方头一个共和国的建立

辛亥革命一开始，日本政府就姑且确定了援助清政府的方针。陆军最高的实权派、伊藤博文死后元老中的头头山县有朋坚决不允许君主制国日本的邻邦建立共和制。可是在政府内部原敬内相等人考虑到革命军将会取得胜利，主张耍两面手法，哪方面胜利就支持哪方面，这种主张在政府内部占了上风。参谋本部为了促使中国的动乱局面闹大、拖长，以便乘机进行武装干涉，创造新的侵略机会，暗中同时向清政府和革命军两方提供武器。海军和关东都督府百般阻挠革命派，而大仓洋行和三井物产公司却按照政府的授意，向革命军提供大量武器和资金，约定革命胜利后取得长江流域的矿山和其他重要利权。

参谋本部利用川岛浪速等“中国浪人”，指使清朝皇族肃亲王和内蒙古王爷分别举兵，策划“满洲”和蒙古的独立，推行日本独占满蒙的计划。朝鲜总督府支持这个计划，驻满领事（外务省系统）表示反对，满铁当局则暗中支持革命派。最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等三方在东京进行协商，结果认为这个阴谋为时尚早便停了下来。但是，参谋本部决没有放弃了这个计划，1916年，又策划规模更大的第二次“满蒙独立”阴谋。

这样，在日本政府、军部和资本家之间，不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方针，而且各个系统内部也没有统一的政策，各个部门都各行其是，各自热衷于彼此矛盾的策略。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巨大

浪潮正在汹涌澎湃，势不可当。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根本不能从历史上全面地分析、判断中国的革命形势，只是根据军队、警察、间谍以及走情报的一小部分的“绝秘”情报，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测，来判断清政府和革命派哪方面会取胜，然后把赌注下在自己认为优势的一方。在中国人看来，通过日本统治阶层的左右摇摆，只是突出一个日本各派势力极其卑鄙的侵略野心。所以，中国的保皇派也好，革命派也好，中间派也好，对于日本哪一派势力都存有戒心，都不相信。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而且开创了中國历史上几千年来第一个共和国的伟大事业。这是亚洲首创的共和国。不过，孙文等真正革命派的力量还很薄弱，还没能把民众充分组织起来，因而只好借助袁世凯等认为清朝没有指望的军阀力量，所以，不久，革命成果便被这些野心家们所窃取，形成这些军阀割据抗争的局面，革命派不得不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中国仍然处于革命动荡的状态。

四、“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1914年(大正三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列强已无暇顾及远东。正如元老井上馨写给元老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所说的：“这次欧洲大战祸，是大正新政的天佑”，日本帝国主义欢喜若狂。他们想借此机会把统治势力推广到整个中国，便以日英同盟的义务为借口，不顾英国感到为难而强行参战，向德国宣战。日本海军立即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群岛，陆军攻占了中國山东省青岛的德军要塞，接管了该省的德国利权。

之后，日本不仅不从山东撤兵，反而增派兵力，以此为后盾，1915年1月，向中国的袁世凯总统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些要求共分五号，第一号，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

利权等共四款；第二号，把东部内蒙古和南满洲实际划为日本领土等共七款；第三号，把中国最大的铁矿、煤炭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日中合办；第四号，中国政府不准将沿海港湾及岛屿割让或租借给外国；第五号，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中国军队的武器由日本垄断供给；允许日本人在中国享有土地所有权、传教权、铁路和港口利权等，共七款。

第一号至第四号旨在割取中国的重要地区，至于第五号要求，实质上是把中国的财政、军队、警察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夺取中国民族的主权，所以在整个中国掀起了强烈的反对运动。连一向卖国的袁世凯也进行抵制，拉拢英美支援。于是日本不得不撤回第五号要求，其他条款则在武力威胁下迫使袁世凯接受了。

过去中国人曾把日本崇为亚洲近代的楷模，对于甲午战争以来的侵略行径，也尽量给予宽恕。革命派甚至期待靠日本的力量来防止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然而，“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来以后，中国人对日本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把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重新下定决心，坚决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翌年 1916 年，当中国各地的军阀举兵反对袁世凯搞帝制，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想乘机把不听日本约束的袁世凯搞下去，搞满蒙“独立”，唆使企图复辟清朝的“宗社党”和蒙古部族，在“中国浪人”和形式上退役的日本军人指挥之下，举兵闹事。为此参谋本部向“满洲”特派两名军官，其中一人是小矶国昭少佐。可是，同一个参谋本部的次长田中义一却支持满洲军阀张作霖，策划以张作霖为傀儡来搞满蒙“独立”，外务省也持同样意见。关东都督支持参谋本部第二部，但他指挥下的独立守备队长和驻满师团长却属于利用张作霖派。这种情况在军队内部早已司空见惯，更何况军队与政府之间，意见更不能统一。小矶等人想炸

毁张作霖坐的列车，把他炸死，但失败了。

这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参谋本部和政府商定，想把黎元洪搞成傀儡，于是满蒙“独立”运动完全停了下来。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是在这以后十二年（1928年）。过了三年，即1931年，关东军发动了占领中国东北“满蒙”的战争——“九·一八事变”，拉出清朝末代宣统皇帝溥仪及其旧臣，也就是—些旧宗社党的人物，拼凑了一个伪满洲国。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就是小矶国昭。可见军部是从1916年起，花了若干年工夫，又把意见统一到1916年参谋本部第二部的路线上来，基本上按照这个计划，炸死了张作霖，搞起了“九·一八事变”。

第五节 是实行经济、政治侵略？还是 采取军事高压政策？

一、“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日本，当1918年（大正七年）11月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1月，巴黎和会刚一召开，就想继承旧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并企图把凭“二十一条”从中国夺取的帝国主义利权，在巴黎和会上取得国际的承认。大战末期，中国也参加了协约国方面作战，是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的。因此，战败国德国从中国夺取的利权，理应无条件地全部归还给战胜国中国。中国的主张是正当的，但英法美却袒护日本，巴黎和会通过了日本的要求。

这一消息一传到中国，点燃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怒火。他们在愤恨协约国和日本的同时，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当时北京的段琪瑞卖国政府。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的群众提

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拒绝签订巴黎和约”、“抵制日货”等口号。

游行队伍涌进亲日派卖国贼外交总长曹汝霖的私宅时，遭到中国警察的袭击，三十余人被捕。镇压更激发了学生和市民的斗志。北京的斗争一下子变成全国学生奋起的信号，全国各地学生在工人和市民中间展开了广泛反帝宣传，号召举行罢工。6月5日，上海进入全市罢工，以上海—南京铁路工人罢工为首，各行各业的工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政治罢工斗争。北京政府只好在民众的压力下，表示屈服，6月9日作出决定，免去曹汝霖的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当28日在凡尔赛宫内举行和约签字仪式时，北京政府声明拒绝签字。过去一直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中国政府，首次针锋相对地拒绝了屈辱条约。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第一，出现了群众自觉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和反对国内反动卖国统治者的斗争结合起来了。就是说，群众对“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革命的正确目标已经有了认识。第二，广大学生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激励了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中国发生五四运动之前，朝鲜爆发了“三一”民族独立起义，这决不是偶然的。它都有俄国革命对世界产生影响这一共同因素。朝鲜民族的“三一”起义激励了中国的学生。

毛泽东说过，从此中国便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五四运动两年以后，1921年7月，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斗争取得了迅速发展。

二、“五卅”运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有严重缺点，但它还是“国民革命”的主力。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同它合作，共产党员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加入国民党。

在日本强行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时候，孙中山认为这不是由日本发起的，而是袁世凯为了让日本支持帝制而炮制出来的，仍然只顾抨击袁世凯，没有完全丢掉过去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五四运动及后来群众斗争的发展，使孙中山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孙中山发展了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规定为中华民族的反帝解放及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义，还规定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为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进行斗争的工农的利益。根据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于1924年1月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领导机构还吸收了很多共产党干部。

“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和作，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可分割的三件大事。现在，大概谁都会理解这一点，但在当时，日本的政治家、军人、官僚、学者和新闻记者等，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部分学生的反日闹事；中国共产党是充当苏联爪牙的秘密结社；国民党在广东建立的政府只是中国许多军阀政权中一个时髦的形式，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和他们所嘲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反帝斗争既不关心也幼稚无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以后，日本共产党诞生了，但它的

纲领草案中只有“从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撤出军队”，竟然连朝鲜的独立要求也没有写进去。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身上看到中华民族的新生的浪头，中国民族主义巨大潮流引起了他的重视。这种认识在当时的日本人中间是罕见的，但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工农的革命力量，甚至对于“二十一条”要求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积极地予以肯定。只有三浦铁太郎和石桥湛山主编的《东洋经济新报》，全面而彻底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直到1927年左右，一贯正确理解并支持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①

然而，不管日本统治阶层愿意与否，不久便碰上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1925年2到5月，上海和青岛的日本纱厂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大罢工，日本职员和充当日本爪牙的地方军阀开枪镇压，杀伤了好几十人。为了抗议这一罪恶行径，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市民于5月30日举行游行示威，租界巡捕开枪射击，又打死了十儿人，这就是著名的“五卅”惨案。这一血腥镇压更加激起了上海等全中国民众的愤慨。在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反帝斗争特别强烈。6月23日，当游行示威的队伍行经英法租界沙面地区珠江对岸的沙基时，珠江的英法海军陆战队从沙面开炮轰击，打死五十二人。这就更加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热情。边境外的香港的中国工人和市民也展开了大罢工和抵制英货的斗争，竟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1926年7月，广州的国民政府开始了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战争。革命军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和工人的热烈支持，10月，很快就推进到长江一线，1927年2月，逼近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华东据点——上海。

^① 参阅本书第3章。

三、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孤立

这时，日本与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正象二十年前伊藤博文预料到的，日本不仅被中国人所唾弃，而且在帝国主义阵营内也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在巴黎和会上曾经不得不同意日本方面要求的美英法，1922年（大正十一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由日、美、英、法、意、比、荷、葡和中国等参加的九国会议上，对日本发起猛烈攻击，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日本不仅把巴黎和会上通过的日本继承的旧德国在山东的利权归还给中国，而且日本一贯强调的、日本同中国接壤因而拥有“特殊权益”的主张，也被全面否定了，在“门户开放”的名义下，列强各国在掠夺中国上进行自由竞争。

结果，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日本让步、承认日本拥有“特殊权益”的《石井—蓝辛》协定也废除了。此外，从1902年以来曾经续签三次、成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国际支柱的“日英同盟”，也与日本的愿望相反，在到期后不再续约。日俄战争后通过三次日俄秘密协定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沙皇俄国，现已不复存在，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日本特别惧怕和仇恨。

就这样完全陷入孤立境地的日本，竟无视《九国公约》，企图把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和内蒙古）纳入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便于1922年4月唆使奉系（沈阳）军阀张作霖同受英国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开战（第一次直奉战争），5月又指使张作霖宣布东三省（满洲）独立。但是，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大败，日本的期望落空了。1924年9月，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时，由于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倒戈，张作霖打赢了，但冯玉祥和张作霖不同，不想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和南方的国民党秘密勾结起来。1925年11月，张作霖的部下郭松龄与冯玉祥合谋，掀起叛乱，日军马上介

人，援助张作霖击败郭军。张作霖的地位虽然姑且保住了，但日军露骨的干涉行动，点燃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反日怒火。这样一来，日本想把张作霖当作傀儡来独占东三省的企图，根本无法实现，而且从冯玉祥的举动也可看出，国共合作统一中国的形势，已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地区。

在这种形势下，上述北伐战争正在取得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胜利。英国帝国主义很快就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加深接触，企图笼络蒋介石使革命陷于流产，而日本的统治者，军部自不待言，政府和议会也都只顾考虑如何阻挡国民革命统一华北，以及如何防止革命进而扩展到东北地区的问题。当时的日本内阁是继1924年组成的护宪三派联合内阁之后的宪政会的若槻内阁，外相是币原喜重郎。在对中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尤其要把东北置于日本独占之下这点上，这届若槻内阁、币原外相同军部和其他统治势力是一样的，但若槻内阁认为，经济力量薄弱的日本，首先应和英美保持协调，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若槻内阁的这一方针引起了军部、枢密院、在野党政友会等的不满，他们要求开展“积极外交”和“强硬外交”。尤其当北伐军即将逼近华北的时候，他们感到危机严重，便想伺机赶快推翻内阁。

恰在这时，1927年（昭和二年）3月，发生了空前的金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浮肿似地膨胀起来的资本，战后仍然未能收敛回来，政府虽然用各种救济措施，延缓了因通货膨胀导致的崩溃，但怎么也挺不下去了。为了救济导致金融危机的各种矛盾的集中所在——台湾银行，若槻内阁向枢密院提出了紧急敕令案。可是，在枢密院内，以袒护政友会的伊东巳代治顾问官为首的一些人，竟不谈敕令案的可否，却始终攻击政府“对华软弱”，否决了敕令案，4月17日，迫使若槻内阁垮台了。

后来，由身为陆军大将、从辛亥革命时期就以强硬侵华派闻名

的田中义一，以政友会总裁身分组成了内阁。外相由田中自己兼任，森恪任外务省政务次官，实际上森恪代理外相。森恪是在中国经营煤矿等事业的三井系统的资本家，与关东军关系甚密，是众所周知的“对华强硬”派。

第六节 为走向“九·一八事变”铺平道路

一、“东方会议”

田中内阁采取的金融危机对策是，拿出近二十二亿日元的救济资金闯过了危机，并清理资本不足一百万日元的银行，确立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第一等五大财阀银行在金融和产业界的垄断地位。

政府一面应付危机，一面以“保护侨民”为名，于5月28日赶紧派两千名关东军出兵山东（第一次出兵山东），妄图在那里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上。接着从6月下旬起，召集军部和与中国有关的外交官及满铁首脑，举行了历时十天的“东方会议”，讨论了对华政策。会上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人主张用“内科的办法”，即用外交和经济手段，捍卫和扩张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东北的帝国主义权益，而军部等人却主张用“外科的办法”，即用军事办法一举解决。会上两种主张互相对立，结论是两者兼用。

7月7日公布了东方会议决定的《对华政策纲要》。“纲要”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来，对于“中国本土”，“要与各国友好合作，共同促进稳健分子（指蒋介石）建立中央政府”；同时表明：“如帝国在华权益及在华日侨生命财产有被非法侵害之虞时，要酌情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明确表示了武装干涉的意图。对于“满蒙”则说，因为“满蒙”“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这是主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前兆），日本负

有“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安居之地”的特殊责任和义务，“万一动乱波及满蒙，对我特殊地位和权益有侵害之虞时……须当机立断，采取适当措施”。亦即坚决把东北四省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为此要有诉诸武力的决心。次日即决定增兵山东。

这就为四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铺平了道路。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日本来独占的企图，在参谋本部乘辛亥革命之机阴谋策划“满蒙独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满蒙独立”阴谋。在东方会议之前，“满蒙独立”本是陆军的部分秘密工作，到了1927年（昭和二年）东方会议以后，具体的时间和办法姑且不论，日本独占“满蒙”的方针已经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公开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根本不是出于军部中央、当然更不是驻外的少壮派军官强烈要求的产物，而是政党内阁、军部和驻外的外交官、资本家代表（满铁）等人汇集一堂，用了十天时间，经过慎重讨论审议、作出决定而公开发表的。而且对于这一政策，在野党的民政党（原宪政党）、资本家团体及其他统治阶级的所有部门，都没提出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对这种政策和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径表示坚决反对的，只有重新组织起来的非公开的日本共产党及受其决定性影响的劳动农民党和其他群众组织。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当中，只有日本劳农党多少表示了反对，社会民众党实际上是赞成田中内阁干涉中国革命的。

在日本田中内阁组成之前，中国蒋介石已经公开背叛了革命。即1927年2月，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合作在武汉建立了国民政府，但蒋介石表示反对，并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解除了工人武装，逮捕了几千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未经审判就全部枪决了。接着，4月18日，蒋介石在英国支持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并宣布排斥共产党。武汉政府主席汪兆铭与蒋介石串通一气，

6月转向反共，9月与南京政府合流。

面对国民党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下定决心进行武装抵抗，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8月1日，朱德等率领的中共军队发动了南昌起义；接着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动了湖南农民秋收起义；10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2月广东公社等进行武装斗争，以及土地革命战争等等。

在此期间，蒋介石政权停止北伐，全力以赴地攻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因而日本在1927年8月把派去山东的军队姑且撤了回来。1928年4月，当国民党政权再次北伐时，日本政府便又急忙从内地派往山东一个师团（第二次出兵山东）。5月3日，驻扎山东济南的日军寻衅阻挠北伐军进攻，双方发生冲突，演成“济南事件”。日本政府故意把这一事件大加渲染，说这是一起杀害日本侨民的事件，以此煽动国民的沙文主义情绪，占领了济南之后，又增派了一个师团（第三次出兵山东。山东日军总数约达一万五千人）。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认为，张作霖若仍留在北京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对日本不利，便动员他撤回根据地奉天。张作霖无奈只好服从，但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却认为，不肯充当日本傀儡的张作霖反而是个绊脚石，便在奉天附近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火车，把他炸死了。早在1916年，关东军就曾试图这样干而失败了，这次竟取得了成功。河本大作等人把这一事件的肇事者捏造成为国民党，还计划以维持“满洲”治安为名，一举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但由于关东军的首脑们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便制止了这一行动。

日本政府、外务省认为张作霖还可以利用，因而对军队的任意胡来甚感恼火，但是却对人民一味掩盖日军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真相，把一切都归咎于国民党。政党、财界和新闻界的首脑们旋即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他们也没有把真相告诉人民，同人民一起责备

军部，而是与政府和军部同唱一个调子，煽动日本人民的反华热潮，同时又把这一事件当作了倒阁的炮弹。陆军当局只是悄悄地让河本大作退役，并未加任何刑事处罚。不止如此，后来河本竟当上了满铁的理事。总之，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于炸死张作霖一事，只是有人责备政治上干得不够漂亮，至于在拉着日本人民执行日本的大方针——企图否定张作霖等中国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地位，宁肯诉诸武力也要把中国东北四省完全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上，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二、伦敦裁军会议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日本三次出兵山东、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和炸死张作霖等，促使中国人民群众把反帝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日本帝国主义。“五卅惨案”以后，英国一度成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但是，英国巧妙地把蒋介石拉拢过去，扭转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矛头。日本占领济南和炸死张作霖，使日本帝国主义想用武力统治中国的企图公开化了，这就加剧了日本同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美英和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都站在同一立场上。结果就成了唯有日本同中国的统治者以及中国人民为敌了。

由于田中内阁对中国的武装干涉过于露骨和拙劣，它在日本统治阶层中也陷于困境，遂于1929年（昭和四年）7月辞职，由民政党的滨口内阁接替，币原喜重郎就任外相。滨口内阁是地道的大资本家政府，实行了产业合理化、紧缩财政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等三大政策。即通过彻底整顿中小企业、降低工人工资、解雇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实行产业合理化，以此促进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压缩财政，收缩通货，以降低物价，提高出口能力（财政紧缩政策）；解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黄金出口禁令，恢复金本位制，开

辟引进外资的途径(金解禁)。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政策，就必须开展币原的“协调外交”。日本政府不再对中国搞露骨的武装干涉，1930年初，参加了伦敦召开的日、英、美、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政府压制海军当局，坚持把大型巡洋舰吨位保持在对美英七成的意见，向英美表示妥协，同意改为六成。这就遭到了以海军军令部为首的军部的强烈反对。他们攻击政府擅自决定兵力违犯了天皇的军队统帅权，枢密院中多数也唱这种调子。但是，政府得到广大人民和财界的有力支持，断然反击军部和枢密院，终于签订了裁军条约。

然而，滨口内阁和币原外交并不是不搞帝国主义了，它只是装扮得比军部时髦些，把招牌涂成资本利益第一罢了。前田中内阁时期，为了“总体战”统制和利用资源，在内阁设立了“资源局”。滨口内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资源局”，并开始了战时产业动员演习和空袭时军用物资的生产和运输的演习。同时，为了准备靠国家同垄断资本融合一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进行总体战，内阁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输出组合法》等，开始了经济统制。由于紧缩财政，陆海军省的经费多少削减了一些，但在财政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反而增大了。政府全力扶植重工业，促进坦克、舰艇和飞机的生产，1931年春，日本首次造出了国产重型轰炸机，同年夏季，首次编制了用国产坦克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对殖民地实行了残酷的高压政策。例如，1929年11月，以朝鲜光州中学生抗议日本人侮辱朝鲜人的运动为开端的学生和工人的斗争，受到宪兵和警察的残酷镇压。1930年11月，台湾雾社当地居民一千五百人，因警察侮辱女性，愤怒掀起了暴动。日本政府不仅调动地上部队，还出动飞机，对部落居民进行烧光、杀光的血腥镇压。

在日本国内，对于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反对战争和反动统治的革命势力，也大肆镇压，远比田中内阁为甚。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的人，1929年是四千零九十二人，1930年达六千一百二十四人，到1931年竟超过了一万人。这些数字从反面证明了左翼势力的发展情况，同时也说明滨口内阁如何扩大解释治安维持法、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在排除“思想国难”的名义下，思想本身也遭到了镇压。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右翼和军国主义分子却放任不管。1931年3月，陆军军官的秘密组织“樱会”，和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势力勾结起来，并吸收部分社会民众党人，策划旨在建立以宇垣一成成为首相的军部独裁政权的武装政变。这一阴谋由于宇垣一成畏首畏尾而失败了，但搞阴谋的军人和民间人士并未受到任何追咎；宇垣依旧担任陆相，对于国民完全隐瞒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滨口内阁的产业“合理化”和通货紧缩政策，造成了经济的严重萧条，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大批工人被解雇，工资普遍下降。

而且，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空前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也濒临危机。工业生产降到危机前百分之三十至七十，进出口也降低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失业者达几十万人，若包括回乡工人在内，超过三百多万。物价下跌，特别是米价和生丝的价格，比过去降低了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农村也变得毫无生气。加上1931年北海道和东北地方因遭到霜灾大歉收，农民的遭遇惨不可言。全家自杀、卖儿卖女、学童缺食等情况，全国农村到处可见。

三、“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对日本统治阶级来说，除了“经济国难”以外，又加上了“思想国难”。视线一转向国外就会看到朝鲜、台湾的反日斗争正在高

涨，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锋芒正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的北伐以 1928 年 6 月阎锡山部队进入北京宣告基本胜利，继张作霖之后统治东北三省的张学良，誓死抵抗有杀父之仇的日本，取消了东北三省独立宣言，与南京政府合作(1928 年 7 月)。他引进英美资本，着手建设威胁满铁垄断地位的铁路和港口。这是公然无视日俄战争后强加于清政府的“秘密条约”的行动。如果照此下去，日本不但不能独占东北三省，最后或许会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及英美资本从东北驱逐出去。

此外，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因经济危机而一筹莫展。社会主义苏联却与此相反，从 1928 年起，成功地执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苏联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间的威信越来越高，影响日益扩大。这就支持和鼓舞了与苏联接壤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斗争，从而更加深了日本统治阶层尤其是军部的危机感。

大日本帝国受到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袭击，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滨口内阁及其幕后的财界，决定首先把恢复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但陆海军军部却坚决反对。特别是陆军认为，如不重视“满洲”的形势，赶紧把它完全变为日本殖民地，并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痛击“赤化的策源地”苏联，就不能把日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日本政府强行签订伦敦条约，使军部和民间的军国主义分子极为愤怒，1930 年 11 月，滨口首相在东京车站遭到受军部煽动的右翼青年的狙击，负了重伤(旋即死亡)。转年，即 1931 年，发生了前述的三月事件。在政府和执政党内，安达谦藏内相和中野正刚等一派，从 1930 年底就策划建立“举国一致内阁”，即为了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内阁。在野党的政友会，不停地攻击政府当局对“满蒙”的“软弱”和“无能”。

三月事件前后，政界和财界人士曾私下传说，今年秋天，好象要在“满洲”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政府和军部竭力为战争做舆论准备。叫嚣“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权益”“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7月，在南满洲的万宝山，关东军特务唆使朝鲜农民同中国农民发生冲突，并把这一事件捏造成中国人威胁日本人生命财产的重大事件来大肆宣传。8月，公布了所谓陆军间谍中村大尉被张学良军队逮捕杀害的事件，煽动说：“日本的生命线满蒙正面临危机”。这时陆军已经宣布改变关东军的配备，作好了临战态势。

在8月4日的师团长会议上，南次郎陆相发表训示，暗示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把训示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在内阁会议上，币原外相提醒南陆相，指出他公开发表训示内容的作法是不妥当的，但对训示内容并未加反对。1930年12月，币原自己也曾就中国方面公布计划建设威胁满铁垄断地位的铁路一事，训令驻外机构“要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此举。此外，若槻首相（在滨口重伤辞职后就任首相）就其在8月民政党大会上的讲演稿，要求内阁会议予以理解。讲演稿中也谈到，“中国的措施如有不当非法之处，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有时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可对此准备有所松懈”，号召进行战争准备。8月31日，在政友会的干部会上，森恪等人组成的“满蒙调查团”报告调查结果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夕的状态”，“确信为了要把日华关系恢复到合理的位置上，必须有待于国力的发动。”干部会同意了这种意见。

四、“上海事变”和“伪满洲国”

总之，包括币原外相在内，无论是政府、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也都和军部一样，决心近期要在“满洲”发动战争，并在大肆制造舆论。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的部分军官和参谋本部的部分军

官合谋,在奉天(沈阳)郊外的柳条沟炸毁了满铁的路轨,并捏造说是中国军队干的,立即出动关东军,攻击奉天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了旨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即所谓“九·一八事变”。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手法发动战争,就连关东军司令官、陆军中央首脑和政府事前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手法发动战争的意图。不过,如前所述,军部中央自不待言,政府和政党也都为在最近占领东北地区的战争下了决心,做了准备。9月21日,日本的朝鲜军司令官在没有天皇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派出四千名(公布的兵员)士兵,越过国境进攻“满洲”。朝鲜军司令官这种明显蹂躏统帅权擅自出兵的干法,不但未受任何责难,反而称赞他英明果断,若槻内阁竟也无条件地承认了这笔军费开支。日本政府一面这样干,一面又再三声明“不扩大事态”,但无论日本国内还是国外,谁都不信。事实上战火一天天地蔓延起来了。

美国虽以激烈的言辞指责日本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①,但它因全力应付经济危机自顾不暇,未能对日本作出任何有效的牵制。

日军为了把欧美列强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们利权集中的上海,1932年(昭和七年)1月,在上海雇佣中国地痞流氓杀害了日本僧侣。借此机会,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方面挑衅,引起冲突,2月,陆军的大部队也在上海登陆,陆海军共同以“保卫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为托辞,2月20日,对上海发起总攻,战火终于笼罩了上海。中国第十九路军,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奋勇抗击日军,日军被打得狼狈不堪。这时,日军基本上占领了整个“满洲”,日本政府和军部于1932年3月1日炮制出来一个由原清朝宣统皇帝溥仪执政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上海方面的战斗已无需再打下去,3

^① 《非战公约》: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1928年,在巴黎签订,参加国共六十余国。——译者

月3日，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以中国军队业已退到当初日本要求的距离以外为理由，声明停战，逐渐缩小战线，5月5日，正式签署了日中停战协定。

美英等列强各国，虽然口头上反对日本侵略“满洲”，但因忙于应付经济危机，不能给日本以有力的还击。另外，内心还期待日本从“满洲”北上进攻苏联，因而对日本采取了姑息态度。由英国控制的国际联盟决定不要立即谴责日本，首先调查“满洲”实际情况。于是以英国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伪满洲国成立宣言发表后不久进入“满洲”。对此，日本当局不加理睬，1932年9月，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缔结了《日满议定书》。议定书只有两条。一，伪满洲国无条件地承认日本及日本人在“满洲”的一切既得权益；二，为了“共同防卫”，同意日军无限制地驻在“满洲国”。这等于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伪满洲国名为独立国，实质上是日本的殖民地。由此可以看到名为独立国实为殖民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殖民主义的“先驱”。

后来，国际联盟调查团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李顿报告书》。报告书认为日本的行动确是侵略，建议撤出日军，但同时又强调东北的“赤化的威胁”，主张把它从中国分开，改为自治区。1933年2月，日本政府不但拒绝了这一建议，而且在热河省发动了新的作战。开战后的2月24日，国联大会根据《李顿报告书》，决定把东北改为由列强各国共同管理的“自治区”，制定了动员日军撤出的劝告案，以四十二票赞成、日本一国反对（只有泰国弃权）通过了大会。日本因此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这就等于宣布日本宁愿在世界上孤立也要继续侵略中国的决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承认伪满洲国和退出国际联盟问题，民政和政友两党比政府和军部还要积极。这些政党人士并不是为了尽量缩小战局和尽快结束战争作出努力。他们虽然反对军部擅

弄权势,但并不反对战争。纵令他们在内部私下议论了些什么,但在人民大众面前,则比军部更加积极地煽动了战争狂热。

第七节 战线扩大,国内法西斯体制的推进

一、五·一五事件

在军部和政府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战争、政党也一味追随甚至比军部更积极地煽动战争狂热之前,他们“保卫日本的生命线——满蒙”的宣传,还未博得人民的响应。战争开始后一个阶段,国民还没有陶醉于战争的狂热。例如:据说在关东军主力第二师团原驻地仙台市,当满铁豢养的军国主义团体“满洲青年联盟”召开煽动战争狂热的讲演会时,台下有三十多个听众大喝倒彩,使得讲演者下不来台,恼恨之余想在讲坛上切腹自杀。还有,象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等主张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钻了政府严格检查的空子,揭露了“九·一八事变”的非法性。当时处于非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及其直接领导下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和文化团体的反战活动也非常活跃。全协登记会员在1931年底就有一万人,至少有五倍于它的工人受到它的影响。

在军部和右翼势力看来,不能利落地收拾这种局面的政党内阁,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开始不久,1931年10月,三月事件的主谋们又在策划新的政变。虽然这次政变又以未遂而告终,但迫于这一阴谋幕后人——军部的压力,若槻内阁不得不于12月辞职,代之以政友会的犬养内阁。新内阁组成的当天,便宣布再度禁止黄金出口,改成通货膨胀和战争财政政策,加强了对左翼的镇压。尽管如此,右翼和军部仍然不满意。

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首脑团琢磨,分别于1932年2月和3月,被“血盟团”——以农民出身青年为主力的

右翼团体——的团员杀害。接着，5月15日，一伙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首相，这就是“五·一五事件”。

对外的侵略战争和对内的法西斯化，两者形成一体，迅速发展起来。由于1932年10月和1933年2月全国接二连三的大逮捕，致使日本共产党几乎遭到致命的打击，1933年6月，被捕入狱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佐野学等人转向拥护天皇制和赞成战争，从此以后，狱内外的党员和共产主义同情者也争先恐后地表示转向，到1935年2月，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作为全国性组织的机能。到了这时，全协、左翼的农民组合、文化团体等也全都崩溃了。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众党和劳动总同盟从一开始就支持战争，全国劳农大众党和它的基层组织劳动组合虽然初期曾经主张反战，但不到一年就转变了方向，1932年7月，社会民众党和劳农大众党合并组成社会大众党，确定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三反主义”和“尊重国体”为纲领。纲领中的“三反主义”，其实是反对共产主义，尊重天皇制、支持战争和法西斯化。

自由主义也遭到了无情的镇压。1933年，京都帝国大学泷川教授被开除公职；1935年春，美浓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说”^①被取缔，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京大事件发生时，京大、东大等全国的学生还展开了捍卫学术自由的斗争，但到了“天皇机关说”被取缔时，哪里都没出现有组织的反抗。

只不过动用了几个师团兵力的局部战争，开战以来还不到四年的光景，左翼和自由主义者们便都轻易地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和侵略战争。每当我们想到这点时，对于现在中国人民把日本帝国

^① “天皇机关说”：日本资产阶级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学说，认为天皇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关，不是日本国家的主体，主权属于国家。以军部为首的法西斯势力认为这个学说损害了日本天皇的绝对主义权力。——译者

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看法，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呢？

在日本国内法西斯化的同时，侵略战争也进一步扩大了。日本继 1933 年春季侵略热河省之后，又侵入了华北。借口是打击扰乱“满洲国”治安的根据地，这和现在美军以打击支援南越民族解放战线的根据地为借口，轰炸越南北方、进攻柬埔寨的作法，如出一辙。对于日军入侵华北，蒋介石几乎毫未抵抗，5 月底在塘沽同日军缔结了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南京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把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划为非武装地区，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从此以后，日本便捏造中国方面违反了《塘沽协定》，以此为借口，扩大并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

二、长征

蒋介石虽然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但对中国共产党却大肆“围剿”。从 1930 年底到 1934 年 3 月，前后四次倾注全力围剿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均告失败。1933 年 10 月，又调集百万大军和二百架飞机，发动了第五次“剿共”。当时王明极左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1934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工农红军不得不放弃江西省根据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奋力追击，对日本的侵略，似乎毫不介意。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随心所欲地发动了侵略东北以后的一系列战争。

然而，对伪满洲国的经营并不顺利。到 1933 年初，日本基本上打垮了张学良等旧军阀的抗日军队，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游击战争却从此活跃起来。1933 年秋，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 年，组建了有七个军的东北抗日联军，其兵力最多时达五万人以上。为了讨伐这些抗日军队，日本不得不投入远比占领初期还多的军队。

伪满洲国的经济并没有取得发展。军部最初曾扬言不许财阀进入“满洲”，但没有垄断资本的合作，经济工作就无法开展。于是立即转而积极欢迎财阀资本，兴办军需产业。但这只是掠夺东北的资源，奴役中国人民，所以，财阀虽然赚了钱，一般产业却得不到开发，再加上无休止的“讨伐”战和日军的掠夺，使得农业生产显著下降。东北三省的农作物产量，战争开始的1931年为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第二年下降到一千五百万吨左右，后来也只保持在一千五百万吨至一千七百万吨上下。东北特产的大豆和小麦受到的打击最大。这样，东北的基本生产人口——农民群众越来越贫困，势必从中不断涌现出抗日战士。

因此，日本的帝国主义分子便以“打击抗日根据地”的惯用逻辑，更加猖狂地侵略华北，1935年5月，把《梅津—何应钦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军队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保证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抗日运动。后来，又炮制了华北居民的“自治运动”，11月，在河北省炮制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①，12月，又策动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建立一个管辖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然不抵抗，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却横挡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面前。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武装抗日，同年7月以后，令抗日先头部队冲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北上抗日，在红军主力部队的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以往的极左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接着又克服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贯彻了毛泽东的北上抗日的方针。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

^① 实际是1935年11月，日军傀儡殷汝耕发表自治宣言，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到同年12月30日，才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译者

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到达陕北，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一年以后，红军的第二方面军也到达了陕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延安定为首都，巩固了陕西、甘肃、宁夏等三省的革命政权，把它作为抗日根据地。长征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懂得：长征是史无前例的英雄史诗；红军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等无法比拟的真正英雄；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在红军长征经过的纵横十一省和两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播下了革命和抗日的种子。

在长征途中，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国，呼吁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斗争。北京学生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反对日本强迫宋哲元建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9日，毅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16日，北京学生不顾军警的镇压，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京的学生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示威运动。在这种压力下，宋哲元也就不能再当百分之百的日本傀儡了。同时，上海等全国各地人民，抗拒蒋政权的镇压，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会。

三、二·二六事件

这时，在日本军部内部，在同是建立军部独裁政权的目标下，“皇道派”和“统制派”^①之间的对立却激化起来。1935年11月，皇道派军官在办公室里刺死了统制派首领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以此为序幕，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26日，东京师团的皇道派军官们率领部下发动了政变。叛乱于第四天平定下来，他们的

^① “皇道派”与“统制派”：两者都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的派别。皇道派主张，必须在拥护天皇的名义下，对现内阁发动武装政变，建立军部独裁。统制派则认为不经政变，也可以实现军部独裁。——译者

军部独裁目标,实际上是由统制派实现了。

事件平息以后,按照陆军要求,原外相广田弘毅当上首相,组成了新内阁,用“广义国防”的口号,在政治、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涂上了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色彩。1936年8月,召开有首相、藏相、陆相、海相和外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规定“在排除北方苏联威胁的同时,防备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迫使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把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属国),筹划我民族和经济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向外南洋^①方面发展”。后来发展成为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与世界为敌的战争。它的最初设想,早在这时就有了萌芽。

二·二六事件和广田内阁的出现,使中国人民更加强了对日本的警惕。1936年5月,中国各地的各界救国会联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11月,关东军唆使内蒙古傀儡军进攻绥远,被傅作义的军队击溃,这就越发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斗志。然而,在绥远取得全面胜利的11月23日,蒋介石逮捕了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开始对救国会进行全国性的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这种卑劣行径的回答,就是12月的西安事变。

被部署进攻陕西解放区的第一线部队司令张学良,要求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进行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后,便于12月12日逮捕了蒋介石,把他监禁起来。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立即赶到西安,在他的说服下,蒋介石签写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誓约而被释放。

这时,战时经济使日本人民的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对于军方的压制越来越有反感。这种动向也反映到国会中去,在议员中也出现了多少批判军部的言论。军部认为广田内阁里还有政

^① 外南洋:日语“南洋”指太平洋西南部各地,内南洋指战前日本委任统治的南洋群岛(加罗林群岛一带),此外各地为外南洋。——译者

党的残余势力,这是不能允许的。1937年1月,便把内阁搞垮了。元老和重臣们推荐原陆相宇垣一成接任首相,但由于军部的反对而流产,改由原陆相林銑十郎组阁。人民对这个内阁的批判十分激烈。在林内阁于3月份解散国会后的大选中,执政党惨败,不仅政友和民政两党合起来拥有绝对多数,而且无产阶级政党也取得空前的票数,有三十八人当选。军部唯恐如再坚持拥护林内阁会连累自己,便把它赶下了台。6月4日,近卫文麿公爵在军部支持下组成了内阁。

四、“柳条沟事件的重演”——芦沟桥事变

军部面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日益强大、日本国内民心背离感到焦虑,内部主张此时应给抗日中国一击的气氛浓厚起来了。1937年7月7日夜,一中队日军正在北京郊外芦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据中队长报告,听到来自中国军队方向的十几响枪声。当中队长急忙集合部下作应战准备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他立即派一名传令员把这种情况报告给驻丰台的大队本部,大队长用电话报告给北京的联队长,接到联队长指示后,做好了战斗准备。

翌日午前一点前已把兵力在指定地区展开。随后三点半左右,又听到来自中国军队的三声枪响。大队长向联队长一报告,联队长命令断然开始战斗。这样,在凌晨五点三十分便开始向宛平县城外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以上是军部对这一事件的官方说法。但是,第一,没有任何关于最初“十几响枪声”是来自中国军队的证据,而且也无法证明这些枪声是实弹射击,仅仅是中队长的主观判断。第二,“失踪”的士兵实际是在大便,集合时只迟到了一会儿,而且中队长没有及时将此情况报告大队长,在大队作好战斗配备后8日午前2时许,中队

长遇到正在前线视察的大队长时才告诉他的^①。

而且曾努力谋求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当时驻北京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少佐,在他写的《中国事变回忆录》一书中写道:芦沟桥事变发生前不久,北京人们就曾担心“柳条沟事件的重演”;东京在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之间也曾私下议论说“七日晚上,华北将要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这个事件是否是日军蓄意炮制的“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很值得怀疑。即使退一步说,中队长的报告属实,中国军队果真开了枪,而故意把这种偶发的小小事件大加渲染的,也是日本军部。驻在当地的日军,早就阴谋占领芦沟桥一带。经过当地日军同中国方面的交涉,在日方的高压下,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终于表示屈服,全面接受了日本的要求,11日傍晚,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事件基本上就地解决了。

然而,就在这一天,东京政府接受了陆军当局的要求,内阁会议决定调动以关东军和朝鲜军各一个师团,日本本土三个师团为基干的步兵、机械化部队和空军部队,派往华北。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天皇的批准。近卫首相还把贵众两院、财界、舆论界的代表邀至官邸,要求各界举国一致团结协作。

在中国,8日,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彻底抗战的号召。蒋介石也迫于人民怒火的压力,17日在庐山同周恩来会谈,承认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全国准备抗战。

在日本军部内部也有人主张“不扩大”战争,但“扩大派”却坚持干下去,政府当局虽然口称不扩大,但在行动上却步步积极地同军部采取同一步调,在煽动人民的战争狂热方面,甚至超过了军部。7月28日,驻华北的日军向北京、天津等地区发动总攻击,到8月4日,占领了京津一带。8月13日,日本海军又在上海挑起

^①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

战端。翌日，日本政府声明：“为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采取断然措施”，决定也向华中派遣陆军部队。

日本就是这样决定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最初把此次事件称为“华北事变”，但到战争扩大到上海以后，又改称为“中国事变”。哪里是什么“事变”，明明是日本发动的空前的大规模战争。

第八节 日本侵略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

一、平型关的战败

在发动战争之初，军部和政府当局根本没有想到这次侵略会演变成决定日本帝国主义命运的大规模的长期战争。陆相杉山元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天皇报告说，用两个月时间结束战争。日本政府在声明“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惩罚不逞之徒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这样稍微灸治一下，中国方面或许会象过去一贯那样，马上就变得服服帖帖的。所谓军部擅自发动战争、政府无奈被牵着鼻子走的说法，纯属弥天大谎。据说近卫内阁里两位政党出身的大臣——政友会的中岛知久平（铁道相）和民政党的永井柳太郎（邮电相），就曾在内阁会议上主张“要趁此机会把中国军队彻底打垮”，比军部大臣还强硬^①，他们也认为这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再者，从中岛和永井的发言还可以看出，即使说这次战争是军部发动的，而政党及其所代表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也积极表示了赞成。因为他们认为马上就可以取胜。

然而，回想远在明治年代，甲午战争是在事先作了十多年的周密准备，并倾注全力主动发动的；而清政府的主要当权人物并无战意，只有李鸿章的北洋军阀勉强应战，因而日本才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日俄战争则是靠英美的大力支援，日本才在优

^① 风见章：《近卫内阁》。

势的情况下媾和的，但在对人民隐瞒真相、灌输取得“伟大胜利”之中，昭和年代的军人和政治家们，竟然自己也确信无疑了。

再说近的，1931年开始的侵略东北战争，以不到两万人的关东军，转眼就打败了二十多万的张学良部队，军事上确实是一大成功。但这次战争也是日本方面周密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在局部集中了优势兵力，还集中动用了对方一架也没有的飞机，出其不意地袭击毫无准备且有内讧的中国军阀而取胜的。塘沽协定和后来日军入侵华北，所以唾手而得，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总司令蒋介石只顾全力以赴地讨伐共产党，根本没有心思抗日。当中国方面有了抗战意志时，如1932年上海战中同第十九路军的战斗，1936年绥远战中同傅作义部队的战斗，日军及其走狗就未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的历史教训，对于那些沉醉于自己创建的“无敌皇军”神话的军部、政府、政党来说，就根本没有装进脑子里去。他们直到如今还执迷不悟，许多群众还在相信军部所作的宣传，以为在中国战线上“皇军确是无敌”。很多历史书对于“皇军”决不是“无敌”的、它们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中经常败北这一事实，也写得含糊其辞。

“七七事变”以后，情况不比过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蒋介石虽然本来无心抗日，但他也不得不同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达五、六亿的中华民族充满了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站在其前头的是以长征的胜利证明了帝国主义根本不在话下的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同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共产党就把原来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总指挥。1937年10月，又把红军主力长征后仍然留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只要抗日，不论是谁，也不管过去情况如何，都一律贯彻了团结的方针，使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从属于反帝的抗日民族斗争；并改变了过去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对抗日地主只实行减租减息。

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象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蒋政权为敌的。政府、军部和政党根本没有察觉到和以前本质上不同的这种情况，竟妄想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取胜。

占领了京津地区的日军，从8月上旬开始，出动二十万军队，分四个方面进攻，到年底控制了北起绥远省包头、南至山东省济南的华北一带。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几乎不战而溃败。

然而，当9月25日，日本出动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四千兵力和一百辆汽车，企图从万里长城的平型关侵入山西省时，尽管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武器装备只是一些少量的旧式步枪，处于显著的劣势，却在平型关附近的公路两侧山地英勇伏击日军，把它彻底打垮。日本空军前来救援，但因双方混在一起展开白刃战，未能进行轰炸。八路军牺牲了一千人，打死打伤日军三千多人，缴获一千多支步枪和很多机关枪、大炮等。八路军的新式武器装备，就是这样完全靠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武器来补充的。

平型关歼灭战，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取得的首次胜利。它完全证明了武器装备处于显著劣势的中国军队也能战胜日本的精锐部队，这次胜利使八路军及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受到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接着，八路军和华北人民在日军的后方广泛展开了游击战，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等地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

二、南京大屠杀

日本以陆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舰队及空军等几万兵力，向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几乎没有前进一步。11月，指派新兵团在上海背后的杭州湾登陆，这才打开了局面。尾随中国军队战略退却之后，12月13日，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蒋政权迁到汉

口。

当时日军残杀了中国俘虏和男女老少市民二十万人（一说是四十万），干尽了放火、抢掠、奸淫的残暴勾当。日军用机枪一次枪杀几百中国人，或把中国人装进船里沉入长江，或挖坑将其用汽油烧死在坑里，或把无数妇女强奸后残酷杀害，等等，可谓极尽残暴之能事。这和一般在战场上常有的个别士兵的暴行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在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西伯利亚战争中，日军就干过这种勾当。后来在同英美的战争中，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也干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勾当。面临顽强的民族抵抗，帝国主义军队就疯狂地干这种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就在它的占领地区干过这种事，最近还暴露美军在越南湄公河进行了大屠杀。

上海沦陷后蒋介石发生动摇时，纳粹德国的驻华大使为日中媾和进行斡旋。上一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防共协定，表面上是日德共同防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是结成了反苏的政治同盟，所以日本对德国的斡旋寄托了希望。特别是参谋本部，警惕与“满洲”接壤的苏联，竭力主张尽早结束日中战争，以便全力投入对苏战争的准备工作。然而，一旦看到日军占领南京已成定局，近卫内阁就认为“无须由连战连胜的日方来提议讲和，而应彻底打垮中国”，于是便对德国的斡旋不再感兴趣，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就在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政权。

由于日本在华北建立了傀儡政权，暴露出要吞并华北的野心，再加上南京的大屠杀等，促使中华民族的抗日怒火以冲天之势燃烧起来，因而连动摇的蒋介石也不敢改变抗日态度了。

日本政府判断，放弃了南京的蒋政权，已经堕落成地方政权，长期抗战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国经济向城市集中的程度很低，在辽阔的领土上，失去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对中国的抗战来说，不但完全不象譬如日本失去京滨、阪神地区那样会受到致命打

击,而且抗战司令部转移到内地,等于使日军更广更深地分散在中国大陆,战略上反而有利。日军的将军、政治家及其周围的人们,为什么没能认识到这个道理呢?

总之,作出如上判断的日本政府,1938年1月16日,由近卫首相发表声明^①。中心意思是:“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真正与帝国协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同它调整两国邦交,为更生新中国之建设而协力。”这个愚蠢透顶的声明,等于日本主动放弃了将来谋求和平的对手,后来连近卫本人也承认这是个最大的失败。这个声明并不是军部迫令发出的,而是由外务省起草、在内阁会议上和在“处理中国事变”的政府最高咨询机构内阁参议会——成立于1937年10月,由陆海军、政党、财界、外交界等统治阶级各种势力中具有代表性的长老们组成——上全体一致通过的。

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如此蔑视中国,作茧自缚,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在中国战线上的日军已达二十个师团,陆军总兵力由开战前的三十万已增加到一百万。如此大规模地征集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在侵略东北的战争期间还几乎没有过。日本凭这支庞大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但其力量却根本达不到周围的村庄,只确保了所谓的点和线,不能控制面,而且所到之处遭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联合的抗日游击队的袭击,狼狈不堪。尽管如此,1938年3月,又在南京炮制了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4月,制定了“开发华北”和“振兴华中”两个国策公司设置法,计划独占华北、华中的中国富源。

三、《论持久战》

随着战争的发展,国内的战时法西斯体制全面加强起来,在

^① 即第一次近卫声明。——译者

“八纒一宇”^①的口号下，大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制定新的治安立法，剥夺了国民的一切自由和人权。1938年3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授权政府随时无条件地统制、动员资本、劳力、物资、工资、物价等一切经济要素的独裁权。在国际上，由于美英忌恨日本独占中国，日本与美英的对立日益加深。1938年7月，关东军在苏、朝、“满”国境的张鼓峰寻衅，进攻苏联，遭到惨败。1939年春夏，关东军在“满洲国”和外蒙古边界的诺蒙坎地区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被苏联的机械化部队歼灭了。

1938年9月，日军想要一举结束战争，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开始了大规模作战，10月21日，占领了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同月27日，又占领了华中的武汉。这样一来，华北、华中、华南等中国最富饶地区的主要城市均被日军占领了。蒋政权又迁到内地的重庆。

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中国必胜，但不是速战速决而是持久战。预见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共分三个曲折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的时期，以运动战为主；第二个阶段，是日本战略保守、中国准备反攻的时期，以游击战为主；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战略反攻、日本战略退却的时期，又以运动战为主。这个预见具有无比的正确性，在战后的今天，大概谁都会明白了吧。

以日军占领广东和武汉结束了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尽管日本政府当初的估计和决策已被证实全部是错误的，但它却没能断然缩小战线向和平方向转变，只是对过去的政策略加修改，1938年1月，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一声明修正了先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即使是国民政府，只要对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示合作，日本政府也将不

^① 八纒一宇：把全世界都变成日本天皇统治下的一家。

予拒绝。

“东亚新秩序”的中心内容就是12月下旬日本政府发表的所谓“近卫三原则”。第一，中国停止抗日；第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签定“日华防共协定”，允许日军驻扎在特定地区；第三，日本侨民在整个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居住权和营业权，“尤其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开发利用方面，积极为日本人提供方便。”如果中国同意这些条件，就和国民政府媾和。第二条的后半部分意味着如果国民党停止同中共联合抗日，日本将协助国民党政府讨伐共产党。

这一声明动摇了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和反共分子。在国民党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兆铭，与日本早有勾结，他借发表近卫三原则声明的机会，逃离重庆，与日本要人进行会谈，靠日本的援助着手准备建立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反共和平”的伪“国民政府”）。蒋介石大总统本人也大为动摇。他对抗日本来就不热心，从此以后，他的主力部队不是抗击日军，而是转而包围共产党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了。

然而，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的对手其实并不是蒋介石或汪兆铭，而是中华民族。汪兆铭投降也好，蒋介石动摇也好，都丝毫没有动摇以中国共产党为先锋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日本就一天天地淹没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正在急急忙忙步日本帝国主义的后尘。只要是帝国主义分子，无论比较开明的贤达，还是愚昧的蠢才，在人民战争面前，只能走完全一样的道路，这似乎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第九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中战争

一、日、德、意“三国同盟”

当日本淹没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1939年

9月，纳粹德国以闪电战侵入波兰，开始了欧洲大战。英法立即对德宣战，美国也表示支援英法。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后随即侵入华北；1937年开始全面侵略中国；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同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新武装；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这一系列战争，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世界的协定遭到武装践踏，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现在，欧洲大战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与英美的对立加深了，在欧洲大战之前，日本业已同德、意缔结了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与英法发生战争以后，实际上同美国也形成了敌对关系，于是日本同德意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1940年5月荷兰政府、6月法国政府分别投降德国，英国也因遭到德军的大规模空袭，无暇顾及远东，于是日本便乘机迫使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当局同意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河内。

这时，中国战线上的日军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到了1940年，中国方面多次进行局部反击，日军一再陷于被动。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的南宁战役和1940年6月前后的宜昌战役中，中国军队多次对日军展开局部反击，使日军陷于苦战境地。华北的八路军也把日军打得疲于奔命。这样一来，用军事手段解决日中战争的希望已经破灭了，这一点就连将军和参谋们也都不得不有所觉悟了。

况且，当时日本的战时经济已经一筹莫展。基本物资极端缺乏，劳动力应征入伍，肥料供应不足，农业生产开始下降，战时食粮也难以保证了。日本军部和政府对于国民大众的艰辛苦难，只要它不致酿成反政府的政治行动就毫不介意，但对于石油、橡胶、锡

和军粮的不足却大感为难。于是，他们的视线便转向了那些资源丰富、在广田内阁时期早已覬覦的东南亚地区。

再者，日本军部认为，由于有一条从香港、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通往重庆运送战略物资和武器的“援蒋通道”，所以蒋介石才能继续抗战。这正和当前美国认为，南越民族解放战线是靠“胡志明小道”从北越和中国不断得到补给才能打仗的想法一样。在人民战争中，只有人民的无穷力量才是首要的根本抗战力量，帝国主义看不到这一点，而竟自觉不自觉地把抗战归因于“外援”，这是古往今来、日本和美国的共同特点。

于是便引出这样一种逻辑，即为了结束“圣战”，可以进行切断“外援”来源的作战。其实本来目的是要占领那块地方，而美军轰炸越南北方和进攻老挝、柬埔寨等地也就凭这套逻辑“正当化”了。同样，1940年，日本为了侵略富于日军必需资源的东南亚地区，军部和政府当局也是把“切断援蒋通道”说成是“大义名分”，乘法国处于困境之机，迫使法国同意日军进驻河内的。日本还迫使统治香港、缅甸的英国封锁了“援蒋通道”。

日军进驻河内证明了日本急于南进。美国把英、法、荷等国对日本的敌意扭在一起，促使它们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在此期间，1940年7月组成的第二次近卫内阁，积极鼓动德、意结成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公开与美国为敌。三国同盟促使美国下定决心，在不久将来发动对日作战。

三国同盟把欧亚两洲的战争结合起来，成了把战争推上名副其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条纽带。盲目崇信希特勒的日本陆军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日中战争同对英美战争以及世界战争结合起来加以解决。1940年11月13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要纲》，内称：“想来想去，孤立地解决中国事变几乎没有希望。只有把中国事变的解决，作为综合欧亚的国际大变局

(即世界大战)之一环,才可望实现”。据杉山参谋总长说,近卫首相和松冈外相都主张:“现在这种情况,中国事变没有解决希望。向南方扩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事变。应该把用于中国力量调往南方”。

二、法西斯三国与统一战线

1941年6月,德国突然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起了大规模侵略战争,妄图以“闪电战”迫使苏联屈服。这种幻想使日本军部和政府认为,德国此举将促使他们更加轻易地取得南进的成功。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西贡,美国看到这种情况,也决心发动对日作战。12月8日,日美战争打响了。

由于德苏战争和日美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三阶段。如果以日本为主体来考虑的话,日中战争也分三个阶段。即从1931年9月至1933年3月热河战役为止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是第一阶段;此后,转入侵略华北的准备阶段,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战争进入第二阶段;1941年12月,日本与美英开战,把日中战争变成了世界大战的一环,从此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这次世界大战具有四种性质。按其出现的顺序来说,第一,是日意德帝国主义分别向中国、埃塞俄比亚、欧洲弱小国家等进行侵略,并攫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对此则是中国等国家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纳粹占领下的西欧各国人民的抵抗,也是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第二,是德意与英法、日本与美英等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战争。第三,是纳粹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侵略战争;在苏联则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防御战争。以上三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综合起来,便产生了第四种性质,即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集团,与第一种性质里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及第三种性质的苏联保卫

社会主义祖国的防御战争结成同盟，结果便形成了民族解放势力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虽是帝国主义但不是法西斯的国家对抗法西斯三国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争。

在日德意力量强大的时候，第四种性质暂时掩盖了第二种性质，但随着三国走向失败，第四种性质便逐渐淡薄起来；一旦三国失败接近定局，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势力以及苏联固有的对立，又全面地暴露出来。到那时，它们甚至企图利用已经战败的日德意法西斯势力。例如，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就曾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还利用了已投降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人。

日本通过三国同盟和日美、日英战争，把日中战争同欧洲战线和苏联战线直接联结起来了。日本军部和政府暗中盘算，通过德意（特别是德国）征服欧洲和苏联，日本攫取整个东南亚的英、法、荷、美的殖民地和当地的资源有了保障；在对美、对英战争的同时，自然也可以保证侵华战争的胜利。然而，事与愿违，已被侵华战争拖得软弱无力的日本战斗力，由于对美、对英战争的开始，更加重了不可估计的负担。德意的战败加速了日本的战败；同盟国对德意的胜利，大大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意志，提高了战斗力。

同时，中国的抗日运动同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民族的抗日斗争结成了一条战线。

日本一举占领了英、法、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日本的占领统治是一种比英、法、荷、美等殖民者更加残酷、只取不予的掠夺，所以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便由反对旧殖民帝国一变而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它们同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在同中国接壤的越南，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同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些抗日民族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援了旧殖民帝国的对

日战争。日本凭“大东亚战争”把亚洲各族人民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东南亚各族人民同旧殖民帝国一起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后来也不允许旧殖民帝国卷土重来再当他们的主人，是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

三、真正的胜利者

日美战争一开始，1942年1月，美国就把史迪威派到重庆，令其担任印度、缅甸、中国战线的美军总司令，并经印度和缅甸向重庆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和军需品。此举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为了加强当前的抗日力量；其二是为加强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创造条件，但当时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上。前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和第四种性质，当时表现为后者占有优势。

可是，蒋介石自转移到重庆以后，不但不抗日，反而把重点放在反共上，而且越走越远。1941年1月，悍然搞起近乎1927年4月反革命政变的背叛行动（皖南事变），欺骗新四军，一举包围了新四军司令部，逮捕了军长叶挺，几乎歼灭了他的部队。美国对蒋介石的如此援助，几乎不能说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援助。史迪威本身和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为了增强国共合作的抗日力量，向蒋介石施加了压力，但美国派到重庆的航空部队指挥官陈纳德却与史迪威对立，支持蒋介石反共。美国总统罗斯福则适当地操纵了两者。

1944年夏季，美国在太平洋战线上发起对日强烈反攻。在欧洲，意大利已经战败，德国的彻底战败也已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对重庆的援助，专是为了战后统治中国创造基础。10月，美国政府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罢免了史迪威，接着又把驻华大使由高斯换成赫尔利。赫尔利扶植蒋介石，极力支援其反共，并妄图以“为了打倒日本，要统一中国所有的军队”为名，取消八路

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的独立性。^①

中国共产党当然就皖南事变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但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应该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加强了党和人民军队的独立性。新四军在陈毅代军长的带领下，加强了同人民的联系，使长江以北的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一年以后，新四军兵力达十余万人，华中解放区人口达两千万人。

日美开战前后，从1941年到1942年，日军以八十三万兵力进攻了华北解放区。为了反击日本的侵略，民兵积极协助八路军作战。他们挖掘了稠密的地道，展开了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的“地道战”、在敌人前进道路上埋下无数土法地雷的“地雷战”、民兵三三两两象麻雀似地神出鬼没消耗敌人的“麻雀战”等等，真正发挥了人民的智慧，施展了独创的打法。

经过两年的激烈战斗，八路军的兵力从四十万减少到三十万人，解放区的人口从四千多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人。但是，1943年以后，八路军和解放区又重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驻华日军除去偶尔在华中、华南进行短期大规模作战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把总兵力的六、七成都用在同中共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的战斗上了。南京的傀儡“国民政府”的军队，并不抗日，专门反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1944年转入局部反攻，这一年在全国进行了两万多次战斗，使日军损失了二十二万多兵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总共发展到七十九万人左右。

在1945年4到6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共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九十万正规军和二百二十万民兵，控制了

^① 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本文引自小此木真三郎：《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第3编，第2章。

九千五百万人口(比当时日本全国人口还多)的解放区。后来继续迅速发展,8月时正规军兵员超过一百万,解放区人口超过一亿。总之,194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在军事上也不断扩大了对日军的胜利。

相形之下,蒋介石唯恐抗日会损失他的嫡系部队,对日军几乎没有抵抗,所以日军才敢以十三个师团的大军从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悍然发动了打通大陆的作战,打通了京汉、粤汉两条铁路,一时占领了桂林、柳州和南宁。日本只大肆宣传这点,仿佛日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仅军队和政府本身抱有这种幻想,而且日本人民也被灌输了这种幻想。为了进行这种大规模作战,抽调了占领区的守备部队。守备部队一经抽出,人民军队就立即在那里建立解放区,并巩固下去。正当日军自信大陆已经打通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广大人民已经开始把两千多公里长的战线切得稀碎。日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的航空基地,到1945年,大部分也不得不放弃了。这样,日军的“世纪的大作战”便以巨大牺牲而告失败。

在此期间,不论缅甸战线,还是太平洋战线,日军到处遭到惨败。由于空袭,本土被烧成一片瓦砾,冲绳岛的守卫军连同十五万居民全被歼灭。8月9日,苏联参战,关东军也垮了,8月15日,天皇终于不得不接受同盟国的对日《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并向全军和全国人民广播出去。

跋

日本的当政者们宣称,“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虽然败于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是战胜了它”,很多国民也深信不疑。其实,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完全歪曲。它说明,对于侵略中国东北以来长达

十五年的侵华战争，日本人至今还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自我批判。

本来，自从日本与美英开始战争以来，日中战争就“走进了死胡同”，所以没能取胜。坦率地讲，即使局部的战斗打赢了，在整个战争上却打败了。

这一点，前面已作了具体说明。而且，日美战争最基本的争执点，早在日俄战争后不久就开始了，日美争夺在中国的霸权，终于达到了极点。日美战争的主战场是西南太平洋，但对日本来说，对那一地区的侵略，比起“结束中国事变”来是次要的。

所谓战争的胜利，是指达到战争的目的。而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无论在哪一阶段，都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失败了。在第一阶段侵略东北的过程中，日本固然炮制出了一个“满洲国”（仅就此而言算是胜利了），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没能使“满洲国”安定下来。也就是说，未能达到战争的目的，所以日军转而入侵华北，不久便开始转入第二阶段——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在第二阶段，战斗虽然打赢了，但就达到战争目的而言，则比第一阶段的失败更为惨重，因而发生了第三阶段的太平洋战争。

在第三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投入了侵华战争。日美开战当初，日本陆军总兵力的配备情况是，一成留在本国，三成配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四成配置在东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二成派到南方。配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军队，肩负确保中国内陆战线的任务，具有第二线的意义。就是说，陆军总兵力的七成用于侵华战争。战争结束时，日本兵力分布情况大致是：日本本土二百四十万，朝鲜和中国东北一百万，东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一百万，南方一百万。留守本土的部队，大部分是新编的，没有足够的装备；派到南方的一百万兵员分散在孤岛上，丧失了战斗力；中国派遣军二十七师团一百万兵员及配置在朝鲜和中国东

北地区的军队,是最有实力的部队,仍然是日本陆军的主力。

就是这支日本陆军的主力部队,也未能在中国大陆上保住点和线;好不容易占据的“点”,如同分散在六亿中国人民抗日大海中的孤岛一样。在战斗方面,如前所述,自1944年以后,日军在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局部攻势下,也陷于失败。所谓日本在中国打赢了的说法,正如前述打通大陆作战那样,把利用蒋介石回避抗日、反共第一的作法而一时取得的局部胜利,偷换成达到战争目的即胜利,进而扩大为一般,仿佛在侵华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没有接受美国的援助,同亚洲的抗日民族斗争联合起来,打败了日本。不但如此,而且还是在克服了受美国全面援助的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的情况下战胜日本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以蒋介石为走狗,挑起了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又进而粉碎了美蒋的一切阴谋,建立并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上就是长达十五年的日中战争的结局。这也是溯至明治维新以来包括国民在内的日本人一贯蔑视、侵略中国的总结算。我们日本人民从这段历史的严肃事实中,到底能全面地汲取多少教训,这将关系到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将来。日本战败后,蒋介石曾经毕恭毕敬地对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等人,不把日军当战俘对待,口称“以德报暴”。当时以及后来历代的日本统治者把这说成是蒋介石的恩义,用来作为勾结蒋介石的唯一最大的借口。然而,蒋介石那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利用冈村等人同中共打内战。不管蒋介石玩弄什么伎俩,也不管美国如何帮助他,被人民所抛弃的蒋介石终于不得不逃出大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尽管过去吃了日本那么多苦头(侵华战争中日本杀伤一千多万中国人,掠

夺和破坏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财富)，但他们还是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这才真是“以德报暴”呢！当我们紧握中国人民的友谊之手时，日中关系最初两千年睦邻友好的历史便跃过近一百年日本侵略和敌视中国的历史，现在又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